

高潔的靈魂



高 耀 潔 回 憶 錄

增訂版

高耀潔 著

「民間防愛第一人」高耀潔教授親筆撰寫以八十三歲高齡踏上流亡路的種種酸苦！

我從來就沒有想當個什麼英雄。但是，是誰把那第一個愛滋病患者送到了我的面前？使我從那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誰讓我是個醫生，誰讓醫生的天職是治病救人，誰讓我從小就在聖賢的教育下長大，誰讓我見了受苦難折磨的人就難以心安，誰讓我見了黑暗和罪惡就怒髮衝冠……

目錄

高教授帶給我們什麼（增訂版序言）

仁者之怒（代序）

前言

上篇：高氏家族和我退休前後的生涯

第一章 我的童年及青年時代（從我記事起-1960年）

第一節 出生於名門望族

- 一 我所知道的高氏先人 4
- 二 我的父輩及其子女們 9

第二節 高新莊村

- 一 我記憶中的高新莊村 19
- 二 回憶復現幾個典型建築物 25

第三節 擺脫封建枷鎖

- 一 我的童年 29
- 二 戰爭年代遷居開封 33

第四節 我的學生時代

- 一 我的中學時代 36
- 二 流亡學生生活 40
- 三 在國立河南大學醫學院讀書的日子 42

第五節 成為一名婦產科醫生

- 一 做婦產科醫生苦中有樂 48
- 二 我在生育期是怎樣工作的 53
- 三 我是個好醫生，不是個好媽媽 56



第二章 三次災難我是怎樣度過的（1960年-1974年）

第六節 職業使我暫時倖免災難

- 一 下鄉參加醫療隊 62
- 二 我在農村醫療隊的生活 65

第七節 在災難中死裏逃生

- 一 文革的疾風暴雨劈頭而至 69
- 二 我自殺未遂後的誓言 72
- 三 「牛棚」裏的苦難生涯 75

第八節 母子兩代人的鐵窗歲月

- 一 兒子被我株連冤獄三年 82
- 二 我在勞教場的十三個月 86

第九節 兒子的冤案判決與平反 91

第十節 奇特的判勞教及平反 98

第三章 我重返專業的工作生涯（1974年-1995年）

第十一節 既壓復起，重返專業

- 一 調往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科工作 108
- 二 我在該醫院婦科環境無用武之地 110
- 三 選擇單項病種開展工作 113

第十二節 果剛之氣仍不衰退

- 一 在全市各大醫院尋找住院困難的病人 117
- 二 聽從指揮的無奈和內疚 119
- 三 開展惡性滋養細胞腫瘤的治療工作 124

第十三節 繼續深造攻克醫學難症

- 一 北京協和醫院進修學先進經驗 129
- 二 中醫一附院成了絨癌、惡葡的治療中心 130

三	獲得河南省科技二級成果獎	133
第十四節	退休前後的熱忱	
一	創辦新疆婦產科班的來龍去脈	140
二	我無力支持現有工作	146
三	退休後不接受醫院復聘	147
四	面向社會宣傳婦女保健	150
五	發現性亂與性病劇增	152

下篇：退休後遭遇的愛滋風雲

第四章 由打假至關注愛滋病（1996年-2001年）

第十五節	調查遊醫、假醫、假藥等社會弊端	
一	打假「性病遊醫」怎一個難字了得	160
二	發現大量假醫假藥	162
第十六節	贏得當時河南省領導的支持	
一	河南省領導支持我打擊假醫假藥	169
二	由此帶來了禍患	172
第十七節	走近愛滋第一步	
一	一次會診的奇遇	177
二	他家為何走向滅門絕戶	180
第十八節	進一步認識愛滋病的病源	
一	得知愛滋病疫情多在農村	185
二	宣傳預防愛滋病真困難	193
第十九節	「血禍」的危害	
一	都是「血漿經濟」惹的禍	203



	二 愛滋病病人的求生欲望	210
第二十節	目睹愛滋病禍患	
	一 無奈患者自殺知多少	216
	二 愛滋家屬的無助	222
第五章 「血禍」及後遺症（2001年4月-2007年3月）		
第二十一節	愛滋病受害兒童的慘況	
	一 愛滋孤兒現存三大問題	236
	二 這三個四歲孩子的遭遇比孤兒還慘	246
第二十二節	愛滋孤兒的遭遇	253
第二十三節	真正關注愛滋孤兒者來了	
	一 杜聰來了	268
	二 杜聰說：急救愛滋如救火	273
	三 高燕寧來了	278
第二十四節	發現愛滋新情況	280
第二十五節	特殊的噩耗	
	一 2005年「三八節」她來了	289
	二 輸血感染愛滋病者何其多	295
	三 直至近日「醫騙子」還如此猖狂	301
第二十六節	愛滋領域內的官司	
	一 愛滋病病人訴訟無門	304
	二 極力打擊愛滋病患者的上訪	305
第六章 深感防愛工作的艱難（2007年至今）		
第二十七節	黑雲壓城半個月（上）	
	一 「生命之音」成了災難之始	314

	二 不祥的先兆	315
	三 圖窮匕首現	317
	四 「說客」盈門	320
第二十八節	黑雲壓城半個月（下）	
	一 株連九族	324
	二 「捉放曹」之謎	326
	三 尾聲	332
第二十九節	我為中國最窮的人而來	
	一 我是偷着跑出去的	337
	二 在美國的演講與參觀	341
	三 頒獎台下的風波	344
	四 希拉里的好奇目光	347
	五 我是英雄嗎？（代結束語）	350
第三十節	難忘的菲律賓之行	
	一 我為何不聲不響去了菲律賓？	353
	二 作家的一次另類採訪	356
第三十一節	八十三歲踏上流亡路	
	一 笑臉後的「招安」陰謀	362
	二 網在收緊魚在跳	366
	三 躍出羅網——為的是說出真相	372
第三十二節	生命的最後衝刺	
	一 「孟夫子之謎」：魚與熊掌的選擇	377
	二 知其不可而為之	382
	三 隔洋回眸望家國 殷殷期望寄後生	387



附件 著作、獎勵與遺囑

一 著作	393
二 各項殊榮	394
三 遺囑	402

附錄

附錄一：爬坡者的足迹	404
附錄二：白醫戰士孤膽鬥遊醫	409
後記	417



高教授帶給我們什麼（增訂版序言）

高教授，
我必須告訴您，
愈讀您的文章，
愈了解您的往事，
我愈被您感動！
高教授，
您實在太讓人敬佩了!!!
平凡的我，
曾經有幸與您相見，
實在深感榮幸。
這陣子，我在工作上遇上很壞的人和事，
本來心情糟透了，
但當我讀高教授您的文章，
我深深覺得，
跟您所經歷過的磨難相比，
我所面對的「挫折」、「不開心」，
實在太太太微不足道了，
想到這裏，我一咬牙，便當繼續努力下去。
高教授您實在讓人尊敬，
雖然我沒能在愛滋病等等的工作上作出貢獻，
但曾經為您的自傳出過一分力，
也是一種榮譽。
多謝您給我這樣的機會。

這是2010年8月15日，我寫給高耀潔教授的電郵中的其中一段，一字一句，都是真心話。

有幸與高教授本人見過一面，那是2008年的事，當時她難得地身在香港，我們在她下榻的酒店的西餐廳內談了一會。當時她給我的印象，也如在電視上見到的沒差，一個八十歲垂垂老矣的婆婆，幹嗎要擔當起那麼重大的使命來呢？是什麼讓她挺下來呢？

那次，其實我們「談」的也不多，她的口音很重，坦白說我這小輩其實不大聽得懂她在說什麼，而她大抵從我臉上的迷惘表情也看得出我的困惑，於是轉而用寫的，由是，我的筆記本子上，還保有幾頁高耀潔教授的眞迹。

在那短短的會面中，高教授給我們說身世、背景、中國的愛滋疫情，每談到她自己年事已高，卻在內地受軟禁等等的情況，她便忍不住落下淚來。但在自由的香港長大的我，當時其實沒多大感受，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慚愧。

回說《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這書。

這書在2008年在香港出版，成書之路說來轉折，因為身在國內的高教授一直被監視、受軟禁，並不能跟「外面的人」直接聯繫，稿件的修改校正也需倚仗其他人士轉折交代代領，好不容易才能定稿出版。

然後，兩年後的某天，突然收到高教授本人發來的電郵，她說她終於成功抵美，情形比較能自己控制，而有見原書的內容有未善之處，於是希望能修訂內容，再次出版。

而我，也趁着這次再版的機會，又重新拿起此書，細閱這顆高潔的靈魂。這書分成兩部分，「上篇：高氏家族和我退休前後的生涯」是高教授的自傳，童年、戰亂、當流亡學生、當上婦科醫生、下鄉、文化大革命、被批鬥、自殺未遂、兒子冤獄、被勞改……透過閱讀她的身世與苦難，我們其實也在閱讀中國近代史。高教授的每段經歷，也是磨難，而且，磨練出她那不屈的人格。此書第二部分，即「下篇：退休後遭遇



的「愛滋風雲」，則是中國愛滋病疫情的詳細總論。從打擊性病遊醫，到遇上第一個愛滋病人，繼而揭發中國內地因為人民賣血而引起的災難性愛滋疫情，一直描述至她因此而被打壓、監視、軟禁，有獎領不得，連帶其他跟她有聯繫的人均被監控或教唆出賣的等等情形。

我輩身在香港，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即使我們會在新聞媒體聽到內地異見人士被軟禁等等的新聞，有時仍很難想像被軟禁是什麼一回事。但從高教授毫不矯飾的描述卻感受到當中的無助與無奈。被軟禁，那可與自己選擇不上街留在家裏打發時間不同，那是失去了自由，失去了選擇的一種特殊的狀態。那種心境與行動上的限制，大抵非筆墨所能形容。

再計一計年份，更難以釋懷的是，這場愛滋災難，其實並不是發生在很久遠的年代，那是發生在眼前的事，而且是未有句號的，沒定案的，大有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真實死難人數的。我自己也有小孩，能想像得到那些愛滋孤兒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庭後悲哀的成長路，他們心理上的扭曲發展，他們長大後會對社會做什麼事，他們會如何教育他們的下一代……那些是將來的事，但那些將來卻都是從今日開始的。而今日，我們又能如何？

此外，此書在2008年出版的時候，高教授仍身在內地，故原書的內容也是寫到當時為止。現在的修訂版本新增交待了其後的事情——高教授為什麼以八十三歲高齡，最終也得踏上流亡之路，與及到達美國後至今的生活。

其中，最讓每一位讀者、每一位母親心痛惡絕的，會是高教授提到，她的女兒寫給她的，那封內容充滿怨懟咀咒的信！皆因她自覺一生的事業家庭幸福都被身為「高耀潔的女兒」這身份毀掉了！讓自己的女兒給自己寫下這樣的信，我能體會高教授心底裏的痛，也更敬佩她身為醫生、為愛滋病患者所作的犧牲！

最後，請留意高教授把她的遺囑也收錄在這書中去。為什麼她要這

樣做？爲什麼她要連遺囑也向所有人公開？當中反映的，是不是更值得我們深思？

我常常想，現在市面上出版的書，有些銷情很好很賣錢，但那些不一定是內容值得細味的書，大抵只可稱爲「流行讀物」吧；有些書內容不錯，我們讀後會有些啓發會學到一些東西；但更稀罕的，是有「價值」的書，這些書未必暢銷，但有內涵、有價值、有歷史意義。我敢說，這本《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便屬這類了。

霍詠詩

明報出版社

2010年10月20日



仁者之怒（代序）

這是平庸的現代世界中一個神異的傳奇：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的愛滋病患者、孤苦無依的愛滋孤兒，還有眾多患有腫瘤的婦科病人、受到其他婦產科疾病痛苦折磨的夫妻，都川流不息地向鄭州市黃河路上一所簡陋的兩居室小屋湧去。那裏是他們心靈的聖殿，他們在痛苦絕望的生活中到這裏來尋求陽光和安慰。

這裏住着一個年過八旬的現代聖者——高耀潔教授。

她並沒有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但飽受死亡恐懼折磨和世人輕蔑的愛滋病患者，總能從她那悲憫的關切和天使般的笑容中得到難得的安慰；那些因貧窮而賣血和因求醫而輸血卻不幸罹患此絕症的人，在這裏都可以得到真誠的同情和支持；成百上千失去父母的愛滋孤兒獲得了這位慈祥老人的慷慨救助；而當年她救活的絨癌病人也來看望她；多年不能生育的夫妻經過這位醫術高超的婦產科專家的治療和指導，終於使自己恢復了健康……十幾年來，這位家境清貧，生活儉樸的老人把一生的所有積蓄，包括近年獲得國際獎項的全部獎金總共上百萬元，都用於對愛滋病患者和愛滋孤兒的救助，以及購買書籍、印刷資料以普及防治愛滋病的知識上，從而獲得了「中國民間防愛第一人」的美譽。

但是，「高耀潔」這個名字傳遍了世界，主要還不是因為這些慈悲善行。

震動世界的是高耀潔的憤怒，仁者之怒，天使之怒。

走近高耀潔的人有一個共同印象：這是位愛心四溢的忠厚長者，是個心直口快的天真老人。當她和來自社會底層的平民在一起的時候，目光是那樣純淨，語言是那樣坦誠生動，發自內心的笑聲更是富於感染力，她就像是個傳播溫暖和希望的天使。但是，近年來，這「天使」卻常常處於深沉的激憤之中。每次見到她，我總會聽到憤怒的話語從她的

胸腔裏連連爆出，看到憤怒的眼淚在她那佈滿皺紋的臉上縱橫流淌。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已經成了一個隨時會爆發的憤怒炸彈。

使她憤怒的有兩件事：一件是當局對愛滋病氾濫的嚴重情況的百般掩飾和惡意歪曲，一件是對她人身權利的非法剝奪和對她人格所進行的無恥誹謗與污辱。

高耀潔對愛滋病的關注始於十二年前。當時她已將近七十歲，退休在家，正準備開始過一個退休醫生的安靜晚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她發現，愛滋病這個似乎還遠在天邊的魔鬼，已經悄悄地來到了中原大地上。「白衣天使」的責任感使她警醒起來，「位卑不敢忘憂國」，仁者情懷激勵着她行動起來，她開始深入中原大地，自費開展了愛滋病調查。調查的結果使她震驚：河南不僅已經有了愛滋病的傳播，而且相當嚴重。用她的話來說，全省一百一十七個縣區，已經沒有空白點！更使她震驚的是，愛滋病在這裏的傳播途徑與世界各地的傳播規律均不相同，高發人群絕大多數不是吸毒者和性亂者，而主要是老實巴腳的賣過血的貧窮農民，以及因病到醫院求醫的被輸血者；主渠道是血液傳播——賣血和輸血！這種情況不僅限於河南，而是全國性的災難，河南省是從山西省學來「賣血致富」的「經驗」，而早在1988年，河北省主治醫師孫永德已發現血庫存血已被愛滋病病毒污染，他層層呼籲無效……而這場災難正是90年代初政府提倡的「血漿經濟」帶來的惡果。她得出了結論：這是一起世界罕見的由於政府瀆職而造成的公共衛生危機。

從此，這位耄耋老人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雙方力量絕對不對稱的「一個人的戰爭」。這場「戰爭」大約可分為兩個階段：

從90年代中期到2003年，是第一階段，鬥爭的焦點是「河南省到底有沒有大規模的愛滋病疫情」。

這位無權無錢、赤手空拳的退休老人只有一個武器：動員輿論。她廣泛聯繫全國媒體，把自己調查的結果和一個個病例告訴記者們，為他



們的採訪提供線索和指導。她還自費印刷了大量宣傳品，廣為散發。

政府的立場是絕不承認河南及其他省市有愛滋病的大面積傳播，調動了國家機器的強大力量，三令五申禁止媒體報道愛滋病的現狀，特別是河南省，甚至派出大批幹部警察，到愛滋病疫區設崗放哨抓記者，攔阻採訪，並追查向記者提供材料的人。高老太太在這一時期成了「重點監控對象」，她的門外經常有身分不明的人巡弋監視，她的名字也列入了媒體報道的「禁區」。因為採訪和報道愛滋病，多家媒體受到嚴厲警告，一些記者編輯還受到處分。很多北京和廣州的記者談起那時的採訪經歷，都心有餘悸，說是進了河南愛滋病疫區就成了「地下工作者」。

這場「戰爭」的第一階段以高耀潔的「有限勝利」告終。2003年，吳儀副總理來河南視察了愛滋病疫區，並接見了高耀潔，聽取了她的對愛滋病問題的意見，從此，關於「河南有沒有大規模的愛滋病疫情」的爭論便畫上了句號。河南省向疫情最嚴重的三十八個「愛滋病村」派出了工作隊和醫療組，便是對早該正視的現實的默認。但這只是個「有限勝利」，因為直到今天，河南到底有多少愛滋病感染者，傳播的範圍究竟有多廣，公開的數字還是讓人難以相信。最明顯的是，除了那三十八個村子之外，還有大量的愛滋病感染者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和救助。與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相同的省份更是如此。而讓人氣憤難平的是，造成這場「血禍」的責任者竟然沒有一個受到追究和懲罰，當局也沒有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對這樣惡性的事故說一句道歉的話。

從2003年到現在，「戰爭」進入第二階段。鬥爭的焦點轉變為「愛滋病大範圍傳播的原因是什麼」。

官方的說法是，河南愛滋病傳播的主要渠道是吸毒和性亂，而不是血液傳播。言外之意是這是一種「髒病」，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最近，河南省一位高官在北京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時，唱的就是這個調子。按這種說法，那些不幸的愛滋病感染者就被推到了道德的審判台上，他們的不幸是「咎由自取」，責任主要應由自己承擔。政府對此

是沒有責任的。

而高耀潔則以自己的調查數據和大量的病例證明，直到現在，因賣血和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數量仍然居高不下，血液傳播仍然是傳染的主渠道。特別是有大量病例說明，很多患者是在醫院裏輸血時被不潔的血液製品感染得愛滋病，「血禍」仍然在氾濫，政府和醫療衛生單位的責任不可推託。可敬的高老太太利用國內外的各種講壇正在不斷重申這一觀點。

高耀潔還激憤地指出，那些本來矢口否認有嚴重愛滋病疫情的官員們，現在突然發現了愛滋病原來是一棵「搖錢樹」，光世界衛生組織和海內外的慈善機構捐助的善款就數以億計，一些貪官污吏也趁機伸出黑手，到這裏來「分一杯羹」，愛滋病重災區上蔡縣那位姓楊的巨貪就是典型的一例。還有不少所謂的「科研單位」和賣野藥的遊醫，也趁火打劫，紛紛聲稱自己發明了專治愛滋病的「特效藥」，到愛滋病疫區招搖撞騙，這些醜類有後台，有保護傘，所以他們能從愛滋病患者口袋裏掏錢。高耀潔多次發表聲明和遺囑，她本人不接受任何以防治愛滋病名義的捐款，也不承認以她的名義組織的基金會和募捐活動，就是為了防止她的名字被這些醜類利用。

看來，這場「戰爭」仍然沒有盡頭，高耀潔的憤怒也不會很快平息。

最近導致高老太太盛怒的還有一件事，就是她的人身權利受到愈來愈粗暴的侵犯。這些年來，監聽電話，跟蹤盯梢，和各種各樣的騷擾，對她已是家常便飯，早就見怪不怪了。但是2007年春節前，因為她應美國總統競選人克林頓夫人希拉里的邀請，要去美國領獎，河南當局竟然對她實行了長達半個月的軟禁，那些日子裏，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幾十個警察日夜包圍着她的家，電話被切斷了，她不准邁出家門半步，任何人也不准來看望她，連她的兒女來看望也被禁止。凡是與她聯繫的人都要受到調查。與此同時，各級官員輪流上陣，對她展開了「車輪戰」，



目的只有一個：叫她發表聲明，放棄到美國去領獎。要不是最後胡錦濤和吳儀指示放行，真不知道這場鬧劇會怎樣收場。

在這過程中，最讓老太太心如刀割的是這樣一個場面：她唯一的兒子、在河南省教育學院藝術系當系主任的郭鋤非被放進來，他們逼着郭鋤非跪到地上，給高耀潔磕了三個響頭，求母親爲了他的工作、生活和前途，不要去美國領獎了……

直到現在，每當說起這件事，高耀潔都會放聲大哭。讀者看了這本《高耀潔回憶錄》後就會明白，這一刀對老太太的刺傷是多麼惡毒。

四十年前，在那「史無前例」的文革中，當時的掌權者爲了從精神上擊垮倔強不屈的高耀潔，曾經製造了一個「現行反革命案件」，把年僅十三歲、正上初二的郭鋤非判了三年徒刑，投進牢房，讓這個少年受到巨大的精神創傷，終生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之中，也讓高耀潔遭到一場地獄般的劫難。

四十年後，還是爲了征服這位偉大的母親，現在的當權者又從文革的武器庫裏拿出了最惡毒的手段，再次把她那個可憐的兒子當成人質，向這位母親心靈中最柔軟之處狠狠地捅一刀……這算不算是恐怖主義？這和劫匪拿槍頂着孩子的頭，逼他母親就範有什麼區別？

還有吶，爲了圍剿高耀潔的觀點，封鎖高耀潔的聲音，他們除了不時地關閉她的博客外，還僱用了幾個槍手天天在網上謾罵，甚至造出「高耀潔出身青樓，曾當過妓女」這樣污穢的謠言。其實，這也是拾文革的餘唾。看了這部回憶錄，你就會知道，文革一開始，高耀潔就曾被迫把鞋子掛在脖子上拉去遊街。

幾年來，我曾多次勸高老太寫寫自己的回憶錄，但她都拒絕了，說是幹事業重要，沒必要爲自己立傳。但這次她主動要寫了，原因就是要說說自己真實的出身經歷，駁斥謠言，以正視聽。從這個意義上看，這部自傳是那些政治流氓們罵出來的（當然，我覺得這部回憶錄的意義和價值遠遠大於闢謠）。誰說他們沒功勞呢？

看來，所有的專制者都是一個老師教出來的，儘管「城頭變幻大王旗」，可他們的骨子裏一點都沒變，還是那樣狠毒，那樣卑污，那樣下流。

一個母親，一個像天使般純潔的高尚老人，對這些陰毒險狠的傷害爆發出無可抑制的憤怒，不是天經地義的必然嗎？

高耀潔總是說，我不關心政治，從沒想過去混迹官場，也沒有出人頭地的願望。綜觀她一生的行迹，我相信這話是真誠的。她是醫生，是仁愛的白衣天使，她把治病救人，在人間撒播健康、幸福和歡樂當成自己畢生的天職。在一個正常的文明社會裏，她應該能尊嚴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快樂地度過自己的一生。

但是，這樣一個沒有政治野心的職業醫生，卻被迫終生在政治的泥坑裏掙扎，不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當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在垂垂老矣的晚年，又只因為堅持職業操守，關注人間慘劇，忠於事實真相，不肯說假話，而被政治折騰得死去活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百般摧殘的高耀潔曾在第三次被迫遊街後，於1966年8月26日自殺過一次。最近，在被非法軟禁前後，她又數次流露出自殺的念頭。這是為什麼？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認真地想一想，我們的社會是不是生了什麼病——比愛滋病更可怕的大病？

可敬可愛的高耀潔教授終於沒有選擇死亡和逃避，而是選擇了抗爭，以自己羸弱的病殘之軀，以八十多歲的蒼老聲音，發出了震撼人心的憤怒之聲。這吶喊之聲你聽到了嗎？

壯哉，仁者之怒，天使之怒！

馬雲龍

寫於2007年11月



前言

如今，只要內容不涉及「敏感問題」，只要捨得花錢買書號，出版一本書似乎並不困難。於是，寫傳出書，為自己樹個紙碑，一時蔚然成風，漸成時尚。這本不是件壞事，表達自由，也是一種權利嘛。無奈這些出版物大多空洞無物，矯揉造作，假話廢話連篇，自吹自擂者居多。關起門來自慰倒也無害，但賣送別人就有點不道德了。這種難以卒讀的垃圾書，對人只是一種精神折磨。因此，多年來，我一直不想去趕那個時髦，不準備出自己的自傳或回憶錄。

從2001年以來，我連續獲得了幾次國際獎項，逐漸成了受海內外關注的人物。這以後，想要給我寫傳記的作家、編輯、記者接踵而至，先後有十來個人。我均以一個理由拒絕了：我是個醫生，關注生命，救助病人是我的本職工作，樹碑立傳非我所求，也非我的興趣所在。不過有兩位作家要求給我寫自傳的情景，使我印象深刻。

一位是原新華總社社長、作家穆青先生，他帶着一位年輕人，一天上午來到我家，穆老先生很客氣，他自我介紹說：「焦裕祿的先進事迹是我寫的，你看過嗎？」

我說：「看過，寫得很好……」

穆老又說：「高主任你已七十多歲了，做了這麼多好事，獲得過這麼多獎項，我想為你寫本自傳，不用你提筆，只用口述。」

我感到盛情難卻，可又不能不拒絕，話難以出口。剎那間我想出一個應對的方法，於是說：「謝謝穆老的關心……」

不料穆老與那年輕人以為我同意了，談興更濃，話題全是這自傳如何寫。

我只好說：「明日我要去山東省，曹縣，鄆城去看望我送到那裏的愛滋孤兒，等我回來後去看您，您老人家就不用再來了。」

我本意是拒絕了，但穆老並未意識到。他接着說，像你這樣出身大家閨秀，能成爲一個名醫，能同情窮苦的病人，特別是愛滋病人和遺孤們，真了不起……鄧小平不是也接見過你嗎？」

我說：「對……」

大約過了半個月，穆青先生又派人來了，他一進門，就傳達穆老的意思，還是要給我寫自傳。我指了指樓上監視我的警察說：「這人是監視我的，他們看着我，怕我下鄉去看愛滋病人，怕記者來採訪我……」

青年人驚訝地說：「那怕什麼……」

我說：「你們認爲我做的是善事，官兒們認爲有損他們的面子工程，這就是過錯……」

青年人說：「毛主席時代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還命令醫務人員下鄉哩！」

他走了以後，穆老再也沒有來找過我。

有人告訴我，來我家後不久，穆老就去世了。

另一位是北京作家閻連科。他們一行三人同來，那是2004年春暖花開的一天，他一進來就說要給我寫自傳。

閻先生說：「咱們是前後校友，我也是河南大學畢業的，今天我來是想給你寫自傳的，你很傳奇，做了這麼多工作，得了這麼多獎，特別是國際獎，在我國是罕見的……」在談話中，我知道閻先生來之前對我的情況已經有所了解！

我說：「我是個醫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職，沒有什麼可以宣揚的，寫自傳幹啥？」

隨閻先生來的那位青年，再三解釋：「總之一句話，這是歷史，我們有責任留下來。」

閻先生很善談，他說了兩個多小時，我仍未同意，這次拒絕閻連科先生沒有上次拒絕穆老那麼作難。我直言：沒什麼可寫的，人就應該爲



更多人而活着。我感興趣的是做事，而不是宣傳自己。

談話間，從開封地區尉氏縣曲樓村來了父子兩個愛滋病感染者，父親叫曹獻，是個農民，賣血感染的。他的孩子，才六歲，因輸血也感染了愛滋病。這父子倆相當可憐。

閻先生他們的注意力轉到了曹獻父子身上，話題也轉向了尉氏縣的愛滋病疫情，說到感動之處，閻先生等人分別掏出錢來給曹獻……

中午快到了，閻先生三人請曹獻父子去吃飯了，因老伴有病，我未能陪同。

據說閻連科當天就跟曹獻回尉氏縣了，到那個村子住了一個多月。一年之後，他以曲樓村為背景的小說《丁莊夢》就問世了。這是中國第一部寫愛滋病災難的小說。前些天傳來消息，這位熱血肝膽的作家因此承受了沉重的壓力。

2006年元月閻先生一個人以看我老伴生病為名，又來到醫院，他又談了寫自傳一事，但看我老伴病情危急，未再多說，就走了。

其餘那些來我家要求為我寫自傳的先生們，都被我以相同的理由拒絕了。

轉瞬間五年過去了，我為什麼又匆匆忙忙開始寫回憶錄了呢？

這是「他們」逼出來的，在2007年春節前即我出國訪美前夕，有幾個髒官僱用的槍手，多次在網絡上對我展開人身攻擊。說我博客上的愛滋病病例都是偽造的，甚至造謠說：「高耀潔自幼家窮，賣給青樓，是妓女出身……」

我深知，祖上的輝煌歷史，未必是後代驕傲的資本；但為了攻擊現在的敵手，就連他的祖上一一起罵，這是中國人所不能容忍的。本人出身於名門望族，如此的造謠中傷，不但是侮辱我本人，而且侮辱了高氏先祖。

高氏家族被激怒了，如今在世的兄弟姐妹還有七人，他們一致同意，我們要寫出高氏家族和我本人的歷史真相，以正視聽，並留給後人。

原書成稿，是我生氣之際，在三個多月的時間內匆匆完成的，部分內容缺少深入調查瞭解，故出現貽誤，特別是 223 頁至 230 頁，這七頁的內容中，後經多方瞭解，有不少是我錯誤聽信別人編造的虛假故事，我不能用假故事寫在書中，欺騙讀者，故必須刪除，還另有一些遺留問題，迫使我下決心再次修訂，以便留下更多真實事迹。

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且憂病纏身，已是來日無多。若無筆墨留下，待我過世之後，那些靠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起家的醜類們不知還要對我造出什麼樣的謠言，我的子女們和家族不知還要承受多少無端的羞辱……

於是我同意了大家的意見，開始組織了這部回憶錄的編寫和出版。

這部回憶錄由清華大學畢業的二弟負責全面策劃，內容分別由四個兄妹起草，定居在美國十餘年的小妹飛回國內專門負責製圖、攝影，她日日夜夜幹了二十天，同時把書中的插圖也完成了。若在這過程中出現意外阻力，在美國從政的兩個侄子（我大哥的兒子）也將介入。一句話，全家人都不能容忍那些卑鄙政客們對高氏先祖和全家族的人格侮辱！

這是回憶錄問世的最初緣由。但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又意識到，目的和意義並非這樣簡單。

——回憶錄中所寫的高氏家族的興衰過程和本人成長的經歷，並非是在自炫家門，原本是用來回擊那些誹謗謠言的。同時我也寫出我在婦產科專業工作中的拚搏和獲得病人等弱勢群體的愛戴。

——寫出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的家庭「死去活來」的遭遇，不僅是對歷史上那個人妖顛倒的時代的控訴，還是對當前仍然猖狂的文革餘孽們罪惡淵源的追索。這些「慶父」不除，百姓永無寧日。

——寫出十幾年來我因揭露「愛滋血禍真相」的遭遇，是爲了讓這起世界罕見的公共衛生災難能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從而爲那些被視爲「草芥」的愛滋病受難者爭得一線公正和安慰。年逾八十的我，怕是看



不到這場「血禍」的盡頭了，但作為一個見證人，我要給歷史留下自己的證詞。

——寫出2007年春節前夕，由我赴美領獎而起的那一齣「捉放曹」鬧劇，是爲了讓人們知道，在中國建立「法制社會」和「和諧社會」，還有多麼漫長的路要走。

寫回憶錄的最初目的，是要爲高氏家族和我個人八十多年的生活正名。但其中的內容涉及甚廣，讀者不妨把它當做現代中國這株參天大樹的一個枝條來看。我自己只是億萬中國人中的普通一員，按古老中國的傳統思想，我這樣一個「草民」的生死榮辱本無足輕重。但幸好我們生活的時代變了，隨着「人權」的覺醒，我這個幼年曾裹過小腳的女子，也能走出家門，在社會上爭得一席之地，挺直腰杆站立起來，並發出自己雖然微弱但獨立的聲音。同時還能獲得海內外有良知者的支持和讚譽。因此，我幾十年的坎坷經歷，便具有了標本性的意義。經歷並不平凡，年已八十三歲，被迫流亡海外，雖有人權組織志士們關注，但我仍受盡孤苦的折磨，爲此又增加了兩節，即三十一節和三十二節，本人2007年回國後的遭遇，以及流亡海外的原因。有些章節中增添了文字和照片，是對偽造中國愛滋疫情的反擊。「一葉知秋」，讀者從我個人命運的滄桑變化中，可能會感受到時代變遷的足音和中國的希望之所在。如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就很知足了。

以上是本書問世之動力和根源，全書分兩篇、六章、三十二節，並有百餘幅圖表，對遠期的事情會有遺忘，這兩年我又查找了山東省荷澤專區地方誌和山東省曹縣縣誌，並且多次訪問高新莊的鄉親們，又增添了一些內容，如：以前先輩過世時的厚葬，所以在60年代浩劫的日子裏，「合法的盜墓賊」使高氏祖墳化爲烏有。而近十二年的事情太多，又無法一一述說，不過有些事情在前幾本防愛書籍中已披露過，此處不再多敘述。

在本書編寫中承蒙馬雲龍先生、孫亞先生大力支持，孫愛玲女士、

李喜閣女士提供大量的愛滋病疫情信息，劉思暢、小高、小朱等大學生的協助整理和打印，在此致以誠懇的謝意！

由於本人水平有限，編寫時間匆促，未免有缺失與錯誤，敬請讀者指正，以便再次修訂、改正，謝謝！

高耀潔

2008 年元旦

2010 年 5 月 1 日重修

上篇

高氏家族和我退休前後的生涯

上篇

高氏家族和我退休前後的生涯

上篇

高氏家族和我退休前後的生涯



第一節 出生於名門望族

一 我所知道的高氏先人

高姓，從全國範圍而言，算不上是個大姓，但是，在魯西南荷澤市所轄的曹縣等地，高姓人氏卻很多，據了解曹縣境地內就有高橋、代樓、孫老家、張貢士樓、高偉莊等十三個村全部為高姓。

當地傳說北宋初年，冀國公高懷德到此鎮守曹州（荷澤地區），不久他便在這裏去世了，這些高姓人氏都是他的子孫後代，這與《宋史》高懷德傳記載的「……四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從平太原，改鎮曹州，封冀國公。」相吻合。自高懷德將軍始至今已四十多代了！

高懷德是天平節度使高行周的兒子，後晉開元初年遼人侵邊，高行周被困重圍，高懷德左右射箭，縱橫馳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他經歷了後晉、後漢、後周、北宋太祖、太宗五朝元老，戰功卓著，太祖即位拜殿前師副都點檢，尙宣祖女燕國長公主，為駙馬都尉。

我家原住張貢士樓村，自祖父子箴公以上，三世單傳，祖父又是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祖父三歲時，曾祖父便去世了，曾祖母袁氏是一個非常能幹的女性，那時曾祖父家及袁氏家都已相當富有，有田地三十六頃，由於祖父也是單根獨苗，家中又十分富有，袁氏懼怕近親宗族中的小人為搶奪財產害死祖父，於是母子兩人便離開了張貢士樓村，另闢新的住址，命名「高新莊」。

母子兩人選擇了現在高新莊這塊地方，在她娘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建起了一個新的村寨：高新莊。上個世紀初，高新莊便是遠近聞名的大村，佔地三百七十四畝，十分氣派壯觀。

袁氏卓識遠見，勤儉持家，雖是小腳女子，但是地裏、場裏的活兒樣樣能幹，母子倆在逆境中奮發向上，祖父高子箴慢慢地長大成人了。

祖父娶李氏爲妻（其弟李文齋 30 年代國民黨要員），生三子一女，長子聖堯，次子聖君，一個小女兒和三子聖坦，聖坦就是我的父親。

祖父爲孝敬老母，光宗耀祖，燈窗雪案，屢試不第，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年僅四十六歲。

由於高新莊村是遠近聞名的富戶，所以當地的官僚及有錢人都都願意和他們結親。

大伯父聖堯娶徐氏（長大伯五歲）爲妻，生有一女，取名明蘭，徐氏家族是上層社會的名流，大伯母的父親徐繼儒字幼之，清末進士，曾在翰林院供職，當過光緒皇帝的老師，任過山西省巡撫，當過三次鄉試（省級）主考官，等等。辛亥革命後告老還家，居住曹縣城內。

徐老一生著作繁富，主要有《曹南文獻錄》八十二卷，附錄六卷，約一百萬言，積十五年而書成。該書彙集了曹州府十一州縣的文獻資料，是研究魯西南地方史志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著作。他的著作共計十三種二百一十四卷約三百萬言。

徐繼儒三百餘萬言的著作均被保存在國家各級圖書館裏，他的墨寶在市場上價格昂貴，他的著作被收藏的最多，是當時人們所罕見的，他清正廉潔的作風，是爲官者的楷模。有口皆碑，衆所公認！

大伯父不幸夭亡，年僅二十三歲，大伯母二十八歲寡居，直至五十五歲去世，大伯母出身名門，受過嚴格的儒學教育，知書達理，她常常用這樣的格言勉勵自己：「燈前不到妝台上，不擦官粉秀花蘭，不比粗存不打扮，絲布綾羅不耐穿，年輕不到府門外，躲避小人免笑談。」她的傳統女性意識留在我的腦海，我一生生活儉樸，爲人正直的性格就是她老人家身傳言教培養的。

大姐明蘭十分命苦，患有淋巴結核，十八歲出嫁，姐夫曹鏡海，其先祖曹以燿，字鐵柱，咸豐三年進士，曾任浙江桐廬、鎮海知縣。考中進士時才剛滿十六歲，同伴文人十分嫉妒他，還編寫過這樣的謾罵詩：



「可惜當年偃月刀，華容道上不斬曹，留下一點奸雄種，竟然文章貫英豪。」由此可見曹家也是書香門第。

大姐有一個兒子叫小績，大姐二十八歲去世，不久小績也因出麻疹死亡，大伯母十分傷心，爲了對她老人家精神的安慰，父親決定把我大哥過繼給大伯母爲子。我出生不久，也過繼給大伯母爲女，我管大伯母叫「娘」，大伯母對我十分親呢，我的奶母李大娘，她生的孩子死了，她用奶水來撫養我，抱着我住在大伯母家，她和大伯母的關係非常好，這兩位老人愛我如同己出。

我陪伴大伯母度過了七個春秋，也是孤獨的難熬的歲月，1934年春，大伯母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五歲。高氏家族念她是個德高望重的老家長，寡居三十餘年，受盡了寂寞的孤苦，故在大伯母身後，隨葬品極其豐富，據回憶，「四獨的柏木棺、槨間全用松香灌入，外槨用盜漆（生漆加細瓷器粉末）油漆一釐米多厚，直到1967年被盜掘時，不但沒有過土，用大鐵錘砸開時也十分吃力。衣被全是紅色繡花緞子，遺體戴有百餘件金銀首飾和玉器等，頭上戴着翡翠金冠，口腔內含有玉質的小魚，右手握着金元寶，左手握着玉質的如意勾，雙手戴有四個金戒指（食指和無名指），雙胳膊戴了一對大金鐲子，兩隻小腳後蹬着一對銀元寶，其他的東西也記不清楚了。」喪事由二伯聖君操辦，並與大伯聖堯合葬，喪禮非常隆重。由大伯母的厚葬，可以推測，祖父高子箴和祖母等先人的厚葬情況，是多麼可觀。四十至五十年後，60年代被「紅衛兵」掘出來的屍體還沒有腐爛，按考古學者的經驗，這與厚葬物品有關。

我愛好文學，離開大伯母之後，繼續攻讀詩書，直到上個世紀40年代的中期，家境貧寒，同齡人都走進學堂，我也去讀洋學堂了，由於努力學習，在成長中，事業上，一切成績令人刮目相看，愛心、膽識、勇氣，在當今之世、國內外的知名度，人口皆碑。

我的爲人、性格，與大伯母的教誨和背後形象高大的姥爺（魯西南

人稱外祖父爲姥爺）是分不開的。當然過去對姥爺的瞭解並沒有今天這麼多，由於徐繼孺已名垂青史，本文所提及的許多資料都是從曹縣誌，山東省人物誌中查找出來的。

如今世上雖然沒有人流淌着徐繼孺的血脈，徐老斷了香煙後代，但是，過繼給他的外孫女也會像徐老一樣爲國爲民，不畏強權，我的事蹟，在國內外已有數千篇報道，國際天文組織將 38980 號小行星永久命名爲「高耀潔」。彪炳青史，散發着一個時代的中華民族的氣息！

我沒有見過面的大伯父作古已一百一十多年，明蘭姐去世也已有近百年了，我的恩人大伯母去世已有七十三年了，先人們，親人們，安息吧！

30 年代初期，在二伯父高聖君舅父李文齋的支持下，曹縣各區、鎮、村成立自衛隊，維護社會治安，對抗土匪騷擾，當時地方武裝力量城東南武魁莊袁錫霖、城東高新莊高聖君各有百多名家丁，長槍短槍百餘支，還有機槍、小炮、他們的勢力最強。值得提一句的是，這些槍炮都是聖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去青島從戰敗的德國人手中購買的。在那時可謂洋槍洋炮，名聲極大。

高聖君智謀高，膽子大，能力強，他的槍法很好，當時稱他「百發百中」，如今當地老人還記得，有人曾說：「高老二槍打的很好，有百步射楊之能」，也就是說他在百步之外，想用槍打哪棵楊樹上的哪片葉子，就會擊落那片葉子。他的能力和智謀，制止了地方土匪的擾民行爲，維護了曹縣地區的社會治安，當時被鄉親們譽爲能人。

1930 年 4 月下旬，李文齋率民團（抗敵自衛團）策應國軍，在曹縣魏灣鎮與石友三部（軍閥）作戰時損失頗大，後偵知石部欲去偷襲駐柳河車站的蔣介石軍隊，即在曹縣黃河大堤佈防伏擊該部，破壞其偷襲計劃，翌日蔣介石及劉峙的第二軍團退到曹縣。蔣介石在曹縣東關鄉師樓上，召見了李文齋。（摘自山東曹縣誌 1840 至 1985 年第 17 頁）這時二伯父高聖君更興盛了。



二伯父，娶賈氏爲妻，其父賈鴻臣爲單縣土地廟人，前清舉人。二伯父患有男性不孕不育症，二伯母婚後十年未育，二伯父又娶了妾冬喜，三年又讓她回到娘家走了。再娶三妮、吳四姐、楊五姐均像冬喜一樣都被送回娘家了，因此二伯父的名譽不佳。我弟弟高世廉1933年7月出生，過繼給二伯父做兒子。他非常高興，請「滿月客」時拒收所有田地上種的莊稼，發放他人以示慶祝「大喜臨門」。不知情的人還以爲不知是他的哪位小妾「立了大功」呢，送賀禮的人絡繹不絕。其實，這時他已經把小妾全都趕回娘家去了。

二伯父很喜歡動物，他餵了許多鴿子，各種鳥、狗、鷹、金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聰明能幹，在他生病之前，我家的許多事情都要靠他來應對，他有極強的組織能力，曾任曹縣第七區區長，他很重視農業，爲曹縣一帶引進了長絨棉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是戰敗國，德國人從青島撤離的時候，他不僅去買了不少槍械，還有一輛摩托車呢！摩托車當時在農村真是一件珍奇物品。

二伯父非常喜歡我們姊妹，見了就給錢、給東西吃，他最心愛鴿子，我們把他的鴿子翅膀剪去他也不生氣，看見我們就一個勁的笑，或者抱着我們轉圈。一直到他老人家仙逝後，遺體停放在靈牀上時，小妹妹明鳳還跑去拉他的被子要糖吃。

二伯父1938年春患中風病，我親眼看到他病的很重，搶救了幾個月後，仍然不會走路，也不會說話，他害的病是半身不遂、語言障礙。1943年8月死於開封市澤民街（北門大街）井胡同口我家前院北屋裏，享年五十七歲，二伯父的後事父親操辦得非常排場。世廉以兒子的身分披麻帶孝、領喪打幡、捧老盆，當時圍觀的人們議論：死者留下的孩子太小了！有人還流下了眼淚……

不久二伯母將家中值錢的金銀首飾都給了世廉，由我母親保管，所以後來世廉讀書時沒有生活困難。二伯母活了九十多歲，文革時還被遣送回那個沒有我家任何親人的高新莊，她問了一聲「明朗」呢？那位叫

明朗的老貧農馬上被拉了出來，頭上戴着兩米高的帽子，上寫着「打倒地主階級狗腿子齊贊臣（齊家原來給我家看高林墳地）」。

安息吧！艱苦卓絕，奮鬥一生的二伯父，寄人籬下一生的二伯母，小女祈告你在天之靈。

我們可憐的小姑母，十三歲時，掉在鹹菜缸裏淹死了，她的墳文革時雖然未被盜掘，但也未能免除被犁為平地，時至今日高氏墓地已是一片麥田。

二 我的父輩及其子女們

我的父親叫高聖坦，字履庭，是祖父高子箴的三子，生於 1893 年元月 27 日，他比大伯父聖堯小十二歲，都屬小龍，他三歲喪母，七歲喪父，跟着大哥及嫂子徐氏生活，經常和看家的（保衛人員）一起睡覺。大伯父生病，住在曹縣城他岳父家治病，那時父親才十歲，他去縣城看大伯父，一個十歲的孩子，一口氣跑了四十多里地，大伯父見了淚流滿面……

那時高家有的是財產和金錢，就是沒有繼承人，父親十五歲，大伯母就給他娶妻。第一任妻子朱氏，生第一胎因難產母子雙雙死亡，年僅十七歲；大伯母馬上又給父親娶了第二任妻子朱氏，不久又因難產母子雙雙死亡，年僅十九歲；大伯母又給父親娶了第三任妻子呂氏，係河南省考城縣（現今蘭考）呂崔莊人，娘家有土地六百餘頃（掛過千頃牌），呂氏有六個哥哥。呂家也是當年的富裕人家。

呂氏生了一男二女。長女明順，長子世方，次女明貞，呂氏三十三歲，生第四胎時因產後大出血母女雙雙死亡。

呂氏死後，第四次續弦，我的生母張氏年齡小我父親十五歲，她的祖父和哥哥都是中醫，家庭並不富裕，母親生了九胎，長女是我，明魁，次女明瑜英年早逝，三女明雲，長子世廉，四女夭折，次子世正，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兄弟姊妹七人
在父母墓前



父母遺像：父親攝於1949年；母親攝於1992年

五女明鳳，三子世潔，四子世豫，現七人尚健在。

父親年滿十六歲時，清朝已廢除科舉，因此父親沒有功名，也未曾為官。

父親在呂氏去世後，心中極度苦悶，曾去江浙一帶考察，那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上世紀20年代初期，他回家後準備變賣十頃土地，到上海市安家落戶，十年宿願未能成功。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

1936年的一天，我父親要賣掉十頃（即一千畝）田地，攜款遷居上

海，打算在上海買兩套房子，一套租賃，用房租來維持生活，一套自己住，我父親說，高新莊攤子太大，太招眼，我們這個地方黃河水會來，日本人會來，八路軍也會來，不管誰來我們都要破產，不如早點遠走。我母親不同意，說他是「敗家子」，於是夫婦二人吵架……由於母親的堅決反對，這個正確的決策未能實現，而是等在家裏被別人當「土豪」來打。如今還有人造謠說：我二伯父高聖君是「惡霸地主」、漢奸，是被鎮壓的。

為此我再次查閱了山東省曹縣縣誌和當時兩個賊官的回憶錄，以及現存的其他資料，又到高新莊訪問了鄉親們。得知60年之情況，可見高聖君對於賊官們的威捏！賊官們對他的懼怕。

曹縣誌記載如下：

1、日軍於1937年12月27日佔領濟南，當時韓復榘的山東省政府遷到曹縣，國民黨軍隊幾十個師分駐紮縣城周圍的五十多個村莊。

2、1938年5月21日，日軍第十四師團進佔土山集（土山集位於曹縣正南去商丘的公路邊屬閭店樓鎮，今京九鐵路經此，去高新莊甚遠。一筆者）。

3、1938年8月日軍第一次佔領曹縣城，縣長王貫一率部逃往青固集一帶（即高新莊附近。一筆者），七日後日軍去往商丘市，王貫一又回到縣城。

4、1938年11月26日，日軍第二次佔領曹縣城，建立日偽維持會。

5、1939年3月12日八路軍冀魯豫支隊二大隊佔領高新莊，抓去高聖君。

（高聖君於1938年2月患中風，半身不遂，言語障礙。一筆者）

曹縣誌的記載與下文所述差別很大，請看中共是如何給高聖君編造罪名，如何搶劫高家的錢財：

1939年3月12日，高新莊東門外大道上來了一隊兵，說是八路軍過路要吃頓飯。族長毛爺（此人是高橋村的，外號「瓦客」。他因吸食鴉



片把磚瓦都賣了。)當說客，打開寨門時已是上午十一時。進門的八路軍馬上變了臉，露出了真實的猙獰面目，立即綁走聖君兄弟父子三個人，嚴刑拷打、勒索，銀元贖人命，有的說高家拿出銀元三十萬（曹縣誌）；有的說高聖君贖命交出銀元七萬塊（見楊得志等人回憶錄，楊得志是當時八路軍搶高新莊的頭目，49年後共軍的大將）。到如今當事人盡已作古，誰也說不清是多少錢？楊得志回憶錄中清楚寫道棉衣作了一萬柒千套；還有長短槍三百三十多支和一門迫擊炮；更有資料記錄：三十九園倉共有存糧三百五十萬（斤）。八路軍一二九師冀魯豫支隊把高家所有的錢財搶劫已空，幾天後他們走了，高氏全家人淨身逃出高新莊。

據說中共中央軍委（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有命令：「八路軍擴軍不需請示，給養自籌……捐、借、指派、沒收漢奸（財物）！」（見彭德懷自傳，彭德懷是49年後共軍的元帥）。高聖君的財產被搶走，按照當時的政策編造他是「漢奸」。還說他有兩面日本旗、指揮刀、委任狀「鐵證如山」！

其實呢？高聖君患病前曹縣高新莊等地區未淪陷在日僞手中。而曹縣濟南撤退的國軍駐地和山東逃亡政府的駐紮點。1939年夏季7/8月份日寇掃蕩了曹縣這個地區，病中的高聖君已經逃出半年多了，他怎樣當「漢奸」呢？既然軍委有命令，搶劫高家的財產，必須給他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漢奸」，這是中共慣用的伎倆。

事隔三十餘年，又成了賊官們撒謊的好材料：1966年4月14日中國官方報紙《工人日報》刊載：「高聖君葬母，活人殉葬，活埋佃戶女兒趙秀英。」這是一樁多麼令人髮指的罪行！這是一個多麼該千刀萬剮的惡人！但是，讀者須知！高聖君的母親於1896年懷第五胎分娩發生難產而去世，那時他還是一個十歲的孩童！時代誕生了這麼一個天才的「惡霸」嗎？，這合乎邏輯嗎？

高聖君無子女，他先後納了四個小妾（本書第一節已講清楚），編

造謊言說高聖君有三十個姨太太，真不知用意何在？莫非是賊官為暴露個人的惡劣本質而獻身自述？？？

編造高聖君的假材料，網上竟可找見，「可喜」這位普通的紳士，已作古六十多年，還作為「階級鬥爭的好資料」宣傳，「多謝」五毛黨的「光輝傑作」。

讀者們知道嗎？當今之世，中國大陸政府官員謊言假話之多，應歎古今罕見，絕非一時一事，有史以來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本領就是撒謊，騙取政權、錢財、女色，打擊異議人士，維護集團的統治，愚弄民衆！！！！從此可以說明他們幹的什麼？有詩為歎：

鬥陰魂

山東曹縣高聖君，故事愈編愈奇神；
不在敵區當「漢奸」^①，他是如何受委任；
幼年喪母方十歲，能拉貧女把葬殉；^②
還有更為神奇事，夜半為匪偷牛人；
「階級教育」好材料，勝過戲中黃世仁；
文化革命怎放過，可惜已死數十春；
扒開墳墓鋸白骨，劊個紙人鬥陰魂；
難得找到活靶子，有個死人也開心；
借問聖君何為者？普普通通一富紳；
家中財產全被劫，倖存殘生逃出門；
殘軀四度逾寒暑，客死開封異鄉魂，
鬥爭哲學自為是，造反有理騙世人，
奪取錢財是目的，嗚呼已兮高聖君！

注：①見山東曹縣縣誌

②見1996年4月14日《工人日報》



父親聖坦聰明、能幹，記憶力、分析力、組織能力都很強，二伯父生病之後，這個風雨飄搖的家就全靠他一人操持。

1939年3月12日八路軍冀豫魯邊區支隊崔田民部二大隊進佔高新莊村，綁走二伯父高聖君、父親高聖坦等三人，對其用盡了酷刑，幾天之後我家用三十萬塊大洋把他們贖回（見曹縣誌）。高新莊的全部地上、地下財產被搶劫一空，不久又把高新莊建築痛付一炬，變成了一片廢墟，其中不乏徐氏的所有遺產，當然也包括徐繼孺老先生的遺物在內，也全部化為灰燼。

旋即我們由高新莊出走，先到柳河鎮的九女集，住了一年多，本想到大後方西安去，黃河阻斷了我們的去路，於是決定遷居開封，租房居住。我家先住在侯家胡同、南聚奎巷，後住在澤民街（北門大街）井胡同口，最後於1943年，我父親用三千一百元聯合票（日偽貨幣）在游梁祠街買了一套二十二間的院落。父親死後，這個院落由於年久失修，大部分倒塌了，因我家屬地主成分，除三間自留房外，統統充公為開封市房管局所有，直到如今，我三弟世潔還住在這三間自留房裏。因年久失修，西屋漏雨透風，1990年我們又重修建成二層樓房。

在開封市時期父親先後開過雜貨舖（有些像百貨公司），開磨房賣麵粉，中間還販賣過棉線和黑虎糖，以維持全家人的生計。

1946年秋，父親回過一次高新莊，那時的高新莊什麼都沒有了，他沒有反攻倒算，只在蘇集請鄉親們吃了頓飯，這是我們能生之於今日的根本原因！

1948年冬開封解放了，父親還短期做過共產黨的居委會幹部（街長）。

1949年春父親病了，他患的是胃癌，那年農曆9月17日，他永遠地離開了我們，走完了他五十六年的人生。死後葬於商丘市黑劉莊，目前已找尋不到他的墳墓。

自父親去世至今已近五十九年了，在這五十九年中我們兄妹又是怎樣生活的呢？

我的大哥（呂氏所生）世方生於1921年，抗戰爆發那年他還是個中學生，激於抗日救亡的一腔熱血，他投筆從戎義無反顧……

我的二姐（呂氏所生）明順婚後生一女岫英，姐夫李道溶是李世謀的長子，李世謀曾任河南省滑縣三任知縣共十二年，她在李家並不幸福，且身患多種疾病，於1943年在開封去世，現在道溶、岫英也相繼辭世。

我三姐（呂氏所生）明貞是我們高家命運最苦的一個人，追憶往事，讓我們不堪回首。明貞在年輕的時候就嫁給了從小結娃娃親的安健之，那時安還是個中學生，1948年10月安隨國民黨南遷，之後便杳無音訊，明貞住在商丘市，無以度飢寒，也不願意回到沒有親娘的娘家。她再婚了，再婚的姐夫姓上官，家住河南省澠池縣西官莊，後來明貞也一直住在那裏，由於明貞不會生育，我在醫院婦產科給她抱養了一個女嬰，取名上官豔玲。明貞雖患有多種疾病，生活條件又差，她還是活到了六十七歲，她去世時，豔玲已經十八歲，高中剛畢業，在明貞去世後的第三天，她去給養母上墳，天下着雨，為抄近道，她沿着一條跨越深溝的渡槽邊行走，不慎墜入十五米的深溝，也追隨她養母去了。我母親病重時，在洛陽住院，我們兄弟姐妹去過西官莊一次，在姐夫的帶領下我們看到的是兩座孤墳。蒼天啊！蒼天！

現在活在人世上的我們同胞兄妹七人，都是母親張氏所生，父親去世那年，母親才四十二歲，最小的弟弟還不滿三周歲，我和明雲還都隨流亡學校在江南讀書，母親將我們七人撫養成人，而且竟有五人讀了大學，所幸的是，那時學生花錢很少，讀師範學校國家還給補助（每月三斗六升麥子，相當於現在八十三斤，還有一塊錢的銀元，當時能買三件普通衣服），這項補助餘下的部分還能養活一個人。

當時，母親她老人家所受的艱辛可想而知。母親沒有了丈夫、沒有了土地、沒有了生活來源，孩子們都小，那年我隨學校流亡江南，正在高中讀書（公費）。社會上是泰山壓頂，生活上 is 備受飢寒，她是一個



偉大的女性，女強人，她活到八十五歲，1992年5月2日因肝病去世，我們永遠懷念的母親！她的骨灰盒和我父親的衣冠骨灰盒，合葬於開封市西北郊的炎黃陵園內。

每年節日兩位小弟弟去看望他們，以慰他們九泉之靈。安葬她的時候大弟世廉和二弟世正各填詞一首如下：

一剪梅

高世廉

同胞聚首老家中，
信息常通，
健康和衷。
夕陽萬般皆朦朧，
好也平庸，
歹也平庸。

七 律

高世正

往事歷歷數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
風雲變態無定數，覆巢之下有完卵。
父母高堂雖千古，同胞七人尚健康。
白頭來往人間遍，故鄉留影憶當年。

賦

高世正

憶往昔兮撫今歲
同胞聚兮慰吾輩

七十年兮家未歸

恨難禁兮仰天悲

特別應該提到的是二妹明瑜，父親去世後的十年內，她一直協助母親共同撫育我們幾個比她小的弟妹，她沒有讀書，沒有工作，沒有美滿的婚姻，終日在家操持繁重的家務，作針線、納鞋底、作飯、洗衣服；白天磨麵，晚上餵驢，她生性善良，從不叫苦，她為我們家作出了巨大犧牲。在她二十九年的歲月中，除了她不懂事的幾年外，幾乎沒有過上一天好的日子……



高明瑜遺像

1958年她結婚了，妹夫是個書呆子，1959年8月15日她生頭胎，半個月後因高燒身亡。我可憐的妹妹留下一個十六天大的兒子，我只得把孩子領到我家撫養，一直養到近兩歲。妹夫再婚後，續妹妹張新榮又把孩子接回，她對孩子很好。……直到1995年我們才重新將二妹明瑜安葬在母親的墓旁。

還有一個我最小的弟弟高世豫，他沒有讀大學，雖然有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家庭原因，他把自己的青春精力都放在侍奉母親的生活上了，十七年如一日，晚上安排好母親睡覺，再騎自行車回到遠在十二公里外自己的家。因此，無暇顧及自己的女兒和妻子，弟妹鞏玉蘭人品很好，對高家從無怨言，在鄰里中更是有名的從沒吵過架的夫妻，就這樣直到母親去世。母親走了，他也人到中年，現已六十一歲的他和妻子一起靠每月幾百元的養老金過活，他很滿足。他也是為了母親，為了姐妹、兄弟們能安心工作，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三妹明雲早年畢業於武漢中南同濟醫學院，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五官科副教授，長期在河醫一附院工作，七十七歲高齡的她，還在堅持工



作。1957年被劃右派，一生坎坷。

大弟弟世廉 1956 年畢業於北京鐵道學院，一直在西南交通大學任教，正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交通規劃方面頗具盛名。

二弟世正 1962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系，在洛陽拖拉機廠工作直到退休，曾任一拖公司副總工程師，是我國知名的空間結構專家。

四妹明鳳 1964 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無線電系，在西北工學院任副教授，退休後和她的丈夫楊儒貴及一女一子定居美國芝加哥市。

還有個當小老闆的三弟高世潔在河南開封市開辦了一個煤礦儀表廠，生意頗為興隆。

同胞七人，五人大學本科畢業，兩個正高職稱、三個副高職稱。

第三代孫輩共十八人（配偶不計算在內），有的從事教育，有的從事醫學，有的從事科技等等，分佈在國內外四、五個國家，此處不再提及。

長相思

高世正

四十年，重聚首；

暢望大河水東流；

人約回鄉後。

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歸來才方休；

風雨共一舟。

第二節 高新莊村

一 我記憶中的高新莊村

高新莊村位於單縣、曹縣、城武縣三縣交界處，西北距曹縣縣城二十二公里，它北面有葛莊，西面有蘇集、曹莊，東面的梁堂村，再往東是水牛陳莊，就在城武縣去商丘市的公路邊，沿公路再向南十餘公里，便是魯西南名鎮青堌集鎮，它東北角緊捱高林墳地有個小村叫李仙堂，我家的菜園子、果林園就在梁堂旁邊。高林墳地在文革期間被明火執仗的全部盜掘。小時候不知道高新莊有多大，現在寄養的那些愛滋孤兒就在此地。2002年到2004年我先後去過十多次，據耳聞目睹，根據現存在的寨牆，估計範圍大約是一個五百米邊長的正方形。我近期回高新莊的留影如下：



2006年攝於高新莊東門里大路



高新莊村有寨牆，寨牆下寬四米，上寬兩米半，高八米左右，下部三米是內外磚牆裏面填土，上部五米是土築牆，土築牆部分牆上長滿了雜樹，寨牆外面有五米多寬的水圍子，水深二至三米，水圍子和寨牆之間大約有十米的距離，長滿了雜草和樹木。

高新莊橫貫東西門之間有條官道，至今還是侯集去商丘市的縣級公路，東西寨門上有炮樓，門外水圍子上有吊橋，吊橋垂直起落，現在已記不起來是什麼樣的結構。炮樓平頂，四周佈滿垛口像城牆一樣，寨門的炮樓上佈滿洞口，可以用槍往外射擊，寨門外包鋼板，上有雞蛋般大小互相錯行的鐵釘。

高新莊的所有建築物都是平頂有城牆垛口，寨牆更是如此，這大概是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年動亂時期的一個特點。

寨牆東門外路北約一里多地有一個幾畝地大小的水塘，鄉親們都在那裏洗衣服、被褥，水塘與水圍子相通，與水塘相對應道路南面有塊大青石，因為那裏是平原地區，石頭墩子並不多見，這塊石頭大概是建村時由遙遠的山區搬來的。每逢荒春凶歲，父親就坐在那塊大石頭上放糧賑災。據說清光緒三年，山東、河南大旱，我的祖父子箴公也在此設粥棚放糧。

寨牆的內圈是佃戶住的一座座小四合院，有些還有自己的牲畜與農具，佃戶的住宅與我家院牆之間有約十米寬的環形道路，可以走四輪太平車。

貫通東西的主幹道把整個村寨分為兩部分，南部佔三分之一是當場（農村打麥場），北面是大伯父、二伯父和我家三家的院落。

南面東端還有個學堂，不但我家子弟讀書，而且冬季農閒時辦有冬學，男性的傭人和佃農都可以免費來此識字掃盲，有時也有中年女性，多半是隨丈夫一起學習的。

緊挨道路北邊有約二十五米寬的車馬棚，餵有多頭馬、驢、騾、牛等牲口，停放各種車輛，有運輸車，也有轎車（不是現代的小汽車），

還存放不少的農具，供應種地用。

再向北便是三個院落，二伯父家在西、大伯父家在中間，我家在東，每個院落都有約一百五十米寬和一百七十五米進深。

我家這三分之一進得大門便是花園和花廊，進得二門是東西帳房（管家會計的辦公室），第二進院的後面是客廳，客廳有約四十五米長、二十五米寬，外觀是一個建在一米多高台階上的大廳，屋頂出廈，正背面各有四個「滾龍明柱」。下部一米多是實牆，再向上是「花格柵」，是「彎字」形組合體，額坊「雕盤龍、雲氣」，上面有三層斗拱，大廳內部四周都是房間，房間木隔斷牆上雕刻「二十四孝子圖」，中間是個擺設十分考究的大廳，凡是尊貴的客人都住在這裏，實際上是個賓館，有三個中年男性僕人接待，原山東省主席韓復矩還在這裏住過呢！

客廳後面是第三進小院，院子很窄，估計只有七至八米。這個弄堂式的小院，向西有個小偏門直接通大伯母家，這是李娘抱着我經常通過的地方。

這個小院再向內去便是第四道門，第四道門有個門斗，中門不常開，中門向內一面為四扇，刻有四幅屏（上面雕刻有牡丹、荷花、菊花、梅花圖案），兩側門是經常出入的途徑，每扇門都可以上「腰穿」，十分牢固。

我們的院落，有三座樓，堂樓（中間）、東樓及西樓，每個樓均為三層，木質樓板，由室內上樓，二樓放有很多東西。堂樓有十三個台階，東、西樓各有八個台階，我家住在堂樓的一樓，東樓一層住的是女傭人，西一層存放些雜物。堂樓二層北牆上全是大箱子、大櫃子，南牆上掛有三任母親的遺像，約有十米長，六米寬大小，從現在的眼光看，她們都是一個少女。在照片下邊放有她們當年結婚陪嫁的東西，裝有金銀首飾和衣物的箱子，為了紀念她們，我父親不讓任何人移動。三樓上放有很多東西，有工藝品，有金銀首飾，箱子上都貼有封條，在北牆的



長桌子上，有曾祖父母的牌位，上寫着顯考×××顯妣袁氏之神位，在右邊，有祖父母的牌位，上寫着顯考子箴公顯妣李氏之神位。每逢節日，如春節，必須把這些靈牌移下來，移到一樓中間大條桌上，燒香磕頭，還祈禱保平安。

我家樓院的東面是廚房（故稱為廚房院），那有廚師和其他傭人及保衛人員（看家的），約有二十多人，他們都住在周圍的房子裏。在這個院裏，還養有雞，鴨，鵝等無數的家禽，有專人餵養。

樓院後面是二十餘座糧倉以及三十多間堆放雜物的平房，有時有窮親戚在此借住，一住幾年，生活全由高家供應。

值得一提的是，我父親臨終前口頭遺囑：樓院西面緊靠堂樓有個西堂屋，並有一個單獨的小院，西堂房是我曾祖母最早的住房，地下還有經她埋藏的三個大蓮花缸內裝有銀洋，每個缸內放有十萬塊銀洋（共三十萬塊），至今已有百多年了，尚未挖出。（注：銀洋又名銀元，直到我國抗日及內戰時期，國、共兩黨轄區仍是能流通的銀幣，直徑38.7毫米，邊緣厚2.4毫米，一個銀元重26.87克，其上有四種圖案，其一為袁世凱頭像（為數最多）其二為孫中山頭像，其三為清光緒時期所鑄的龍圖案，其四為香港所鑄上有西方武士左手執盾牌右手執長矛）。



銀元圖案「袁世凱頭像」

我的大伯父、二伯父院落也大致如此，不過規模小一些，外觀也差一些。

上個世紀 20 年代之前，高新莊是個相當優雅的地方，水圍子裏種着紅、白荷花，莊內花園種植着牡丹花、冬青樹、夜香花、菊花等，父親在客廳東端專建一個小院，他平時多在那裏休息。專門有個叫「小三」的爲他打掃衛生。

自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中葉，高新莊經歷了一百年的盛衰巨變，於上個世紀 30 年代末期我家出走後，痛付一炬，高新莊變成了一片廢墟……

2009 年中秋節我二弟世正回高新莊，看到成了廢墟的莊園，但是高新莊村本地土神——田姑娘廟，至今保存完好，相傳在高新莊村建寨牆時，北寨牆某處有一個老而大的甜菜芽，被建設者挖掉了。而後，這段寨牆白天建成，夜晚倒塌，如此數日，便建了一個田姑娘廟，後來寨牆建成了，村民們常來問彼，直至今日還供奉着這位田姑娘。近期攝的照片附下。



高新莊村本地土神——
田姑娘像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田姑娘廟近景

來自故鄉的風

財產被哄搶啦！

房舍被焚燒啦！

墳墓被挖掘啦！

當事人相繼死去啦！

只留下，來自往昔的幾聲犬吠。

這一枝高氏的興衰，

已經成為一件永遠也說不清的往事。

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一百年間，

高新莊村到底發生過怎樣的故事？

請你告訴我，來自歷史的風！

你今天說不完，我明天繼續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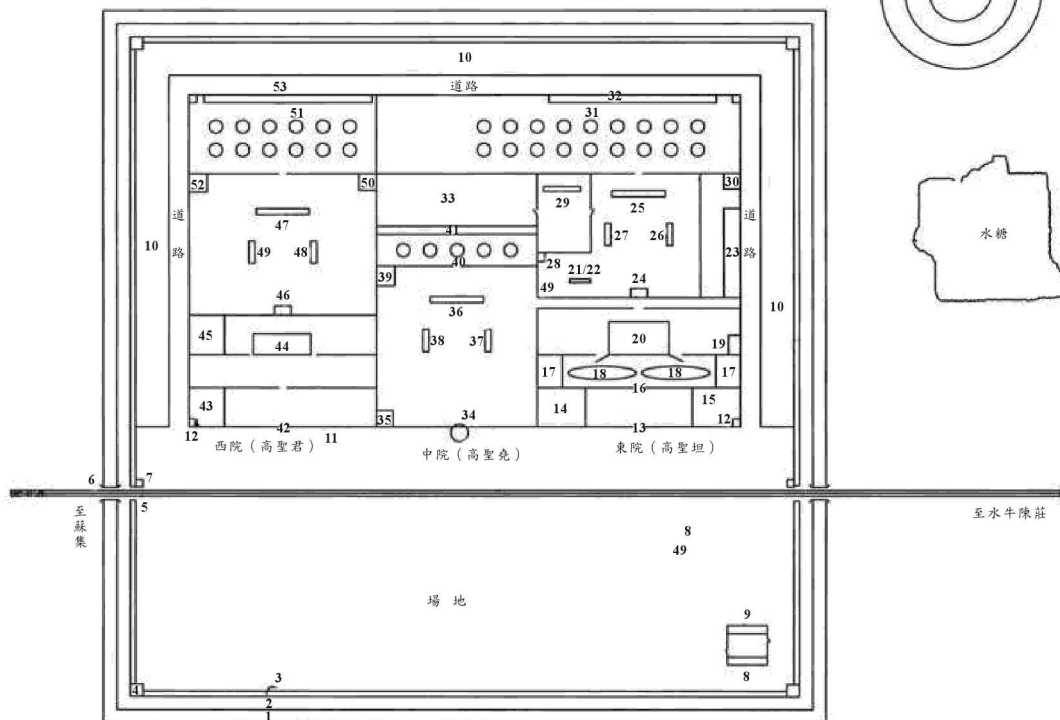
請你告訴我，來自故鄉的風！

二窮兒

2010年10月1日

二 回憶復現幾個典型建築物

我記憶中高新莊的主要建築物佈局示意圖：



高新莊各建築物的名稱

1 水圍子	20 大客廳（內刻有二十四孝）	38 前院西屋
2 綠化地帶	21 私塾書房	39 前院廁所
3 寨牆	22 藏書畫房（含古文物）	40 前院糧囤
4 寨牆炮樓	23 東院保衛人員住宅	41 前院雜物房（內養有家禽）
5 東西兩寨門	24 東院四道門	42 西院大門
7 莊園東西寨門保衛住房	25 東院堂樓	43 西院車馬棚
8 大青石墩	26 東院東樓	44 西院客廳
9 高新莊小學	27 東院西樓	45 西院花鳥院（內有水井）
10 寨牆周圍佃戶住宅區（有井）	28 東院廁所	46 西院第四道門
11 住宅院牆	29 東院西堂屋	47 西院堂屋
12 先人遺物安放室（兩層樓）	30 東院廚房院（含水井洗衣房）	48 西院東屋
13 東院大門	31 東院糧囤（20多個）	49 西院西屋
14 馬棚（飼養馬、牛、驢等）	32 東院雜物房	50 西院廁所
15 停車院（內存放大量農具）	33 家禽飼養院（雞、鴨、鵝）	51 西院糧囤
16 東院二門	34 前院大門	52 西院廚房院（含水井洗衣房）
17 東西兩帳房	35 前院廚房院（含水井洗衣房）	53 西院雜物房（內養有家禽）
18 花園（內有水井）	36 前院堂屋	54 高林（墓地）*
19 客房（接待外來辦事人員）	37 前院東屋	

* 高林（墓地）未畫出，它位於莊園東北方500米之外。



水龍吟·我的家

山東曹縣高新莊

我生之於望族，我生之後成不望。

日寇入侵，中原板蕩；戰亂硝煙，遍我故鄉；

哀哀魯西，生靈塗炭，我家更遭殃。

走為上，莫彷徨！

去何處能安身，路茫茫！

歷盡艱辛，欲投後方；天不遂願，駐足汴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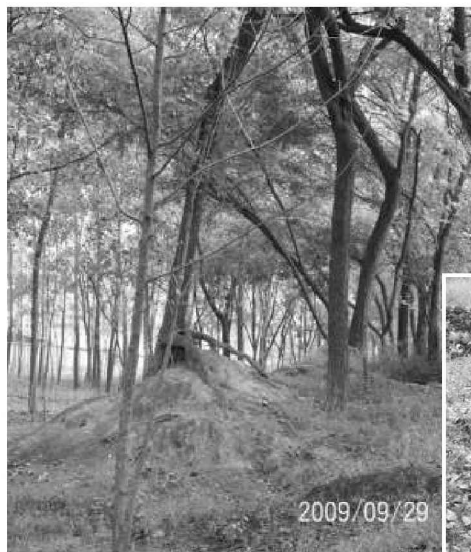
慈父仙逝，二妹早亡，痛斷肝腸！

是何人，將我七人撫養？母恩難忘！

在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一天，「造反派」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掘開了高宗三代祖墳（八座墳塋，十二具屍體），因棺槨堅固，隨葬品珍貴，故屍體保存完好，紅衛兵本擬抬着屍體去曹縣城裏遊街，因屍體出墓後很快腐爛，發出臭氣，沒有人願意去抬，才把屍體拋棄在荒野，任其腐爛，不久消失在自然中，餘下滿地骨骼，路過的人誰見誰怕，有幾個大膽的人，把骨骼用火焚燒了，骨灰隨風而去。高氏墓地已經消失了，獨有十三歲女孩的墳墓內無隨葬品，未被掘開，至今這個墳墓也不存在。

死者的金銀珠寶等隨葬品呢？這些物品在何處？我想不會消失吧！俗稱文化大革命中掘墳的「革命行動」，其實是「合法」的盜墓賊。

2009年中秋節我二弟世正回到了闊別七十餘年的故鄉（自1939年之後高新莊中再也沒有高性之人），寫下了回鄉這首詩，並在新莊村攝下了多張照片，選出幾張附下。



村東北角寨牆遺址



焚燒後的礫堆



西寨牆遺址

西門外村碑座（這是原來祖母的墓碑座）





回鄉

高世正

樹上的葉兒由青變黃。
 樹旁小溪的淌水由溫又變涼。
 時值中秋，金風送爽，
 歸來啦！
 闊別七十年的遊子，
 歸來啦！
 滿載着歲月的風霜。

明月還是當年的明月，
 村莊卻不是舊時的模樣；
 看到啦，至今尚存的神廟；
 拍下啦，殘存的東西寨牆；
 走過啦，昔日大火造就的瓦礫；
 不見啦，林門雙碑、菜園池塘。
 這一切，都訴說着人世滄桑。

彷彿看到了，
 彌漫全村的大火，
 彷彿聽到了，
 砸開棺木的鏗鏘！
 故鄉重遊，如夢一場！
 相伴着夕陽的餘暉，
 我的車兒駛向遠方！
 遠方！！

2009年中秋節於洛陽

第三節 擺脫封建枷鎖

我出生在一個封建的大家庭，家裏自幼給我的教育是「三從四德」，又加上讀了多年私塾，儒學文化在我腦海中根深柢固，它培育出本人一顆善良的心、真誠的心，不過那時擺在我前程的是做一個賢妻良母。

幸遇戰爭的來臨，社會的變遷，使我擺脫了封建的枷鎖，走向社會，成爲一個有用的人、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

童 年

高世正

家庭雖溫馨，難鎖女兒心。

走出閨房後，學業逐日新。

一 我的童年

從我記事起，我娘徐氏待我很親，可謂「嬌生慣養」，對我的生活照顧體貼得無微不至，我要什麼給什麼。那時她有四十多歲，從外表上來看像個老太太，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小腳，還纏着小腿，很熱的炎夏也很難看到她失身露體，了不起她穿上一身寬大的單衣，褲子不是黑色，便是藍色，上衣多是白色，或淺藍色，典型的良母和守節的賢妻。

她身體多病（我也不知啥病），經常吃中藥，有時候她會長吁短嘆。我要撲她懷中給她玩時，她就高興了，她會講高家的家史，如：高氏家族如何發迹致富；有時她又會講明蘭姐婆家曹家的歷史，別人罵她公公曹以燿，那首詩就是她告訴我的，到如今已經過七十多年了，我還記得很清楚（見前節文）。

我三歲多的時候，她教我認「字片」，字片是用 3x3 公分的硬紙



片，每片用毛筆工工整整寫上：上、下、天、地等，開始每天教我一至三個字，我學得比較快。一個月後，每天讓我學四至五個字，她發現我記得很牢固，四十多天前學的字都不忘記，以後每隔三至五天就給我增加字數，約一年時間，我學會了上千字。四歲之後，她開始叫我學四句古詩，如：「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她說一句我學一句，兩遍之後，她說上句我就對下句，她笑着說：「這妮子該上學了。」

那時，高新莊辦了所私塾（費用由我高家支付），外祖父（我們叫姥爺）徐繼孺的學生張承皇先生在這個私塾任教，不收費，全是親戚家的孩子，約有十幾人，他們不好好學習，有時亂跑。我以外孫女的身分送入教室，我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孩子，奶娘李大娘還跟着我，把我抱着送去，她在門外等着我放學後接回去。那時我專心學習，老師也很喜歡我，書讀得很好，一個月我能背誦《三字經》，從頭到尾，一字不錯。但我愛搞小動作，一天我抓隻小麻雀，放在老師衣櫃裏，大家都聽到衣櫃內有響聲，誰也想不到那響聲是什麼，弄得大家都很驚惶……總之，我今天打破茶杯，明天弄爛花瓶，不停地惹事。可是，就是在小動作中我惹了不少麻煩……

在那個時代對女孩要求溫柔，我不符合家長的要求，於是，我娘說：「這孩子特殊，像男孩子的性格，該裹腳了。因之，我五歲開始纏小腳，纏腳的滋味是很痛苦的，因腳痛而睡不着覺，把腳伸在被子外面，走路時一雙腳因疼痛不能平落地，我急了爬着行走，每次上樓全是在梯子上爬來爬去，這樣一來我的活動減少了，靜坐讀書的時間增多了，不到半年我讀完了《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孝經》（如今我還能流暢地背誦）。老師扶着我的頭說：「這孩子的記憶力太好了，可惜是個女孩，她若是個男孩子，在興科舉時，你們高家至少也會出個進士。從那時起，我開始讀《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等書。

那時張先生有六十多歲，我們叫他太老師，兩年後我不但讀完了《四書》，也已繼續讀《五經》。我對《詩經》、《孝經》很感興趣，如今，我還能熟悉地背誦多篇。我娘說：「《易經》神神鬼鬼，孩子太小，領會不了書中的內涵」，所以沒有讓我讀《易經》。但我讀過近百篇古典詩、詞、歌、賦，因當時年歲太小，只會背誦原文，不能理解文章的內容情節。

我娘很愛我，因為纏腳，很多時間讓他人背我去教室，放學了再背回來，腳纏得也比別人輕，十一歲遷往開封後，我才不纏腳了。如今我只能穿三十四號碼的鞋子，但因纏小腳在我以後生活中也受了不少歧視，我也沒有辦法，只能用自身職能來對付環境，而未有影響我在事業上的前進。

人 生

高世正

自幼讀書受薰陶，清風明月古松濤。

青山踏遍志未已，富貴功名棄九霄。

筆走龍蛇書生累，不求高枕夢逍遙。

嘔心瀝血十數卷，字字句句我辛勞。

童年的儒學教育受益匪淺

我讀了五年多私塾，學到了很多東西。如：姥爺的愛國精神、憂民意識、同情弱者、反對列強、痛恨邪惡……以及我現有的古文水平，不少人評說：「現在大學中文系古文專業的畢業生，也難比得上你的古文水平，誰能背誦這麼多古書古文呢？」

談到這裏，古文水平真助了我一臂之力，多年來接受記者採訪時或官員找我談話或其他閒談時，我會用古書上的文言回答他們幾句。

有一次某記者問我：「在中國一提愛滋病就是河南上蔡縣文樓村，你爲啥把工作重點放在其他很多地方，甚至於你會去外省調查愛滋病疫



情……」

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見《孟子》），上蔡文樓村的愛滋病病人是病人，其他地區愛滋病疫情更重，有更多的愛滋病病人不是病人嗎？文樓村那是河南搞的防愛面子工程，用不着我去……」

2004年元月23日，當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克強找我談話，他說：「河南的防愛工作搞得如何好……」

我慢騰騰地回答了一句：「惜吾與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與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見《論語》）

李克強書記說：「對！我應當親自下去看看。」

他不但對我如此回答沒有生氣，還來了個「對，去看看」。不管是真是假，他給我留下一個好印象（事實證明：以後他對我也沒有任何報復行為）。2007年以來不少媒體詢問我：「你見過李克強，你對他的印象怎麼樣？」，我就舉這個例子來說明：李克強能聽反面意見，其他官員們是很難做到的，不少官員只願聽好話，吹大牛！

2007年元月26日至2月10日，赴美鬧劇出現之前，「雙眼皮老鼠」養的小兔子在博客上點着我的名字，用侮辱我人格的言語罵我十一次（我所能看到的），引起了網上群眾的關注，這還引起了西方諸多記者的深入調查。有的外國記者還去了山東曹縣，了解我的家史，寫我的傳記。這場鬧劇出人意料地結束了，造事者爲了升官，其行為是何等的「榮耀」呢？她的同僚官員也評說：「她太過分了！……」

對這一鬧劇，奇蹟般的結束，對不擇手段的官員們、政客們作出了巨大的、無聲的回擊，本人深深地感謝我娘和姥爺，若不是他們當年讓我讀了這麼多的古書，絕不會有如此結局，我應當繼續幹下去，以慰他們在天之靈！

我一直在私塾讀書，直到我家離開高新莊，失學逃亡，這段歷史，對我來說，是了不起的，還決定了我的人生觀，信用和廉恥是我做人的標準，我對任何人、事務都能平等相待，我非常厭惡仗勢欺人的壞東

西，對發愛滋財者和醫騙子恨之入骨……

二 戰爭年代遷居開封

自 1937 年起，我們高家的祖業財產，遭到搶劫，待搶空之後，其院宅又被焚燒，好端端的村莊，各種古老照目的樓房、廳堂等各種建築物變成了一片廢墟！真可謂「匪人一舉，可臨焦土」，其破壞之慘重應嘆古今無！

我親眼看見過日本飛機轟炸的現場，更看見過無辜被炸死者的慘狀，我見過賊官指揮，土匪們搶劫的情況；百姓四處逃亡，真像電視熒屏所見的爭戰畫面。真如孟子所說：「爭地一戰，殺人盈野，爭城一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自古戰爭都是很殘酷的，迄今過去六十餘年了，如今我仍害怕看電視上的打仗影片。

我家就在這種環境中，逃出山東曹縣高新莊，先到河南省商丘地區柳河集鎮九女集村，租了五間北屋居住，在家的只有二姐、三姐、我和明瑜，明雲兩個妹妹全失學了，世廉、世正兩個弟弟很小，家中共有九口人，其中六人是未成年的孩子，全靠我父親一人來維持生活。這時是相當困難的。

二姐比我大五歲，三姐比我大三歲，她倆會協助母親搞家務，如：做飯、洗衣、打掃室內外的衛生等，我只會帶弟弟玩，我抱不動他們，只好用竹子小車推着他倆，怕暴露逃亡地主的身分，更怕暴露高新莊那個大戶人家，會遭到意想不到的麻煩，地痞流氓他們會注視着你，會搶劫你，很可怕，所以我每天推着弟弟在院內轉悠，兩個妹妹不足十歲，任其她們自己跑着玩。

那時大伯母（我娘）去世三年多，但我仍然很想念她，我做夢會見到她對我的親呢。我一直以為我是她生的……因此與我生母離心離德，我經常地躲在沒有人煙的房後空地上，自己學繡花，做各種女紅，我會繡花、做鞋、做衣服等，就是那時學來的，同時也為我做婦產科醫生，



手術台上的穿針法、縫合法提供了基礎。

在九女集的日子裏，由於生活沒有保障，我終日沒有看見過父母的笑臉，最多看到的是他們的愁容，聽到的是他們長吁短嘆，父親那時以近五十歲的人了，他爲了生活整日東奔西走，下農村買些棉花線子，去城裏紡織廠賣了，獲利很薄，父親當年勞作之情景，如今我還記憶猶新。

那時二伯父在病中，他患的是「中風」，連話都說不清楚，扶着拐杖行走蹣跚，二伯母本身屬於名門千金，那時變成了護理丈夫的保姆。我父母對二伯父很好，經常去他們房內幫忙，我們姐妹更是一有空閒就擁在他們家。

二伯父生活比我們好，他的人緣好，有許多往日他幫助過的人們，給他送錢送物，特別是我的小弟，小妹更喜歡去，到那裏可以吃糖，給零錢，一元關金票便滿足了。

我們到九女集不久，便聽到很多傳言：「日本飛機轟炸，漢奸詭詐，土匪搶劫」，黃河水開口等噩耗不斷傳來，社會上戰亂四起，九女集呆不下去了，我父親想赴抗戰的後方西安，因種種原因不能成行，只好投奔開封呂氏家，那時呂家六個舅舅，全在開封閒住，他們各戶離開蘭考老家較早，祖傳的衆多財物帶出來了，因此，每家都比較富裕，不但有房屋，而且還有傭人，我記得二舅的丫頭叫桂娟，她才十九歲，很能幹，解放後她在開封百貨大樓當營業員。

二舅呂寶仁，他比較有能力會辦事，我父親就找他，很多衣物包裹都運到了他家，幾個月後，可能是我母親不同意外出，或出於其他原因，東西又從開封運回來了。

1939年春節之後，又往開封運東西，於是年5月13日，我全家遷居開封，先是租房住，後來又買了一套房，係現在的游梁祠東街十九號院，我父親經營一些小生意（見第一節），全家勉強餬口。

這時，我家前任已故的三位母親的娘家人，她們逃出原籍老家很早，各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們五個女孩成了天天月月串親戚的專業

戶，二姐、三姐由呂氏所出，當然在這六個舅家輪着住，我和二妹明瑜成了隨從着她們住的親戚。

第一任朱氏母親只有一個弟弟（乳名叫巧，我叫他巧舅）他對我們很好，經常往我們家送東西，他的家人叫我母親六姑（因已故第一個母親排行老六）；第二任母親朱氏雖已故多年，那時朱氏的母親健在，一天，這位外婆帶我到大街上玩，有人問：這是誰家的閨女？

外婆說：她四姑（後一個朱氏母親排行老四）家的閨女，說完她一直流淚，當時我沒想到老人家為什麼要哭，後來我才明白，我非她女兒所生，只是在女兒的情分上，認了這個外孫女。

當時很多親戚的女孩，誰也不纏腳，在她們的影響下，我們姐妹幾個全放了腳，解除纏腳的痛苦，剛除下纏腳布條，雙腳出現水腫，也走不成路了，慢慢地由輕纏變成去掉。半個月後就習慣了，腳也不疼了，但走起路來，與自然雙腳不一樣，為此，我被許多人看不起，不少人說我走起路來很難看……

不管如何議論，我的腳回歸了自然，我可以在開封街上自由走動了，當時，我很高興，這等於擺脫了捆在我身上的枷鎖。

在離開高新莊之前，我一直讀私塾，來開封之後，這麼多親戚，同齡人數十人，誰也不認字，更不念書，天天打骨牌，打麻將，打得很熱鬧，我對此很不習慣。1942年之後，他們再請我也不去了，因為我不會陪他們玩，我的腳小他們還笑我走路不好看……

十幾年後，這些家庭全沒落了，他們那種坐吃三空的途徑，弄得後輩人生活非常困難，這是他們不學無術的結果，給後人留下慘痛的教訓。

暴雨前夜

高世正

夕雲初期日沉閣，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四節 我的學生時代

談起我的學生時代，並不是按部就班學習前進的，因戰亂輟學、跳級，是我的讀書過程。本人沒有讀過小學，直接考入初中，初中兩年讀完，便跳級進入開封中級女子師範學校（現在稱中專），中師讀了一年半，我又轉入高中二年級下期，江南流亡結束，考入國立河南大學醫學院，讀醫學時期，又趕上頻繁的政治運動，如「三反」、「五反」、「土地改革複查」等活動，政治學習，日益可見。我盡力躲避與沉默，故那時校方給我的評語是「政治不開展的大地主出身的子弟」，幸虧父母送給我良好的記憶力，才獲得了最後的「第一張」畢業證和大學畢業生稱號！

一 我的中學時代

我讀書的經歷與一般人不同，更不可能「昔與今比」，我入學校讀書並沒有花家裏的錢，原因有二：

1. 那時中學收費很低，我只記得有書雜費（那時人很笨，不會亂收費），師範與大學一切費用由國家供應，不過當時人們都不知道讀書有用。
2. 我走進學校讀書非常不容易，是突破封建家庭的重重枷鎖闖出來的，那時我這個困在封建家庭的閨秀對時代變革非常擁護。

（一）進入中學的誘因

我能離家外出求學，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其中遇有阻力和動力，可也是蒼天有靈，爲了更多生靈，陰差陽錯，讓我走出來的。

我隨全家人於1939年5月遷居開封，在那個時期社會的親戚風、裙帶風很盛行，我和姐姐、妹妹經常串親戚，不管到哪個外婆家，一住就是二十天或一個多月，我們這些親戚家的同輩人，如表姐、表哥、表

妹、表弟，還有表嫂們，這些富家子弟，誰也不讀書，講吃、講穿，比着對傭人發脾氣，我很同情那些傭人，厭惡他們的特權作風，因此，逐漸與他們疏遠了，我講中國文化他們一無所知，故沒有一起玩，誰家再來請兩個姐姐去，我不去，於是便呆在家中，因無事可幹，就跟我大弟學算術，他是在我輩中的一個聰明人，同時他也肯教我，從加、減、乘、除一點點問他，一直學到「雞兔同籠」等之類的難題。

那時家中開磨房，賣麵粉，也用麵粉換原糧，生活可以維持，但我父親非常累，二妹明瑜比我賢惠，她比我小一歲半，一切家務她來承擔，因為我經常手中拿着書，幹家務不積極，母親很看不慣我，我看着我自己的書，她說：「你不用吃飯，你去吃書吧。」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爬上大磨盤看《三國演義》，驢跳了，母親很生氣，不但用棍子打我，還說：「你連個驢都不如，給我把那本《三國演義》吃了吧。」現在回憶起來真可笑。

我們院內南屋有家房客姓孫，我們叫女主人孫大嬸，她經常來我家串門，她不斷告訴我說：「女人不上學，不認字，一輩子只能伺候別人，我這一生受不玩的累，生不玩的氣，全家五口人，三個孩子，你看我每天圍着鍋台轉，夜裏十二時之前，從沒有睡過覺……」

她說得多了，我更發現讀書的重要性。二戰勝利，百廢待興，我看到三妹明雲天天陪着世廉讀書，我想……於是向父母要求上學，我父親同意，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說：「你四個人（指二姐、三姐和二妹）都不找事，就你事多，小閨女家能認識「錢票」就行了，不需要出去上學，我不服氣……」

（二）北倉女中招生

我聽說私立北倉女中從豫西嵩縣趙灣遷回開封，高中、初中全招生，初中一年級招生較多，甲乙兩個班，我悄悄地和邢淑祥、黃玉亭（她小學畢業輟學兩年）一起去北倉女中考試了。半個月後，在校門外貼出學生錄取榜，高明魁，入取初一甲班，邢淑祥和黃玉亭落榜，她倆



都哭了，黃對我說：「你佔了讀私塾的便宜，我兩年沒有翻過書本，所以才有這種結果。」但我非常高興，我要去北倉女中學校讀書了。

高興得太早啦，我母親不同意我上學，又哭又鬧，我姨母還跟着說壞話，她說：「閨女一上學就學瘋了……」我母親更來勁阻擋，鬧了半個多月，我哭了半個多月，我想考學多不容易，我們一起投考的三個人，只有我一人入取……那時我輩上了，什麼也不幹，只是哭。因我母親掌握錢，她不來外拿，我父親很明白，他用百多斤麥子，頂了學費與伙食費，我入學了，一走再不回來……

初一上期瞬間過完了，由於「算術」的拖累，我的成績不好，又加上我纏過腳，在班上惹來不少同學們的歧視，這時我沒有任何退路，只有拚搏了，經過日夜的努力，初一下期的成績大有好轉，初二上期楊一表老師開始給我班講「代數」「幾何」課，他講得很好，又是從頭開始，楊先生上課提問，先找兩三個差生，她們答不出來，他就叫我答，並上講台上演算，國文、歷史、地理凡是需要背誦的課程，我不困難，

從此，因腳小遭到的歧視慢慢也消失了，同學們對我也另眼相看。

楊先生是北倉女中的訓育主任，並代理我們班的班主任，高中幾個班的「代數」「幾何」也是他教的，他的課講的非常棒，我很感激他……。1947年冬季的一天，突然聽說，楊先生領着十幾個同學，去延安參加革命了，當時我很難過，他為什麼不帶我走呢？

二十幾年過去了，在70年代初的一天，突然楊先生來醫院找我，當我看到他那衰老憔悴的臉龐，檻



北倉女中讀書時留影

樓的衣服，我真不知說什麼才好，楊先生說：「我在1959年被打成了右派，現在有病，我無人管……」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呆了一會我領他到內科看病，取些藥，又買兩件衣服。楊先生臨走時說，看你當醫生多好，你這個不問政治的人沾光了。我問楊先生，跟你走的張坤琦、張長民同學呢？

楊先生說：「他們教書說錯了話，全被打成了右派」，我流着淚，趕快回病房了。不久，我聽說楊先生去世了。

（三）開封女師的生活

在北倉女中讀了兩年，經濟實在困難。沒錢去飯堂吃飯，我們有個叫胡璉的同學，她時常從飯堂給我拿饅頭吃，劉孟真先生知道情況之後說：「高明魁，你去考開封女子師範學校吧，那兒不但免費，而且還供應生活。」我沒有畢業證。於是由高明魁改為高耀潔，以同等學歷報考，竟錄取在普通師範甲班。

入學後每個學生每月的待遇是三斗六升八合麥子，一塊錢銀元，自己用不完，每月還可以往家送一袋五十斤的麵粉，這時我母親很高興，還有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開封女師講的《國文》文言文多，每課在教師講課之前，叫同學們先做預習，這時我就會背誦給同學聽，老師講完之後，不少同學領會不了文章的內容便找我問，讓我再講一遍，這樣一來，全班人叫我「大姐」，同時開封女師各班都有纏過腳的同學，在那裏我腳小受歧視不再存在了。有一次講《弔古戰場文》，同學在預習時文章中的字不認識，我便把該文背誦了一遍，同學很驚訝！待老師講完之後，她們都來找我問這問那，那天也巧啦，老師上午給甲班講，下午給乙班講，凡是文學基礎稍差的同學，在自習時都來找我，熄燈鈴打過了，我們躲在牆角裏，還為《弔古戰場文》竊竊私語……從此之後，我變成了兩個班同學的「大姐」。有的同學比我大兩三歲也叫我大姐。有人連我的姓名也不知道，她們只知道甲班有個懂古文的大姐。

那時我在老師、同學面前都受歡迎，唯獨叫我為難的是，本人缺少



藝術天資，對彈琴、跳舞、打球、跳繩、賽跑、花樣體操、打武術等活動不能勝任，甚至成了包袱。這時我才發現本人不是讀師範的材料，於是選修英文，準備轉學，讀高中，女師讀了一年半，轉入嵩雲高中讀高二下期的插班生，功課又感到吃力了。

二 流亡學生生活

1947年秋開封發生戰爭，開封女師是個據點，子彈亂飛，風聞有同學死在槍彈之下，我們全校師生都藏身在一號、二號、三號樓地下室內，我記不清鬧了多少天，大批學生南逃，開封女師在校長王少明先生的帶領下，全體師生數百人，逃離開封，經商丘、徐州，至浦口，擺渡長江，過下關至南京，停在火車站候車廳內，逗留了三天，全校師生遷往嘉興，又往西南逃去，這段時日已成為我歷史的污點。

在嘉興的日子裏

開封女子師範遷往浙江省嘉興縣，住在棲真寺，因學生太多，把我們年級甲、乙兩班分在池灣村繭場內住，同學們全在二樓地鋪上，回憶那段生活，最大的感觸有兩點：

1. 同學來自天南地北，而人與人之間並沒有你爭我奪，互相猜疑，勾心鬥角，更談不上自我防範。
2. 大家能夠坦誠相待，互相信任，互相幫助，爲了他人寧可自己吃虧，真可謂互敬互愛，親爲手足！

時間過去六十多年，如今回憶往事，我們同學們之間的感情，還是令人難忘！如今，這些人在世還不足半數，每人已是老態龍鍾了。

天漸漸冷了，我記得學校給我們發棉衣，學生伙食全是大米，那時的生活既能吃飽，又能穿暖，上課是在蠶房樓下大廳裏，老師全是從河南一起來的，課程進行很緊，老師說：「我們要把逃亡失去的時間、課程補上來」，殷進德先生是我們的班主任，他的妻子是他大學同班同學。所以，管我們女生的事情，全靠殷師母出頭露面，她很開朗，會彈奏鋼琴，更會

唱歌，一時池灣繭場的氣氛搞得很活躍，同學們也樂以忘憂了。

1948年春節是在池灣過的，那年氣候不太冷，剛開春，同學們都去田野裏挖野菜小蒜，淹着吃，江南的小河，來往的帆船不斷，有時我們還可以下河抓蝦，回去煮了吃……

天剛熱社會上又亂了起來，我和時榮華、俞慧璋三個，想轉高中，於是和河南南陽的嵩雲中學王哲夫校長聯繫。那時只能打電話，嵩雲中學在無錫金華，院方同意了，我們剛到嵩雲中學，經過插班生考試，入取在高中二年級下期，報到了，上課不到半個月，學校要遷往四川，當時我很高興隨學校走衡陽、株洲，輾轉到長江三峽。在長江乘的是木船，江內不斷下雨，我們在船艙內太悶，乾脆出來淋雨，等於洗澡，這段路程走了七天多，到達四川東部，萬縣，全校學生只有二三百人了，住在輔城法學院，在那兒上課，老師不夠，王校長請來當地教師，那時教師並不一切向錢看，有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四位老師按時按點來上課，他們白盡義務，從不要報酬。

天熱了，當地救濟分所給我們發單衣服，每逢周日就有當地紳士往學校送食品。有豬肉、牛肉、羊肉，雞、蛋類，所謂讓學生「打牙祭」，這時同學們的生活還可以，天快冷時學校解散了，不少同學隨當時的河南省政府逃往海外了，我膽小，沒敢再遠去，這一錯誤決定，給我和我的子女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苦難……

我因發瘧疾和痛經，不斷在萬縣紅十字會醫院看病，認識了院長沈丕謀，他是山東濟南人，齊魯大學醫學院畢業，我們拉上了同鄉關係，沈院長很慈善，當年秋天，紅十字會招收護士，我們去了四個同學，進入醫院之後，很少上課，天天打雜活，給醫院打掃衛生是我們的主要工作，那時在醫院招收的學生中，有個順口溜：

大便器、小便器，都是護士的好武器，擦擦桌子，掃掃地，放下痰盂擦玻璃。



由於學不到東西，他們三人全走了。一天，我們那位當地老師，教數學的鄒老師來看我，我求他為我找工作，不幾天他找了河口場鄉小學，我在那兒教了一學年書，生活還算安定，可以飽食暖衣，1949年秋四川解放，春節過後，我隨萬縣十字會醫院院長的太太一起返回中原地區，那時人心驚惶，沈太太去了濟南，我去了開封，從此，流亡生活結束了。

在開封的日子，只有複習高中功課，準備考試，升學。這段流亡學生生活，過去五十多年了，有時還會在我夢中相逢，它給我帶來的污穢與災難，特別是在河南大學讀書時更是令人難以承受，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這段歷史也成了大「污點」硬說：「我們參加過蔣經國的『青年救國軍』。」

三 在國立河南大學醫學院讀書的日子

1950年7月，國立河南大學正式招考，當時該校是河南唯一的大學，考生蜂擁而至，投考人數我已記不清，錄取是8月15日在《河南日報》發榜，密密麻麻學生的名單，登出了一版半，醫學院在最後一個角落裏，我在那裏找到了我的名字高耀潔。當年是按各大行政區招生，我投考了三間學校，一間落榜，另一所錄取的學校太遠，我沒有路費。報考河南大學，我的志願是中文系，但錄取到醫學院，因不用交學費，家人勸我入河南大學，這是我走入醫學界的開始。



考河南大學前期留影

（一）九月初進入河南大學

學生進入河南大學先進預科，時

間是三個月。全校分八班，我被編入第五班，「政治學習、改造思想」把學生編成五人小組，美其名曰「互助學習」，其實是互相監督。男女混合編組，那時的學生很聽話，任其學校擺佈，不過也有一些「積極分子」，他們很會按照「階級」劃分編造言論，我們班就有兩個這樣的人，他們提前留校當輔導員了。

三個月政治學習結束，學生各進各系，我們這兩個班很特殊，當時大約有六十多人，多數是女生，校方傳達我們兩個班的性質，原計劃是培育助產士、護士等衛生學校的教師，學制定為三年。而學生來自全國各地，有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大家不同意這個學制，學生說，事前在報考與大學通知書上均未告知我們，畢業後當衛生學校的教師。於是紛紛要求退學，校方認為這樣退學，有損方校聲譽，就把兩個班合二為一，命名「婦產科專修班」。這一決定男生們紛紛轉系，最後只剩下了兩個男生和五十四個女生，學生仍不甘心，繼續鬧事，理由是婦產科是醫學領域中的一大科，人是整體的，專修婦產專科，來日我們無法應付將來的臨牀工作，與校方談判結果，我們將所有前期課與本科外科班統一教材，一起上課，那時學生真傻，不知道婦產專科的帽子尚未摘掉，為將來埋下了禍患！當時只知道我們與同屬本科前期課沒有區別，後期課多上了婦產科課程的學時，大家便無憂無慮了！（三十年後我們晉升高級職稱時，畢業時間和證書的修業年限不符，我發動全國各地同學簽名告狀，與母校打了一場官司，更換畢業證書，得以成功。這是入學時未能搞清而造成的。）

當時我們的講課老師，全是醫學院的知名教授，我記得解剖課是著名教授宋玉吾和魯培然教授講的，張靜吾講神經學，偶爾有講師上課。我記得一次賀講師（記不清名字）在講人體生理時他看見我一雙細長的手，他說：「你這兩隻手長得很適合做婦產科醫生」，因課程較緊，同學們把精力投入了學習，思想也集中在書本上，一學期轉瞬間度過了！

大家以為生活平靜了，特別是我本人只想將來如何能當個好醫生。



豈料，內幕並不平靜，輔導員在同學中搞三人互助小組，實際上是互相監督言行，這些「積極分子」還經常打小報告，有些同學就倒了霉。如我班開除了兩個同學，劉秀嶺因在談戀愛中出格。羅敬軒是一個有啥說啥的人，她的罪名是思想「落後」，也遭到開除處分。五十多年過去了，但在我腦海記憶中她倆是個好人，她倆離校後我們已失去聯繫，她倆的後果如何，我莫能知。

（二）參加土改復查與「三反」、「五反」運動

我記不太清楚，可能是1951年初，全國掀起一場土改復查運動，當然河南不能例外，而又必須走在前邊！我們全體同學停課奔赴農村，陝州溫塘鄉、灌注村，我和馬琦分在一起，同組還有《河南日報》社的兩位記者（現二人均已去世）。這四個人相處很好，我們在這裏還有一位藥理學教授夏一圖先生，不少農民找夏教授看病，我和馬琦最高興在旁邊看他如何給病人診斷。

我們在縣裏開會，見到縣長書記他們的生活相當樸實，既無油麵肥肚，也無華麗衣裝，下鄉騎自行車，道路崎嶇的地方他們會騎毛驢或者步行，談起話來滿口民生，如：種地，建水池（因當地缺水）等，我們對他的情況進行過落實，的確如此。

土改復查工作隊部讓我們爬山越嶺到農戶訪貧問苦，地處深山峻嶺的農民，他們的溫飽沒有問題，那時雖然處在春荒期間，農民並不缺少口糧。我們感到很欣慰。

開大會鬥地主，多數農民並不積極，因為在那些地方沒有「十里不親戚」，互相牽連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他們多數人採取沉默的態度，因此我們獲得的信息並不多，土地已分產到戶，按他們的話說：「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這說明了農民很滿足。

那時的村幹部也很老實，所以工作容易做，如我們培養的積極分子，未來的村支書武某他公開說：「我不能幹這個活，我沒有文化，我有三個孩子，我要種地吃飯……」隊部領導說這個人不行了，我們去找

張采蘭吧，張又說：「我是外來的媳婦，我丈夫有病，兩個孩子還小，這事我不能幹。」

現在回憶，當時那些人真老實，他們不去爭官，而是安居樂業，更談不上拿錢買官了……三個月後土改復查工作結束，大家坐在那兒，談思想心得，異口同聲地說，這裏沒有你爭我奪的現象，社會風氣真高尚。他們突出的表現是社會安定，人們安居樂業，他們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1951年10月至1952年元月社會上又掀起「三反」、「五反」運動，我們又停課三個月，離開學校參加宣傳隊鍛煉，改造思想。（作者按：1.「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對幹部）；2.「五反」：反行賄受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對工商者）。）

我們大多數同學都分在宣傳隊，我分在開封鼓樓街五反宣傳隊，在這裏有我們八個同學，大家的工作是自編自演活包劇對資本家出洋相，出窩囊，如：商人怎樣偷工減料，有商戶往棉花裏摻假，往肉裏打水，往藥摻白陶土，包養女人等等不法行為，最後的結果法辦。我沒有文藝天資，我只好負責「黑板報」，我們的組長張少騫設計好板報，讓我來畫，我的字寫得不好還得找別人寫，那時得工作多在深更半夜，第二天出場演出是下午和晚間，這場運動，搞了三個月我們就回學校了。

（三）回校復課

1952年秋季，我們開始講後期課，全班同學已搬往開封寺後街，河南大學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當時稱謂三分院）的後院裏，吃、住、上課全在這裏，這裏離開封河道街市人民醫院較近，講臨牀課需要與醫院的病人相結合，有時老師會把病人領到課堂上，另一面聽病人自己講述他的病情，結果，同學們對這種講課方法都很滿意。

當時校方對我們班很重視，請上海著名教授儲通爵先生來講婦產科課，他在40年代是全國婦產科學界的名流，他講得很好，美中不足的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河南大學師生合影

是言語不通，有時聽不懂儲教授的話，幸好有兩位助教，李子森（已故）、王芝蘭，課後，她倆再給大家解釋一遍，五百多個學時，大家把婦產科理論學得很好，這兩位助教經常說：「我們當這次助教真受益匪淺……」由於儲教授年事已高，他不適應北方生活，一學期之後，他返回上海了。

我班的婦產科手術學又請來廣東省中山大學醫學院婦產科林劍鵬教授講的，林教授多次在醫院做手術表演，我親眼看見過他搶救大出血病人。我們班的同學都很佩服他的技術，給林教授編了個順口溜：

婦產疾病來勢真劇烈，要人命的大出血。

嚇壞了醫生和家屬，我們的林教授自報來輸血。

美中不足的是，同學們到醫院臨牀科室有很多時間得看工作人員的臉色，值夜班時，醫院的夜餐本來是叫大家隨便吃，可是有些助產士和

護士不讓我們吃，把食物拿回家。護士長楊瑞輔對同學更兇了，不管你工作做得好壞，她都是以訓斥的態度出發，嚇得我們看見就躲開。那位輔導員董麗英更嚇人，她把學生按出身劃分成等級，我這個「出身不好」的人，整天提心吊膽……董麗英培養了一個黨員，這黨員的家庭歷史還是偽造的。當時，學生們悄悄地給她編了個順口溜：

人間地獄真是苦，三分院有兩母老虎。

一個是董麗英，一個是楊瑞輔。

1953年春，我們進入臨牀實習。全班分九個大組，奔赴全國各大省級醫院，我留在河南，半年後，以社會需要婦產科醫生為名，在我們班抽出了六名學生（我是其中的一個），命名為「代理住院醫師」，每月給三十六元的生活費（那時雞蛋一分多錢一個），派往開封第四巷妓女院為妓女治病，我臨走時李老師告訴我說：「你去幫助婦聯工作，為妓女看病時借機多做檢查，為你將來當婦產科醫生鍛煉檢查的技術和能力。」我按她的叮囑做了，練熟了我的婦科內診技術，掌握了女性盆腔正常與異常的情況。三個月後返校，馬上又把我和馬鳳樓派往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鄭州市南菜市街）工作。

1953年12月3日，我和馬鳳樓一起來到省二院，當天下午就接管了二十張產牀，為何這麼着急呢？該院只有一個婦產科醫生在門診上班，病房那位醫士患了骨癌，生命垂危，我們一直在那兒以醫師的身分工作。當時就有人評說我的診斷操作熟練，這時我是多麼感謝李老師對我的提醒，促成我在日常工作中加強了醫學理論知識的學習。

直至1954年上半年才宣布我們正式畢業。我們班的五十四個同學分往全國各地，六個大行政區，河南只留了九人。其中有我，我的大學階段就是這樣度過的。



第五節 成為一名婦產科醫生

我這一生從事婦產科專業，最大體會是「以己之身比他人之身，以己之心體諒他人之心」，我記不清自己接診過多少產婦、嬰兒，和各種各樣的婦科病人，但我能意識到病人求醫難，特別是婦女看病更難，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個醫生，是「生命的工程師」，責任重大。



大學畢業前夕的照片



成為婦科醫生的高耀潔
攝於1958年

一 做婦產科醫生苦中有樂

婦產科是出了名的髒和累的科室，但我們班畢業五十四名同學，絕大多數都選擇了這個專業。婦產科顧名思義，醫生面對的是產婦和嬰兒，當然還有難產和產科併發症；婦科呢？無疑是診治婦女生殖器發生的疾病，消除婦女生理、病理帶來的痛苦。

（一）產科情況

我剛開始當醫生時，政府提倡多生孩子。毛主席說：「人多好辦事……」，有的婦女一輩子竟生了十五個孩子！那時，我們科有四十五張病牀，每天至少出生三至五個嬰兒，最多達到二十三至二十四個（在我的記憶裏，有好多次都是二十四小時出生了二十四個嬰兒）。產婦分娩，不會選擇時間，有時這個產婦還沒有處理完畢，而那個又臨產了，還有產婦同時分娩的……



臨產產婦

在 50 年代，我科只有三個醫生，兩個醫士，助產士、護士共有十二人，產房、嬰兒房、護士部，忙到什麼程度，那是如今的人們想像不到的。那時的平產很多，剖腹產不到 10%。因此，守產程成了我們最大的任務。產程進展時，三至五分鐘檢查一次胎心的變化、宮口開展及宮縮情況，大家忙到何種程度？舉個



已分娩婦人與初生嬰兒

例子：早飯吃到上午十時，午飯吃到下午三至四時，晚飯呢？什麼時候下班什麼時候吃！餓得頭暈。有時，人在產牀旁接生，全身穿着隔離白衣，雙手戴着手套，同事從口罩側方塞上一塊兒饅就很滿足



了。誰也不敢脫下白大褂走人。大家就忙到這種程度！

難產不多，偶爾會從農村轉來橫位難產或前置胎盤，這些病人，胎兒死亡的機率比較多，但多數病人沒有怨言，醫護關係較

好，社會稱我們為「白衣天使」，回憶當年的醫務人員，他們確實不圖名利，真正做到了「為人民服務」，特別對產後大出血病人，若血庫無存血，找輸血團員來不及時，或賣血者又不同意，只抽一百五十毫升時，我科室工作人員就自願小量無償給病人獻血。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個男嬰出生第二天，患了「新生兒自然出血綜合症」，這種病便血吐血，齊醫士抱着這個男嬰在哭，男嬰與其父親的血型不合，其母親又患了「妊娠高血壓綜合症」，不能給他輸血。不到半天，這個新生兒全身蒼白，我一接夜班就發現了這個病重的小生命，就馬上去化驗室配血，我與這個男嬰的血型符合，問題就解決了。我抽了一百五十毫升血，晚上八時就給男嬰輸上了。天亮時，這個嬰兒就發出哭聲了。三天後，我又抽了五十毫升血輸給他。本人義務獻出了二百毫升血，這個小生命得救了。他父母是個農民，他們只知道孩子輸血後病好了，至於誰獻的血，我當然不會讓他們知道，因為我不是賣血人，他們又無經濟能力償還，我何必聲張呢？像這樣無償獻血的醫護人員又何止我一人呢？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是不足掛齒的小事！



嬰兒室

（二）婦科疾病

在 50 至 60 年代初這十幾年裏，婦科疾病並不多，也不複雜，因為那時候社會風氣好，性亂的女性也較少，又不允許人工流產，所以，來醫院求治的病人多是白帶多、宮頸炎、盆腔炎等，而且病情也都比較輕，人爲的婦科疾病也很少，偶爾來個婦科病症患者，多屬於器質性病變，如子宮畸形、子宮缺如、陰道縱膈，或者先天性無陰道（俗稱石女）等，也有極少見的男性不育。

1958 年之後，因社會上出現大躍進、人民公社，婦女的勞動力加重，造成了「子宮脫垂」，醫院門診求治子宮脫垂的病人較多，這種病，藥物是很難解決的，只得手術，因此，子宮脫垂病人住院手術者明顯增多。這時我從事醫學臨牀工作已有四年多了，完全能勝任一般的手術，如剖腹取胎、子宮切除、卵巢囊腫摘除等，但對子宮脫垂手術還比



子宮手術



較陌生，於是我求助於書本，根據病人年齡和病情分三種方法治療：老年、中年、青年人（把青年人又分為兩種，即要求生育者和要求絕育者）；子宮脫垂可分為Ⅰ度、Ⅱ度、Ⅲ度，根據子宮脫垂的度數在治療方法上又有所不同：

1. 對於子宮一度脫垂或單純陰道壁膨出者，不實施手術，內服補中益氣丸，同時減輕勞動強度，若久治不癒，再做陰道前後壁修補術。
2. 青年婦女要求生育者可用子宮園韌帶縮短術，保證子宮完好，同時做陰道前壁修補術，術後不影響生育。
3. 中年婦女或要求絕育者，可實施陰道前後壁修補，對子宮有病變者，可實行子宮切除；要求絕育者實施輸卵管結紮術。
4. 老年人子宮已萎縮，可施行陰道前後壁修補術和子宮園韌帶後繞術，使病人免於開腹手術的痛苦。

總之，凡是子宮脫垂的病人，除一度脫垂之外，不施行陰道前後壁修補（其手術效果不佳）。這是因時代促成的病例中本人摸索出的一套治療方法，適用於臨牀、各種子宮脫垂的病例。

那時，我們工作重點是產科，全科不到二十個工作人員。天天忙着接生、護理嬰兒，在我的記憶中，病理孕婦是很少的。

因舊法接生沒有完全取消，農村難產依然存在，有時候我們出診，對難產病人多是用車拉回醫院解決，我特別怕遠路出診，病人病情嚴重，無法轉院，需立即在農村衛生所處理，如，一次，一個不完全流產病人，年齡較大，陰道出血很多、很急，我就在她牀邊給她清除子宮內的殘存胎盤，病人的陰道出血馬上停止了，當我們回醫院時，病人家屬感激得直流淚……

自1956年，我開始無償兼鄭州衛生學校婦產科的課，1958年該校改成醫學專科學校，我又兼了大專班的課，還要帶河醫大的學生實習，有時候病房來了急診，我就用自習時間給學生上課，忙到什麼情況，無法用筆墨來形容。

本人深感當婦產科醫生苦中有樂，病人得救是醫生最大的欣慰，所以說，當婦產科醫生雖忙雖累，但其中有很多樂趣！我常這樣想：如果有人真的有來生，我還要當一名婦產科醫生，為女同胞們消除痛苦。

二 我在生育期是怎樣工作的

1953年12月，我到醫院臨牀工作，至1990年7月退休。在這三十六年間，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樣走過的，特別是二十一年的婦產科工作，我的三個孩子全都是在這個時期出生的。

（一）懷第一胎時，我剛結婚不久，懷孕期間反應不重，我不知道自己懷孕了，因為我的例假一貫推遲。在三個月後我摸到子宮底偶爾有胎動，六個月後腹部慢慢隆起，同事們還不知道我是個孕婦。因不被人注意，我和大家一樣工作、學習、值班，只是有時嗜睡。有一次，我和護士畢秀珍一起騎着毛驢去鄭州郊區白寨出診，那是一位滯產婦女，我對產婦使用了產鉗助產，產家看出我懷孕了，產婦的母親說：「大夫是



結婚照



個重身人（即當地方言所謂的孕婦），不能踩血泊（當地風俗說孕婦不能進產婦的房間）。」這位老太太一邊潑水，一邊不停地念叨着什麼。我也聽不懂她說啥，只知道她是在為我祝福……

從那天起，我懷孕的消息就傳開了，直至我妊娠足月，10月16日才住進醫院，17日折騰一天，18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兒子出生。那時社會上正在搞「鏟鋤非社會主義運動」，他爸爸給他取名「鋤非」。在孕期，我一天都沒有休息過。下午，我見到了兒子，他爸爸下午下班後來醫院看我。當我們二人仔細端詳兒子郭鋤非的模樣時，我發現他的臉長得很像我。當時我想，他可能會接受我智慧的遺傳基因，從來也沒想到過我給他帶來了世上罕見的苦難（見第二章）！

（二）我剛從農村醫療隊回來，又懷了第二胎。這時，妊娠反應較重，噁心、嘔吐，不能進食，為了照常工作，我吃了就吐，吐了再吃。吐了一個多月，最後發生胃出血，住了一個多月院。反應減輕後，我又恢復了正常工作。

當時我認為這是女人妊娠的正常現象，而工作是我做醫生的職責，不應該有任何過分的要求。懷孕六個月時，我的慢性闌尾炎又出現了急性發作，因怕出現化膿現象，做了闌尾切除手術，經過順利。半個月後，我又開始上班了。直至分娩前兩天，我出現了子宮前驅陣縮，才住進醫院，次日凌晨二時二十五分，順利生下一女嬰。那時正在開展「先進工作者」競賽，她父親就給她取名「郭竟先」。

因產前休息了兩天，產後休息



鋤非、竟先幼年攝

五十四天就開始上班了。那時，有餵奶時間。我認為這是正常現象，無任何過分苛求。

（三）第三胎懷孕，停經三十八天我發現自己又懷孕了。當我告訴我丈夫時，他說：「上次妊娠反應折騰得死去活來，遭了不少罪，你去做人工流產吧。」當時做人工流產不是那麼容易，需要打報告，請示領導批示，而且僅限於六胎以上的婦女。當然，我不夠條件，也不敢多此一舉。這次，妊娠反應不太重，孕期末出現多大異常情況，只是八個半月後，腳部出現水腫，血壓不高，尿中沒有蛋白，可能是我走路太多的原因。

分娩前三天，我和蘇大夫（已去世十多年）查房時她說：「我們把前天收的那位子宮肌瘤病人的手術做了吧，要是你生了孩子，這手術還得找外科大夫幫忙。」

我說：「好，你安排吧。」

次日，即7月23日，我們八時進入手術室，我這個足月妊娠的孕婦，子宮陣陣前驅陣縮，在洗手準備手術時我已不願意說話了。病人麻醉、消毒等一切準備全由蘇大夫來做，手術正式開始，我的精力特別集中，忘掉了一切。病人的肌瘤較大，又是多發性的，當兩側子宮動脈被結紮之後，切子宮頸時，我已經筋疲力盡。一個多小時的手術結束後，我連隔離衣都無力解脫。

產房值班助產士打來電話說：「來了一個骨盆畸形孕婦，胎兒頭位，不能進入骨盆，問問高大夫怎麼辦？」

我說：「我馬上回去。」原裝未下，我又走進了病房。產婦是個先天性脊柱畸形的婦女，她的骨盆向右傾斜四十五度，根本無法自然分娩，唯一的辦法是剖腹取胎。我和蘇大夫推着這位產婦馬上又回到手術室，脫下隔離衣。消毒雙手，孕婦做術前準備，她不會彎腰，無法做硬腦膜外麻醉，只好進行局部麻醉。為了減輕病人的痛苦，當胎兒取從腹腔取出後，我們用了強化麻醉，手術緊張了一陣子，我什麼都忘記了。



下了手術台，我連走出手術室的力氣都沒有了。

門診值班大夫又打來一個電話，說：「門診來了個宮外孕病人，因腹腔內出血，已經休克了。」

以一個醫生的職責，走不快也得往門診跑，我們兩個走到半路，門診護士已把病人推到了前往手術室的路上，我一看病人面色蒼白，問她話已不會回答，她的母親和丈夫急得大汗淋漓，他們嘴裏喊着：快！快！快……

於是，我們又進了手術間。毫無疑問，這又是一場在「死神」手中奪人的鬥爭，消毒後在局部麻醉下切開腹腔，病人子宮角妊娠破裂，失血量估計在八百毫升以上，靜脈切開輸入代血漿，動脈切開，輸入全血六百毫升。一個多小時後，病人慢慢恢復了血壓，我們才鬆了口氣，抬頭一看，時鐘已指向下四時。回到病房，累得飯都是躺在牀上吃的。腿和腳腫得連襪子都脫不下來，乾脆用剪子剪開。這時，我也變成了待產室的產婦，子宮收縮陣陣加劇了。

第三胎經產婦分娩比第一胎容易得多，夜間十二時十九分就分娩了一個女嬰，由於這正值大熱天，其父為其取名「郭炎光」。

每逢提起這段歷史，不少人說我「虐待婦女」，我說：「這算是虐待我自己吧。那是工作所逼迫的。我總不能看着病人不救吧？因為我是個醫生。」

三 我是個好醫生，不是個好媽媽

我是一個醫生，關注病人、救助病人是我神聖的天職。凡是有熱血者都不會認為這種行為影響了當權者的「面子工程」，對他們不利。

作為一名醫生，我替病人說話、為病人做事，得到了患病的弱勢群體的稱讚和愛戴，同時，那些狼心狗肺的人，卻把人的生命「視為草芥」，用盡各種方法打壓我這個敢於說真話的人，把我看做眼中釘、肉中刺，其目的是為了他們個人或集團的利益，而給我的家屬、親友以及

許多同情者帶來災難！特別是我的兒子，當然，我的女兒也難免其害。所以，我不是一個好媽媽。

（一）孩子出生後，我因工作忙，來不及照顧他們，就把他們放在哺乳室，有時因手術下不來台，孩子餓得直哭。阿姨看不下去，就餵他們喝點水……

孩子慢慢長大了，我三個孩子全被送到省委幼兒園，每周六去接他們回家，周一再送回幼兒園。那裏的老師和阿姨們對我不去接孩子都有看法和意見，她們不了解我的工作性質。

一次，小炎從幼兒園接回來，她走路時我聽見她褲子上發出嘩嘩的響聲，我一看，原來是她把褲子尿濕後結成冰了！問她為什麼站着尿，她說：「我看見小朋友（指男孩）站着尿了。」當時我心裏很難過。可是，婦產科不分白天黑夜地忙，我是手托母子兩條生命的醫生，我不忍心脫身。一天，幼兒園余院長給我開玩笑說：「你們家是反着過，接送孩子、洗衣服全靠孩子的爸爸，孩子的媽媽當個大夫就忙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我丈夫在第二門診部工作，接診的都是幹部，工作不忙。他性格內向，不愛管閒事，俗話說是個「老好好兒」，所以他有時間管孩子。我在婦產科，孕婦生孩子是不會聽從任何人的時間安排的，那時毛主席提倡多生孩子，弄得我們婦產科工作人員忙得焦頭爛額。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任何醫生都不會放棄自己的本職工作去搞家務，我這個出身不好的醫生更不敢妄自菲薄……

孩子們慢慢長大了，他們放學回來，第一聲先喊：「爸爸！」

（二）竟先上小學了，脖子上掛個鑰匙，她放學回來找不到媽媽，吃不上飯。不是我不讓她吃飯，是因為我在產房或手術室脫不開身。我這樣想：我的孩子是孩子，而產婦母子二人更重要，因此，我不能有一點怠慢。

我的孩子找不到媽媽，吃不上飯時就餓着肚子又跑回學校去了。有



時候，同事們看不下去，就給她些剩飯吃。

三十年後的一天，市三院退休炊事員王師傅對郭竟先說：「郭大夫，你還記得嗎？你在三益街上小學時，天天脖子上帶着鑰匙等你媽媽，你媽媽高主任又忙得走不開，我就把賣剩的麵條送給你吃，你吃完後，頭也不抬就往學校跑了。你現在成了大大夫了……」

我工作上雖然這麼賣力，在那個階級社會裏，出身決定一切，我不會得到任何領導的欣賞。我只能得到病人及家屬的好評和感謝，不過，也有的院長怕醫院出事故引起官司，會對我表示友好。

一次，開完院務會後，科主任告訴我說：「今天我很高興，也很奇怪，誰都嫌婦產科事多，麻煩，今天劉慶良（已故二十多年）院長說：『婦產科真忙，急診人數佔全院急診人數的一半，每逢婦產科有重病人或急診病人時，我首先問問高大夫在嗎？她要是病房，我就放心了。』停了一下，劉院長又說：『高大夫在工作上、技術上是沒什麼可說的，我親眼看見她在枕頭上、豬肉上練習手術縫合，手術技術在咱院的大夫中是無人可比的上的，對病人的態度更是好，她就是政治思想不開展，典型的走白專道路的人。』」

現在看來，這個說法很可笑。醫院醫生不是要對病人友好嗎？所謂的政治思想又是指什麼？何謂思想不開展？時過四十多年，我還是不理解。

我是醫生，我為的是給病人解決疾苦的，這是我的天職，我不能為那些養尊處優，做「面子工程」的人們塗脂抹粉！

第二章

三次災難我是怎樣度過的
(1960 年-1974 年)

第二章

三次災難我是怎樣度過的
(1960 年-1974 年)



第六節 職業使我暫時倖免災難

一 下鄉參加醫療隊

河南省發生了洪水災情，省裏指定每個醫院都要派些醫護人員參加醫療隊。醫療隊由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醫生和護士組成。這些醫生是從各個醫院抽調出來的，那時，社會上的人是分等級的，我是出身不好的醫生，當然是首當其衝，指定我下鄉的原因有兩個：

1. 地主出身的「臭小姐」需要下鄉鍛煉，改造思想。

2. 我掌握了婦產科的診治技術，不但能處理一般病人，而且能解決疑難病症和手術，同時也能解決一般外科小手術，如外傷縫合、闌尾切除、體表腫瘤切除、瘡瘍切開等手術都可以勝任。

下鄉之前，院長找我談話，當然說的是第二個原因，其實我心裏很

清楚是怎麼回事。於是，我欣然接受了這項工作，我把竟先交給了同科的醫生張蘭芝。她對竟先還不錯。三十年後，張大夫年逾花甲，她給竟先送病人時說：「竟先，你現在成了大大夫了，你還記得張姨嗎？你媽媽下鄉了，我照顧你，你雖然嘴巴很甜，可是你才一



下農村醫療

歲多，你說一聲：我想尿。我稍慢一點，你就尿到褲子上了……」

這次下農村半年多，我們的任務是夜以繼日地給農民看病。有的病人是用擔架抬來的，有的是用架子車拉來的，多是卧牀不起的患者，有子宮肌瘤，合併月經量多，病人重度貧血；有卵巢腫瘤，個別病人合併柄蒂扭轉壞死、化膿，我們都收治了。還有一些是晚期癌症，廣泛擴散，對於這些病人，我們只得動員他們回家等死。

我記得有一個巨大的卵巢腫瘤，她是個農村婦女，從山區抬來的，她叫陳李氏，她的腫瘤長得很大，摘除後稱了一下，有四十四市斤，病人躺在牀上瘦得像一個「山藥蛋上插了四個柴禾棒」，她躺在牀上七年多了，牀上挖個洞，供她大小便。她有一個十多歲的女兒輟學在家伺候着她的生活。她住進縣醫院，她的病情和體徵招來了很多好奇的人來觀看，這些人一方面看熱鬧，一方面看我怎麼解決這個病人的問題。有人說：「這是個只有一口氣的『活屍體』，省裏來的這位女大夫竟然敢收她住院！」聽說要給她做手術，他們給家屬說準備後事吧。家人便把棺材和衣服都準備妥當了。縣醫院外科、婦產科的醫護人員，更覺這是一大奇觀。對陳李氏進行術前檢查完畢，沒想到把主管文教的副縣長也驚動了，他大駕光臨，來看望這位病人。這位副縣長言行樸實，留給我的印象很好。我和他談的和家屬談的相同：不進行手術摘除腫瘤，病人只能是等着死亡，大膽手術，還能爭取一線希望。我這個意見，家屬和副縣長都贊成了。（這一病例如果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本人絕對沒有這麼大的勇氣，敢承擔這種艱險的手術。）

我們給陳李氏做了充分的術前準備，包括腫瘤取出時加腹壓用的沙袋，如何裝製、消毒、使用；洗手護士，第二助手，指定用男性，因為我怕腫瘤太大，我抱不下手術台。誰知副縣長很好奇，他也來參觀手術，手術間，負責的護士長攔住他，讓他穿上了隔離衣。當病人全身麻醉完畢，給病人插上氧氣管，手術剛開始，還沒打開腹腔，天大的笑話來了，這位不懂醫學的副縣長掏出打火機，點支煙抽了起來，病人麻醉



陳李氏腫瘤放出
液體後的標本

機裏的氧氣起火了，麻醉師當機立斷，把麻醉機的氧氣閥門關了，火撲滅了，而病人的嘴唇上已經燒了好幾個大燎泡。太危險了，大家非常緊張，為這生死瞬間忙活了好一陣子！否則，手術室會爆炸，我們十幾個人生命難保，同時過忌日！

虛驚一場之後，手術按計劃進行。陳李氏的腫瘤是漿液性的，柄蒂在右側卵巢，周圍沒有黏連，歷時不到一個小時，手術就順利結束了。術後又來了一關，病人腹壓大減，影響了心跳，我只有日夜守護。她不能起牀，半個月後，才在女兒的攙扶下開始學走路，住院二十天，他丈夫在醫院賣棺材，才交了住院費後，她出院了。後來，我聽她女兒說：她活到七十八歲那年走親戚時出車禍去世了。

從此，我在醫院裏成了一個手術匠，不但本縣病人找上門來，周邊的縣也來了不少需要手術的婦科病人，也來求治，我也不知道看了多少病人，做了多少手術，只記得每天都要幹到夜裏兩三點鐘。直至接班醫療隊來到，我仍不能脫身，快一年我才返回單位。回家之後，孩子也不圍着我轉，她只跟着照顧她的阿姨跑來跑去。

我回來之後，反右派運動的疾風暴雨即將過去，我聽說有不少熟人都被劃成了右派。例如，我的一個同班同學張世平說了一句話：「人民

公社以後農戶吃不飽。」就這一句話被打成了右派，受盡了折磨。直到1979年她才得到平反，使她失去青春的二十多年大好時光。在當時的社會上，像這樣的事件，何止張世平一人呢？聽說河南最先進，錯劃右派人數最多，據說佔全國的半數，在文化大革命中，河南搞得最紅火。另有一個不能忘記的是，河南吹得最大、最空、最假，《孟子》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河南人在全國人的印象中最差，應該怪罪誰。有這樣一句順口溜：

十億人民九億騙，河南人民當教練，總部設在駐馬店。

二 我在農村醫療隊的生活

衛生工作到農村去，當時被稱為「六二六」指示，我對下農村參加醫療隊很感興趣。這個組織是從各醫院抽調出來的，人與人之間沒有多大厲害關係，勾心鬥角的事情很少，提防捏造陷害事件會減少，防人之心可以放鬆些，所以我志願下醫療隊。更讓我高興的是農村病人多，對醫生來說，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病人多，幹活多，這樣可以提高技術，像我這樣的人，出身成分不好，技術上一定得精益求精，否則更抬不起頭來。在這種主導



高耀潔（中）與農村醫療隊人員合影



思想下，我甘願拋家捨口，不顧一切地奔赴農村醫療隊。

農村醫療隊工作的生活比較簡單，幹活（看病人）、吃飯、睡覺，雖然比城市的生活條件差一些，沒有洗澡條件，飲食單一（饅頭、麵條，很少有菜），但我並不在乎，最大的安慰是給害病的農民治病，讓他們能較快地治好病，少花錢。一個又一個病人被治癒了，他們恢復健康，回家安居樂業，他們雖然不會對醫生說任何感謝的話，這些老實的農民，我打從心眼裏喜歡他們，而那些坑、蒙、拐、騙、巧舌如簧的「醜類們」，他們骨子裏都是骯髒的，說什麼我也討厭他們。在醫療隊沒有提防這些人的必要，比在單位清淨得多，我們的任務就是幹活，如：在另一次抗洪中，我們醫護人員隨着民衆一起往山上跑，洪水剛消退，我們就到水邊消毒防疫，看到水上漂來一物體，我們以為那是一個「冬瓜」，隨着水流漂得很快，待這個「冬瓜」漂到河邊時，我們歡呼起來：這是個搖車，內有一個女嬰。我抱起她時，發現這孩子全身發



下鄉醫療時自行車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燒，趕快抱到縣醫院搶救，兩個小時後，女嬰發出哭聲，但不會吸奶嘴，二十四小時後，她慢慢恢復正常，會拿紙往嘴裏吃了，我們估計孩子有七個月大小，就把揀到她那天起往前數七個月定為她的「生日」。（現在，這個女孩子鄭州大學已畢業，在某中學教書，她已經是孩子的媽媽



浚縣人民醫院歡送省醫療隊同志離浚合影留念（高耀潔，後排左三）

了。）在醫療隊救人太多了，不單是一般病人，尤其是需要手術的人，他們特別需要我們。上述女孩，若非我們伸出援助之手，她哪會有今天呢？此件事情只有蒼天知情。

再舉一個例子。一次某地區遭水災，我們醫療隊下鄉參加救災。直升飛機把我們降落在「南山」上，這是一座較高的山，山上一片荒草，只有一間茅草房，裏面住着一位九十多歲的老道人，他自種自食，餵養了一群雞，公雞高聲啼叫，給他報時，母雞生蛋他吃，我們到達那裏，老道人很沉默，他不說話……下山之後，我才知道他是在戰亂中隻身上山的，他的感情與興趣，一切一切都與世隔絕了……

當時，當地政府用小木船把我們送往各個要去的衛生院，那次發大水，是在文革前，農民沒有盲目外流趨勢，仍然安心地重建家園，他們對醫療隊非常歡迎，我們看病不分科，每天至少接受四十至五十個病人，病種有：



1. 老年人，高血壓、心臟病、關節炎、胃病、痔瘡等較多。
2. 中青年人，外傷、瘡瘍、感冒等小傷小病比較多。
3. 兒童，腹瀉、咳嗽、皮膚病較多。

一般我們送他們三至五天的藥，複診率不高，醫患關係、幹群關係無法與今日相比，他們沒有任何過高要求，我們更不會拿他們賺錢，醫療隊是不收費的。這是當時政府對民生的關懷，沒發現任何人貪污，也沒有大吃大喝的行為，更沒有什麼包「二奶」、「三奶」之類的醜聞。

下鄉醫療

高世正

醫診手術走出院，
鄉鎮村落勤奉獻。
借得今日此義舉，
鑄就來日愛滋緣。

第七節 在災難中死裏逃生

我是一名婦產科醫生，迎接一個個鮮活的小生命來到人間，讓他們給一個個家庭帶來歡樂和希望，就是我的事業和我人生樂趣。對政治，我從來就不感興趣，沒有到官場去混的野心，也沒有在政治舞台上拋頭露面的願望。但是，生在現代中國，你不問政治，政治要問你；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可要來「關心」你呀！1966年開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性「疾風暴雨」突然降臨了，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把我、我的家庭和千千萬萬的家庭一起拋進了人間地獄，而我是一個死裏逃生者。

一 文革的疾風暴雨劈頭而至

我的噩夢是從1966年6月6日開始的。

在這以前，我已經感到了政治空氣的異常。街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標語，報紙上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乃至6月1日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廣播，都給人一種山雨欲來的感覺。但是，我總覺得那些政治風雲事離我這個距首都千里之遙的醫生還遠着呢，人所共知，婦產科是很忙的，我關注的只是產房裏的母親、嬰兒和那些婦科病人或手術的情況……

當時，我家住在鄭州行政區，我丈夫帶着三個孩子住在省直第二門診部院裏一間八平方米的房子裏，而我上班的鄭州市中醫院在西郊，距離太遠，交通不便，我只能一個人住在醫院宿舍一間六平方米的房子裏，最多每星期回家一趟，有時候，一連幾個星期不能回家。

6月6日那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樣，從宿舍的牀上爬起來，匆匆吃幾口早飯，就趕往辦公室去上班。走在路上我就感到氣氛有點不對頭，牆上的大字報琳琅滿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標語墨迹未乾，大喇叭裏傳出火藥味十足的口號聲，令人心驚膽顫，平時熟識的同事見了



面都鐵青着臉，有的人則像躲瘟神一樣，見了我就把臉扭到一邊，金佩珍、楊瑞靜表現得最明顯。

進了辦公室，一個叫趙湍惠的黨員醫生就厲聲宣布，我作為「牛鬼蛇神」已被革命群眾揪出來了。平時，這個姓趙的見了我總是滿臉帶笑叫「高老師」，她出身「好」，是所謂的「根正苗紅」，她是1958年大躍進時保送到鄭州衛生學校大專班學習的，她那個班的「婦產科學」課是我來講的，雖然她畢業時成績很差，但因「政治條件」優越而被選入這所省會醫院任婦產科醫生。剛來時，她連刮宮那樣的小手術都不會作，是我手把手教會的；她不會寫病歷，也是我一字一句地替她寫的。可我萬萬沒想到，就是這個我曾經真情幫助過的人，竟然也是第一個對我大吵大鬧、大動手腳、沒頭沒臉地打起來的人，我兩個胳膊上青一塊、紫一塊，都是被她打的——這種事說起來現在的人們可能不會相信，可是從那個年代裏過來的人都知道，這就叫「政治覺悟高」和「階級立場堅定」，在當時可是一種非常時髦的「美德」呢。「大義滅親」嘛，連親娘老子都可以出賣，更何況老師、同事呢！

捱了打，我疼痛難忍，但更感到巨大的心靈震驚：平時這些人都人模人樣的，怎麼眨眼間都變成嗜血的狼？是什麼東西使人發生了這樣的扭曲和劇變？當時報紙上有個提法，說文革風暴是「一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對我來說，這場「大革命」是從「觸及皮肉」開始的，確實也觸及到我的靈魂了——使我對人和這個社會產生了懷疑。

這一天，中醫院一共揪出了七個人，為首的是非黨員女院長，她的罪名是「走資派」，其他的六個人中有的是「歷史反革命」，有的是「反動權威」、「壞分子」等，我是其中唯一的女性，罪名也特別，叫「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根據是：我是科室負責人，我指揮着人工流產的工作，有時我也動手做流產手術。人工流產手術是上級的命令，並非我私設的項目，而給我強加一個這樣的罪名，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還有個罪名叫「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在「龍生龍，鳳

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的血統論邏輯下，這是個最方便的罪名；第三個罪名更荒唐，說我也是「走資派」——雖然不是黨員，沒有正式任命主任，但憑藉醫療技術能力，掌握了婦產科的技術大權（即所謂的「婦產科負責醫師」）。

這天將近中午時，我們六個被打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牛鬼蛇神」第一次被拉出去遊街了。有生以來，我從來沒有受到過如此的屈辱——頭上頂着紙糊的高帽，鞋子被脫下掛在脖子上，逼迫你赤腳走在用煤渣和石子鋪的路上……對我這個早年曾裹過小腳的婦女來說，真是可怕的折磨。沒走幾步，腳就被扎破了，鮮血染紅了腳底下的路，每走一步就留下一個血腳印，每走一步都鑽心地疼痛。

肉體的疼痛尚且可以咬牙忍受，可人格的侮辱則是我根本無法忍受的。中國人都知道，把鞋子掛在女人的脖子上遊街，有個特殊的含義：是說你是「破鞋」，也就是妓女的別稱，這對一個良家婦女來說實在是無法容忍的人格侮辱。這樣難堪的侮辱，後來雖然宣布「平反」了，但多年以來，我都如司馬遷所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司馬遷《報任安書》）

不可思議的是，在文革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的今天，由於我揭露了河南愛滋病的真相，當局又對我進行打壓和造謠傷害（在第一節中已經介紹過我的家庭和身世，在此不再重述），這說明當局的一些人，和文革中的那些流氓、無賴是一脈相承的，看來，時間並沒有使他們的本性有什麼改變，他們也沒有比他們的文革前輩有多大長進，從本質上來看，他們仍然是一群專制謀私的流氓無賴！這些年來，人們常說，文化大革命的慘劇不會再重演了。對此，我嚴重懷疑。現在把持着大權的人中，有不少是文革的殘渣餘孽！文革的思想、文革的語言、文革的手段，是他們最熟悉的武器，說不定哪天他們又會造出一場新型的「文革」來，創造一個天下罕見的奇蹟！

四十一年前，我們這些被剝奪了做人的基本權利的「牛鬼蛇神」，



就這樣走上了「鬥鬼台」。我清楚地記得：滿街筒子的人像看耍猴一樣看着我們，有人在幸災樂禍地笑，有人裝出滿臉革命義憤高呼口號，有人用污穢的話語在謾罵，有人還向我們吐口水扔垃圾……

我已經記不清那漫長的遊街之路是如何走下來的，只記得當時，充滿我腦海的只有一個念頭：死、死、死……

二 我自殺未遂後的誓言

以死亡來抗議所遭到的橫逆屈辱，擺脫難以忍受的痛苦煎熬，似乎成了我當時可能的唯一選擇。我從小熟讀經典，「士可殺不可辱」的觀念早已深入骨髓。當人連最起碼的尊嚴都無法得到時，死亡怕是最方便的避風港，也是最無奈的抗議方式。

從6月6日以後，我們先後三次被拉出去遊街，同難的人中有幾個已先我一步選擇了這條不歸路，我親眼目睹長我兩歲的婦產科醫院的醫生王承敏上吊自殺。後來，我逐漸知道了，在那鬼魅橫行、血雨腥風的日子裏，走上自殺路的人在全國何止千萬！著名作家老舍、鄧拓、歷史學家吳晗、翦伯贊、翻譯家傅雷、戲劇藝術家馬連良、言慧珠、音樂家顧聖嬰等一大串曾經如雷貫耳的名字都在這個殘酷的名單中間，像我這樣一個普通的醫生就是死了又何足掛齒？

我們被「揪出」後，就被關入了「牛棚」。而那個要求入黨的工人梁巴夫，最能打人罵人，他打過李孝周大夫、鐵亞林大夫……而我的「牛棚」有點特殊，它是醫院存放死人的「太平間」前院。我在這個恐怖的屋裏，竟然斷斷續續地被關了八個多月！在那些日子裏，我日夜與死人相伴，冬天又濕又冷，還不給飯吃，真可謂飢寒交迫！當時鄭州市有位姓劉的市委副書記，捱鬥後難忍屈辱而自殺了，他的屍體就存放在中醫院的太平間裏，我天天夜裏就睡在這些屍體旁邊，與冤魂相伴，想着自己將來可能和他們有相同的命運，真是雖生猶死啊！

風聲愈來愈緊，全市要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批鬥會，文教衛生系統成

百上千的「牛鬼蛇神」都要登台，而爲首的是主管文教衛生工作的副市長、「牛鬼蛇神的總後台」金成。我作爲金成在衛生系統的「黑幹將」自然也名列黑榜之上。

我名列黑榜是有來由的。主要是因爲我曾被鄭州市金成副市長指名參加「針灸麻醉輸卵管結紮手術示範表演」。那時被當局稱讚爲「針麻成功、手術快、效果好，一台手術歷時不到十分鐘」。

在那個無奇不有的荒誕年代，各種各樣的虛假「奇蹟」都被創造出來，以證明毛澤東思想的英明靈驗和戰無不勝。衛生戰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針灸麻醉」和「用毛主席著作治療精神病」。文革前夕，鄭州市要推廣「針灸麻醉」，我們實驗過多次，受術者痛得連皮膚都切不開，只得悄悄地改用局部麻醉，而事後誰也不敢吭聲。金副市長點名要我主刀來做一次「針麻輸卵管結紮手術」，還說這是政治任務，必須確保成功。事實證明，我無法相信針灸可以麻醉，但被迫接受了這個「政治任務」，心中充滿了矛盾：用針灸真的能夠「麻醉」嗎？受術者能夠忍受到痛楚堅持住手術進行嗎？在一個醫生的良心上能夠忍耐嗎？拒絕了吧，巨大的政治壓力怎麼抗得住？最後，我決定用作假來應付。我和麻醉師、護士串通好，表面上是用「針灸麻醉」，實際上是用局部麻藥1%的卡因液浸濕紗布，蓋在動手術的部位，腹壁逐層使用麻醉液，待取輸卵管時，我們悄悄地加用了一支強化麻醉藥，即「冬眠一號（杜冷丁、非那根、冬眠靈）」，以保證患者不受痛苦。這次作了假的觀摩手術，當時着實被鄭州市各大報紙和電台大吹大擂了一陣子，說是用毛澤東思想指導衛生工作的偉大成果。爲此，金成副市長還受到了上級的表揚。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這卻成了金成的一條罪狀：你不讓黨員來做手術表演，卻點名讓高耀潔這樣一個「黑五類」來作如此重要的手術表演，豈不是「重用牛鬼蛇神」？這不證明了你就是「牛鬼蛇神的保護傘」？事情過去多年後，還有人拿這件事開我的玩笑，說你高耀潔真



風光一時，居然有和鄭州市副市長平起平坐的權利。

開批鬥會的那天，外面的大喇叭一早就厲聲命令我到外面集合，去接受全市「革命群眾」的批鬥。我知道這一去又將是一場空前的災難和折磨，下定決心寧死也不任他們宰割。於是在太平間裏找個角落藏起來，千呼萬喚也不出來。總算暫時躲過了這一劫。

但是，躲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沒過幾天，我還是第三次被抓去遊街了，回來又是首如飛蓬，遍體傷痕……

那天晚上，我實在絕望了，看不到一線希望的星光。於是，我終於走出了那一步：抓起早已準備好的三十多片氯丙嗪（麻醉藥）一口吞下……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是1966年8月26日。

如果我真的死了，那將是我的祭日。

……可我沒有死成。當我慢慢地醒來時，已經是8月28日了。

後來我才知道，當我服毒昏迷後，大概在無意識中進行了垂死掙扎。隔壁鄰居聽到了我以頭撞牆的聲音，叫人來破門而入，把我送進了醫院的急診室，輸液搶救……

是我的孩子們慘痛的哭聲把我叫醒的。我先是朦朦朧朧聽到哭聲，費力地睜開眼睛，便看到我的三個孩子圍在牀前，一個個都哭成了淚人，這個叫一聲「媽」，那個叫一聲「媽」……

望着三個無助的孩子，我突然明白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我的孩子還小，最小的才六歲多，我不能死，還不能死！我要是死了，孩子怎麼辦？

——我是一個母親，是我把這些小生命帶到了這苦難的人間，我有義務和責任撫養他們長大，保護他們不受凍餓欺凌。在這種時刻我撒手而去，拋下孩子不管，豈不是放棄了母親的天職？

女人身心中深藏着的最強大堅韌的力量——母性讓我堅強起來了。

「我不但不能死，還要在這險惡無比的世界上咬牙活下去，用我的

翅膀守護自己的孩子們。」這是我當時心中默念的誓言。

後來，當我的兒子郭鋤非真的因我而遭難，蒙受三年冤獄時，我果然有機會兌現自己死而復生時立下的誓言了，這是不久以後就要來臨的命運考驗。

三 「牛棚」裏的苦難生涯

對人的肉體逼害和人格尊嚴的踐踏，在文革中是有一套通行全國的程序的。揪鬥、遊街、坐噴氣式、戴高帽、剃陰陽頭，「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等一套儀式是少不了的，抄家也是其中之一。

我直到現在還完好保存着一份「高耀潔被抄家時損失物品清單」，紙雖然已經變黃變脆，但字迹還大致清晰。這是抄家過了很久以後，新來的當權者作出的一種姿態，大概是要顯示「盜亦有道」，野蠻的強盜行徑也是「有規矩」可循的吧。（直至1974年平反結束，我都未要求他們作任何賠償。）

這張抄家的「清單」共分兩欄，左邊是我自報的抄家中損失物品，右邊是他們「核實認定」的。這份被我當做「文物」的清單可以證明抄家的嚴厲程度，也說明我這樣一個



文革前夕全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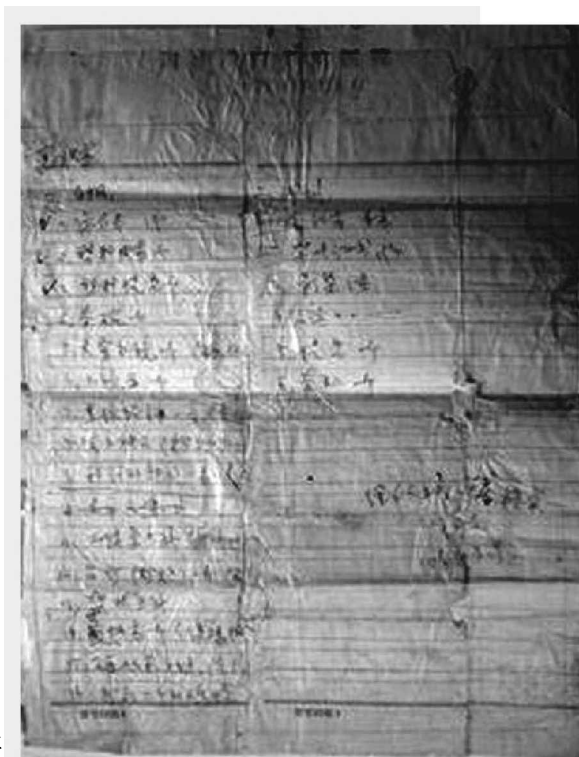
普通醫生當時的生活狀況。全文如下：

一、自報：

1. 相片本一個
2. 塑料皮本一個
3. 塑料提兜一個
4. 茶碗一個
5. 大穿衣鏡一個（砸壞）
6. 小鏡框一個（砸壞）
7. 黑線呢褲一條（半新）
8. 緞子被面（粉紅色）
9. 《戰傷外科》書一本
10. 大學文憑一張
11. 公債券五張（每張十元）
12. 台燈（燈泡）一個（壞）
13. 獎狀三張
14. 剪報本一個（健康報）
15. 砸壞箱子上的鎖
16. 打死兩隻小雞娃

二、找到：

1. 筆記本四本
2. 畢業證書一份
3. 影集一本（照片失蹤）
4. 文件……
5. 提兜一個
6. 茶缸一個



抄家清單影本

經手人 謝夢謙（簽名）

核實 實收 1968. 3. 9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當時簡直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了，一個「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所有的家當竟然如此寒酸，最「豪華」的家具只是一面大穿衣鏡（二尺長一尺寬），還被他們毫不留情地砸爛了。而最「奢侈」的物品不過是一條半新的「黑線呢褲」和一幅粉紅色的「緞子被面」，被參加抄家的打手們順手牽羊地據為己有了，可他們的頭頭並不認帳。此外，連箱子鎖、台燈都被砸爛了，可見破壞之徹底。最可恨的是我養的兩隻小雞娃也被他們當場打死了，嗚呼，小雞娃何辜，遭此毒手！

現在的讀者們，你們能通過這張「抄家清單」想像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醫生當時的生活狀況，和被野蠻抄家時的可怕情景嗎？現在有人又在懷念文革了，說那時不管怎樣，當官的還算是清廉的，社會風氣還不錯。請注意，我那貧寒的家中最大的資產是國家強制發行的「公債券」五十元（大約相當我一個月的工資），被抄走後居然不被認定，這些錢進誰的腰包了？這樣的強盜們能算得上「清廉」嗎？

我從被關進「牛棚」那天起，就被扒下了醫生的白大褂，剝奪了行醫的權利。作為一個被「打入另冊」的「牛鬼蛇神」，我除了頻繁地罰跪捱鬥以外，還要承擔繁重的勞動。我每天要掃地、打掃廁所，送開水（如今我右腳內踝還留有燙傷的斑痕）……凡是醫院最髒最累的活我都得幹。其實，我不怕勞動，也沒有把體力勞動者看成是下等人，但是如果勞動不是一種正常的工作，而是對「罪人」的懲罰，那就是另一種體驗了。最讓人無法忍受的不是勞累，而是四周投來的仇恨和鄙視的目光。還不讓我吃飽飯，一天，我正在吃饅頭，紅衛兵的頭頭外科醫生王傳榮伸手把我的饅頭打落在地上，嘴裏還說：「你還有臉吃？……」

王傳榮，你現在在陰曹地府，你知道嗎？你的兒子二彪吸毒、偷盜，無惡不作，最終落了個監斃的下場！這是閣下「行善積德」的結果！你應該不會忘記你們為我兒子郭鋤非製造冤案，害他坐了三年冤獄的作為吧？

那段非人的生活像漫漫長夜，似乎沒有盡頭。只有幾點微弱的星光



還能給我一點活下去的力量。首先是親人們關注的目光，特別是我丈夫郭明久悄悄的給我送東西吃，其次是一些人性未泯的善良者難得的同情。如：

護士賀文秀偶爾會在無人的環境中悄悄地說：「高大夫你要活下去……」

助產士潘賽英她會悄悄地說：「大家心裏都清楚……」

護士長葉桂根無意在人群中說：「高大夫對工作、對病人的責任心誰也比不上的……」紅衛兵馬上把她拉出來讓她跪在那裏陪着我捱鬥。

我記得，當我被罰連續幾小時跪在地上向毛主席「請罪」時，雙膝都腫得烏青（已落下了病，如今行走困難已十幾年了）有個不相識的好心人悄悄給我送來一個棉墊……我在「太平間」裏飢餓難耐時，炊事班一個姓霍的大嫂偷偷給我送來夾着肉片的饅頭……

中國古語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我願終生來報答這些在苦難中幫助過我的好人們。當時我就曾對霍嫂說，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回到醫生崗位上工作，她和她的家人如果需要，我將終生免費為他們服務。後來，我終於有機會兌現自己的承諾了，我恢復工作後，霍嫂真的來找我看過病，我也真的免費為她治療了。現在，霍嫂已經去世十多年了，但她的親戚、同村人至今還常來找我看病，我依然愉快地為他們服務。有人很奇怪我和霍家有什麼特殊的關係，其實謎底就這麼簡單：她在我被剝奪了人的權利時，還善良地把我當做一個人。

可惜，在那黑暗的年代裏，人人自危，像這樣的人性之光實在太稀少了。

野蠻的體罰，沉重的勞動，惡劣的飲食和長期的憂憤，把我的健康徹底摧毀了。1967年5月13日，在一場批鬥中我被推打，造成胃部損傷，大吐血而被送進了省人民醫院病房。為了止血救命，只有手術切除一條路了。於是，我只得接受了這個手術，胃被切除了十分之九，只剩下細細的一條。從此，我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了，每次吃飯只能

鄭州市骨科醫院診斷證明書

查病員 高映生 性別 女 年齡 78 (門診號 住院號 X 光號)

于 19 年 月 日經我科檢查結果于后:

檢 查:

診 斷: 左側胸肋傷氣滯 右側肱骨
與股骨肌肉傷

處 理: 配合藥物
止痛休息

骨 科 醫 師 劉永新 1977年5月17日
不蓋公章證明無效

鄭州市骨科醫院診斷證明書

查病員 高映生 性別 女 年齡 78 (門診號 住院號 X 光號)

于 19 年 月 日經我科檢查結果于后:

檢 查:

診 斷: 左側胸肋傷氣滯 右側肱骨
與股骨肌肉傷

處 理: 配合藥物
止痛休息

骨 科 醫 師 劉永新 1977年5月17日
不蓋公章證明無效

打傷證明

吃一小點，還只能吃流質食物，一天要吃四五頓，還經常發生腹瀉，常年不斷吃藥，實際上我早已經成了個殘廢人了。幾十年來，我就是這樣生存的，連我自己都驚訝，我居然這樣活到了八十多歲！

我至今還保留着一疊那幾年的醫療診斷書，上面記錄着我捱打後的傷情：「左側胸肋傷，氣滯，右側肱骨與股骨肌肉傷。」也記錄着胃切除後的病情：於1967年5月13日在外科手術後半個月轉內科治療，因切胃手術中發現肝表面已有結節及纖維增生，最後診斷早期肝硬化（因自殺未遂藥物中毒引起來的），轉內科是作保護肝臟治療的。

我之所以珍藏這些診斷書和「抄家清單」等文件，是因為它們不僅



河南省人民医院 门诊号 471290
诊断证明书 住院号 74950

姓名 高洁 性别 女 年龄 4 科别

诊断意见: 一. 胃次全切除术
二. 早期肝硬化

治疗经过及处理意见: 于1967年5月13日在外院行胃次全切除术, 术后病理检查提示: 胃体部粘膜慢性炎症, 胃体部粘膜固有层内见少量淋巴细胞浸润, 胃体部粘膜固有层内见少量淋巴细胞浸润, 胃体部粘膜固有层内见少量淋巴细胞浸润。

1974年7月27日 医师 高洁

(未盖章者无效)

胃切除診斷證書

出院证

姓名	高洁	性别	女	年龄	47
入院日期	1969.8.1	出院日期	1968.2.26	科室	外科
病名	1. 胃次全切除术 2. 早期肝硬化				
结果	见明显变化				
医嘱	1. 术后随访 2. 注意休息 3. 饮食清淡 (半流食) 4. 1970年12月来院复查				
院长	高洁				

河南第二医院 医生 高洁

胃切除出院證明

是我個人苦難的真實記錄，也是那個黑暗時代的罪行鐵證。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在歷史的法庭上舉證，讓這些殘酷的事實大白於天下，那個時代正像蔡楚先生寫的一首詩所描述的那樣。詩《給北風》如下：

給北風

蔡楚

不要吹吧，凜冽的北風，
別來闖入我熟悉的夢，
因為在我的夢裏，
同樣是雪柱冰峰。

讓我沉沉的睡在這兒，
像一片落葉，如一條僵蟲，
不管希望的芽綠到窗前，
成功的花正開的火紅。

也不管在什麼別的晴空，
陽光已透過惡霧的深濃，
古老的樹昂起了低垂的頭，
幽閉的泉又緩緩流動。

不要吹吧，凜冽的北風，
即是你帶來了春天的資訊，
請告訴我沉默的父兄，
告訴我忍耐的親朋。

1975 年 12 月



第八節 母子兩代人的鐵窗歲月

文革初期的這段經歷，已經使我痛苦萬分。但是，苦難並沒有就此結束，更大的災難，更痛苦的記憶接踵而至。他們在我兒子身上下了毒手。

一 兒子被我株連冤獄三年

當我還在「牛棚」裏苦苦掙扎，並用不斷的申訴來進行無望的抗爭時，新的罪名又加到了我的頭上：他們把我的申訴行動說成是組織了一個非法組織「平反委員會」，還煞有介事地捏造說我是「平反委員會的二把手」。對此，我當然不能接受，以更加憤怒的申訴來回答了他們。

看到無法征服我，那些非要致我於死地的惡人們使出了「殺手鐮」。他們發現，我能咬牙生存下來的最大動力是母親對孩子的愛和責任感，他們認為這是我精神上最柔軟、最薄弱的環節。於是，他們決定對這個「軟肋」開刀——把魔爪伸向我的兒子。

1968年11月6日和7日，據說在鄭州市中醫院的電工房和男廁所裏出現了一幅「反動漫畫」和一條「反動標語」（這漫畫到底是什麼樣的，標語寫的到底是什麼，我至今沒看到過）。這在當時，成了鄭州市轟動一時的「重大反革命案件」。在破案的過程中，公安機關和中醫院的當權者立即把矛頭指向了我的兒子郭鋤非。

郭鋤非是我唯一的兒子，他1955年10月18日出生，當時只有十三歲，在鄭州八中初中二年級上期讀書。平時，他並沒有到西郊來和我住在一起，而是跟着我丈夫生活在第二門診部院內的家裏，因為那裏離鄭州八中很近，上學方便。

11月5日上午，郭鋤非吃過早飯買了些雞蛋，到西郊的中醫院給我送來，吃過午飯後回到學校去上課。6日上午，郭鋤非又趕到中醫院，

給我送來一些掛麵，然後急忙趕回八中上第三堂課。這個時間和發現「反動漫畫」和「反動標語」的時間並不吻合。但破案者一口咬定，郭是「反革命案件」的作案人，理由是他有所謂的「作案動機」——「11月5日，當中醫院革命群眾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揪鬥其母時，郭即表示嚴重不滿，並企圖尋機報復他人。」（見後附郭鋤非的判決書）

經過了半個月的所謂「偵查」（其實是炮製），11月22日下午，一個公安局八科（看守所）的工作人員，一個市中醫院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員來到鄭州八中，把正在上課的郭鋤非抓走，帶回市中醫院審訊。我當時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是在太平間裏聽到不遠的地方傳來不是人聲的慘叫，仔細一聽，才聽出是兒子的聲音。這時候，我心急如焚，但又無可奈何，只能踮起腳尖，扒着窗戶，向傳來慘叫聲的方向望去。這個世界上凡是當過母親的人，都應該能體會和理解我當時的心情吧。

據郭鋤非後來回憶，在審訊中，他不僅遭到了毒打，還經受了百般威脅利誘。審訊者騙他：「只要承認了，馬上就可以回家回學校上課。」威脅他：「不承認就判你重刑！」

鋤非不承認，他們就來個車輪戰，輪流審訊，不讓孩子休息，直熬得孩子涕淚橫流，神志不清。

當鋤非說自己那幾天穿的是雙塑料底鞋時，他們大吼：「不對！你穿的是雙破球鞋！」並逼着鋤非說這樣的口供。

鋤非實在說不出漫畫上畫的是什麼，他們先是口授「畫兩個小人」，叫他自己畫，還畫不出來。一個姓龍的軍官竟然拿來「反動漫畫」的照片，給鋤非紙和筆，讓他照着照片畫下來，畫得不像了還要反復重畫，直到他們滿意為止。

鋤非實在想不出「反動標語」的內容，他們也拿來照片，讓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描，於是就算「取證完成」了……

很快地，不到兩個月，於1969年1月13日，對郭鋤非的判決公布



了：他以「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立即送往開封監獄執行附郭鋤非的判決書。郭鋤非的判決書影本見第九節。

鋤非當時的實際年齡不足十四歲，按當時的法律，根本就不夠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於是判決書就把他的年齡改成了十五歲。

刀子砍到我兒子的頭上，但目標顯然是瞄準了我。

判決書的開頭對鋤非的社會關係寫道：「現查清，郭的母親高耀潔，地主出身，有嚴重歷史問題及現行活動，解放前曾參加過反動組織，多次進行反共宣傳，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革命群眾揪出。」

關於犯罪動機的描述是：「當中醫院革命群眾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揪鬥其母時，郭即表示嚴重不滿，並企圖尋機報復他人。」

而對犯罪原因的分析是：「郭出身反動家庭，長期受其母反動思想影響，加之本人的不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因此，劃不清階級界限，失去了應有的階級立場……」

這是他們對我無辜的兒子——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孩子蓄意陷害，也是對我這個母親所發出的惡毒一擊。我明白，他們這是要從精神上徹底摧垮我。

我沒有被擊垮，但被徹底激怒了。老母雞看到雞娃遇到危險也會撲向老鷹，何況我是個人，是個母親！

孩子被送到開封監獄後，有人對這個全監最年幼的「政治犯」十分同情，有人說幹了十多年第一次見到這麼小的「政治犯」。監獄的一些工作人員把郭鋤非安排在造紙廠，他那時可以看到廢紙中的書本，為他 1978 年投考河南大學打下文化基礎。我多次跑去探監，兒子每次見到我，都是痛



郭鋤非上大學之前攝

哭流涕，我也老淚縱橫。我緊緊地抱着孩子，告訴他，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媽媽已經橫下一條心，決定拚死一搏，為你爭個公道！

看完兒子，我就背着個破背包，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北京去替兒子申冤。晚上就睡在天安門的門洞裏。現在，每看到那些含冤上訪的人們，我都發自內心地同情，因為我也是個多年的「上訪戶」。沒有天大的冤屈，誰會走上那條艱難屈辱的血淚之路啊。這也是同情弱勢群體包括愛滋病病人的起因……

1972年，郭鋤非三年刑滿獲釋。1974年冤案才得到正式平反，只有百來字的「平反決定」上簡單地結論：「經覆核調查研究，原判反動標語，不是郭鋤非所寫。故決定撤銷原判，改判郭鋤非無罪，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事情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他在少年時受到的精神創傷一直籠罩着他的人生。從此，他像驚弓之鳥一樣，他特別害怕當官的，他整天籠罩在恐懼的陰影下，變得膽小怕事。當官的誰想捏誰就捏，他變成了一個「麵糰」。

2007年2月，我因為要到美國去領獎，被河南省當局軟禁在家半個月。為了強迫我放棄領獎，當局什麼手段都使出來了，其中最卑鄙的就是逼着已經擔任河南省教育學院藝術系主任的郭鋤非跪在我面前給我磕響頭，哀求我答應省裏的要求，如我堅持出國會對他的工作和今後生活可能產生很壞的影響……

就像當年他們把整兒子當做整我的「撒手鐮」一樣，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他們仍然把征服兒子當作征服我的突破口，太惡劣了。

我不埋怨我的兒子，也理解他的心情，只恨那場給他造成終生心理陰影的文化大革命，更恨那些至今還用文革手段來威嚇他、恐嚇他的政客們。太卑鄙了，太無恥了！

「免於恐懼的自由」，對中國人來說還是多麼遙遠啊！兒子的冤案過去已快四十年了，在這些歲月裏，每逢想起此事，或提及此事，本人



無不慘哭流涕，我流出的眼淚，若從鄭州往路上灑直至北京，路面會是濕漉漉的，本人至死不會忘記這一慘痛的事實，鄭重告訴政客們，我永遠不會成為你們立功授獎的對象，直至今天，我仍然認為死是一種解脫。但由於本人在國內外的威望，不能自殺。

二 我在勞教場的十三個月

隨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斷「深入發展」，我的罪名也在不斷增加：繼「牛鬼蛇神」、「平反委員會二把手」之後，1971年又給我加上了「516分子」的帽子。原有的關牛棚、戴高帽、抄家批鬥、遊街示衆、毆打罰跪沒能讓我屈服，把我的孩子打成反革命也沒能堵住我的嘴，他們決定拿出最後的一手：把我也投進鐵牢。市中醫院當局是走軍人張立順的後門，把我送進陘山石料場勞改的。

可要把人關起來總得有個藉口啊。

不過，你別為他們操心，他們的法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1972年6月27日，我終於被抓起來了。罪名是「非法墮胎」，懲罰是「勞動教養三年」。根據很簡單，作為一個婦產科醫生，我曾為一個未婚懷孕的女青年作過人工流產。（中共當局的政策規定：「人工流產有求必應，不能拒絕。」）

說是勞動教養三年，我實際上被關的時間是十三個月。地點是位於新鄭縣和長葛縣交界處的陘山勞教場。

勞動教養是一種很能體現「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

中國政府已經正式簽署了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也就是說，想要剝奪一個公民的自由，必須經過法院的審理和判決。

但是，勞動教養卻不需要如此「麻煩」。它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

不需審判，被勞教人員甚至沒有上訴的權利，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長達三年，還可延長為四年。

我就是「享受」了這種特色十足的法律制度，被關進勞教場的。

「勞教」雖然和「勞改」有字面的差別，但在兩點上是相同的，一是剝奪了人的自由，二是要強制勞動。要是比較監禁和勞動的條件，那勞教可能比勞改更要嚴酷。

陞山勞教場是個露天採石場，我在的時候關着二千多人，其中婦女百多人之中國家工作人員三人，受過高等教育的只有我一人。那裏的勞動主要是砸石頭這種重體力勞動。無論是赤日炎炎的夏天，還是寒凝大地的冬日，勞教人員都要每天按時出工，在監督下從事繁重的勞動。

對我這個當時已經四十五六歲的知識婦女來說，這種勞動簡直是酷刑。由於體單力薄，再加上我是個曾經裹過小腳、胃大部分被切除了的殘疾人，根本無法勝任那樣重的勞動。捱罵受罰是我的家常便飯。我記得那裏有個叫周敬一的管教幹部，簡直像個凶神惡煞，對我總是非罵即打。她要打我時誘導其他人動手，周敬一不動手。

更難熬的是飲食。我那只剩十分之一的胃，需要少食多餐，可在那裏誰會理睬你的這些要求？「你是來改造的，想開小灶，搞特殊，沒門！」這是那個兇暴獄吏的回答。

受過高等教育，在那裏不但不是優勢，反而是劣勢。那裏的勞教者多是小偷流氓之類的輕微犯罪者，力氣大拳頭硬才是資本，文弱的知識分子不但是管教者歧視的對象，而且還是飽受其他人欺負的弱者。每到吃飯時，那些野蠻強悍的小偷流氓經常來搶奪我的飯碗，我只能吃玉米麵窩窩，一點菜也拿不到。因此，從進入陞山以後，我就沒吃過飽飯。很快地，我本來就羸弱的身體就瘦得皮包骨了。我丈夫來陞山看我，給我送東西吃，周敬一不讓我見他，也不讓我接東西。我看明白了，等不到三年期滿，我就要一命嗚呼，葬身陞山了。



幸虧，在受了十三個月的地獄之火煎熬以後，由於我丈夫替我反復申訴，也有一些實在看不下去了的好心人暗中幫助，我終於收到了一紙「勞教強勞解除證」，我於1973年7月19日居然活着走出了陘山。

不過，這份「解除證」並沒有承認對我的勞教是錯誤的，而是說我「在勞教中接收改造較好」，所以才「經評查現批准，解除勞教，予以釋放」。

我回到鄭州後，立即拖着病弱的身體，又開始到處申訴。到當年的10月27日，才收到了一份「鄭州市革命委員會公安局關於對高耀潔的平反決定」。他們終於承認，「高為未婚婦女刮宮，構不成違法。給予勞動教養三年是錯誤的。現決定予以平反，恢復名譽，回原單位工作」。

平反決定是下達了，但當時製造冤案，把我投到鐵窗裏的單位掌權者還坐在台上，對我的歸來和平反，他們並不甘心。把公安局的平反通知草草地念一遍就算完事了，他們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更不用說追究冤案製造者的責任了。為此，在文革的最後時期，我又和他們進行了長達幾年的鬥爭。

直到1979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全國開始大規模地平反冤案，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所遭受的逼害才有個相對徹底的結果。當我看到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退還我本人的上訪材料，上面的批示：「如果這個醫生是女性，立即放人。」這時我完全明白了，我被勞教時所捏造的罪名是：「我與人流女通姦，使之懷孕，做人工流產消滅罪證。」其實質上是為阻止我，為兒子的冤案上訪。可見當局是何等無恥啊！

我並不相信什麼宗教式的因果報應說，但有個事實也應該告訴讀者：那些在文革中狠狠地打我、鬥我、製造冤案來陷害我的人，多數的下場並不好。單從壽命上來看，他們都沒有活長過我，有些人還死得很慘，例如有個在文革初期批鬥我時狠下毒手的人，到了文革後期自己卻

鑽到火車底下去了。

1982年的一天，我在街上遇到那個姓龍的軍人，他第一句話就說：
「我轉業到食品公司，那裏效益很差，我兒子車禍死了……」

我未及答覆，他又問，郭鋤非呢？

我說，在開封河南大學讀書……，我實在不願意理他，我趕快走了。

前幾年，有了個流行的說法，叫「向前看」，有個也受過逼害的人現身說法，說了句名言：「娘打兒，兒不記仇。」意思是要人們忘記那慘痛的過去，以免讓某些人難堪。說實話，這我做不到，也不同意。我是主張「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特別是在還有人懷念文革，並企圖復活文革的時候，我們更應該牢記文革那些慘痛的歷史。爲什麼他們懷念文化大革命？他們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就出來的殘渣餘孽，現在興買官賣官，他們的官都是買來的，權也是買來的。哪知百姓死活。

其結果似蔡楚先生寫的一首詩：

等 待

蔡楚

從鮮紅的血泊中拾取，

從不死的靈魂裏採來。

在一間暗黑的屋裏，

住着我的——等待。

它沉沉的不說一句話，

不掉一滴淚，如同我的悲哀。

它緩緩的，不邁一個急步，

不煩每次彎曲，如同我的徘徊。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有時，它闖入我的夢境，
帶我飛越關山，飛越雲海，
到一個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那裏是光明的世界。
但它卻從不肯走出屋外，
去眺望那飄忽的雲彩。
它是緘默而又固執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應該怎樣安排。

在那間暗黑的屋內，
它凝住我的恨，凝住我的愛，
凝住我力的爆發，
凝住我血的澎湃。

從鮮紅的血泊中拾取，
從不死的靈魂裏採來。
在一間暗黑的屋裏，
住着我的一一等待。

1976年4月

第九節 兒子的冤案判決與平反

爲此，我在本章的最後部分將上文中提及的判決書、平反書等重要法律文件全文整理出來。前兩件是關於郭鋤非案的，後幾件是關於高耀潔案的。我認爲，這些歷史文件不止對我和我的家庭有意義，對人們認識那段歷史也有一定意義。

附件一

最高指示

專政是群眾的專政。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中國人民解放軍鄭州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

中原區軍管小組判決書

（69）刑字第1號

現行反革命郭鋤非，男，現年十五歲，漢族，中農成分，本人學生，黑龍江省明水縣人，捕前係鄭州八中學生，現住鄭州市中醫院16號樓。

現查清，郭的母親高耀潔，地主出身，有嚴重歷史問題及現行活動，解放前曾參加過反動組織，多次進行反共宣傳，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革命群眾揪出。

1968年11月5日，當中醫院革命群眾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揪鬥其母時，郭即表示嚴重不滿，並企圖尋機報復他人。郭於次日（6日）下午五時許，於中醫院電工房門上畫下



兩幅反動漫畫。郭在7日上午九時左右又於中醫院樓下男廁所用原子筆寫下「打倒×××」的反動標語。兩次作案，證據確鑿，本人供認不諱。

郭出身反動家庭，長期受其母反動思想影響，加之本人的不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因此，劃不清階級界限，失去了應有的階級立場，公然書寫反動標語及反動漫畫，直接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性質是實為嚴重。被捕後，郭犯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本着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精神，經鄭州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批准，依法判處現行反革命犯郭鋤非有期徒刑三年。

刑期自1968年11月22日起至1971年11月22日止。

鄭州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
中原區小組（公章）1969年1月13日



附件二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判决

(69)刑字第1号

郭鋤非，男，現年十九歲，黑龍江省明水縣人，原系鄭州第八中學學生。

郭鋤非因反動標語一案，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被前鄭州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中原區小組，以“現行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本人不服判決，多次提出申訴。經復核調查研究，原判反動標語，不是郭鋤非所寫。故決定撤銷原判，改判郭鋤非無罪，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日

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法院判決書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判决

(69)刑字第1号

郭德非，男，现年十九岁，籍贯河南省新乡市人，原系郑州第八中学学生。

郭德非因反动标语一案，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被郑州市公安局军管会中原区小组，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本人不服判决，多次提出申诉。经复核调查研究，原判反动标语，不是郭德非所写。故决定撤销原判，改判郭德非无罪，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上述判決下達同時還給高耀潔所在單位寄來一份平反通知，全文如下：

郭鋤非（原系市中醫院產科大夫高跃洁的儿子）因反动标语一案，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被前郑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中原区小组，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本人不服提出申诉，经我院复核调查，反动标语不是郭鋤非所写，故决定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因郭鋤非之 在你处工作，为了消除影响，现将判决寄去一份，请向群众宣布是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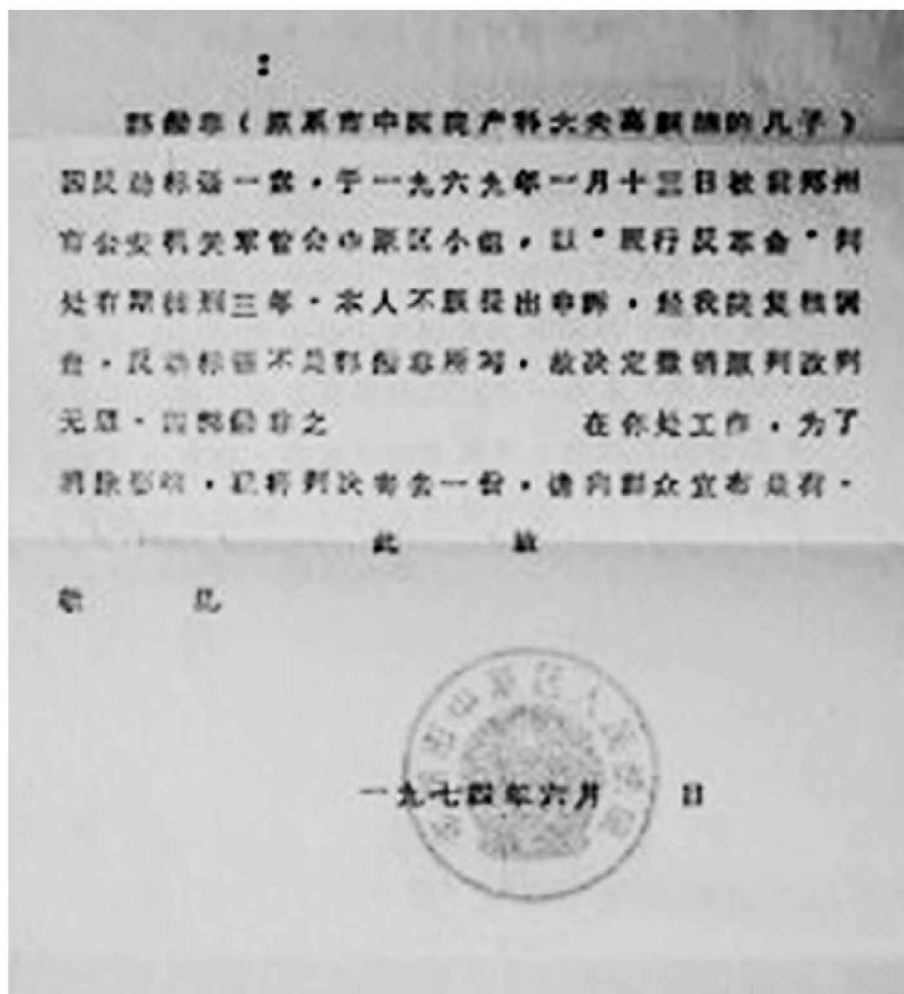
此 致

敬 祝

一九七四年六月 日



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法院平反書





第十節 奇特的判勞教與平反

當時判決勞教時，是通過走後門辦的，未給任何手續。待一年之後，這些「醜類」再也捂不住了，就發了個解除勞教證。見附件一。

附件一

毛主席語錄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一般說是可以把人改造過來的。只有個別的人改造不過來，那也不要緊，刑期滿了放回去，有破壞活動就再捉回來。

中國人民解放軍鄭州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

勞教強勞解除證（第348號）

茲有高耀潔因私自打胎被勞教三年，在勞教中接收改造較好，經評查現批准，於1973年7月19日解除勞教，予以釋放。至鄭州市中醫院。（憑此證入戶口）

鄭州市革命委員會公安局（公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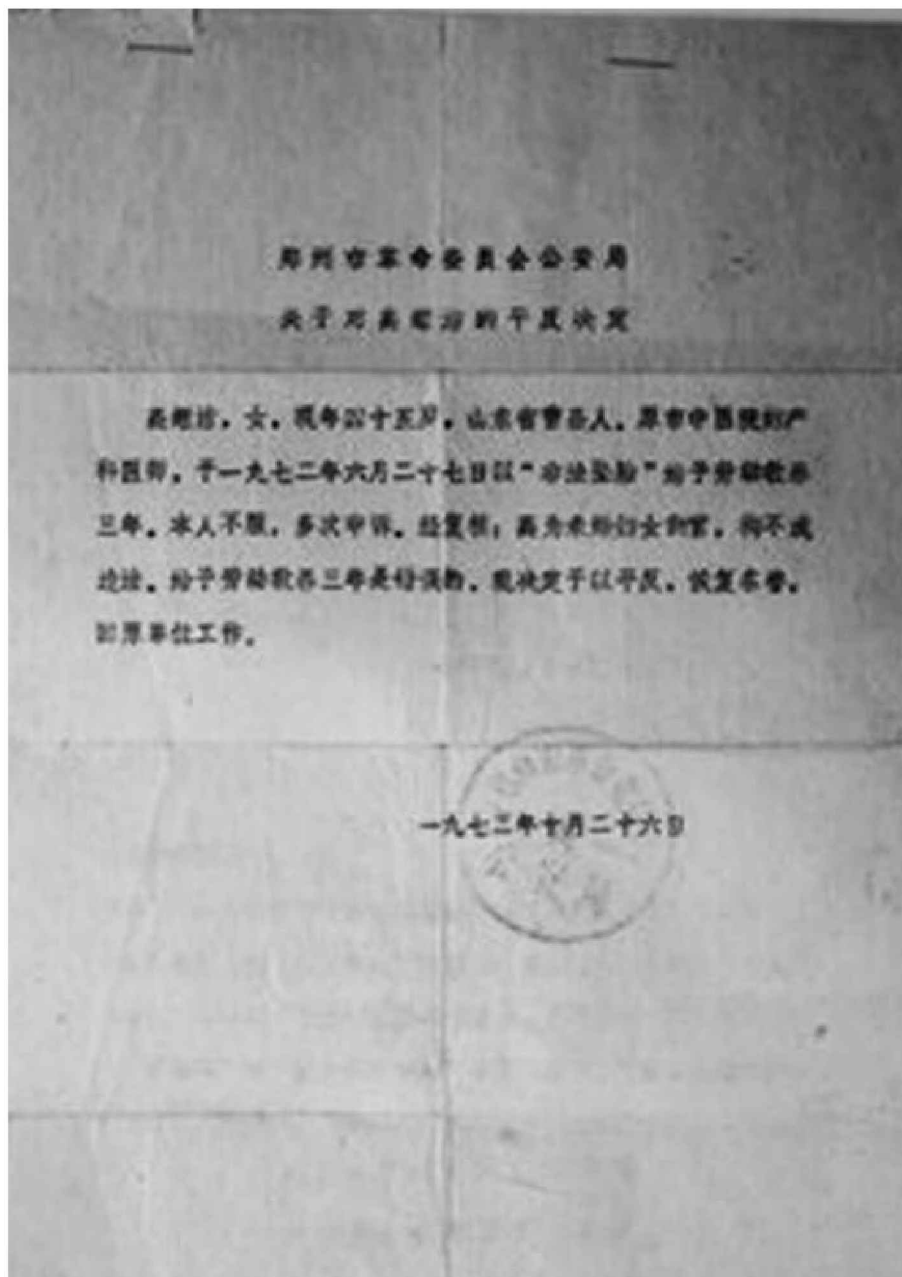
1973年7月24日



郑州市革命委员会公安局解除劳教證書（影本）



附件二



鄭州市革命委員會公安局平反書(影本)

附件三

鄭州市中醫院

關於給高耀潔平反致高耀潔親屬所在單位的通知

負責同志：

你單位×××同志之（親屬）高耀潔同志是我院婦產科醫生，於1972年7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1973年10月鄭州市公安局已作了「高耀潔為未婚婦女刮宮，構不成違法，判處勞動教養三年是錯誤的，予以平反，恢復名譽，回原單位工作」的決定。我們已當眾宣布了這一決定。恢復原來職務，回我院婦產科上班。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由於我們沒有按照黨的政策辦事，錯誤的認為高耀潔等同志在我院革委會成立前成立了什麼「平反委員會」，來阻撓我院革委會的成立，而進行了審查。經過調查，根本不存在「平反委員會」這個組織。1970年已作了否定結案，1973年11月予以公開平反。

1971年在深揭深挖「516」時，由於我們路線鬥爭覺悟不高，執行了王新推行的林賊反動路線，懷疑高耀潔同志是「516」，進行審查。使高耀潔同志受到了打擊和逼害。這是王新推行林賊反動路線在我院造成的惡果。為了糾正這一惡果，於1973年11月已給高耀潔同志公開平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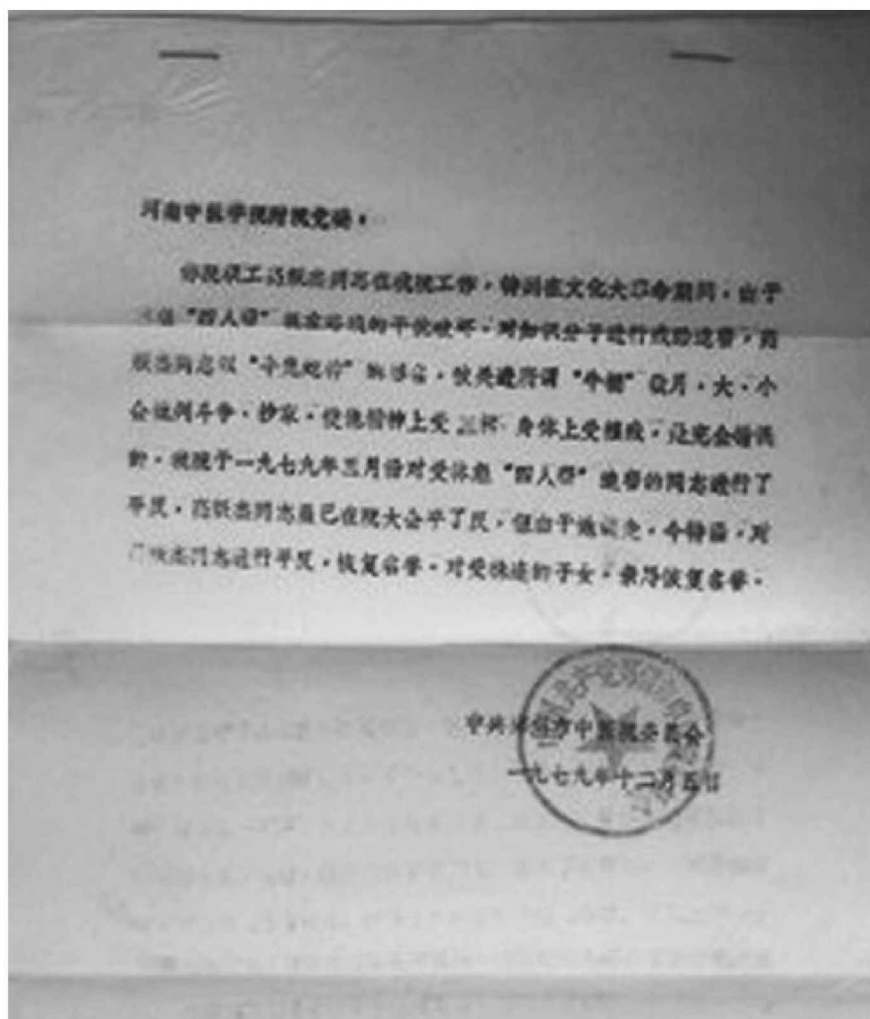
總之，由於我們路線覺悟不高，政策水平低，沒按黨的政策辦事，受王新推行林賊反動路線的干擾和影響，使高耀潔同志受到了逼害和打擊，並牽連了家屬。我們對此深表同情。我們向高耀潔同志及其家屬和親友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在所涉及的範圍內肅清流毒，消除影響。



×××同志如果因高耀潔同志的問題受到影響，請你們協助消除影響為盼。

中國共產黨鄭州市中醫院支部委員會（公章）

1973年12月28日



中國共產黨鄭州市中醫院支部委員會平反書

附件四

鄭州市中醫院致河南中醫學院附院的函

河南中醫學院附院黨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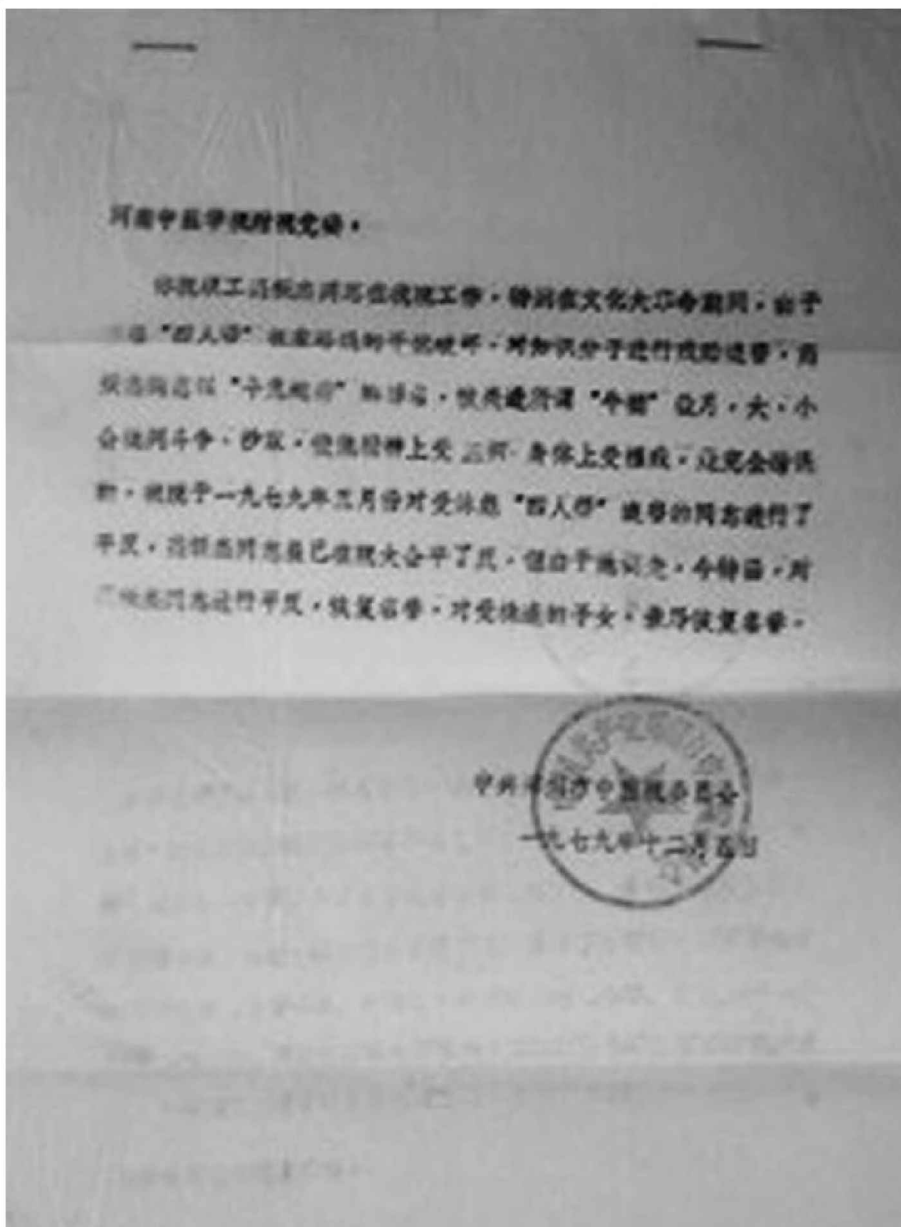
你院職工高耀潔同志在我院工作（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干擾破壞，對知識分子進行殘酷逼害，高耀潔同志以「牛鬼蛇神」的罪名，被關進所謂「牛棚」數月，大小會批判鬥爭，抄家，使她精神上受壓抑，身體上受摧殘，是完全錯誤的。我院於1979年3月份對受到林彪四人幫逼害的同志進行了平反。高耀潔同志雖已在院大會平了反，但由於她調走，今特函，對高耀潔同志進行平反，恢復名譽，對受株連的子女、親屬恢復名譽。

中共鄭州市中醫院委員會（公章）

1979年12月5日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中共鄭州市中醫院委員會平反書

第三章

我重返專業的工作生涯
(1974 年-1995 年)

第三章

我重返專業的工作生涯
(1974 年-1995 年)



第十一節 既壓復起，重返專業

1974年初讓我回原科室上班，醫院領導臉色正常，雖然我對工作、對病人態度依然如故，但我對周圍無端整我的「積極分子」心有餘悸。這時醫院辦公室表現出另一種態度，可能有人發動病人對「屁大一點的小事」也寫表揚信。我無法在那兒工作下去。這時河南省中醫學院和鄭州市中醫學院合併，人員可以流動，而鄭州市文革前的領導們亦已恢復工作，他們對我的技術方面比較欣賞，便說，做婦產科工作又髒又累，很多人不想做這種工作，這個醫生（指我）才四十多歲，爲了病人應當發揮她的作用，於是調換了我的工作單位。

一 調往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科工作



1974年調往河南中醫學院工作

1974年4月初，我來一附院報到，醫院領導想把我留在辦公室，我很有自知之明，本人不是做行政工作的材料，工作了二十多年，沒有沾過行政工作的邊，特別不會看領導的臉色行事，於是我再三要求進婦產科（那時我並不了解婦科的情況）。4月底醫院遇上下鄉醫療隊的任

務，婦科醫生安排隊應該下醫療隊了，我趁機進入了婦科，當時婦科有二十三張牀，其中有個單間兩張牀，住了一個男性「植物人」（腦溢血後遺症），他叫王達夫，是個高級幹部，其家屬很特權，他要什麼藥給他開什麼藥，甚至於把日用品如：痱子粉、花露水也開入公費醫療藥物之內，我受不了這種特權棒的指揮，一個月後，我拒絕檢查他的病房，理由是不會看男人的病，婦科住男病人真是一大奇觀。不管他的家屬如何告狀，隨他的便吧！誰講情也不行。現在回憶這是社會腐敗滋生的小苗子……

其餘所謂二十一個住院病人，均是女幹部，依我的看法，她們全屬療養，我不知道她們是怎樣住進醫院的，在診斷上很離譜，病歷上沒有記錄婦科內診檢查的結果，最後診斷「功血」，即功能失調性子宮出血，她們的住院時間少則六個月，多則一至兩年，有時在病房幾天看不到病人，病房管理叫人不安。我是個醫生，不能接受這種病房管理手法。

於是我把每一個病人都作了婦科內診檢查，其中十八人的子宮增大，已超過懷孕八周以上的大小，其中有一個病人子宮增大如懷孕十二周以上，還有兩個病人重症盆腔炎（包括宮體、宮內膜炎），我不明白功血的診斷是如何成立的，提出兩種治療方法：

1. 根據病人子宮增大的程度，月經過多的情況，已是手術適應症，行子宮切除手術，若病人不接受我的處理意見，我不能耽誤你的病情，你可以出院了。

2. 依病人的症狀與體徵，在這裏住院保守治療，是極不合適的，若拖延下去，不按醫療規律對待，這是我的失職行為，病人不接受我的處理意見，你就出院。

另兩位內生殖器炎症的病人，也可以出院治療，當時我想若不按正常醫治方法對待病人，未免太缺德壞良心了，硬着手腕這樣做吧，管他別人說閒話，隨他們的便吧！

當時醫護人員中有一首打油詩：



高幹病男住婦科，
農婦患病無醫藥。
中醫變成療養院，
這種情況誰敢說。

二 我在該醫院婦科環境無用武之地

根據我管病房之經驗，有出院必須有入院，現有大批病人沒有長期住院的必要，需馬上解決問題，病人要出院，必須要有新病人入院，這一下子讓我為難了，當時婦科是療養院性質，就診者除了找我求治的病人之外，絕大多數「病人」是「小病大養，無病呻吟」。怎麼辦呢？堂堂省級醫院，又是最高學府，能起到醫治病人的作用嗎？我們身為人師，怎樣教學生實習診治病人，一大批一大批的學生，他們只能在醫院觀察，見到這些養尊處優的「病人」，他們畢業後，面對農村，面對基層，求醫者是病人，學生實習期間見到的是病人嗎？他們學到的能適合今後的臨牀工作的需要嗎？我深感愧對了學生。

病房管理，病人收住條件逐漸改變，又迎來了新問題，現有病人中有的接受了我的處理意見，有的出院了。接受我處理意見者，當然應安排手術，當時科室裏連個第一助手也選不出來，大夫不少，除了中醫徒弟，大批是護士改的醫生（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有人吹破天，她說：「當年我做子宮切除手術時，手術後我會抱着病人回房間，哪用現在推來抬去這樣費事。」其實呢？子宮切除後病人應平臥，用推車推回病房。她助產士班只上了一年，因故退學了，連洗手的程序也不懂，她根本不會做手術。以大夫身分坐在門診，婦科內診也檢查不清，不過她也很能幹，會給領導送禮，也很吃得開……

一天，這位吃得開的大夫收了個「盆腔炎」病人，她叫張蘭英，住院後我發現病人肚子痛得在牀上打滾，經檢查是個卵巢囊腫蒂扭轉，按

盆腔炎吃了二十多天中藥，囊腫已經發生了壞死，必須馬上手術，把囊腫摘除之後，第九天張蘭英出院時寫了一張大字報，說明她的病情經過，給醫護人員一個震驚！有人說：「婦科病人也得作手術嗎？有的好事者來病房看張蘭英的情況是真是假，張蘭英是個小學教員，把病情經過說得滔滔不絕……」

科室內，還有醫生是靠 cp 帽（戴着共產黨員的帽子）的人，他們挑三揀四，其本領就是會打「小報告」，還有人天熱了不上班，天冷了不上班，春秋天只上半天班，其實她年齡並不大，與我同歲。這一切一切，再難我也能與其和平相處。大問題又來了，每逢作個手術他們不但自己吵，讓院領導出來吵說：「我們是中醫院，中藥也能化掉瘤子。」手術影響了中醫的政策和路線。

一天，來了個急診「宮外孕內出血休克」，我通知手術室馬上手術，因病人病情較重，馬上報告院長。

院長說：「趕快轉黃河醫院。」

我說：「病人已量不到血壓了，你院長來轉吧，死在路上我無法負責任。」

院長說：「病人從哪兒來的，她不知道我們是中醫院吧！」

我說：「病人住的離咱醫院很近，省委家屬院來的。」

院長放下電話，不到三分鐘來到病房，幫助我抬病人進了手術室，一陣緊張的搶救，手術尚稱順利，當手術完成之後，院長又在病人牀前問長問短。他們大開眼界，從那時起，減少了中醫院不能做手術的說法！此後，以前的種種流言蜚語也慢慢的停下來了。

這時河南中醫學院有兩個班的大學生要開西醫婦產科課程，每班三十八個學生，要從臨牀大夫中選拔教師來講課。當時我們科室裏掛西醫名字的有八人，有六位是護士改的醫生，另外一個是中專只讀了半年；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隊軍宣隊調來的，他們不是醫生，而其中有四個官太太，正規大學畢業的西醫只有我一人，而且我曾擔任過鄭州醫



學專科（大專）的大學生課程，因此我成了唯一人選。學生開課了，我病房工作並沒有減少，仍然很忙，我的課多排在下午，有時候下午有急診，就晚上講課，累得坐在那裏講，一個學期課程講完之後，學生反應很好，見下面一首詩：

我的老師

一位學生留言

她是一位稱職的醫生，
她不但醫術精湛。
更是道德高尚，
愛病人勝過親人。



講課



備課

三 選擇單項病種開展工作

婦科的實用病牀二十一張，我必須收十八個以上的病人，收住院的病人是有一定標準的，特別對公費醫療病人不能同意她想住院就住院，這樣太浪費國家的公費醫療的款項。因此收病人已成為難上難的大問題，中醫一附院的「病人」多是休養者，按當時她們的話說：「我想吃幾副中藥養養身體……」我聽到這種話就頭痛，我們不是療養院，我們是教學醫院，要為學生着想，要為基層病人着想，我乾脆回答她們說：「你走錯門了，快去療養院吧。」

我認為對抗特權「病人」的措施，應當加大力度，但收不上來真正的病人，讓我着急。不過我的孩子都長大了，我再不用為他們操心，更可以一心為工作着想了。自1974年秋季開始，我往鄭州市各大醫院婦產科門診尋找其他醫院就診的病人，這些醫院要求住院的病人，因牀位擁擠住不進去。這時



孩子們高考前夕所攝全家福

我才發現河醫大一附院、二附院婦科門診病人擁擠不堪，要求住院者排隊，託人走後門，於是我亮明身分，因我在省二院（即現今市立第三人民醫院）那裏工作過十多年，有人知道我，病人就跟我來了，我會從河醫大一附院五里堡，幫病人推着架子車走進人民路中醫一附院婦科病房（這個距離至少在十華里以上），我這樣做並非一次兩次，而是為了開展工作，不知有多少次拉病人來醫院婦科住院。後來發現各醫院的醫生



不歡迎收治惡性滋養細胞腫瘤（絨毛膜癌、惡性葡萄胎）患者，我就選擇了這項病種，對惡性滋養細胞腫瘤（以後簡稱絨癌、惡葡）來求治者不能拒絕，我想這些病人大多數來自農村，她們治病太困難了，我能為她們治病感到莫大安慰！這就是我科開展單項病種（絨毛膜癌與惡性葡萄胎）治療項目的開端。

生命的讚歌

仲谷

生命終於勝利了，

她沒有死於文化大革命！

辭別了，隆冬的寒夜，

迎來了，初春的黎明。

憶往昔，蓬門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細雨，夜夜孤燈。

湖波送暖，春風吹夢！

是她先行。

五人的「全家福」，

身上沒有漂亮的衣著，

臉上沒有會心的笑容，

有多少個這樣的家庭，

如，大病才癒，

似，噩夢初醒，

劫後餘生！

西元1974年的春天啊！

八千里風雲變換的天空裏，有誰知幾處陰，幾處晴？

億萬人腳步紛紛的道路上，此刻啊！誰向西，誰向東？

她不能死！
未來的征程上，
還有，曉風楊柳，萬紫千紅，
還有，聲聲滾動的春雷；
還有，波濤壯闊的人生；
大器晚成！

在那「公費醫療」的日子裏，
中醫院變成了「開後門」進出的療養院，
醫生變成了病人的附庸！
真正的病人得不到救治，
長期住院的「病號」確是無病！
她，一路走來，一路抗爭！

破了中醫院不能施行手術的陳規，
救治了許多瀕危的生命！
手推大醫院住不上院的病人，
用纏過的小腳走過了這段不平凡的里程，
縱觀神州大地，哪裏有這樣的醫生！

她遇到了今生第一個機遇，
攻克了許多醫院不願意收治的絕症！
——惡性滋養細胞腫瘤——
奪去過多少姐妹的生命。
她，開展了專科醫療，中州大地也因此播下了她的姓名！



她，放眼於廣大農村，許許多多急待救治的生命。

她回憶起父親的三任妻子，自己的一個姐姐一個妹妹都是死於產科病！

奮鬥吧！頑強的生命！

奮鬥吧！經歷過九死一生！

未來的光輝正在向她招手，

未來的事業等待她訴說：永無止境！！

第十二節 果剛之氣仍不衰退

我調入中醫一附院之後，收住病人成了一個難題，只好在鄭州市各醫院尋找住院病人，時間久了中醫一附院收病人也出了名，慢慢地，住不進其他醫院的病人，會自動來到我們醫院求助，病人多了，二十幾張牀位不但住滿了，還要加牀，1975年之後婦科病房增加了十幾張牀，這時我往縣級醫院發信，要求這些醫院的婦產科爲我科轉疑難病人。

一 在全市各大醫院尋找住院困難的病人

找病人住院的做法，是出於無奈，當時我們醫院收不到真正病人，而其他醫院，則因病人過多，病人住不進去，當時這些病人有兩個特點：

1. 這些人的病程較長，病情較重，治療起來很棘手。
2. 病人多是農民，交住院費困難，甚至連吃飯也成問題。

我認爲醫生的職業是治病救人，不是專門伺候特權女人的，所以我要收治真正的女病人，但困難太大了。我乾脆找到市級醫院的河南大學的同學，當今的大夫們，我簽好住院證讓他們直接把病人給我收進病房來，這更爲難了，有些晚期癌症病人，她的癌細胞已經廣泛擴散轉移，我不懂起死回生術，還是只好勸病人回家，不過那時醫患關係很好，我們沒有惹任何麻煩或官司，有一個病人已死三年，過三周年忌日時，她的丈夫和女兒還來我們科室看看，她丈夫說：「她媽死時，你們受累了……」

由於我向鄭州市駐鄭各醫院要病人，於是出現了另一種情況。在各節假日有些醫院不願收的急症病人，就往中醫附院推。

1976年除夕之夜，轉來一個胎盤稽留子宮腔內達六個月之久，合併感染的農婦叫邵淑琴，半年來陰道出血時多時少，近來大量出血，她丈



夫用架子車拉着她，來到了我們醫院，她躺在架子車上，面色蒼白，下身已浸在血泊中……

她丈夫看着妻子不行了，他發瘋的哭着喊着：「大夫、大夫救救她吧！我們家還有六個月的孩子，他不能沒有媽媽！」他急的滿頭大汗，又立即跪在地上磕頭，他說：「大夫行行好吧！俺一天跑了三家醫院，醫生都說沒有病房收病人……」

我們把邵淑琴抬進病房，她的血壓已測不到了，高燒三十九度，陰道不但出血，還發出奇臭的氣味。先做婦科檢查，發現腐爛的胎盤，卡在子宮頸口內，很典型的分娩時醫生不負責任，沒有檢查胎盤娩出是否完整，造成這麼大險情。

中國老百姓就是這麼愚昧，他們不知道追究接生醫院的責任，而只會四處求治。

當病人痊癒出院時，他們只會說：「孩子有媽了，春節我給你們磕頭！」

類似這種情況不斷的出現，自1975年起每個節假日我們的急診都會明顯增多，什麼「不全流產」、「宮外孕」、「卵巢囊腫蒂扭轉」等等急症應有盡有，我只好每逢這個時期，安排醫務人員加強值班，這樣弄得我不敢離開醫院科室。直至80年代中期，我們醫院科室收病人已無困難，在同行醫院中站穩了腳步，我再也不用處處要病人了，這個現象才慢慢消失。

但也有令人不能忍受的事情，我記得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她叫馬淑娥，入院檢查，印象為「卵巢囊腫」因腫瘤活動性不好，我在手術前作了腫瘤惡化的準備，手術中發現腫瘤已向膀胱轉移，當即插入腹腔導管，準備化學藥物抗癌治療，手術後摘除腫瘤標本的病理檢查，確診為「卵巢顆粒細胞癌」，這癌症對化學藥物是很敏感的，我和她的父親談了她的病情，馬上準備給淑娥用化學抗癌藥物，效果一般不錯。我跟她爸爸說：「你女兒很年輕，一定要治病。」

馬父說：「癌症嗎，不治了，我們沒錢，明天回家……」淑娥的未婚夫說：「爸爸，你把我拿出的那五百元彩禮，先用上二百元，不管她病的結果好不好，我都會把錢還給你。」

馬父說：「那錢不能用，我要用來蓋房娶兒媳婦哩。」

我一聽很難過，於是我問馬父：「你兒子多大歲數了，這麼急娶媳婦？」

馬父說：「十三歲了……」

我給他講了許多道理，說明淑娥病情有治癒希望，不能放棄。

馬父說：「是俺閨女，不是你閨女。」（這時淑娥未婚夫在流淚了……）第二天中午她的父親悄悄把馬淑娥拉走了。

我非常生氣，於是找省婦聯，那時省婦聯主任吳全智在北京開會，副主任張新華還真當一回事來辦了，打電話到縣婦聯、鄉婦聯，不到十天馬淑娥和她未婚夫又返回醫院。經過四個療程的化療，四個月後馬淑娥治癒回家了。

三年後春節前的一天，馬老漢、馬淑娥和她丈夫抱着一個不足周歲的男孩來到我醫院婦科辦公室，一進來，馬老漢開口就問：「高主任呢？她閨女、女婿、外孫來看她哩……」

恰巧我開會不在，護士長說：「你這個老頭，你不是說，是你閨女嗎，不是高主任的閨女，你不是說不治就是不治嗎？」馬老漢笑了笑，他們放下一小包棗和柿子餅就走了……

從這個病例告訴我們，醫生不但爲了治病，還要救人，特別是女病人，她們還受着重男輕女的落後觀念的殘害，若當年不找省婦聯，副主任張新華不管此事，馬淑娥早已不在人世了！

二 聽從指揮的無奈和內疚

自從文化大革命後期以來，控制出生人口的工作，一天緊似一天，全國各地各級政府都設立了專門的「計劃生育」機構。各級醫院都成立



了「計劃生育」門診科室，每一個醫院都要做所謂的「四項」手術，即 1. 人工流產（包括大月引流），簡稱「人流」；2. 子宮內放置節育環，簡稱「放環」；3. 輸卵管結紮，簡稱「結紮」；4. 男性輸精管結紮，簡稱「男紮」。這四項手術，婦產科佔了三項。門診計劃生育手術室具體工作是上環、取環（把節育環從宮內取出來，但必須持有關單位的證明）。工作量最大的是「人流」，那時每月做「人流」手術幾百人。由於那時「人流」不要任何手續，大量的未婚（包括性亂）的婦女也來做人工流產。婦科病也增多了，我們的工作更忙。

婦產科醫護人員由原來的忙於接生，而變成了忙於做四項手術。70年代初開始一對夫妻准生兩個孩子，到80年代初只准生一個孩子，對懷孕第二胎及以上者稱為「超生」，必須墮胎，否則罰款，沒有錢的人家如果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當地的政府就到這些人家搶家裏的東西，如櫃子、桌子等家具，甚至於扒房屋等以為懲罰和警戒。各地土政策多如牛毛！民衆沒有人敢公開反抗，他們只能悄悄發出怨言，如：「有權有勢的人家公開生，有錢的人家買着生，無錢無權的人家跑着生。」

由此出現了偷生孩子的「游擊隊」，現在農村出現了不少沒有戶口的「黑孩子」，後來被我送進原籍山東的九個因父母患愛滋病死亡而留下的孤兒中，有五個人沒有報過戶口。還有一些不生男孩不罷休的家庭，我見過擁有六至八個女孩子的農戶。

當局為了解決這類問題，大搞「結紮」，每個醫院設有一定的牀位，抽調醫務人員，組織「計劃生育手術」小分隊，包鄉包村直接下到基層，在鄉政府設立計劃生育手術室做「結紮」工作。我們醫院承包的是鄭州郊區大崗劉、小崗劉兩個鄉，其手術條件是兩孩以上的婦女，她們多數是被民兵押送進手術室，強迫她們接受「結紮」手術。我們那個手術室設四個手術台，專搞「結紮」。我們最多每天「結紮」一百人以上，最少也要「結紮」五十多人。幸虧當時的秦大夫能幹、肯幹，她擔

當起了主要任務，還有剛留校的四位女大學生，她們是新任大夫職務的，很需要鍛煉，任務完成得不錯，很少出差錯，基本上沒有出手術事故。

這些接受手術的婦女，幾乎全出於迫不得已而來的。在那個時期，用打胎來減少人口的政策，凡是有人性者，都不願意坦然接受這一任務，只是迫於政治的壓力，無奈地對胎兒下毒手，如今回憶起來還深感內疚！

有一件事情讓我永生難忘，一天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婦女，她一進門就哭，上手術台時哭得更痛，使我注意了，我問她：「你為什麼哭得這麼傷心呢？」

她說：「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全都有病……」

我問她：「孩子害的啥病？」

她哭得說不成話，在她身旁的一個婦女說：「心臟病……」

我馬上讓她從手術台上下來，叫家屬把孩子抱來讓我看一下，一個多小時之後，兩個孩子全來了，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們害的是先天性心臟病——「法魯氏四聯症」，兩歲多的女兒稍輕些，還可以走路，兩個多月的男孩已出現面色青紫、呼吸困難了。

我馬上找主管計劃生育的負責人老范，她被錯劃過右派，受過苦，比較通情達理。我告訴她說：「這個婦女等於沒有孩子，我們不能給她『結紮』。」老范讓這個婦女回家了，後來我聽說這個婦女的兩個孩子全死了，兩年後，她又生了一個健康的男嬰。在當時大哄大嗡的形勢下，其他婦女是否還有類似的情況呢？那就很難說了。

我們計劃生育手術小分隊是當地政府和有關部門通過醫院來請的，一切安排還不錯，但當地民衆很反對我們，一次我們開着救護車帶着消毒完備的手術器械，赴鄭州北郊老雅陳鄉開展「結紮」手術，車剛進村，村民們用磚塊、石塊、土塊，往汽車砸去，簡直像下「冰雹」一樣。他們有人還高喊着：「滾出去！滾出去！你們這夥人一定會斷子絕



孫……」當時，我們把汽車調過頭來開回醫院了，請醫院告知當地政府我們遇到的險情，若貴鄉需要開展「計劃生育手術」，請把需要手術的婦女送進醫院。

醫院病房也很熱鬧，多數是大月份妊娠，引產的婦女，當時命令是不讓活孩子被抱出醫院，有些強迫引產的足月胎，實在令人心寒，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有醫護人員多次往外偷嬰兒，送給患婦科病症的婦女，也救了孩子一命，我這個科主任就裝作不知道這回事。2008年元旦前夕，有一位2007年暑假大學畢業的女生和養母一起來我家，我還說：「你愈長愈像你媽，皮膚這麼黑……」她就是當年被偷出來送給這個婦科病婦女的一個孩子。還有其他的嬰兒，我已記不清了，無法一一寫出，這些孩子可謂「虎口餘生」。

上面所談的醫務人員從產房裏悄悄的往外抱嬰兒送給婦科病婦女，這些虎口餘生的孩子，現在有的已成為國家有用人才，可惜，他們終生不會知道自己的身世。

2008年2月18日，老范來我們家作客，她已經是近八十歲的人了，十幾年沒有見面啦，她非常蒼老，頭髮花白，行走蹣跚，但頭腦還清楚，我們談起80年代那段傷心的工作，她還回憶起一件當年的事例。

老范說：「強迫某婦女打掉了足月胎的男嬰，真不忍心把男嬰弄死，便送給公安廳不會生育的官員，他們愛如己出，孩子成長順利。」

停了一下，老范又說：「90年代末的一天，孩子的生母某婦女來問我孩子的下落……我對她說，孩子很享福，你不要再問了，事情聲張出去，誰也負不了責任。」

由此可見，救無辜嬰兒者也是提心吊膽，凡是往外送足月嬰兒者，都嚇得連一句話都不敢說，當然更不敢喝抱養孩子的一口水，更談不上其他報酬了，只是一種道德良心的驅使，知情者都在默默祈禱，但願這個嬰兒能逃出虎口，三十年過去了，我們談起來這類事情，內心還很不是滋味……

後來聽說，公安廳養孩子的那對官員夫婦退休了，這個虎口餘生的嬰兒已長大成人，而且成了孩子的爸爸，並在公安系統供職，知情者很想找到這個當年的嬰兒告訴他說：「你當年的身世太可怕了……」還想叮囑他一定要奉公守法，起碼要做到三點。

1. 不要貪污受賄，危害國家民族。
2. 不要吃喝嫖賭包二奶，要有道德廉恥觀念。
3. 不要欺壓百姓，要同情弱者。

你雖非養父母所出，他們敢於抱養你，已冒了天下之大不韙了，你要好好孝敬老人，你記住你是個虎口餘生者！

在這兒我送他一首詩讓他引以為戒：

你只記得貪

你貪你富，你可換權。

朝朝暮暮吃吃喝喝，只論錢和權！

「吸血鬼」，草菅人命，

哪管他，民眾死活，世人如何評說。

只管為個人欲壑難填！

捂、捂、捂，蓋、蓋、蓋！

掩蓋了草菅人命的巨貪。

疾病在蔓延，變法轉地下……

看！疫區，冤魂遍野，墳塋增現！

你！地位顯赫，私囊飽滿。

還有一次出現一個驚險的情況：鄭州北郊一個姓趙人家，他夫婦已有一個女兒，這次是妊娠第二胎足月了，當地民兵把他妻子送進我院病房，經檢查該孕婦血壓：高壓 240，低壓 180mm Hg，主管醫生問我怎



麼辦？我不敢作主，就找醫院院長，內科醫生十幾人進行會診檢查，結果誰也不敢負責採取「當即引產」的措施，討論來，討論去，決定先用降血壓藥，第二天上午再作處理。豈料，當晚凌晨二時許，她臨產了，而且是急產，一個男嬰迅速娩出，接生者是兩名快要畢業的實習生，實習生還沒有來得及採取「規定」措施。嬰兒的父親和舅舅在產房外邊，發現嬰兒已經出生，就踹開房門闖進產房，把嬰兒搶走了。

這一下我們婦產科像油鍋爆炸了一樣，各級官員多次來醫院訊問，凡是參與這次會診工作的醫護人員都要寫情況說明材料。我和主管醫師更是多次受審查，官員們懷疑男嬰是我們故意「放生的」，整整鬧騰了一個多月。幸運的是，十幾份說明材料十分一致，沒有什麼漏洞可尋。政府計劃生育部門只好找趙家罰款去了。

以上所寫的情況，我們是那樣無奈地聽從上級指揮來工作，這僅僅是當時全國形勢的一個縮影，各地各級動用這麼大的人力物力，採取「打胎」、「結紮」等「計劃」手段來控制人口增長。如果五十年前採納馬寅初先生的忠告，就不會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也不會引得民衆怨聲載道。

三 開展惡性滋養細胞腫瘤的治療工作

絨毛膜癌、惡性葡萄胎（簡稱：絨癌、惡葡）這類病，在50年代是罕見的病例，而70年代後已成多發病了，患者又多是農民。從病史觀察分析，這種病增多的原因與人工流產有一定的關係，不少病人有人工流產史，引發惡葡或絨癌，少數病人的絨癌發生在流產或大產之後，幸好它是一種生殖細胞的惡性腫瘤，對化學藥物治療非常敏感。

因為這種病陡然增多，醫生有些陌生，故不歡迎收治，我們科室因收不到正式病人，就選擇了這個病種，只要有病人來就診，我就收，來者不拒，很快病房的牀位被佔滿了，又把房間四張牀加至七張牀，中等房間兩張牀加至到四張牀，這時婦科病區，由原來二十三張牀增加到四



給絨癌病人進行婦科檢查



檢查病房（絨癌病人）



查看病例

十五張牀。

可惜我們沒有治療經驗，用化學藥物，種類、方法、劑量全然照書本搬下，有的病人療效不錯，若遇有疑難情況，就傻臉了，更不應該沿着傳統的治療方法，先做子宮切除手術，有的病人久治不癒，反而出現肺轉移，唯一辦法只有轉外省醫院，開展這項工作與胡玉荃大夫合作，她人很聰明，不少問題她主動來管，合作尚稱順利。

絨癌、惡葡萄病人多了，病情也複雜了，科室工作人員也忙了，原來的老護士誰也不想進病房，護士改為醫生的大夫們更是「退避三舍」，護士長是從黃河醫院調來的，十幾個護士全是文化大革命後的畢業學生，這些小護士在當時的工作都很好，在全院可以稱是最棒的科室，而一度出現怕收治這種病人的現象，慢慢有所扭轉，但治療中的困難，一直在困擾着我們。如一個絨癌肺轉移病人，她叫張春月，出現了「心力衰竭」，我用強心藥物（西地蘭等）無效，病情反而加重，我把在鄭州



北京協和醫院進修留影



各大醫院心血管內科的權威專家全請來會診，大家一致認為「用強心藥物」的療法沒有問題，只有嚴密觀察，但病人情況愈來愈重，三天後病人死了，她才三十四歲，我一直對她的治療方案有質疑，但又束手無策。

另有藥物劑量、方法等等，我們沒有多大把握，本市（省會）從事惡性滋養細胞腫瘤治療工作的醫生我請了一遍又一遍，只要對病人有好處，我不怕暴露出自己無能，但治療工作仍沒有改善，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寫信向外省各大醫院求援，上海回信了，北京回信了，廣州回信了，三個大城市十幾間醫院都回信了，同意我院派醫生進修學習，最後我們選擇了北京協和醫院，我認為那裏有中國婦產科的鼻祖林巧稚教授，她的學生治療惡性滋養細胞腫瘤的專家宋鴻釗教授，他在國內外是很有名的，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第十三節 繼續深造攻克醫學難症

我們收治了惡性滋養細胞腫瘤，不單是工作人員忙碌，更大問題是我們遇到疑難病情束手無策，因此我們選擇了去參加北京協和醫院絨癌進修班學習，醫院領導支持，學院領導沒有反對意見。協和絨癌學習班每個單位只接收一個醫生，根據當時我們科室工作情況，需要參與這項工作者，一人不夠，本人已快五十歲了，為長久打算需要再增加一個年輕醫生，那時除胡大夫（她比我小十歲）之外，別無她人，於是醫院派辦公室主任老胡女士赴北京找協和醫院交涉，效果不錯成功了。

一 北京協和醫院進修學先進經驗

1977年秋季我與胡大夫二人一起赴北京進入協和醫院絨癌進修班，該院搬遷重建房屋，不解決進修生的住宿問題，胡住在她姑母家中，我的住宿問題太困難了，我住在東直門外一個小旅社裏，下班乘最後一班



我在觀察病人化療後肺轉移癌灶的變化

公交車，一次我在車上睡着了，車把我拉到終點站，因此我很願意值夜班，或到老同學家住宿，等於天天打「游擊」。

絨癌進修班發講議，每周講三次課，我聽過林巧稚教授講課，她的外語很棒，讓我聽起來很費力。我最喜歡聽宋鴻釗教授講課，他對臨牀疑難問題解答得比較多。如：

1. 惡性滋養細胞腫瘤病人，發生肺轉移，出現心力衰竭是由肺動脈痙攣引起的，肺動脈痙攣的原因是由癌細胞轉移引起的，此時不能用強心藥物，應該加大化學藥物治療（簡稱化療）的劑量，以靜脈點滴為宜，應把一日的藥物劑量放慢滴速，靜脈注射維持在十二小時以上，使我聯想起病人張春月之死的誤治，是由於不懂病人的心力衰竭引起的原因，停了化學藥物，按常規使用強心藥，只能促進病人的死亡，這一疑難問題解決了。

2. 對絨癌滋養細胞腫瘤的病人不忙於子宮切除手術，應當先進行化療，待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降至正常之後，或子宮轉移病灶局限了，才適宜手術。這種病與其他癌症不同，化療可以徹底治癒，不需要手術切子宮，效果很好，改變了我們的傳統療法。還有很多知識，化療劑量、反應觀察、處理、治癒標準、隨訪方法等等，我們提高了很多。1978年春節我都没回家，除夕夜我仍然守護在病人身邊，為了能學到知識，不但努力去做本職工作，而且護理工作、清潔工作也去幹，在那兒待了半年多，得到宋教授的親切教導，最後她還送我一本她寫的專著《滋養細胞的診斷和治療》（如今存放完好）。

二 中醫一附院成了絨癌、惡葡的治療中心

我們本來就收有這種病人，從北京回來之後病人更多了，不但縣級各醫院往我院轉送病人，而北京協和醫院因病牀擁擠，外省來的病人無法救治，宋教授、吳主任、王大夫，寫條子讓病人來河南找我們醫院求治，如四川省的絨癌腦轉移的病人鄒秀清，她是從成都轉往北京，由北

京再轉往鄭州，她是第一個由北京轉來的病人，在我科住院半年後治癒出院了，是我們第一個治癒的重病人。一年之後，她夫妻二人背着一簍自家種植的橘子，千里迢迢來到了鄭州，特意來我院看望醫護人員，鄒秀清夫妻說：「我們是來感謝救命恩人的……」

另一例陝西大荔縣的惡葡病人張二芝，盆腔轉移嚴重，腫瘤在盆腔內呈「冰凍樣」，潰破處可見白色的盆腔內的骨面，感染奇臭讓人無法忍受，陰道出血呈噴射狀，用紗布填塞陰道，每天更換一次，堅持了半個多



我與張二芝合影

月，病人在醫院化療一年多，先後輸血八十多袋（每袋為三百毫升），病人終於治癒出院了，一年後來檢查。她說：「我如果在治病過程中不繞這麼多彎路（先在當地，又轉西安，再到北京，幸虧北京的教授負責，把她轉到鄭州），直接來鄭州，不會受這麼大罪，花這麼多錢，可以說，我是死裏逃生。」她丈夫說：「二芝的病治好了，救了我們全家，那時候家裏窮，兩個孩子十歲左右，她要死了，天呀，哪有今天。」現在張二芝的身體很好，一雙兒女全長大了，全家開了一個汽車修理廠，生活很好，她兒子聶波在2004年西安會議上見到我，張口要贈個十萬元的支票，被我拒絕了，每兩三年，張二芝會來鄭州看我們，她說：「知恩不報是小人……」

再有一例河南鄭州郊區的絨癌肺轉移病人王春香，先轉到北京協和醫院，因該院無病牀，又轉回來，往返折騰，不但花了錢，而且拖延了



一個多月的時間，她發生了「心力衰竭」，入院後，我們加大化學藥物劑量，沒有再犯治療張春月那個錯誤，病人很快治癒了。三年以後，她來到我科，懷裏抱着一個不滿周歲的女兒，她說：「我們家過得很好，上個月我坐在橋頭上給孩子餵奶，原來給我看病的那個醫生喊着我問：『王春香你還活着？抱的是誰家的孩子？』我說是我生的，醫生不相信，她走向前擠了擠我的奶，擠出了乳汁……醫生拍了一下我的長髮，她說：『醫學進展太快了，我想王春香早就死了，誰會想到你治好了病，還會生孩子呢？』……」

80年代，我科治療絨癌，已是遠近聞名，病人不但住滿了二十多張牀位，很多時間還要加牀，簡直成了一個沒有掛牌的「惡性滋養細胞腫瘤治療中心」。我發表了多篇論文，而且參加了這個學科的國際會議。



惡性滋養細胞腫瘤（北京）國際會議留影



惡性滋養細胞腫瘤（北京）國際會議上，在河南中醫學院的展板前留影

三 獲得河南省科技二級成果獎

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治療惡性滋養細胞出了名，跟着來的問題是醫生太缺，更是後繼無人，所幸是學院領導換班，從河醫大調來書記杜葆林、院長程鷹，醫院領導院長是部隊醫院轉業下來的周尚賢，他們懂業務，對我科工作亂刁難的現象逐漸消失，相反予以支持。一次我科有兩位絨癌重病人，我九天九夜未離開病房，第八天下午四時，我暈倒在辦公室，頭部右枕側摔傷（如今還有個傷疤），鮮血直流，同事們把我抬到辦公室的桌子上，用上了心電圖，我慢慢清醒過來，睜眼一看，周院長握着我右手的脈搏，他說：「你真把人嚇壞了，怎麼這樣幹法呢？」

周院長說：「我們選擇從外地調大夫吧，不能把人累死！」

不久從山西省永濟縣醫院調來一位山西醫科大學畢業十多年的婦產科醫生秦順雲大夫（她比我小九歲），她的技術可稱為很好，能支持科



推廣治療絨癌的經驗

室所有的工作。同時，到地區醫院去推廣治療絨癌的經驗。

1983年我科中西醫結合治療「惡性滋養細胞腫瘤」成果鑑定，獲得河南省二級成果獎，我獲得晉職、晉級和各級領導的重視，也埋下了我退休後不接受反聘的根子。在此同時我將1983年畢業生中三個學生，司秀蕊、王麗娜、李京芝留在科裏，可惜這四位大夫都不是共產黨員，在挑選中我是從工作態度上、技術能力上選擇的，因此問題又來了，有人告狀說：「婦科路線錯了，異己分子掌握了大權，變白了……」弄得支持我科工作的領導也很被動。

天啊！怎麼不看我們科室設有四十五張牀位，還不夠病人住，在緊急時期要加牀，甚至在走廊上加牀，高達二十五張，我們救了多少病人的生命！一氣之下，我去學院領導指名要那位叫王磊的學生（她是黨員，留校之後在校黨委辦公室工作），她一直想搞業務，因為她姐姐患子宮外孕時在我們科住過院，因此她特別要來婦科工作，於是找到學院黨委辦公室，又找了黨委書記把王磊要來了。她的工作還不錯，當然比



獲科研成果獎（中排右三為高耀潔）

文化大革命中積極分子培養入黨者的人格好得多，後來她成了科室副主任，升正主任，2000年後還是被排擠走了！我感嘆醫療工作者沒有人際關係，相處是那麼困難。

最後附上 1984 年我寫了一篇二百四十六例的臨牀分析總結論文如下：

中西醫結合治療 246 例惡性滋養細胞腫瘤的臨牀分析

河南中醫學院屬附醫院 高耀潔

【提要】1974 年 5 月至 1984 年 4 月，收治妊娠性滋養細胞腫瘤二百四十六例。年齡以二十五至三十五歲為最多，又一百九十五例發生轉移，以肺轉移為主。在化療的同時加中醫中藥，以辯證論治的原則，在臨牀上分為三型，即：氣虛血瘀型（盆腔轉移）、邪毒蘊肺型（肺轉移）、氣血兩虛型（廣泛轉移）。結果證實，服中藥組副作用小，病人免疫力強，對青年婦女盡量不作手術，保存生育



能力，已有一百零六例再次妊娠，七十四例正常分娩，且嬰兒發育正常。

參照協和醫院宋鴻釗教授採用大劑量化學藥物治療惡性滋養細胞腫瘤的先進經驗，加用中藥，辯證論治，從而提高病人機體免疫力，增加對化學藥物的敏感性，使治癒率（存活三年以上）由1974年至1978年的80.6%，上升到91.5%（225/246）（絨癌由62.5%上升到80.6%，惡性葡萄胎由95%上升到100%）。

材料與方法

自1974年5月至1984年4月，我院共收治惡性滋養細胞腫瘤二百四十六例，以宋氏的分期標準〔3〕為依據作如下臨牀分期（見表1）

表1 二百四十六例臨牀分期

疾病類別	例數						合計
	I	IIA	IIB	IIIA	IIIB	IV	
惡葡	43	12	14	30	33	11	143
絨癌	8	9	12	22	28	24	103
合計	51	21	26	52	61	35	246

二百四十六例均為妊娠性滋養細胞腫瘤，年齡十四至五十六歲，以二十五至三十五歲為最多。有一百九十五例發生不同程度的轉移。其轉移部位：肺一百四十八例，附件、宮旁盆腔共一百四十八例，外陰、陰道共六十七例，腦十三例，腎七例，肝六例，膀胱五例，腸管三例，宮頸、皮膚、齒齦、舌、胃各一例，某些患者發生多器官或組織轉移、無轉移者僅五十一例。

所用化學藥物的種類，給藥途徑與協和醫院相同〔1-3〕，僅劑量略低。如5-氟脲嘧啶（5-Fu）每公斤體重低於協和醫院2-3mg，更生黴素（KSM）低於1-2ug。

中藥用法，臨牀將惡葡、絨癌分為三型以中藥湯劑口服治療。

一、氣虛血瘀型（盆腔轉移）

主證：面色白，少氣乏力，體倦懶言，腹中有塊，疼痛拒按，陰道出血，舌淡，脈細弱或舌紫暗，有瘀點瘀斑，脈澀。

治則：健脾益氣，活血逐瘀。

方藥：棱莪消徵湯，黨參、白術、茯苓、益母草、茜草、桃仁、紅花、丹皮、赤芍、三棱、莪術。

瘀塊結於肋部，症見腹痛，便血者，主方加側柏葉、地榆、槐花等清熱涼血藥。

二、邪毒蘊肺型（肺轉移）

主證：咳嗽咯血，或痰中帶血，胸悶作痛口乾渴，或有發熱，舌質紅，苔黃膩，脈沉數。

治則：清熱化痰，潤肺止咳。

方藥：益肺飲（清肺化痰湯），二花、連翹、全瓜蒌、杏仁、川貝、半夏、葶藶子、海蛤粉、南星。

若化療後，出現口乾咽燥，五心煩熱，舌質紅少苔，脈細數者，屬陰虛諸證，主方加南北沙參、石斛、麥冬等滋陰清熱之品，防止口腔潰瘍。如症見抽搐，嘔吐頻劇，雙目上視，頸項強，頭痛，偏癱者（腦轉移），主方加全蟲、蜈蚣、勾丁、羚羊角、天竺黃、地龍等，以清熱鎮驚熄風。

三、氣血兩虛（廣泛轉移）

主證：面黃體瘦，納呆肢倦，動則汗出或腹痛，便溏，或噁心，嘔吐，舌質淡苔白，脈虛數。

治則：補益氣血，滋陰固腎。

方藥：補腎固沖湯，黨參、白術、黃芪、女貞子、旱蓮草、杞果、山芋肉、鼈甲、山藥、五味子、阿膠。

鼻出血時宜清熱止血，主方加生地、白芨；皮下出現瘀血瘀點時，宜清熱涼血、活血止血，主方加赤芍、丹皮、生藕節、三七；陰道出血時，宜逐瘀生新止血，主方加益母草、茜草、荊芥炭、貫



衆炭；口腔潰瘍者，用兒茶、五倍子、黃柏等量，煎水漱口，每二至四小時一次，局部撒珍珠粉，對脫髮者用滋腎之品，藥物性肝損者，則配五味子一百二十克研末分七份（七天量）服用，病人服中藥後不影響再次化療。

結果

為證實中西醫結合療法的效果，按宋鴻釗提出：絨癌細胞周圍有淋巴細胞和漿細胞及組織明顯反應者，對化學藥物敏感為指標我們設立對照組，且輔以實驗室觀察指標〔3〕，將條件相等的四十八例患者，分為兩個組（每組二十四例）取材部位，刮宮組織各六例，切除子宮標本各十四例，陰道轉移灶組織各四例，其中一組配服中藥，觀察兩組病理學組織學上的異同點，服中藥組二十四例病檢中二十三例鏡下可見：絨癌細胞周圍有大量的淋巴細胞、漿細胞、組織反應明顯，佔95.8%，未服中藥組癌細胞周圍有細胞反應者十一例，佔45.8%，說明服中藥可以增強病人的免疫力。

又將1978至1979年，條件相等，期別一致，化療藥物相同，劑量大小無差異（5-Fu25mg/kg/日，KSM5ug/日）的服中藥組與未服中藥組（各三十例）的化學反應情況加以對照，觀察對化學反應的臨牀表現程度。服中藥組，副反應症狀明顯減輕，如：接受單純化療，頭髮全部脫落，而配服中藥組的三十例中，二十五例輕度脫髮，三例少量脫髮，其他症狀也較前為輕。可見中藥對減輕化療的副反應效果良好。因此，我們盡量不切除子宮，只有子宮發生穿孔，或大出血無法制止者才行子宮切除。

據1984年6月隨訪二百四十六例治癒出院病人，其中保存子宮一百六十六例中，有一百零六例再次妊娠，七十四例正常分娩，嬰兒發育正常，其餘三十二例流產（其中人流二十一例）但也有八十一例行子宮切除術，其中在我院手術十九例（單化療組），其餘六十一例是在其他醫院實行術後又發生肺或他處轉移而入我院的。此說

明有些病例採用中西醫結合而不做手術，對保存年輕婦女的生育能力是可行的。

在二百四十六例中，治癒二百二十五例（出院三至十三年），死亡二十一例，其中惡葡一例，佔0.7%（1/143），絨癌二十例佔19.40%（20/103）。此惡葡治癒後兩年懷孕，分娩一男孩，發育正常，產後八個月發生絨癌，沒有治療而死亡。

討論

本組中西醫治療的結果，1974至1978年絨癌三年治癒率為62.5%，惡葡為95%，總治癒率為80.6%。1978例1984年正式進行療效觀察，絨癌治癒率80.6%，惡葡治癒率100%，十年治癒率為91.5%，說明中西醫結合治療惡性滋養細胞腫瘤，可使治癒率明顯提高。

中醫辯證施治的原則據臨牀上出現的「證」，分三型施治：分別用健脾益氣，活血逐瘀，清熱化痰，潤肺止咳，補益氣血，滋陰固腎等法。經臨牀實踐證明，分型進行辯證施治，協同化療，比單純化療加手術為好。

從臨牀觀察，中醫中藥在治療惡性滋養細胞疾病中的作用是肯定的，但對中藥作用於本病的詳細機理，需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 （1）宋鴻釗，二十年八百零六例絨癌和惡性葡萄胎化學治療總結。中華婦產科雜誌1979；14：255
- （2）宋鴻釗等，大劑量化學療法根治絨癌及惡性葡萄胎。中國科學1973：16（2）：297
- （3）宋鴻釗等，滋養細胞腫瘤的診斷和治療。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160-168



第十四節 退休前後的熱忱

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治療惡性滋養細胞腫瘤，在那十幾年中搞得遠近聞名，病人多是慕名而來，有病人介紹病人而來求治的，如絨癌腦轉移病人張獻玲，她介紹來的病人最多，也有從基層醫院轉來的和北京協和醫院轉來的，一時病人迎門，我已超過退休年齡三年，六十三歲了退休是必然的，退休後我沒有接受反聘，這其中必有緣故在內，退休後幹什麼呢？關注社會婦幼保健工作，防止性騷擾，以保障社會的健康。

本節先談談我快退休時，經學校批准，由我主要負責辦的新疆婦產科專科班的事情。

一 創辦新疆婦產科班的來龍去脈

1986年河南醫科大學（它的前身是河南大學醫學院）舉辦六十周年大慶，我們班來了十多位同學。

當年畢業分配到新疆的三位同學，這時只來了一位席玉珍，她的丈夫和她一起來了。他們來鄭州住在我家，久別重逢，我們訴不完別後的苦衷。玉珍的遭遇比我還慘，以「蘇聯特務」的莫須有罪名，坐了十年冤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無罪釋放，青春歲月無法挽回，專業技術工作也失去了一切機會。

近幾年她大轉好運，從一般醫師晉升為主任醫師，送她一頂紅帽子——黨票。不久提升為婦幼保健院院長兼黨委書記，工資也翻了幾倍，五個子女全安排了工作，但玉珍內心仍然痛苦，孩子們受了株連，影響了學業，他們不能出任好的工作崗位，唯一的兒子在衛生局開汽車，玉珍哭着說着：「你們不知道我受了多少冤罪，監獄的日子，我不會忘記。現在我這個院長，本職業務拿不起來，要依靠各科主任來幹，就

需要看他人的眼色……」玉珍說着哭得更痛。

夜深了，掛鐘時針已指向凌晨二時，玉珍突然說：「明天我們去找杜伯廉吧？他是咱班王克聰的丈夫，又是河南大學的校長，他可能會幫我的忙。」

我問她：「你找杜伯廉幫啥忙？」

玉珍說：「我很憋氣，想辦兩個婦產科班，讓每個縣婦幼保健站都有我的學生，今後的工作容易開展，為老百姓辦件好事，我也出口氣。」

我說：「那不需要找杜伯廉，現在我大權在握，婦產科的事情我說了算數。」

玉珍說：「我只要求辦兩個專科班，畢業生到工作崗位之後，能夠解決一般婦產科疾病就行了，並不求過高。」

我說：「這件事我可以完成，我們明天就去找校長，讓學院給新疆辦兩個婦產科班，你們從高校招生中入取學生，定向培養，不在河南高校招生計劃之內，新疆付學費，這叫委託培養。」



畢業三十年校友聚會



玉珍說：「那沒問題，三十萬、五十萬都行，叫新疆衛生廳付款。」

我說：「明天到學院，先談每班三十人，學費三十萬元人民幣。如果校方嫌少，咱再給他漲價，行嗎？」

玉珍說：「可以。」

次日上午我和玉珍一起到了河南中醫學院，見到了尙志昌院長，我先介紹玉珍來拜見的目的，繼續按昨天夜間商定的計劃說了一遍，尙院長很高興，也很客氣，他當場拍板，接受新疆委培婦產科辦的任務，對三十萬元的學費沒有異議，並答應學生的住宿費，其他雜費一切在內。最後他說：「高教授，這任務交給你了，學院會大力支持。」

玉珍對中醫學院的收費非常滿意。

我開始寫計劃書，翌年（1987年）暑假後新生入學，從高考招生中入取，以女生為主，因在中醫學院，這個班的名字，必須掛上中醫二字，想來想去命名為「中西醫結合婦產科班」。爲了學生今後的實用臨牀工作，我大膽地壓縮了中醫課程的課時（比其他的專科班減少了2/3），增加了西醫婦產科課時，比本科班增加了十倍，即三百學時，其他西醫課程，按一般西醫專科班進行，因此周學時增加了1/4，實習時間八個月，回當地縣醫院解決，爲了保質保量，首先請席玉珍和新疆衛生廳審議批准。

1987年暑假前，新疆衛生廳來了兩位負責人，與中醫學院簽訂合同。暑假過後，新生入學，新疆來了三十一位學生，其中有三位男生，女生中有三位已婚者，其中還有一位孩子的媽媽，我懷疑這是一批後門生，入學先測試文化水準，果然令人吃驚，他們比高考分低得多，勸退吧，但河南到新疆迢迢幾千里，萬一學生出了事怎麼辦？無奈只有開課。

學生文化水準低，有的學生連筆記都不會記，學習很費力，課程進展困難，只好利用晚間自習時間補課，老師提意見，要求增加講課費，

院長還不錯，出面解決了。

講課老師缺乏，「西醫」、「組織胚胎」、「生理解剖」等課程沒有教師上課，只好從外院聘請，學院支持，每位外院老師每次來上課都有車接送。「婦產科」課課時最多，因當時科室內沒有其他講這門課的教師，只有我自己擔任，白天科室有了手術，我就晚上講課，有時把病人帶到課堂上，讓學生實踐，他們很歡迎，每天晚自習時輔導，檢查秩序。

班上秩序差，他們愛吵架，而且許多學生身上帶有刀子，刀子有一尺多長。一天，我問一個學生：「你的刀子用來幹什麼的？」他說：「切肉吃。」輔導員和我都擔心刀子傷人，於是把刀子都「借用」了。他們實習完畢離開時才還給他們。另一個問題，媽媽學生想念孩子想得哭起來，她悄悄把孩子從新疆接來了，住房住在校外，不過她的學習成績還可以，我只好裝不知道。

第二年秋季，第二個班的學生又來了，全是女生，文化程度仍然參差不齊，大多數人的學習精神還可以，少數人貪玩，有學生膽敢去社會上的舞廳，輔導員大會講，小會說，也沒用，晚上，我和輔導員乾脆一起坐在舞廳門外臺階上找學生，堵住不讓他們（她們）進去，怕萬一出了事怎麼辦？實在沒法向家長交待……

於是我多次跟他們說：「學生以學為主，你們的任務是學習。」

我同時多次告訴他們：「醫學專業生，你們是將來的生命工程師，人的健康和生命，會委託給你們，若是學不到技術知識，將來怎麼給別人看病，俗話說『庸醫殺人』。庸醫就是無技術知識的醫生。同學們，假如你們生病了，誰願意找庸醫看病呢？將心比心，現在你們不好好學習，將來就是庸醫，不但沒人找你看病，你還會看錯病、開錯藥，出了醫療事故，還得住進監獄裏。」學生們聽完之後，效果很好，班上的學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這時我讓學生們討論，今後怎樣做個好醫生。



這一班的學生多數來自新疆，全是二十多歲的姑娘，身材高大、漂亮、愛說、愛笑、愛蹦、愛跳，走在街上很惹人注意。因此，不僅是課程、教師等問題，在管理方面也是提心吊膽。

1989年夏季，「六四運動」來了，新疆學生的家長非常緊張，那時我家還沒有裝電話，更沒有手機，辦公室的電話被家長們「打爆了」。有一位家長來到鄭州給我家裏裝了一部電話，這樣我得日夜接聽新疆學生們的家長的電話。

來電內容基本一致：孩子離我家太遠，是個獨生子，請費心注意他的安全，不要讓他上街，不要讓他打架，萬一他出了事，我就活不成啦。

這使我非常不安，局勢愈來愈緊張，其他班級的學生上街出現了傷亡事故，內科三年級有學生與警員發生衝突而死亡。我聽說之後更緊張了，馬上出了一百道題目，送到教室，並通知學生，明天答疑，婦產科這門課程馬上考試，筆記本也計算成績，這一招很靈。學生們安定下來



1988年河南中醫學院婦產科專業畢業生留影

了，乖乖的坐在教室裏做那一百道題。也有學生發出怨言，怪我管理方法保守，家長式作風，我一言不發，社會上的事情我裝作不知道，只知道分數是學生的命根子，你們的任務是學習，但是我心裏說，這些女孩子，你們知道你們的父母是多麼擔心嗎？我是在按他們的意願行事。

「六四」過去了，這個婦產科班的學生沒有上街，也沒有傷亡，他們也安靜了，生活依舊，學習如往。第一個班的學生開始實習了，他們拿着實習計劃書，各回各自的縣醫院，同時告訴他們實習生的規矩和實習方法。八個月後，請各位學生帶回實習的老師（臨牀醫生）寫出的評語，學生各自帶鑒定表來鄭州河南中醫學院領取畢業證書。第一班的學生踏上了赴新疆的回程，我輕鬆了一半，家長們也放心了。

第二班比第一班差，文化程度不如第一班，學習精神也不太好，明顯是後門學生，幹部子弟多，生活要求高，他們花錢很浪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們的學業完成了，他們進入實習期，我也退休啦。

十五年後，2005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來自新疆的電話，聲音比較熟悉，她說：「高老師，您來新疆玩吧！我給您買飛機票，到烏魯木齊，我叫他派汽車接您。行嗎？在這多住幾天。」

我問：「你是誰？現在我老伴有病，我離不開鄭州。」

她回答：「我是小葛，您忘了嗎？您以省人大代表身分檢查監獄在押犯人性病時，我一直跟隨您工作，學了不少東西。」

我說：「等老伴病好了再說吧。」

我對小葛的口氣很納悶，這個當年的「小黑妞」，現在幹什麼？爲啥口氣這麼大？便打電話問經常與我聯繫的小杜。

小杜說：「高老師您不知道嗎？小葛是地委書記的夫人，地區婦幼保健院院長。」小杜接着說：「我們班大多數同學已做衛生行政工作，有縣醫院、婦幼保健院；院長、主任，還有地、市、縣衛生局局長，沾了您保守的管理方法，和一百道題的『光環』，我承認那些大城市來的畢業生業務上都很棒，但因為沾了『六四運動』，他們不能被提拔，只



能幹活。這是中國的特色，顛倒黑白，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二 我無力支持現有工作

俗話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各種工作開展起來了，學生慢慢地也能工作了，重擔子、急重病人仍然落在我和秦順雲大夫身上，這些主要工作人員誰也不是黨員，執政領導能不着急嗎？要在這方面培養新黨員，這時院長書記全換了，新的這些人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鍛煉過的，幹事情必須看着上級的面色說話。

我們科就有能人，凡是科室有了重病人、或大的複雜的手術，一般是我和秦大夫一起上台，再配上新來的年輕大夫，她先拿着腫瘤向院長匯報。手術室護士給她起了個綽號，叫「拿大頭的」，我才知道。

時日漸久，變成了我們幹活，她來請功，院領導愈來愈欣賞這位能人，不久發展成新黨員，更是如虎添翼，我也深知人老了無用了。有一天來了個卵巢癌病人，腫瘤較大，她是在河南省人民醫院住院手術時發現腫瘤轉移，關閉腹腔，勸她回家等死，病人在省人民醫院出院，抬着上火車時，遇見了她的熟人，熟人告訴她說：「你去人民路中醫一附院吧，那裏有個姓高的大夫，讓她看看能否再治。」於是病人又回來了，抬病人的家屬有七八個，找到我之後跪在地上一大片，嚇我一驚，病人求醫生是正常的現象，這是怎樣一回事呢？我把這些人一個個攙扶起來，病人丈夫訴說了她的病情。我想病人才四十多歲，從腫瘤發病史來看，她患的是否「卵巢顆粒細胞癌」。這種癌症屬於生殖細胞癌，對化學藥物非常敏感，北京協和醫院吳葆楨教授有個治療方案，我用這個方案治癒過阮軍花和劉愛英兩個病人。

當時我很同情這個病人，於是告訴他們說：「我可以收她住院，但能否能徹底治癒，我只能說治着看，不能說保證能把病治好。」這時，她十幾歲的女兒馬上跪地下磕頭，當我簽完住院證之後，當時任主管業務的副院長說：「省人民醫院開完了刀不能治的病，咱是中醫院，收了

能治療嗎？」他不讓收，護士長馬上大力反對，當時我很生氣，我連收病人的權利也沒有了，要我這個婦科教授幹什麼？這時我明白了，工作已不能再幹了。

病人住院後通過兩次化療，腫瘤基本消失了，在第三次化療過程中殘存腫瘤及子宮、大網膜、闌尾，都進行了切除，手術標本病理檢查結果，確診為「卵巢顆粒細胞癌」。

三 退休後不接受醫院復聘

1990年7月15日，我照例提前上班了，那時婦科還住有二十四位惡性滋養細胞病人，我在每個病例上都寫了總結，把收藏惡性滋養細胞腫瘤資料，包括病人出入院登記冊、照片、信件等等的櫃子上的鑰匙交出來，我希望科室能繼續把這項科研搞下去，以便將來查找總結用，當天我照常上了一天班，並沒有告訴任何人我不會再來了。晚上退休人員會餐，飯後我又到病房看了一下，便默默無聲的走了。說真話，我很清楚，我很捨不得這些病人，但我這一去未曾再回去過。我的家庭生活恢復了正常，子女成家立業，孫兒活潑可愛。

回家當月7日發工資時，我的工資只有二百一十九塊錢，以前那勞模、先進、成果（包括舉辦新疆班的成績）提的三級工資全不算數了，在原工資上又按80%的發放。我問了一



與子孫們合影



下原因，那三項進級全劃在她人身上了，我說，按我參加工作的時間，退休後也不應該扣工資，當時我是河南省第七屆人大代表，我拿着工資單和榮譽證書去省政府找省長去了，因為我認識馬忠臣省長，三個月後學院解釋說，弄錯了，恢復原工資，三次提級全算數，又補發了七、八、九這三個月的工資，這是當時任一附院黨委書記張達的「傑作」，這樣使我更不會接受反聘了。

時任院長的袁海波，找我多次，他很會說話，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國慶節。袁院長說：「學生（他是中醫學院畢業生）在醫院負責，老師不回來上班、不接復聘書，對學生有意見嗎？」

我笑了搖搖頭說：「不是……」

袁院長說：「你對學生有意見，吵吧，打吧！老師不能不來上班，支持學生的工作……」

我說：「我無法上班……」

袁院長又說：「老師再休息一段時間回醫院上班吧！」

至今十七年過去了，他不知道我為何不上班，我不願意當任何人的保駕員，我退休後惡性滋養細胞腫瘤病人逐漸減少，待黨員主任退休之前，這類病人在病房內已經消失，病房再也看不到絨癌、惡葡萄病人了，因為病人鼻子下面有個嘴，醫院能否招來病人，是靠醫生的技術，其他「形象工程」全然無用。

夕陽人生

高世正

兩鬢蒼蒼花甲年，

客愁為何轉茫然。

又是一段人生路，

為誰忙碌為誰閒。



退休時留影



科室同事歡送退休



四 面向社會宣傳婦女保健

我退休之後，本意想寫些東西，總結一下近四十年的臨牀經驗，不料接踵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小診所、小門診部、小醫院來找我做診，張口就是個「天價」，如：一個軍隊門診所，開口就說：「每月給你一千五百元人民幣（比我當時的工資還高），並許下只要你高主任答應來我們這坐診，同意掛你的牌子，你要是很忙，不來我們也照樣付工資。」各種各樣，形形色色來請者，煩不勝煩，我絕不能用自己的聲譽來賺這種昧心錢，故一一拒絕。這些賺錢入迷者並不死心，有一天，我聽說西郊有個診所，門前豎立着一個大牌子，說「高耀潔教授在本所坐診」。我帶着記者和攝影師去抓了，準備質問他們的侵權行為，但可能事情預先暴露，牌子不見了，這樣一鬧，想利用我的名譽賺錢者有所緩解，但仍未斷絕，使人無奈。我知道這些人把病人當作搖錢樹，如有一個「護改醫」提前退休，在一個私人小醫院幹了兩年，賺來的錢買了一套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漂亮房子，其他生活上的提高就不言而喻了。現在社會上這種情況太多了，叫人忍無可忍，老百姓生病還要捱宰，這種情況太慘了，令人嘆息古今罕見。

在此同時，各級婦聯、工會、學校，請我演講婦女病的預防，開始幾個月我只選了幾種女性常見的病如：月經病、生殖炎症、孕期保健等，在演講中有所提及，從女性發問中我增加了女性生殖器保健，和孕期常見病的預防，在演講之餘，給聽眾看病，我發現了令人心酸的幾個病例：

有一位十九歲的女子，舌頭尖上長了黃豆粒大小的尖銳濕疣。我問她，怎麼性病長到了舌頭上？她說，嫖客們多付一些錢，讓她進行「口交」，結果就長出了濕疣。

我還見過一例梅毒造成的死胎，胎兒的媽媽是一位「富婆」。

在一所幼兒園，我見到一位四歲的小女孩染上了淋病。幼兒園有一



我編寫的婦科保健方面的書籍



宣傳婦幼保健



位老師，「第二職業」是舞女，在舞廳裏伴舞時染上了淋病。她成了幼兒園幾個兒童淋病的傳染源。

我還見到一位年僅三歲的小女孩，染上了尖銳濕疣。疣長在尿道口的下方，有雞蛋黃大小，又化膿，又出血。孩子非常痛苦。她的家裏有四口人，爸爸、媽媽、奶奶和她。除了奶奶以外，其餘三口人都長了尖銳濕疣。源頭是孩子的父親，他在外面嫖娼尋歡，搞得一家人不得安生，包括無辜的孩子。

五 發現性亂與性病劇增

1992年春節後，河南省當時的女副省長委託我為1995年世界第四屆婦女大會在北平召開寫論文，於是在河南各地作了幾千名女性的健康調查，發現了兩個特點：

1. 城鄉結合部婦女發病率高，特別是清潔癖者自用沖洗器沖洗陰道，或用衛生栓在月經期塞入陰道的婦女，患炎症者很多。
2. 性亂使女性發病率高。我們檢查了七個監獄，其女子監獄的性犯罪在押的女人，其性病發病率92.7%，令人吃驚，為什麼發生此現象？本人在進行了解。

這幾年來，出現一個特殊的群體，她們像城市健康軀體上的腫瘤，俗稱「三陪女」，活躍在歌舞廳、夜總會、美容院、洗腳屋、桑拿浴的包廂裏，從事着色情服務。她們也是性傳播疾病的受害者，更是性病傳播的主要源頭。

誰也不知道每年大把大把的「招待費」、「公關費」，有多少錢落入了「三陪女」和她們的老闆腰包裏。

在一個國家級的貧困縣，我看到，那裏唯一繁榮的是酒店和歌舞廳。我與一位歌廳的老闆聊天，打聽他們的生意。老闆說，現在我們的生意愈做愈「紅火」。你想吧，小至個人的家事、子女升學、工作調動、就業上崗，大至企業存亡、審批項目、刑事訴訟、檢查評比……凡

是求人辦事，都離不開花錢請客。花上千百塊錢請客吃頓飯，這年頭已經算不上什麼了。酒足飯飽以後，還得把客人請進包廂，請上「小姐」，躲在見不得人的地方鬼混上幾個鐘點，方算完成請客任務。有道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寬；『三陪』一抱，事情辦到。」

我不知道這位老闆說的情況是不是十分普遍。

另一位美容院的女老闆告訴我，她僱用了二十幾位「小姐」，一個月的收入就是幾十萬。

我問她，來這裏光顧的都是些什麼人？女老闆回答說，「主要是機關幹部。」

「機關幹部哪兒來的那麼多錢？」我問。

她笑笑說，「我給他們開發票，回去能報銷。」

「發票上寫些什麼呢？」我又好奇地問。

女老闆又笑笑，神秘地對我說：「給他們用飯店裏的就餐發票。」說着，她露出一副嗤笑，「這幫人夠便宜了，玩了女人還能報銷……」

這些「公僕」們如果染上了性病，還得花納稅人的錢給他們治病。

難怪大家對近來政府頒布的公務員條例拍手稱快，能否執行，只有天知道。

過去，一些醫學上的調查分析，認為性傳播疾病的高危人群，是先富起來的個體戶、經常出門在外的採購員、跑長途運輸的司機，或者從事服務行業的人。但是，現在有些變化，有權有勢的人，也成了高危人群之一，使我們感到悲哀。他們用公款消費，玩弄「三陪」，結果也讓自己嘗到性病的苦果。

豫東傳有一首「打油詩」說：

吃喝嫖賭膽包天，貪污受賄心不懸。只因手中有巨款，某君今日又升遷。



不潔性交是性傳播疾病的主要傳染途徑。有了公款消費，有了「三陪」，性傳播疾病就有了生長的「土壤」。

如此「繁榮娼盛」，叫人痛心疾首！

從1994年以來，我的講演不但有婦科病，還有性病，及如何防止性騷擾。而大學生最喜歡聽的是「如何防止性騷擾」，當然要加上性病，那時我對愛滋病在中國傳染的真相還不了解，一切按官方腔調又加入愛滋病，1995年半年我講了十幾間大學，三十多歲的機關工會及工廠女工們，如1995年「三八」節那一天，我講了三所大學，上午鄭州大學，下午工業大學，晚間農業大學，每場三個小時之久，雖然講了九個小時，我並不感到累。爭得講台我可以聲明我不會外出坐診賺錢，即使有人找我外出看病，也白盡義務，講課費，他給我就收，不給也就算，我認為我們的民族，特別是女性，更應該提高衛生保健知識，勞累了我一人，讓大多數人受益，還很值得。

在講「防止性騷擾」的同時，發現性病發生情況，不是死灰復燃，而是今盛於昔，太可怕了，假醫假藥接踵而來，使人深深感到社會變了，變得像《新周刊》曾經撰文指出的……性自由以人性為鰲頭，以性愛為藥效，不斷釋放曖昧與激情的煙幕彈，縱慾成癮……

這樣下去，我國的傳染病，特別是性傳染疾病，早已今能盛昔了，這是民族的憂患，防止性騷擾，已是時候對年輕一代伸出援助之手！

我用一首詩，來勉勵大家。

疾 病

所有的疾病都帶着傷情，病魔都不是孤立的。

你看！世上有多少種傳染病在蔓延。

它的終點——不癒則死，你知道嗎？疾病在侵襲你！

長期痛苦行走的人們，最後還是一命歸西。

尋醫問藥，急中之急，騙子，花樣百出，無孔不入！

騙走的不僅錢財，更重要的是生命！

人啊！疾病就這兒，騙子，巧言花語，向你攻擊。

人啊！你無來生和再世，愛護自己，提高警惕。

下篇

退休後遭遇的愛滋風雲

第四章

由打假至關注愛滋病
(1996 年-2001 年)

第四章

■打假至關注愛滋病
(1996 年-2001 年)



第十五節 調查遊醫、假醫、假藥等社會弊端

一 打假「性病遊醫」怎一個難字了得

從各種渠道了解到的情況更讓人氣憤難平。1997年10月，一位名牌大學畢業生李某，在單位工作，時間並不長。他宿舍裏還住了另一個單身漢，那位先生不拘小節，愛亂用他人的東西。而李某很愛清潔，他怕有傳染病，就從報紙上找到一家省直醫院，他選定時間去做身體檢查，查了兩天，結果出來了：李某竟患有三種「性病」。他拿着檢查單，很痛苦地自言自語道：「我為人清白，爲啥會得這種病呢？」他愈想愈痛苦，去醫院吧，又怕遇見熟人，想來想去，真是太丟人了，不如一死了之……

於是，他以回家探親爲名請了假，住進一家賓館，又買了一瓶安眠藥，準備服毒自殺。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他準備把積蓄用完後再服藥。賓館服務員發現他情緒異常，在打掃衛生時又發現他枕頭下有瓶安眠藥。細心的服務員告知了領班的主任，主任是位熱心的中年婦女，她也有一個兒子和李某差不多年紀，於是她開始注意李某的行止動靜，同時還調查了李某的身分來歷，很快找到了李某的單位，可單位的人誰也不了解李某究竟出了啥問題，於是就找到了李某的父親。他父親聽到兒子的消息大吃一驚，立即找李某談話，這才了解到李某企圖自殺的前因後果。

李某的父親就帶着他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省防疫站檢查了三天，結果全出來了：李某身體一切正常，根本沒有什麼性病，連炎症也未發現。原來那家省直醫院的「性病門診」承包出去了，李某碰上了「性病遊醫」。可恨、可怕的「性病遊醫」幾乎斷送了一位剛大學畢業青年的生命。

這哪裏是在看病？分明是圖財害命！1998年1月24日，我將一份調

查報告面呈當時的河南省省長馬忠臣，呼籲對只顧賺錢，卻置人民生命健康於不顧的「性病遊醫」應予以有力的打擊，取締這些害人蟲。

報告引起了省領導的高度重視，馬省長第二天便作出批示。1998年3月30日，省政府召開全省整頓醫療市場的電視電話會議，一場整頓假醫、假藥、假郎中的活動在全省展開。

不過，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一些不知身分的人接二連三打電話來：「再多管閒事，要你的老命，不僅殺你，還要殺你全家！」個別媒體的負責人甚至也口出怨言：「老太太亂告狀，讓我們損失了幾百萬（廣告費）。」

為此，不但我的小女兒也因為這件事受到牽連，而且我明白了，遊醫還有保護傘，有後台老闆。這些人並非一般無職無權之輩，有官太太，更有官員，他們受了賄，「一切向錢看」，死人對他們來說算不了什麼……

我這才見識了「性病遊醫」的「厲害」——這是金錢的威力。因為錢可以打通關節，和正規醫院「聯營」；因為錢，廣告可以在媒體上狂轟濫炸；因為錢，管理部門的某些人可以睜隻眼閉隻眼。然而，我不能向這些醜惡的勢力示弱：活着要有自己的骨頭自己的肉。我利用一切場合，口誅筆伐，矛頭不但指向「性病遊醫」，還對準了其滋生的溫牀——某些醫療單位、管理部門的腐敗現象，僅向有關各級部門、領導寄出的信和材料就有三百餘封。

儘管1998年底衛生部糾風辦發文通報莆田農民遊醫佔國團、陳金秀詐騙團夥，要求各級衛生主管部門加以查處；在1998年10月河南省出台《醫療廣告管理辦法》，但是，「性病遊醫」仍然充斥中原。尤其是1999年入夏以後，虛假醫療廣告滿天飛，「性病遊醫」活動又見加劇。一個遊醫甚至還肆無忌憚地說：「那個拚命反對我們的老太婆已七十多歲了，活不了幾天了，幹吧！」

面對嚴峻的形勢，我再次上書新上任的河南省省長李克強，痛陳遊



醫的危害，要求取締「性病遊醫」，治理非法醫療廣告。這次省領導非常重視。1999年8月13日，省政府再次召集省公安廳、省衛生廳、省工商管理局等有關部門，研究集中整治遊醫、非法醫療廣告問題的措施。

這說明新一輪打擊「性病遊醫」的行動又開始了，同時也讓我感到擔心：打擊「性病遊醫」究竟需要多少個回合？又有多少人因此而受到傷害？

我想起了千里迢迢從河北涿州找上門來的一對小夫妻。1999年5月的一天，這對妻子人工流產後再也沒有懷孕的年輕夫妻，到北京某醫院看病，卻被醫生介紹到所謂的「性病、婦科病症專科門診」。經診斷，夫妻倆都得了性病，一連去了幾家這樣的「專科門診」，結論竟然如出一轍，老實本分的他們驚呆了。就在痛不欲生的時候，他們在報紙上看到介紹我的文章，就直奔鄭州，輾轉找到了我。我斷定他們上了「性病遊醫」的圈套，就介紹他們到衛生防疫站檢查，結果發現只是有輕微的炎症，消炎治癒後即可在很短的時間內懷孕。

甚至深夜，我都能接到全國各地的電話，聽着他們在電話裏帶着哭腔的控訴：「高老師，我讓『性病遊醫』害苦了。」這一切讓我意識到「性病遊醫」肆虐的範圍絕非河南一省。於是，我繼續投書中央、省領導和各大媒體，揭露「性病遊醫」及其支持者。

當時，我想：我要一直幹下去，若我本人遇有不測或我的家人為此出了意外，只希望能變成淨化醫療系統的動力，讓老百姓不再受此痛苦也值得。

二 發現大量假醫假藥

假醫假藥與社會道德急劇下降、信用缺失、一切向「錢」看有關。在醫藥系統和愛滋領域裏，假醫假藥種種事例，誰也掩蓋不了這一醜聞。他們沒有羞恥，就沒有良知；沒有良知，就會惡行遍地。這是假醫假藥的根源。最近我又發現貪官和他的老婆或情婦是他們的保護傘。

自 2000 年以來，衛生醫療領域裏醫騙子五花八門，假醫、假藥不知害死了多少病人（包括愛滋病病人）！真是喪盡天良！

醫騙子用甜言蜜語哄騙病人，自稱他的藥有神效……損人利己地騙來了昧心錢，吃得肚滿腸肥！他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羞恥二字。

「特級騙子」多以「神醫」為名，他們成立組織，建立「醫院」、「租賃科室」，勾結貪官，收買吹鼓手等等，用廣告、網絡、會議宣傳他們的神藥，極其缺德！

醫騙子多得像廁所的蒼蠅，翩翩起舞，千方百計，不擇手段來搞與我的合影像，妄想說明他們的藥物是「真實」的，以便欺騙病人，賺錢肥自己，少廉無恥。他們已變成了新型的奴隸。

我送他們一首詩：

奴 隸

奴隸啊，奴隸！

你是現代化的新型奴隸。

你是個欲壑難填、喪失廉恥的奴隸，

也是見利忘義、腐朽的奴隸，

更是金錢至上的奴隸。

你是搞「血禍」及引發「愛滋病」的奴隸，

也是害人的罪惡奴隸，

你是缺少道德失去人性的奴隸。

也是千秋萬世被人唾罵萬惡不赦的奴隸，

你是臭名遠揚可恨可惡的奴隸。

這些騙子絞盡腦汁，利用一切手段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1. 騙子假藥，其數量之多，令人難計其數。經常有人向我反映有騙子不擇手段，詐騙病人的錢財。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村醫給愛滋病病人



亂用藥，如尉氏縣一個姓陳的村醫給發燒的愛滋病病人靜脈滴注地塞米松（免疫抑制劑），導致病人大汗淋漓，加速了死亡。還有一些社會上的遊醫、庸醫，利用廣告、網絡、信件來欺騙愛滋病病人及家屬。如2001年10月2日愛滋病病人馬煥軍告訴我說：「某醫院有預防愛滋病的針，每月打一針，可防止愛滋病發作，幾百元一針，我打不起……」愛滋病暫無藥可醫，無疫苗可防，這是世界公認的，不知這「預防愛滋病的針藥」由何說起？

他們用低劣的中草藥、過期藥、發霉藥，甚至白陶土或其他草根樹皮，研成粉末、丸子，或裝入膠囊，或泡成藥酒，自2006年以來，出現了不少「神醫」發明的保健藥品，說成是專治愛滋病的特效「神藥」，來欺騙病人，說政府發的免費抗病毒藥物有副作用，沒有效果，他自己的藥或保健藥品對治療愛滋病有神效！這嚴重影響了病人正規治療的效果，甚至加速了病人的死亡，使他們落得人財兩空。

這些騙子何許人也？有無業遊民，有庸醫、遊醫，還有幹部、工人，他們並沒有讀過醫學院校，更沒有行醫資格，竟然敢說：「我研治的中藥酒對愛滋病病毒在人體外試驗殺傷率兩分鐘為100%，對淋巴細胞保護率為92.7%以上，在十幾例愛滋病病人身上試用，抗感染療效為100%。」就利用這些假話胡騙亂吹，盯住愛滋病病人不放，其目的很清楚，出售「神藥」，大肆牟取暴利，以飽私囊。

類似這種事情太多了，如某某「專家」原是一個汽車修理工，搖身一變成了治療癌症的「中醫專家」，多處設立醫院、診所，他的簡歷介紹中沒有學歷，只有雲天霧地，在境外這國、那國治療愛滋病的經歷，可能他是「生而知之」，現在又說他在我省治癒愛滋病病人二十多例。河南省衛生廳一位副處長說：「這個人在項城一帶賺了不少愛滋病病人的不應該賺的錢，他上面有人，不然他在這幾年會發展這麼快嗎？他跟李紅蓮（綽號「三仙姑」，南陽醫騙子，已判十年徒刑）是「一類貨色」。這位「中醫癌症專家」自述未來人類戰勝愛滋病的希望必然在中

國，必然用中國傳統醫學來攻克。

與以往的醫騙子不同，有些人是國家職工，他會利用文筆，利用關係，嘴裏高喊「只為救人，不為賺錢」等官話，比無業遊民、遊醫、庸醫等詐騙愛滋病病人的伎倆更「優秀」，更「高明」。

騙子們到處寫信、登廣告、上網、打電話、拉關係，不擇手段地查找愛滋病病人，進行詐騙。我在三年內曾接到六千多位群眾來信，其中約10%是醫騙子來的，還有少數是病人受騙後寄來的控訴信。

如某某，其丈夫因愛滋病死去，家中一貧如洗，好心人救助他幾百元，不到一周就被騙子們騙走了，為了買騙子的「神藥」，家中能賣成錢的東西都賣了，結果呢？很快死亡了。家中四壁空空，連火化費也拿不出來，只得用高粱杆捆纏上屍體，夜裏偷偷地埋入墳塋。

任何病人特別是愛滋病病人陷於孤獨無助的境遇，這些騙子利用病人求救無門和渴望治病的心理，就大吹而特吹他能夠治癒愛滋病病人。騙子的伎倆是什麼呢？靠耍弄騙術。他們自稱老中醫、老專家、攻克愛滋病的神手，祖傳中醫秘方專治愛滋病，並吹噓說已治好幾十例、幾百例！那些受騙上當的愛滋病病人，在甜言蜜語中一個個倒下了，誰又知道醫騙子們賺了多少昧心的愛滋錢？

為貪騙者寫了一首詩：

貪騙病人

天地良心，在你內心早已發酸！

一批欲發「愛滋財」的冷血畜生啊！

變本加厲，花樣翻新……

四處鼓搖唇舌，儼然治愛神仙，

亂配藥物，拿愛滋病病人作試驗……

愚弄病人，實施詐騙，



真個是，造假發家的「冷血們」腰纏萬貫！

春去秋來，聲、色、賭、樂，打發無聊歲月。

你、你、你，如同魔鬼混世，

你、你、你，廉恥氣節全喪完。

2. 任何病人，特別是愛滋病這個弱勢群體，是全世界善良人們所關注的、所愛護的；但也有一部分披着人皮的狼，卻給這個弱勢群體設下陷阱；還有些冷血醜類當了幫兇。不少真實故事，令人髮指！本章就是為這些可憐的人們呼籲，讓那些愛財、缺德的傢伙們曝光，讓萬眾指責與唾罵！

醫騙子的訛詐活動，農民的封建迷信意識，各種勢力的剝奪和勒索，壓在愛滋病病人和愛滋孤兒的頭上，這種情況，時下還鮮為人知！

(1). **貧窮**：人們因貧窮生活困難而賣血，因賣血而傳染了愛滋病，又因病治療花了不少冤枉錢，弄得窮上加窮，最終導致家破人亡。

(2). **歧視**：人們對愛滋病知識的缺乏，誤認為這是一種「髒病」，是嫖娼、賣淫、吸毒傳染的，正常人不會得愛滋病，因此，愛滋病病人受到了各種歧視，以至他們的遺孤也無法倖免。

(3). **恐愛症**：因對愛滋病傳播途徑沒有正確的認識，加上宣傳的誤導，導致某些人對愛滋病產生了高度恐懼，特別是那些性行為不端正的人們，萬分害怕染上愛滋病，他們患了「愛滋恐懼症」。

以上是人所共知的現象，其危害就不用再囉嗦了！現在出現了新的危害，就是詐騙、迷信、剝奪等活動陷阱，挺入了愛滋領域：

(1). **詐騙**：利用行醫之名，搞欺騙之實，這些沒有靈魂的人，為數不少，他們「歇斯底里」似的想要發「愛滋財」，用盡各種伎倆，要盡了無賴的本能，廣告、廣播電視、網絡，大搞有償新聞，極力吹噓，自稱「國寶」者有之，自稱全國、世界發明第一人者有之。

他還說：愛滋病病人不喝免費的「雞尾酒」，要喝他的中藥酒。這

種連批號都沒有的「中藥酒」，豈敢與世界公認控制愛滋病的「雞尾酒」相比呢？但真的有病人這樣做了，可能他的行騙手段高明。

這些人的大話、狂言，吹得天花亂墜，人已死了，他們硬說，健康的活着。說假話、吹大話、耍無賴是他們的本能，因其「胡編亂吹」，使他的社會地位降低，那是他對號入座的結果，不足為怪，可恨的是不知騙子害了多少愛滋病病人！

(2). 封建迷信：時下社會道德淪喪，人們精神空虛，封建迷信乘虛而入。算卦、燒香、拜神仙，求其保佑，那些冷血醜類為了大發橫財，就利用這種活動，在孤兒和愛滋孤老中設下深深的陷阱：如父母因賣血感染愛滋病死了，他們硬說是孩子命毒剋父母，女孩更是個「掃帚星」……

(3). 剝奪勒索：愛滋病病人多在農村，這些地方的人多數失去了為他人着想、互助、友愛的集體精神，賭博成風，若局外人送給他們一些錢，救助病人或孤兒時，他們的親屬會截走，把錢拿去賭博，有的還逼着孩子去向外人要錢……如孤兒高闊的叔叔便把我給高闊寄的錢拿去賭博。更甚者打着保護孤兒的旗幟，辦私人託兒所、幼兒園、學校、孤兒院等等；到處募捐，拿着這些錢做生意，牟取更大利潤；甚至用詐來的錢養情婦、鬧離婚、不撫養親生孩子；還有人用這筆錢修蓋房屋。

近年來，我多次為多個疫區的病人送衣物，每次經手人都說，已把衣物發



一家只剩年幼的姐弟和七十四歲的奶奶



送給了許多村民。2002年12月23日，我突然去了某縣某村的經手人家裏，發現她房間裏堆積了大量衣物，真叫人不知所措。

一位劉先生有詩云：

慘遭不幸已堪傷，落井偏逢下石忙。

騙子黑心蛇蠍似，怎令雪上更加霜。



丈夫因賣血感染愛滋病身亡，妻子抱着丈夫的骨灰悲痛欲絕



這些愛滋病感染者，手臂上都因長期賣血留下了豆大的疤痕

第十六節 贏得當時河南省領導的支持

面對「性病遊醫」對群眾的坑害，大賺昧心錢，讓人忍無可忍，我站出來與他們鬥爭，得到當時河南省領導的支持。然而，這種現象不是河南一省的問題，我遇到「性病遊醫」近乎瘋狂的攻擊。

一 河南省領導支持我打擊假醫假藥

80年代以來，各種曾經在中華大地上銷聲匿迹的性病又死灰復燃，可怕的愛滋病也悄然入侵到我們身邊。一些江湖遊醫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採取種種醜惡手段，租賃、承包一些正規醫院的科室，辦起了「性病專科門診」、「泌尿病專科」，這些人對科學治療性病所知甚少，只顧大賺昧心錢，卻不管病人死活，一些非性病患者被當作性病治療，導致家庭破裂、夫妻反目，甚至傾家蕩產，致傷、致殘、致死的悲劇屢屢發生。有一個例子非常典型，鄭州某高校一個女大學生，感到下身不適，就按照報紙廣告的指引，去某「泌尿專科」就診，醫生經過一番「認真的檢查」，說她得了三種性病，並把病情說得很重。女大學生在該門診打了一次針，就花了二千多元。這位大學生實在想不通，自己清清白白，怎麼會得這樣的「骯髒病」？她感到沒臉見人，就產生了輕生的念頭，準備跳樓自殺。恰巧我應邀到該校給女學生作防止性騷擾的報告（當然要有性病內容），會後，這個女學生記下了我家的電話。抱着最後一絲希望打電話來求助。我聽完她的敘述，判斷她得的只是尿道感染，就讓她到河南省防疫站去進行治療，結果只用了十七元八角，吃了一些紅霉素就徹底治癒了。

面對如此駭人聽聞的現象，我忍不住了，一個醫學教授的良知，使我決心揭穿這些遊醫的騙人嘴臉，還性病治療這個領域一片淨土。從退休後的1990年，我開始走上了漫漫十年的「性病打假」之路。



性病是性傳播疾病的簡稱，包括淋病、梅毒、尖銳濕疣、軟下疳等十幾種疾病。泌尿道系統包括尿道、膀胱、輸尿管、腎臟等器官，它有可能發生炎症，也會生長腫瘤，遭到藥物損害等。人的泌尿道與生殖道雖然非常接近，但確分別隸屬於泌尿和生殖兩個系統，泌尿系統疾病與性病風馬牛不相及。那些以治療泌尿科疾病為名、行性病之實治療的廣告，均標榜由「專家」應診，請問，連疾病隸屬都分不清的人，還會是什麼專家？這不是「掛羊頭賣狗肉」以騙取錢財是什麼？我認為，這些所謂「性病專家」的存在，至少對社會有四方面的嚴重危害：

1. 這些性病遊醫的存在，破壞了正規醫院的信譽，破壞了患者對醫院的信任，以往人們稱醫護人員為「白衣天使」，現在確稱某些醫護人員為「白狼」；

2. 城市裏開設這麼多性病診所、性病專科門診、防治中心，給人們的印象好像我們國家「遍地性病」，如此下去，豈能不影響我國、我省的形象，還會有人來旅遊、投資嗎？

3. 性病遊醫不作傳染病報告，一方面使國家對真正的性病患者不了解，影響國家制訂正確的性病防治政策，另一方面，他們把非性病說成性病，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一種「性病恐慌症」，嚴重影響了社會風尚和群眾的正常家庭生活；

4. 性病遊醫在全國各地騙取大量錢財，但從未給國家捐過一分錢稅收，他們不少人暴發後僱有保鏢，為所欲為，甚至發展成具有集團性質的黑社會勢力，他們的保護傘是貪官和他們的臭老婆或情婦，這些蛀蟲們對社會的潛在威脅很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性病遊醫不除，對國家、對人民的危害不可估量！

1998年1月23日，河南省文史館舉行迎新茶話會，時任河南省省長的馬忠臣省長代表省政府和館員們共慶佳節。得知這一消息後，我連夜趕寫了一份報告，痛陳性病遊醫騙人的驚人黑幕極其嚴重危害，呼籲省長關注此事。我在調查報告中寫道：「根據本人近半年的親身調查，發

現我省各地市仍有大量遊醫、庸醫、假醫、廣告醫，他們利用手中騙來的錢，收買了某些醫院的領導，承包租賃了醫院的科室，搖身一變成了『性病專家』、『婦科病症專家』等，並在各種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上大做廣



當時河南省省長馬忠臣支持打假

告。此現象愈演愈烈，不可小視……」會上，我把這報告親手交給了馬省長。第二天，馬省長就做出了明確批示：「限期整頓非法醫療活動，並將此作為一件大事長抓不懈。」春節過後的3月30日，河南省政府召開了全省整頓醫療市場的電視電話會議，一場整頓假醫、假藥、假郎中的活動在全省展開。這個問題並不僅在河南省存在，據我調查了解，這是全國性的災難。請看吉林省蛟河市莫林場年輕人的來信：

高教授：

您好！

看到您的事蹟後，我非常感動。您在古稀之年，還為人類的健康和發展不懈努力，實在讓人感動。在商品經濟大潮湧、不少人都向錢看的今天，還有您這樣熱心公益事業的人，確實非常難得。您所從事的事業，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我願做繼續您事業的後來人！

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劉光君 1999年7月22日



性病打假工作直接影響了江湖遊醫的利益，我受到數不清的威脅、詛咒，甚至有人要把對我的不滿發泄到我的子女身上。我的女兒郭炎光，1985年從河南醫科大學畢業後，分配至省內一家大醫院工作。不料這家醫院的皮膚性病科竟然也被那些遊醫承包了。郭炎光不願與那些騙子一起騙人騙財，受到該院領導的反復責難。後來，遊醫從該院撤走，該院領導十分惱火，先後兩次在中層領導大會上說：「有人爲了個人利益，不管別人吃飯不吃飯，把性病門診趕走了，醫院今年少收入幾十萬元……」對這件事我很氣憤，不過我也感到很欣慰，我說：「我的女兒不和遊醫同流合污，沒有丟我的臉，我感到很自豪！」

我最痛心的事，那就是性病的再度出現。我國大陸在60年代初期已經基本上消滅了性病。但進入80年代後，性病又在我國蔓延開來。作爲一名婦科教授，我呼籲廣大婦女，特別是女青年，一定要自尊自愛。因爲婦女是性病的易感染者，又是傳播者。暗娼、妓女是性病襲擊的主要對象。在世界上，每天有三千名女性感染上愛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年齡在十七至二十五歲。性病患者可造成終身婦科病；一旦懷孕，分娩哺乳就會殃及後代。一般性病可能造成兒童傷殘或死亡，而愛滋病感染的嬰幼兒，大都在五至七歲左右死亡，很少人能活在十歲以上。「性解放」、「性自由」已經使西方社會吃盡苦頭，他們開始反省自己，重新注重家庭，注重貞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同時，更要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設，嚴厲打擊嫖娼賣淫這種危害社會的行爲，徹底堵塞性病傳播的根源，最終消滅這類社會醜惡現象。

二 由此帶來了禍患

我打擊「性病遊醫」甚至連累了我的家庭，那些和「性病遊醫」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醫療部門和衛生管理部門竟然聯手對我的女兒進行一系列的報復，請看我女兒郭炎光的文章《遊醫承包科室斷送了我的職業生涯》：

我叫郭炎光，生於1960年7月。1985年秋，畢業於河南醫科大學，被分配到河南省職工醫院任醫師工作。1995年，晉升為皮膚科主治醫師。當時皮膚科是個小科室，只有我一名醫師。

1997年12月4日，河南省職工醫院把皮膚科承包給福建莆田的性病遊醫陳某。陳某沒有行醫執照。承包後，陳設立了獨立的診斷室、藥房、化驗室、收費處、注射室、他在各種媒體上發布廣告招攬病人，以開闢他的生財之道。陳某承包了皮膚科後，坑騙就診者，引發了不少糾紛。其中有一對新婚夫婦，被查出「性病」，在診斷室裏抱頭痛哭。等他們冷靜下來不哭了，新郎說：我不可能得性病的。兩天之後，新郎拿着其他醫院的診斷證明來到皮膚科找遊醫吵架。同時負責注射的一位護士告訴我說：「陳老闆囑咐了，如果淋病病人開兩支『菌必治』，只注射一支；第一天來治療者只注射10mg的地塞米松，不添加任何抗生素。」陳某給了我一張藥物清單，要求我按照清單開藥方，並叮囑我留住每一個就診者，讓來看病的人都做化驗，要把沒有病的人說成有病，把小病說成大病。」

作為一名醫生，這叫我良心不安，於心何忍？決不能欺騙病人。

陳某惱怒我不配合，於是給了我一個單獨的診斷室，很少讓我接觸病人，並限制我與其他人接觸。後來又要求我不要再去上班了，每月可以照發工資。我不同意陳某的決定，找到院長梁倫富，梁院長非常生氣地對我說：「你來找我幹什麼，你們自己內部商量好了，不用給我講。」（意思是：你和遊醫陳某商量就可以了。）本人回答：「我是河南省職工醫院的職工，我沒有與陳某簽訂任何協議。我不找院長找誰？」梁起來就走……。為避免矛盾，我只好要求去北京協和醫院自費進修一年。辦妥了手續，後來醫院無故不允許我去學習。



在此期間，社會上性病遊醫因詐騙就診者的錢財，給就診者造成很大傷害，有就診者到最後沒有辦法，企圖通過自殺來解脫，如就診者李某無病卻被診斷成三種性病……。《河南日報》記者以求診者的身分來醫院調查，被診斷患「性病」，《河南日報》報道了此事。《半月談》雜誌報道了社會醫院把科室承包給無證性病遊醫經營的問題，當時無證性病遊醫承包醫院科室，詐騙病人是普遍社會現象。這一現象被媒體披露後，給那些承包科室的醫院帶來了很大壓力。

1998年2月23日，性病遊醫陳某停診。2月27日院務會議上，院長說：「有的人，比如馬某不給單位捅事，就辭職；而有些人為了點個人利益，就向上捅，給省長寫了三封信，不管大家有沒有飯吃，那捅事的人還反過來問醫院要飯吃。」其實1998年元月23日河南省文史館的茶話會上，我母親（是一名醫學教授）把沒有執照的遊醫租賃社會醫院科室、欺騙病人的情況已面對面的向省長馬忠臣反映過。次日，馬省長說「人命關天……」，批評了公安廳和省衛生廳的領導（河南省文史館存有批示）。院方取消了皮膚科，把我調到內科二病區，告訴門診工作人員：「我院沒有皮膚科，如果有病人點名找郭炎光，就說郭已不在醫院；倘若問她的去向，就說不知道去哪裏了。」院方把我調到二病區後不久，就不讓我管病人了。每當別的大夫去查房，我只能站在走廊上或者看護心電監護機（一般情況下，此工作由護士擔當）。1998年6月27日院務會議上梁倫富院長說：「我院皮膚科大夫的家屬（皮膚科只有我一個大夫）給省裏領導寫了三封信（實際情況是，我母親當面和馬省長談的，並且交了一份報告），第一封信把聯合醫療（指把皮膚病科承包給沒有行醫資格的陳某）的性病科給趕走了。第二封信說人家（性病科遊醫）三個月後再回來。第三封信向縱深發展，說做CT和藥物提成等。我院好多項目是聯合辦醫，以後怎麼辦，是向前

走，還是保守發展？聯合收入少了二三十萬元。聯合醫療不僅沒有錢了，反而對方向我們討損失費。職工們討論，建樓拿不出錢來，還差五十萬。中央已經下文件醫院10%下崗，發不了錢安置下崗職工。」

梁倫富院長唆使不明真相的人為難我。不少同事嚇得都不敢和我說話了。後來院方讓我去學習急診內科，我學成回來後在醫院門診上班。院領導三番五次地找到當時的門診主任問我什麼時候走，要攆我離開醫院。我不得不另外找接收單位。河南省中醫一附院同意借調我，而河南省職工醫院門診主任避着我，不給我辦調動手續，說如果我要求外調就必須寫一個書面說明，內容是我就算進不了對方單位也不准回河南省職工醫院了，要不然不放我的檔案走。這種情況下，我按主任的要求寫了一個書面說明。

那時我的母親高耀潔公開揭露河南愛滋病高流行的情況，受到河南省政府某些人的敵視和壓制。原本已經談妥同意調入我的河南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改變主意，學院以無指標為名，兩年未能辦成調動手續（1998至2000年）。在此期間中醫學院黨委書記的老婆和女兒調進該單位。我失去了工作，並處處受到敵視和排擠，2000年底，不得不流落加拿大。和我同樣命運的不止一人。2004年，河南省職工醫院成立聯合科室：「內病外治科」。有一名主管護士豫封被安排到遊醫聯合醫療的診室。主管護士豫封不配合遊醫欺騙病人，她實話實說：「告訴病人，點穴治療法不能治癒糖尿病。」遊醫把她的言行告訴醫院領導，梁院長把她分配到眼科，眼科承包者為了縮減成本，迫使豫封提前內部退休。因為主管護士的工資高，抵得上幾個臨時護士的工資。

2006年4月我父親去世，本人奔喪回國。4月21日，我去河南省職工醫院，有關人員說：「誰逼你走啦！當年醫院科室很多都是承包的，院長也是為了發展醫院。」那麼，醫院把科室承包給遊



醫，合法嗎？醫院為什麼要把科室承包給遊醫？建議有關部門追查醫院尤其是院長梁倫富與遊醫的經濟問題等內幕，並予以處理，賠償我一切損失。

郭炎光 2006年4月30日

這就是我反對遊醫惹的禍，多年來許多朋友和媒體非常關心我小女兒郭炎光失去工作的事情。我在公共場合說過：郭炎光就是因為河南省職工醫院性病遊醫租賃科室受逼害，而失去工作的。現在河南省職工醫院有人揚言說：「沒有跟她（指我）認真，她破壞了醫院的名譽，若跟她認真起來，就把她告上法庭。」試問河南省職工醫院向無證遊醫租賃十幾個科室，迄今還有未獲行醫資格的人從事醫護工作，這合法嗎？多年來遊醫以醫院的名義坑騙這麼多病人，你沒有破壞醫院的名譽嗎？

現在我告訴大家郭炎光流落加拿大的實情：大家只知道她非常恨我吧。已有兩三年了，她來電話時從不叫一聲媽。郭炎光痛恨我在當年不應該向河南省省長馬忠臣反映公立醫院非法把科室租賃給沒有行醫資格的遊醫坑騙病人的情況。其實，我反映問題並不是針對河南省職工醫院，也未提過河南省職工醫院的名字。

由於河南省職工醫院將不少科室租賃給遊醫，自然受到各方面的指責，並影響到院領導的經濟利益。所以河南省職工醫院領導對號入座，遷怒郭炎光，造成郭炎光今天的遭遇。而郭炎光膽小怕事，她不敢說出真實情況，只是怨我，恨我惹了禍，連累了她。

2006年4月郭炎光為父親病故奔喪返家，我才得知實情。

現在事情已經過去十多年了，醫騙子卻愈來愈多，老百姓受害愈來愈重，這個問題應該由誰負責？

第十七節 走近愛滋第一步

上世紀 80 年代，當我聽說愛滋病的時候，我也誤認為是性亂、吸毒人群的專利。因在許多媒體報道和政府有關文件中這樣講述，「中國愛滋病的傳播、流行發展趨勢，主要特點是吸毒與性」，並強調愛滋病疫情呈繼續上升趨勢，感染者也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的態勢。傳播途徑仍以吸毒傳播為主。另據有關報道，據我國衛生部門統計，在我國現有的 HIV 病毒感染者中，有 55.3% 是因靜脈吸毒傳播的愛滋病。但性傳播、母嬰傳播呈上升趨勢，性傳播不僅限於性亂、嫖娼賣淫者，而同性戀特別是男性同性戀也是傳播愛滋病的一大傳播途徑。至於母嬰傳播，主要是人們無知……可是我所見到的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事實轉變了我對中國愛滋病傳播途徑的看法。

一 一次會診的奇遇

一次偶然的會診機會，我遇到因輸血感染的愛滋病病人時，才知道「血禍」在人間降臨。受害者是善良的、無辜的婦女。我非常驚訝！當我接觸更多的愛滋病帶毒者和愛滋病病人時，才知道這是一場全國性的災難，並非僅限於河南，也可稱之為「國難」。作為一個醫生，我對此不能視若無睹，我有責任為這種傳染性疾病的防治獻出自己應盡的力量。但我不知道愛滋病傳播、流行的背後蘊藏着這麼多令人不可想像的問題。否則我沒有這麼大的膽量、勇氣！投身「防愛」工作，現已經十四年了，在這麼長的歲月裏，我走過的道路如大夢一場，真是坎坷而艱難。

因為太艱險了，才引起國內外人們的關注，被譽為「民間防愛第一人」，但我內心深處卻認為自己有愧於這一讚譽。因 1988 年，河北孫永德主任醫師就已為此呼籲，武漢桂希恩教授在 90 年代末已深入愛滋病



疫區，每戶每人進行檢查愛滋病疫情。鄭州某部隊醫院收住了一位姓巴的女病人，腹部有腫塊，高燒不退，十六天未能確診。1996年4月7日，該醫院請我會診，下午四時我見到病人，她極度消瘦，高燒持續在攝氏三十九度至四十度之間，口腔潰爛，並發有白膜，腹部隆起，其表面皮膚有多個、散發的點狀、突起的暗紫色斑點，圓形或橢圓形，壓之不褪色。我給她做了全身檢查，又抽了腹水、胸水化驗，結果未發現癌細胞。病人害的啥病？從紫斑形態，使我懷疑到「卡波西氏肉瘤」。

會診完畢，我回家後翻閱了有關資料，當晚未找到答案。第二天，我到醫院圖書室，該圖書室愛滋病的文獻奇缺。下午又到學院圖書館，在圖書館查到了有關愛滋病的文章：從病人的一切體徵，特別是「暗紫色的斑點」極似「卡波西氏肉瘤」。4月8日晚，我打電話通知經治醫生，讓他給病人抽血化驗 HIV 抗體。

該醫生說：「你診斷不清楚，想到愛滋病了，哪裏那麼多愛滋病讓你看呢……」

我說：「化驗一下 HIV 抗體，排除了愛滋病，也放心。」次日即4月9日下午，我再次打電話詢問經治醫生，病人巴某化驗 HIV 抗體的結果。

該醫生說：「我想病人是一個善良婦女，不可能害愛滋病，所以沒有給她化驗檢查。」

我說：「病人這麼重，病情診斷不清，對症治療無效總得多想辦法吧，明天給她抽血檢查，若再不檢查，你以後有病人也別來找我……」

4月10日上午，巴某 HIV 抗體化驗結果「強陽性」。她果真是一個愛滋病人。醫院立即沸騰起來了，大家疑神疑鬼，有的護士連家屬拿來的化驗單也不敢接過來。醫生馬上通知巴某的丈夫、兩個孩子、姐姐妹妹以及照顧她的親屬們一行十幾人，到河南省防疫站化驗 HIV 抗體，結果均為「陰性」。我得知情況後，感到很奇怪，特別是巴某的丈夫 HIV 抗體「陰性」，說明他沒有被愛滋病病毒傳染。我們感到十分疑

惑，輸血至今已兩年多了，夫妻同居未有任何保護措施，為何男方未被感染愛滋病呢？於是給巴某的丈夫反復檢查三次，半年後才釋疑。我們對當地愛滋病的傳播途徑有了新認識——血傳播。



在一次會診中遇到的第一例愛滋病病人

4月11日，河南省衛生廳某官員得知此事後，他以訓斥的口吻說：「你們大驚小怪什麼，哪有那麼多愛滋病……」衛生廳官員的態度令我震驚，一例傳染病他們為何這麼緊張？這使人倍感驚奇，發現情況異常，給巴某化驗血的經手人員，怕負不了責任，當夜悄悄地帶着病人及家屬的血液標本趕赴北京中科院檢驗科，再次化驗，結果病人HIV抗體為「陽性」，其餘家屬均為「陰性」。病人被確診為「愛滋病」病人。我們才鬆了一口氣！這是我們第一次因愛滋病病人吃驚……

十幾天後巴某死了，她才四十二歲。我聽說巴某死後，她丈夫在下雨的日子裏，帶着塑料布、折疊牀、巴某生前愛吃的東西等，躺在她墳前睡了十多天。他說：「我們夫婦結婚十幾年了，關係很好，她生的有兒有女，我很心疼她做子宮肌瘤摘除手術受苦，為了她的健康，我要求醫生給她輸血，誰知招來了要命的愛滋病。我很後悔，不應該給她輸血……」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病人，她從輸血感染至死亡，歷時近三年，其家屬任何人均未被感染。她又是個普通的農村婦女，沒有任何特殊嗜好，周圍的人也都是健康的。時下，在防愛宣傳中，主要強調靜脈吸毒傳播、性亂傳播、嫖娼、賣淫、婚外情等傳播途



徑，很少提及醫源性「血禍」的危險性。此事迫使我不得不思考和調查：周圍有沒有類似巴某的病例？愛滋病的主要傳播方式又是什麼？

此次會診的機會，我遇到了一位因婦科手術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婦女，她死去了，給人們留下了深思，愛滋病經血庫的血液傳播，意味着巨大的災難。從那時起轉變了我對中國愛滋病傳播途徑的看法，觸動了我的勇氣，促使我走上了艱難而坎坷的「防愛」道路。以我醫生的神聖職責，爲了我們的民族，宣傳「防愛」知識，減少愛滋病給人們造成的災難，是義不容辭的任務！

同時，我聽到還有人因賣血和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病人因病輸血庫的血感染了愛滋病，這說明血庫的血已被愛滋病病毒污染了，有多少病人因疾病或手術輸過血庫的血，誰能知道這些受害者有多少人呢？我所看到的不過是冰山一角，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愛滋病肆無忌憚地橫行，會有多少無辜者喪命於愛滋病疫情之下！愛滋病由賣血和輸血傳播，這絕不是天災，而是一場人禍。我爲輸血致命者送上一首詩：

愛滋離誰都不遠

人生如夢無復來，手術輸血她離開。

愛滋離誰都不遠，應防自己遭禍災。

二 他家為何走向滅門絕戶

1996年「五一」節假期的一天，一個學生告訴我，她丈夫的一家親戚得了愛滋病。他們沒有任何醫學認識，更缺乏愛滋病的知識，爲了賺大錢發大財冒充治療性病的醫生，結果全家四口人落得個滅門絕戶。只待最後一口人快離開人世時，才確診爲愛滋病，經過多次電話採訪，得知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她叫阿芳（化名），生病半年多了，發燒、腹瀉、厭食、無力起牀

活動，但神志清晰。在病後無奈的情況下，她開始篤信天主，躺在牀上天天為她和丈夫當「性病醫生」騙錢害人的罪行祈禱，懺悔……

我家祖祖輩輩都是打漁、種地為生，我曾有過一個和睦幸福的四口之家。1988年，我們為了發大財，收起了漁網，從遙遠的南國福建，到了東北吉林，進駐了一家醫院，掛起了「治性病」的招牌，我丈夫阿陳很聰明，他悟出了一套經營性病的「高招」：

1. 不惜重金，先收買醫院領導，租賃醫院房屋即承包有關科室，用錢叫那些貪財、缺德的醫院領導們俯首聽令，在虛假廣告的審批手續上蓋了單位公章，並提供一切方便，一般需送上幾千元或萬元以上，沒有錢是辦不成事的。

2. 那些見利忘義、缺乏新聞道德的編輯記者，要麼送錢、送物，要麼宴請他們，有時候需要為他們邀來「三陪女」助興，這樣便可拉攏他們，可以通過報刊雜誌、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大量製造虛假的「治療性病」的廣告，吹噓得天花亂墜，招攬病人。

3. 在街頭巷尾，張貼治療性病的虛假廣告，或者僱社會上的流浪人員充當「托兒」，到大醫院門診等處騙拉農村進城求醫的病人，每拉來一個病人就給他提成二十至五十元不等，一般視病人的情況而定，若從病人的身上撈的錢多，也可以獎給他一百元。

4. 花錢請來當地肯為「五斗米折腰」的醫務人員、「專家」、「教授」（不管他們的身分是真是假），只要那些人肯為我們的性病門診辦事，每月付給他坐診費一千至三千元，我們就是借助他們的名氣，利用他們的人際關係來招攬病人，來賺更多的錢。

5. 用各種各樣現代化儀器為我們助威，不怕病人不相信「醫生」的話。再僱來幾個所謂的化驗員（其實他們也不知道化驗為何物），病人看着他們在操作一道一道複雜的程序，「認真」地逐個在化驗單上劃上加號（陽性），「醫生」再根據這種「陽性」結果，嚇唬病人，讓他們主動地掏出錢來。



6. 凡是就診的人，沒病的說成有病，小病說成大病，再講講性病的嚴重性，再動員他們的家屬也來檢查，他們來一個就「宰」一個，他們若有遲疑，就再叫「專家」來嚇唬他們。有一個做生意的中年男子，他因排尿不適來檢查，結果弄得他全家都來治性病，半年賺他十多萬元。結果呢？中年男子在省醫院檢查，他們沒有病，於是他找阿陳大鬧。我們看事情不妙要鬧大了，一夜之間離開東北吉林到了安徽蚌埠。

7. 不管他們害的什麼病，有病沒病，一概說他們害的是性病，病人沒有什麼衛生知識，我們又打着正規醫院的牌子，他們不得不相信，即使在醫院工作人員中出現非議，醫院領導也會因受了賄出來制止。有一次一個護士發現我們把不是性病的說成是性病，她在外面嚷嚷，院長聽到了，狠狠地罵她一頓；一個大夫對我提出開藥太多、劑量過大，院長說她：「你開得對嗎？你賺不來錢，怎麼說呢？」

8. 凡是進了我們性病門診的「病人」，只要他能夠拿出錢來，一個療程，兩個療程，只說他病情好轉，就是不給停藥，直至把他兜裏的錢掏光為止。有一個姑娘因白帶多來檢查，我們說她害了性病，她花了三千多元，病情不見好轉，姑娘喝農藥自殺了，這件事情發生在吉林，到如今我還在懺悔……

9. 我們開支很大，每年廣告費就得花去五十萬元左右，還有其他開支，又要賺錢，怎麼辦？只得在藥費上做手腳，把幾塊錢的藥賣幾百元，甚至千元以上，在醫藥公司進藥利潤太低，只好從小販手裏買來過期藥、失效藥，偽劣淘汰的藥，也昧着良心往病人身上用。有一個打工仔，就是因為吃了我們的藥中了毒，險些喪命。現在我有病了，才覺得對不起他們，主啊，我懺悔！

10. 還有一招更沒有人性、人味，就是開了藥不用在病人身上，扣下來繼續銷售給其他病人，這些病人在我們那裏每天輸液，

用的就是鹽水。有一個真正害性病的小伙子，因未給他用藥，後來他因全身多處潰爛死了。

我們用這些欺騙方法，換來了財源滾滾，我們又用不着向國家交一分錢的稅，只花了一些行賄錢，很快就發了大財。五年後家裏蓋起了兩處小洋樓，汽車、各種高檔電器應有盡有。我們打漁的搖身一變成了醫生，頭腦很靈活，我們這夥人也很多，哪個地區腐敗風吹得緊，我們就去哪裏，原因很簡單，有腐敗才有我們賺錢的市場啊！很多省份都有我們這夥人，我家先後到過吉林、安徽、河北、天津、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市，所到之處，都是生意興隆，若一旦露出馬腳，便走之大吉。有了錢身價高了百倍，那些貪官們把我們「敬如上賓，視若手足」，誰敢對我們不利，臧官們便修理他。有一次一個女醫生說阿陳把沒病的人說成性病，她和阿陳吵起架來了，醫院院長知道後，在醫院大會上把女醫生大大批評了一頓，當時我幸災樂禍地想，真開心，有錢就有了一切，錢會叫「鬼」推磨……

那時，我們家庭過得真像天堂生活。誰料天有不測風雲，1995年2月的一天，我八歲的女兒發生了車禍，失血過多，情況緊急，她爸爸給她輸了二百毫升血。從此，體壯如牛、三十二歲的阿陳得了怪病，厭食、發燒、腹瀉，半年後他人瘦得像條枯柴，為了給他治病，我們花去了家中的半數積蓄，病也未治好，折騰了八個多月，他不情不願地離開了人間，如今也不知道他害的是啥病。與此同時和之後，我兩歲多的兒子，十歲多的女兒，也得了這種「怪病」，不久兩人都跟隨他們爸爸走進了另外一個世界。我又痛苦地得了這個同樣的「怪病」，吃啥藥都不見效，現在我們大筆的家產為了治病，基本快賣完了，我也終於體會到了害病難過的滋味，我的主啊！我有罪……



1995年國慶後的一天，阿芳侄女把她送進大醫院檢查，化驗結果確診為「晚期愛滋病」。從此，她的親屬和鄰里再不來看望她了，有些人行路還躲着她的家走，這時她已不能起牀，更無法自理生活，連個照顧的人也沒有，就更痛苦了，她少氣無力的，斷斷續續的，一直把「謀財害人」的罪惡說到最後。這年11月的一天，她痛苦地死去了。陳家四口為何死得這麼匆匆？他們害的不是什麼無名怪病，而是愛滋病。

陳家四口是怎麼樣感染上愛滋病的呢？陳某漁民出身，不懂醫學，更不懂得隔離消毒知識；他一味只追求賺錢，沒有任何性病知識，就開辦性病門診（性病中心），期間他接觸了大量性病患者，在性病病人中，有少數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同時，陳某又需要「三陪女」為他在宴請中作陪。因此，陳某感染上愛滋病是毫不奇怪的。陳妻（阿芳）是通過性生活感染的；陳女是血液傳播（她車禍時父親為她輸血）被感染的，陳子是母嬰傳播（即垂直傳播）被感染的。從病情分析，陳家四口症狀相同，服藥無效，死得很快（均在一年至一年半時間內死亡），是愛滋病無疑。可惜他們沒有醫學知識，亂吃貴重藥品，不去大醫院化驗「愛滋病病毒抗體」，陳某及子女三人生前未能科學地證實患的是愛滋病，還巧，陳妻得以確診，給人們敲了一次警鐘！這一個事例告訴我們，愛滋病傳播三個途徑：血傳播、性傳播、母嬰傳播。

以上事實告誡人們，不懂醫學衛生知識，接觸性病患者是很危險的。愛滋病無藥可醫，也沒有疫苗可防。一旦感染上愛滋病，金錢再多，也買不回來生命，陳家四口之死，完全是一個「貪錢」和「害人害己」的悲劇。同時，這件事情也給我本人留下一個有關愛滋病的驚人信息。為此寫了一首詩：

騙人開始，害己告終

詐錢害人天難容，騙來榮華一時興。

豈知愛滋伸魔手，滅門絕戶一場空。

第十八節 進一步認識愛滋病的病源

我原來僅注意了性病，自會診遇到巴某因輸血感染愛滋病後，得知她死得很慘，而輸的竟是血庫的血，可以推測：受害者絕非巴某一人。於是，我把視野擴闊，在城市、在鄉間，諮詢很久，終於發現了目標：愛滋病來源於「血漿經濟」。

一 得知愛滋病疫情多在農村

自 80 年代來，在農村已出現了「用血漿經濟來致富」，處處貼着「獻血光榮」、有償獻血等，甚至縣領導在電視上講，有償獻血好處多，既能致富，又不得高血壓。血和泉水一樣，愈抽愈旺……

各種各樣的血站，形形色色的「血頭」，如魚得水，急於發財，不管百姓的死活。他們用的針頭、剪刀、抽血的塑料管、血袋子，離心機堆在一起，同型血全放在一起，不是一人一次用，而是多人用多次！然後再把血球加上生理鹽水後再輸回賣血者體內！若一個人的體內含有愛滋病病毒，那麼這

一班人很難倖免，所以像滾雪球一樣，愛滋病很快蔓延開來，這不僅限於河南省，而是周邊各省，如安徽省、河北省、陝西省、山西省、山東省都有，現在把我在 1999 年至 2000



供血證



年所調查了解的愛滋病疫情舉例如下：

河南省駐馬店地區、新蔡縣設有三個血站，即中國人民解放軍血站、紅十字會血站、新蔡縣人民醫院血站。該縣城關鎮，東湖村村委包括七個小村，董莊、閻凹、小高莊、熊莊、汪莊、東關村、孔崗，長年居住人口三千多人，在賣血鼎盛時期，有一千五百多人以賣血為生，居民們說那裏至少有八百多人患有愛滋病：

（一）李建新，男，三十二歲，董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過三十多次血，染上愛滋病，全身癢、氣喘，無力幹活。其妻王國珍，二十九歲，也賣血多次（記不清次數）。於1999年農曆臘月初五病故，留下一個九歲的孩子。

（二）董建河，男，三十二歲，董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四十多次，染上愛滋病，高燒、爛嘴，於1999年農曆臘月初五病故。其妻孟小群，三十二歲，在同上血站賣過三十多次血，染上愛滋病，現已發病。他們有兩個女兒。

（三）董新生，男，四十三歲，董莊人，在同上三個血站賣血多次（記不清次數），感染愛滋病，發燒、咳嗽、氣喘，於2000年7月14日病故。其妻趙曉雲，四十歲，在同上血站賣血二十五次，染上愛滋病，頭痛、發熱，不能勞動，三個女兒全部輟學。

（四）崔之友，男，五十二歲，閻凹人，賣血七次，染上愛滋病，全身長癬，於2000年10月12日病故。其妻杜學芳，五十三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十五次，染上愛滋病，腹瀉、嘴爛、發燒，於2000年農曆8月初五病故。其子崔曉慶，賣過三十多次血，於今年6月因愛滋病病故。兒媳王運芳，三十七歲，在這三個血站賣過十五次血，染上愛滋病，腹瀉、厭食，她有三個孩子，二女一男。

（五）徐會理，男，三十二歲，閻凹人，在這三個血站賣過七次血，染上愛滋病，於2000年10月病故。其妻張小枚，三十二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十多次，染上愛滋病，發熱、頭痛，有一男一女兩個孩

子。

（六）馮冬元，男四十三歲，東關村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三十次，染上愛滋病，發熱、頭痛，於2000年農曆2月初五病故。其妻三十八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四十次，染上愛滋病，發熱、全身痛，於2000年6月14日病故，留下四個孩子，三男一女。

（七）王小虎，男，三十五歲，東關村人，賣血三次染上愛滋病，發熱、頭痛。其妻李月明，三十五歲，東關村人，賣血三次感染上愛滋病，發燒、頭痛、眼瞎。於1999年3月15日病故，留下兩個男孩子。

（八）熊世華，男，三十五歲，小高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二十五次，感染上愛滋病，發熱、頭痛，於1997年10月11日病故。妻子王傲亮，三十二歲，改嫁，兩個女兒留給八十四歲的爺爺熊保民養着，因生活太困難，把長女託付給智行基金會，現在生活在山東省曹縣，讀初中。

（九）高大好，男，三十四歲，小高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十三次，染上愛滋病，發燒、頭痛。其妻子王玉梅，三十四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二十五次，染上愛滋病，發燒、頭痛、脫髮，於2000年7月26日病故，留下一男一女兩個孩子。

（十）任力新，男，四十二歲，熊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五十次，染上愛滋病，於2000年9月13日病故。妻子李勤，四十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三十五次，染上愛滋病，發燒、生瘡，有三個男孩。

（十一）任建民，男，三十五歲，熊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三十五次，染上愛滋病，爛喉，於2000年6月3日病故。其妻梅大霞，三十五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三十五次，染上愛滋病，爛喉、不能進食，於2000年6月3日病故，留下兩個男孩。

（十二）孔海道，男，三十三歲，熊莊人，賣血六次，染上愛滋病，發燒、頭痛。妻子杜桂梅，三十二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十五次，於2000年9月17日病故，留有兩個男孩。



（十三）熊小力，男，二十五歲，小高莊人，賣血十五次，染上愛滋病，於2000年3月18日死於鼻癌。妻子任大亮，二十五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四次，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他們有一個孩子。

（十四）高建偉，男，三十五歲，小高莊人，賣血三次，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妻子楊傑，三十三歲，在那三個血站賣過四次血，得了愛滋病，於1996年7月14日病故，留下一女一男兩個孩子。

（十五）任小晃，男，三十八歲，熊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六十次，現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妻子陳小霞，三十七歲，在那三個血站賣過五十次血，染上愛滋病，發燒、腿痛，於2000年10月8日病故，留下一個男孩。

（十六）汪建民，男，四十三歲，汪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二十五次，染上愛滋病，於2000年6月3日病故。妻子耿顯枚，四十三歲，在那三個血站賣過十八次血，染上愛滋病，發燒、頭痛，留下一女一男兩個孩子。

（十七）梅留紅，男，三十四歲，孔崗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二十次，染上愛滋病，嘴歪、偏癱，於2000年7月19日病故。妻子王心晴，三十二歲，賣血六次，愛滋病病毒攜帶者，有三個孩子，二女一男。

（十八）劉希俊，男，四十歲，孔崗人，賣血兩次，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妻子王秀坤，三十九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十二次，染上愛滋病，高燒、咳嗽、頭痛、氣喘，於2000年9月14日病故，留下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十九）董新建，男，三十三歲，董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二十三次，於1997年6月2日病故。妻子金玉英，賣過兩次血，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他們有三個孩子，二男一女。

（二十）董合林，男，三十九歲，董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過二十次血，染上愛滋病，高燒、頭痛，於2000年11月3日病故。妻子杜秀

芳，三十九歲，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三十次，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二十一）李海軍，男，三十八歲，熊莊人，賣過八次血，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妻子張霞，三十九歲，賣過十五次血，染上愛滋病，發燒、頭痛，於2000年10月4日病故，留下一女。

（二十二）胡大國，男，三十二歲，東關村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二十五次，染上愛滋病，於2000年11月25日病故。妻子王小娥，三十二歲，賣了兩次血，染上愛滋病，無力幹活、咳嗽、氣喘，他們有一個孩子。

（二十三）馮長紅，男，三十歲，東關村人，在那三個血站賣過六次血，染上愛滋病，嘔吐、腹瀉、爛嘴，於2000年5月2日病故。妻子王小革，三十一歲，賣血四次，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他們有一個孩子。

（二十四）任大華，熊莊人，在那個血站賣血數次（記不清次數），現在愛滋病已發作。妻子王玉環與他同時賣血（記不清次數），也染上愛滋病，於2000年元月19日下午五時病故，留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二十五）閻建全，男，三十五歲，東關村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數次（記不清次數），現在愛滋病已發作。妻子陳銀平，三十歲，與他同時賣血（記不清次數），感染愛滋病，於2000年元月15日上午十時病故，為安葬妻子捱家捱戶要錢，他們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兩歲的孩子患有愛滋病。

（二十六）王小頭，東關村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多次（記不清次數），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其妻馮長紅與他同時賣血（記不清次數），於2000年下半年病故。

（二十七）董超修，三十五歲，董莊人，妻子宋平，三十五歲，與他同時在那三個血站賣血數次（記不清次數），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故，留下三個女兒。



（二十八）徐會理，男，三十四歲，閩西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數次（記不清次數），感染愛滋病，渾身起癬，於2000年9月30日病故。妻子張新勤，三十二歲，賣血多次（記不清次數），感染愛滋病，高燒、氣喘，他們有兩個孩子。

（二十九）董運修，三十六歲，董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多次（記不清次數），他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妻子趙效雲，三十六歲，賣血數次（記不清次數），因愛滋病病故，留有兩個孩子。

（三十）董小友，男，三十二歲，董莊人，在那三個血站賣血數次（記不清次數），感染上愛滋病，現在已發病。妻子徐培玲，三十六歲，與他同時賣血多次（記不清次數），於2000年2月13日病故，留下一個孩子。

（三十一）高運生，男，四十四歲，小高莊人，與妻子戚秀芝在那三個血站賣血多次（記不清次數），感染上愛滋病，分別於2000年農曆12月先後病故。留下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據統計：

我家訪的三十一戶中曾賣血者六十四人；賣血次數能說清楚者：四十五人；賣血次數：八百七十八次，說不清楚者：十九人，其數量無法計算，每次賣血量為五百毫升，血站付給賣血者四十五元，這些人全部感染了愛滋病，在我家訪時已死三十八人，二十七人在病中，其中包括一個母嬰傳播的幼兒。

以上不包括東湖村村民因賣血感染愛滋病的全部情況，這只是我走訪家庭的慘狀！

以下幾張照片，記錄了當時一部分的情況。

從東湖村完全小學來看，那裏只有一百八十多個學生，其中愛滋病家庭的孤兒已有：



探望晚期的愛滋病人



走訪患愛滋病的農民家庭

（一）常明明，男，十四歲，現為五年級學生，其父2001年去世，多次賣血的母親帶有愛滋病病毒。

（二）高岩，男，十二歲，現為五年級學生，父母相繼去世，身為長子，無依無靠。

（三）劉豔玲，女，十二歲，五年級學生，其母2001年去世。

（四）董敏，女，十三歲，五年級學生，其父1999年去世。

（五）梅麗，女，十二歲，五年級學生，其父2001年去世。

（六）高夢楠，女，九歲，四年級學生，其母2001年去世。

（七）任盈盈，女，十歲，四年級學生，其父2000年去世。

（八）任響強，女，十歲，四年級學生，其母2000年去世。

（九）任永光，男，十二歲，四年級學生，其母2000年去世。

（十）孔帥，男，十一歲，四年級學生，其母2000年去世。

（十一）汪天恩，男，十歲，四年級學生，其父2001年去世。

（十二）熊雨豪，男，九歲，四年級學生，其父2000年去世。

（十三）任響麗，女，十一歲，一年級學生，其母1999年去世。

（十四）董靜，女，九歲，二年級學生，其父1999年去世。



（十五）崔敏敏，女，十三歲；崔磊磊，男，十一歲，父母已死，分別為五年級學生、三年級學生。

（十六）薛藏敏，女，九歲，二年級學生，其母1998年去世。

（十七）董旭輝，男，七歲，二年級學生，其父1998年去世。

（十八）魏志成，男，八歲，二年級學生，其母2000年去世。

（十九）李鋒，男，九歲，二年級學生，其母2000年去世。

（二十）董燕傑，女，九歲，三年級學生，其父1999年去世。

（二十一）熊林果，女，九歲，三年級學生，其父1999年去世。

（二十二）高俊，男，十一歲，三年級學生，其母1991年去世。

（二十三）董紅珍，女，九歲，三年級學生，其父1999年去世。

（二十四）王芳，女，十三歲，五年級學生，其母1998年去世。

（二十五）董豔傑，女，十一歲，三年級學生，其父2000年去世。

（二十六）董紅玲，女，十二歲，三年級學生，其父1997年去世。

（二十七）董耀輝，男，八歲，一年級學生，其父1998年去世。

一位鄉村女教師為愛滋病受害者寫了一首詩：

走啊走

一望無際的原野，伸向大地之盡頭，綠綠蔥蔥。

墳塋起伏無邊，墓內躺着愛滋冤骨，陰魂難眠。

可憐的遺屬們，老人和孤兒，苦難無邊無頭。

缺德無恥的騙子們，仍渺着他們詐騙錢財，糾纏不休。

他們幾時才能走出患難？走啊走！漫長的道路！

這個沒完沒了的歲月，何日才能走到頭？

二 宣傳預防愛滋病真困難

我國的愛滋病病人主要是血液傳播，而且多在農村，農民得病者多是因貧困而無錢醫治，更不懂得如何預防，直到死亡還不知害的是啥病。在駐馬店農村，老百姓把愛滋病叫做「怪病」，因愛滋病病人發熱，周口一帶叫它「無名熱」。由於官方對愛滋病的疫情捂蓋子，變着花樣封鎖人們的知情權，使他們對愛滋病的真實情況缺乏了解，只知道愛滋病是一種「髒病」，是一種「醜病」，是一種壞人害的病，因此使得病的人由於怕「醜」而不敢公開身分。

（一）預防愛滋病資料的產生與散發

我發現了賣血感染愛滋病的病人之後，意識到愛滋病疫情的嚴重性，特別是廣大民衆對預防愛滋病知識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漠不關心。更可怕的是，某些宣傳內容與我國愛滋病來源、流行、蔓延實況不符合，使我不得不自費編寫愛滋病真情的「書籍」和防愛「資料」（以後稱小報）進行宣傳。



在農村分發預防愛滋病資料



1996年4月我接觸愛滋病病人之後，深感愛滋病知識缺乏，我本人尚且是醫生，那廣大群眾又該如何呢？於是當年9月我開始自費編印第一批小報，向廣大民衆宣傳預防愛滋病知識。當時我的經濟狀況十分困難，只有五百元，河南文史研究館拿出八百元，宋慶齡基金會拿出四百元，這一千七百元錢共印出一萬二千份資料。1996年12月1日「國際愛滋病日」那一天，河南文史研究館出車，在同事們的協助下，我們走遍了鄭州市五個長途汽車站，三天內向群眾發放了八千多張防愛宣傳資料。

第二年，我得知愛滋病病人多在農村裏，但因為「保密」我很難和他們聯繫。這些情況激起了我宣傳「預防愛滋病」的信心和勇氣。我已掌握了大量預防愛滋病的知識、資料，於是繼續寫啊！編啊！印啊！講啊！利用各種形式向群眾宣傳預防愛滋病的知識。每年編印出二期資料，每張用八開的紙。從第十一期開始，已改為折疊型，四頁八面，用新聞紙印刷，每份資料看起來很像一本小書，有利於讀者保存，至今共印了一百萬餘張。除第一期外，每期都印三至五萬份，第十九期印了十八萬份。

各期的預防愛滋病資料內容不同，其總的大綱是：愛滋病知識和有關愛滋病的實例，如什麼是愛滋病，愛滋病即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英文簡稱AIDS）。該病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簡稱HIV）感染而引起，導致被感染者免疫功能的部分或完全喪失，繼而發生機會性感染、惡性腫瘤等。愛滋病的病死率極高，目前尚無徹底治癒的方法，但是完全可以預防。在傳染方面，除全世界公認的三種傳播途徑，即血傳播、性傳播、母嬰傳播之外，還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1. 必須有足夠量的愛滋病病毒從感染者身體內排出；
2. 排出的病毒在一定溫度和時間內傳遞給他人；
3. 足夠量的病毒才能通過接觸者的破損皮膚、黏膜進入另一個體內。

人們僅懂得愛滋病的傳染途徑，而不知道傳染的三大條件，故造成恐懼與不安，引發歧視和冷漠！以致於隱瞞愛滋病疫情，忽視了愛滋病經醫源性傳播的危險。

在十四至十七期專門報道了有關愛滋孤兒（愛滋孤兒是愛滋病患者死亡後留下的遺孤，孩子是健康的，與愛滋病孤兒不同。愛滋病孤兒是本人也患有愛滋病）的生活問題、讀書問題和心理問題，並討論了他們今後的出路怎麼辦等等，引發社會上極大反響，不少人來信詢問求助……

本人編寫的資料堅持實事求是，從人道主義出發，不畏權勢，愛滋病是啥樣就是啥樣，以便於人們了解愛滋病，控制愛滋病的傳播。由於我的防愛資料印刷成本低，攜帶方便，內容新穎，又是免費贈送，故很受歡迎。

這幾年，我的散報的散發方式很多。前十期，多無償送給河南省防疫站，從那裏再發往基層醫務工作者或病人家屬們手中。一天，我和丁老師、黃老師等拿着防愛資料到一家夜總會向「三陪」小姐散發時，小姐們如見到洪水猛獸般躲來躲去。有位大膽的小姐接過資料看了看，見是愛滋病的資料，便揉作一團扔進垃圾簍，並嚷着說：「老太婆，還不快走！這些東西讓客人見了誰還會來這兒，他們不以爲我們有愛滋病才怪呢！」夜總會的老闆聞訊趕來，像見了仇人似的，將我們攆了出去。諸如這些事情並不少見，不但一些娛樂場所，就是政府機關、工廠、企業也鮮有例外。這其中有個誤區，他們大多數人認爲「愛滋病是髒病，見不得人的病。我不賣淫、不嫖娼、不靜脈吸毒，不會得愛滋病」，於是把我們搞防愛宣傳者也看成了「壞人」……

無奈，我們改變發放方式，通過熟人在汽車站、火車的車廂內把資料發給群眾。某些計劃生育指導站也是一個發放點。讓我感激的是第六期、第八期資料，有萬餘張是河南省婦聯婦兒工作委員會往縣級婦聯發放的，並證實已發到農民手中。有些熟人找我看病時，我也託他們把資



料帶往農村發放。還有一些報社、雜誌社發信時把資料裝入信封內替我發放。另一出路是有些報紙、雜誌發出通知，告訴群眾，請他們來信索取。我每年向群眾講衛生科普課三十至七十多場。自1996年後，我把愛滋病知識加入於講課內容中，同時在課堂上向聽眾發放「防愛資料」，每次發出幾百張至幾千張。

（二）「盡心盡力」捂蓋愛滋病疫情

愛滋病疫情早在80年代中期已浮出水面，小民不知疫情，官方盡量來捂蓋子，愛滋病成了社會的敏感問題。當時我自己也不了解賣血引發愛滋病的內幕，只是出於對愛滋病病人的同情心才涉足這一領域，從此不能自拔。誰知後來發生了許多叫人無法想像的故事……

1999年12月1日中午，鄭州市電視台請我現場播放「防愛知識」，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院（本人退休單位）院長在一下午找我四次。下午四時我去她辦公室，她態度很好，說得也很好聽。她說：「高老師，這是爲了愛護你。愛滋病不是啥好病，廳裏（指衛生廳）說了，河南至今還未發現一名愛滋病病人。」而當時，我口袋裏就有張紙條，上面有一兩個愛滋病病人的姓名與地址！還有不少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和病人，我當時尚未掌握他們確切的地址，但這絕對不等於沒有愛滋病發生和蔓延。怎麼能說河南沒有一個愛滋病病人呢？真是睜眼說瞎話。

2000年3月18日，我第一次下愛滋病村，給病人送藥，見到了不少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給他們拍了三十多張照片。回來之後，院長說「若叫別人看見這麼多愛滋病病人，那還得了！」於是把照片扣起了。迄今已有十多年了，期間我曾多次要求取回那些照片，一直未果。院方承認有照片一事，但始終未曾歸還給我。最近我又要求了一次，他們說找不到了，要我諒解。此事談不上諒解，拍照片是我的權利，她扣起我的照片就是違法。

四月二十三日我又去該愛滋村，給病人看病，並送給他們一些對症治療的藥物（如圖），同時，我發現在本單位我的外來信件經常丟失。



給村民開藥方



2000年在農村給愛滋病人看病



於是我就把信件轉到河南省文史研究館，文史館比較講統戰政策，不敢隨便扣館員的信件，以後我發現信件丟失較少。

2000年8月中旬《中國新聞周刊》對河南的愛滋病作了採訪調查，並寫出了較詳細的真實報道，許多報刊轉載。又有領導說我擅自為記者提供有關愛滋病疫情的資料，是「失密」，影響了河南形象。並勒令我以後不准再接受記者採訪。有關人員不讓我接觸記者，說：「記者抱着各種目的，胡說八道。」我不否認有些記者也是「向錢看」、不負責任、缺乏新聞道德，但大多數記者還是實事求是、富有正義感、忠於職責的。我們應該相信中國還是好人多。

2000年10月底某高校邀請我11月7日和9日去該校講課。11月7日給女生講過課後，11月9日該給男生講課了，豈料當日上午我院黨委某副書記打電話問我：「下午給外院大學生講課講什麼內容？」我說講自我保健和怎樣防止性騷擾。她說：「講愛滋病嗎？」我說：「講，講得很少。」當時中央電視台記者小王在一旁坐着，兩個多小時後，這場講課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記者小王正在拍攝的電視片也被不明不白地停下來了。2000年11月15日晚，該書記告訴我今後不要見任何記者，並說：「不能再講愛滋病。說得多了，影響了河南形象，誰還敢來河南投資呢？」

2000年11月19日晚，衛生廳某副處長悄悄地進入我家，他是來為妻子辦事，剛剛在我家中坐下；第二句話即說：「你見到衛生廳的人，不要說我來過……」我問他河南農村愛滋病的情況，副處長搖着手說：「不敢說，不敢說……」我說：「我自費印的愛滋病資料大量送給河南省防疫站請他們往下發放。」某副處長說：「王哲（防疫站副站長）敢跟你來往？」

2000年底，有人告訴我說我家的電話被監控了，我不敢相信這是事實。2001年6月3日，我託一個朋友給新蔡縣東湖村的愛滋病病人捎去些藥，同時我打了個電話告訴感染者和病人捎藥車的車號。豈料藥還未

到，地方的官員就去村裏準備把藥沒收！並審問他們藥物從哪裏來，不允許他們服用，只能上繳。最後那位病人趁夜間在大路口接車，把藥品取走，並連夜分給許多愛滋病病人服用。由此證實了我的電話確實被安全部門監控。

河南省晉升北京部級的黃姓女高官，她是原衛生廳廳長的大靠山，「血漿經濟」的幕後支持者，也是受益者。「血禍」傳播愛滋病之後，病者、死者衆多，醜聞不脛而走，知情者說她是個「血女人」，兩手沾滿了百姓的鮮血，而她是盡最大努力來捂，我記得很清楚，她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中有兩大指示：

1. 河南愛滋病，劉廳長（劉全喜）沒有責任。
2. 直接給河南中醫學院黨委打電話，叫高耀潔閉嘴！

這位女高官，愛滋病疫情屬於衛生廳的範圍，是你做組織工作的範圍嗎？賣血傳播愛滋病，難道說衛生廳廳長沒有責任嗎？我的職務是醫生，談疾病是醫生職責所在，你這位女高官有什麼資格讓我閉嘴？

2001年11月20至22日，我在河南省文史館開會，22日下午五時許才回到家，六時許，尉氏縣婦聯主任打來電話，問我是不是帶了記者到該縣邢莊鄉拍愛滋病病人及死去的人的照片。我說：「不知道。」半個小時後，省防疫站主管愛滋病工作的副站長王哲也來到我家，還是談去邢莊這件事，我說近來忙於開會，這個月沒有外出。一個小時後，公安廳李副廳長（尉氏縣省直駐村工作隊領導）和該縣呂副縣長都來了，李副廳長說：「本月21、22日兩天，《北京法制報》來了三男二女共五個記者，帶頭人叫盧廣，他們在尉氏邢莊等地拍照兩天，不但拍了病人，還拍了死人。現在要讓你把膠卷要回來。」呂副縣長又說：「愛滋病不宜多說，怕群眾害怕，怕地方產品賣不出去，更怕影響河南形象。」我說盧廣我不認識，我開玩笑地說，我開了三天會，在文史館坐了三天，即使「作案」也沒有時間。他們坐了半個小時就走了。後來聽說，他們在三個縣市戒嚴，找那幾個記者一直找到深夜四時多也沒找



到。半個月後，聽說這五個記者深夜逃回北京了。盧廣在2003年國際攝影大賽上獲得一等獎的，就是這次拍的照片。

（三）初次發現對我的跟蹤

在1999年「世界愛滋病日」前後，在各地報紙雜誌報道了有關愛滋病的信息和防愛知識後，也有人來我家索取有關愛滋病的資料和書籍。我雖然不是傳染科醫生，總是醫學界行內的人，在他們眼中我懂得什麼是愛滋病知識，所以，招來不少人問長問短，也有不少人來信索取書籍資料，我對此一律免費贈送。我認為愛滋病是不治之症，只有預防，沒有其他好辦法，免費贈送預防愛滋病資料，是救人的善舉，這是醫生的責任，但我絲毫沒有意識到愛滋病傳播內幕的複雜性。

2000年春節前後，我聽說《紐約時報》等境外媒體的記者要來採訪我，河南省當局不同意，已拒絕了兩次，同時我發現，在我居住的那個破舊的樓院周圍，有幾個人騎着摩托車，注視着我的房間。一般是三至四人，晚間也發現了他們，看來是三班輪換。開始時我想他們可能是準備抓小偷的，因為院內沒有保安，居民還經常丟東西。

一次，我上街買原子筆芯，順便買塊肥皂，回頭一看，後面跟着三輛摩托車，三個人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我對他們笑了一下，他們面無表情，我以為他們也是來買東西的。兩天之後「三八節」，我去單位開座談會，剛上公交車，發現那三輛摩托車又跟上來了，我進入醫院會議室，他們就待在醫院大門外。等我回家時，這三輛摩托車又跟回來了，這時我完全明白了：這是在跟蹤監視我啊！我沒有犯法，救治病人是屬於我的職業範圍，又沒有收費，我真不敢想像，他們監視我什麼？真是莫名其妙！

一次天氣變冷，雪花紛飛，人們都躲在房間內取暖，那幾個騎摩托車的青年人坐在摩托車上喝口瓶裝礦泉水，吃口冷饅頭。我在窗戶內烤着火看得清清楚楚。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騎摩托車的青年人大衣上落滿了雪花，口唇凍得發紫，若是他們的父母看到孩子這樣的情景，他們會

怎麼想呢？

古人云：「誰無父母，提攜報負，唯恐不壽。」這幾個青年人爲啥這麼苦，他們爲誰呢？他們看着我，我又未犯法。社會腐敗，他們爲了生存，任當權者擺佈，太可憐了。於是，我冒着雪，下樓走到那幾個青年面前說：「天太冷了，你們上樓上烤個火，吃個熱飯好嗎？」青年人笑了一下，拍拍身上的雪，開起摩托車一溜煙似的走了。我回到房間之後約十分鐘的時間，通過窗戶再看時，騎摩托車的青年人又回到了原來的雪地上。

日復一日，我和他們都熟悉了，一天我問他們：「你們爲什麼來看着我，爲了啥問題，誰叫你們來的？」一個快人快語的小青年回答說：「領導讓我們來的，怕你到處活動，怕記者和愛滋病人來……」這時，我才明白，宣傳預防愛滋病，救助病人，官員們是反對的，他們爲什麼捂蓋愛滋病疫情，自有其不可告人的情節。我更想探個水落石出，這促使我再進一步下鄉調查愛滋病疫情。

1999年末，2000年初，我家的電話多次出「毛病」，有時打不出去，還有不少人告訴我說：「給你打電話，第一次總是提示空號，再打才能撥通，說明你的電話被監控了。」我和老伴不相信，來的多是病人，我們又沒有收費，監視什麼？因此，老伴多次找人修電話，還買了新電話機，但仍未能解決問題。一連串的事情，我不得不相信了。但我不服氣，這種手段對我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因此反而增加了我預防愛滋病工作的決心，我不去救他們於心不忍，由此驚動了國內外媒體紛紛來找我採訪，特別是《紐約時報》在1999年12月份、2000年3月份、2000年6月份以正式渠道來了三次，均被當局拒絕，2000年9月21日這位記者突然來我家採訪了四個多小時，她走了之後，在10月份發表了有關報道，後來她又見到我，很高興地告訴我，爲此她獲得了克林頓採訪獎。

監控我的電話，直至2008年4月尚未停止，不信你可以試一試！打



一下響一聲、兩聲，馬上就停了，再打便可以通話，十月初香港記者許少芬來電話問我愛滋病疫情，就出現了上述現象；電腦更熱鬧，今天壞了，明天上不了網。前些時期，許少芬流產了，她給我發了個郵件，很長時間我沒有收到，我以爲她該生孩子了。現在我也習慣了，住室前後裝有四個攝像頭，來監控我這個下樓已困難的八十多歲老人，特別「胡佳案」出來之後，當局對我的監控更是有增無減，那麼，真正「顛覆國家政權」者不是他人，而是那些吃、喝、嫖、賭、貪污受賄、養情婦包二奶的髒官們……

我寫到這裏，當年我們善意提出愛滋病的危害時，當局官員若能用捂蓋子、打擊不同意見者的心思、力量來防治愛滋病，救助孤老孤兒，對民族、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豈不是做了一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大善事？我送上一首詩：

隨 筆

歌舞昇平多享受，嘆把權錢用過頭。

只知自我謀私利，哪知小民苦與愁。

平凡生命遭「血禍」，非法採血何時休。

如今愛滋再捂蓋，災難影響在日後。

第十九節 「血禍」的危害

一 都是「血漿經濟」惹的禍

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某些高級官員的授意下，河南省衛生廳內靠公章，外靠血漿，全民賣血，大興「血漿經濟」，幫農民「脫貧致富」。幾年時間內，河南省遍地興建血站，僅「合法」的官辦血站就有二百三十多家，非法血站更難計其數。官辦醫院是「血漿經濟」最積極的鼓吹者，各地醫院、保健機構門口貼着「獻血光榮」、「獻血有利於健康」等類的海報。鼓動人們賣血的某些人士這樣宣傳：「借你一點血，還給你錢。賣血對健康有好處，可以預防高血壓，可以治療高血壓」。

（一）走進尉氏縣真困難

早在多年前，我就風言風語地聽說，尉氏縣有大營、水波、邢莊等三個鄉，愛滋病人多。因為，當年搞「血漿經濟」活動時，那是個創辦「血站」的先進地區，當然愛滋病疫情是會很嚴重的。

2001年3月20日我和陝西省的兩位青年記者一起赴尉氏縣調查了解愛滋病疫情。是日下午剛抵尉氏縣邢莊鄉政府所在地，正巧遇見了鄉長，我還未來得及多問情況，鄉長開口說：「天晚了，你老年齡大，用我的車送你回鄭州吧。」待我上車後沒有回鄭州，讓司機送我們回開封，還沒有進城，便讓司機停了車，我們三人下車了。兩位記者問我怎麼辦，我說先吃飯，飯畢七時許我們住進了一間小旅店，每人每天五元錢，第二天剛黎明，我叫他二人起牀，再回尉氏縣……

3月21日大早返回尉氏縣，在中途開店村下了車，先找當地三輪車司機了解疫情，當時村口有七至八輛三輪車。我們找了一個年歲較大的司機，他叫丁改名。先給他送盒紙煙，又請他在小攤上吃飯，交上了朋



進入愛滋病疫區受到阻攔，我只能躲在每天租金五元的小店裏住宿

友之後，才問他：「你住那兒有沒有愛滋病病人？」他說：「我們這裏很多愛滋病病人。」「你拉我們去吧？」他拉着我們首先來到北緯烏村和南緯烏村，那裏只有一個衛生所，四合院青磚瓦房，所裏只有一個「醫生」，姓陳。打針、發藥的那個中年女人是他的老婆。我們走進衛生所後，女人很不友好，她說：「你們是看病的吧？不是，快出去！」她一臉不高興的樣子！

我看了一下衛生所，設備極差，器械消毒用的是「煮飯的高壓鍋」，注射器用過只換針頭，在裏間牀上、門外架子車上躺着十幾個病人，他們在輸液，其中有五個人，三男三女，他們都在三十至四十歲，具備以下症狀：

病人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倦怠乏力，並伴有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燒，不停的噁心或嘔吐、腹瀉；呼吸困難，伴有陣陣咳嗽，醫生多按「肺炎」治療；口腔潰爛，其中有位女病人從口唇至咽腔，大片小片，深淺不一的潰瘍，上敷有白色、淡黃色、黃綠色痂膜，厚薄不一，接觸出血，因疼痛她已兩天沒有進食；還有人上下肢、背部、胸部生有瘡癤或膿胞，潰爛滲出膿液，發出臭氣，有的與衣服沾在一起，從衣服表面往外滲膿樣的水……

高世正為他們寫了《十六字令》三首：

十六字令三首·慘！慘！慘！

慘！賣血致富夢未圓，應哀嘆，此狀絕人寰！

慘！骨瘦如柴已耗乾，將去也，看生靈塗炭！

慘！留下老小誰看管，血禍遍，激天怒人怨！

司機告訴我，他們都是從縣醫院回來的愛滋病病人。我想留下他們的慘影，可是這些人拒絕拍照，把我們已拍好的膠卷抽出來曝光了，他們太迷信那些「忠告」——得的這一種病，丟人！

衛生所醫生在結藥帳時一元一角的討價還價，絲毫看不出醫生的治病救人精神，把醫患變成了商人與消費的關係，令人痛心不已！

離開這裏，車往水黃村開去，在司機指引下進入該村的第一家，這一戶五口之家，女主人因病已不能起牀了，他們和一窩十八個豬娃同住一屋內，垃圾遍地，臭氣沖天，我問她，爲啥不把豬娃放在圈裏，她說：「……怕別人偷走了，這小豬到年底長大，賣來錢給我治病……」我送給她一些食品，男主人再三推辭後收下來了，並很友好地把我們送到大街上。

街西這一家姓霍，他們二十八歲的兒子，在七年前去省城賣菜遇上了車禍，右腿軋傷骨折大出血，在當地醫院手術搶救，輸血染上了愛滋病。近幾年都知道他身體不好，大家也無所謂，自從上個月他在縣裏檢查出是愛滋病，消息不脛而走，村民對他家像對瘟一樣躲躲藏藏，周圍鄰居搬走了，親戚朋友誰也不敢往霍家串門，他兩個女兒（五歲、三歲），只要出家門，就有同齡的孩子們喊打：「愛滋仔，不要臉」；他妻子下地幹活，就有小孩用彈弓子往她身上打紙球，若把紙球展開，你可以看到上面寫着「愛滋婆快滾開」。爲此，把她母女三人趕往娘家去了。這位患有愛滋病的小伙子，孤苦伶仃的躺在房間裏，每天他父親從窗戶裏給他送上一點飯，他食慾很差，有時一天也不吃飯，甚至連口水也不喝，發着燒躺在牀上等待着死神的來臨。小伙子說着哭着！

吃完午飯，我們去了曲樓村，這個行政村有六個小村，我們沒有走完。一進村見到一個小青年，他叫曹獻，因賣血染上了愛滋病，已發病一年多了，行路已有困難，他弟弟也因賣血染上了愛滋病，家有兩個孩子（五歲、七歲）都沒有病。我給他二百元錢，他流着淚收下了，以後曹獻多次來我家，每次我都送他東西或現金，一次他遇見了新華社記者，這次給他八百多元，他回去後不知為何被幹部知道了，「訓他一頓」，以後他再也不來了。

從上午八時開始至下午五時許，司機拉着我們三人去了七個村莊，出這家進那家，不是一個就是兩個愛滋病病人，有的一戶五個人全被感染了，有的已卧牀，更可憐的是因病不能下地，糧食收種也成了問題，又加上生病無錢買藥，有的人天天在廟裏神像前跪拜祈禱，有人躺下等死，有人尋短見自殺……

我很難過，爲此寫了一首詩《災難》：

災 難

一陣暴雨，一陣暴雨，隨着狂風撲來，

善良的人們快走開，快走開！

暴雨變成了黑雪，它和狂風狼狽為奸，

颳個不停，颳出災難！

善良的人們啊！你為何不知「防範」？

不！它不是暴雨、不是狂風、不是黑雪，

它是吸人血的貪污犯！

血站、疫情、掩蓋、作假！

才是真正的災難！



愛滋病人親屬在廟的神像前跪拜祈禱

（二）新蔡一行的見聞

2001年3月29日早上五時，我從鄭州站乘火車出發，上午十時到駐馬店，換乘長途汽車去新蔡縣。因中途堵車，直到晚上八時半才到新蔡縣，車上擠得要命，在車上呆了九個多小時。這麼長的時間，七旬高齡的我，連口水也喝不上，更談不上吃東西。和我一同去的兩個小青年不時跳出車窗透氣，而我卻在車廂裏受罪。到目的地下車時，我才發現我的雙腳腫得不能走路，雙腿痛得幾乎無法站立。事情過去許多天了，我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急着到愛滋村去，正在尋找機會時，遇見一個賣蘑菇的婦女，她叫王霞。我們先跟她談蘑菇的情況，後又請她吃早飯，她說她們那裏有六個村愛滋病都很嚴重，她說：「我領你去。」她領我們坐着三輪摩托車去了古呂鎮、董莊、熊莊、小高莊、閭凹等十幾個村莊，同時去了東湖村完全小學，該校彭校長介紹了學校的情況，父母病死留下的遺孤有五個，但是還很少被人知道。有一個村我去那天就埋葬了六個因愛滋病而死亡的人，在村民中他們談愛滋病就跟談感冒那樣，誰家有病人，誰家的人死了幾個，成了很普遍的現象。有一個小女



孩牽着我的手，說：「奶奶，我爸爸害那個病死了，你救救我媽媽吧，我不能沒有媽媽！」另一個七歲的女孩說：「媽媽，你把我賣了吧，賣的錢給你治病。」那裏的愛滋病疫情的慘況比文樓村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後有人想了解愛滋病疫情的情況，我都給他介紹到東湖村。並告訴他去找王霞。王霞能告訴來人當地愛滋病疫情的真實情況。但當地的幹部在監視着王霞，特別是王霞的丈夫因為這一行動還捱過打……

2004年6月，我們又一次來到東湖村，在董莊王霞的新房子裏找到了王霞。王霞領着我們去看愛滋病病人，剛走了兩家，我們拍了十幾張照片。一個耀武揚威，騎着摩托車的村幹部過來了，王霞說：「咦！情況不好你們快走！」我們馬上上車逃出村外，這時警員已經到了村口，後來聽說，王霞因為我們去了村裏還捱了罵！

我記得很清楚，在2002年的初冬，我想了解一下愛滋病疫區的人們節日上墳祭奠亡人的情況，於是，僱的士赴新蔡縣古呂鎮疫區，經過一天的奔波忙碌，得知情況令人吃驚！

出發前一天，我約定一輛的士，全天車費五百元。與兩位外省來的隨行記者約好，早上五時半出發，時間到了，記者來了，的士未來，我打電話給司機聯繫，司機說：「我馬上去，五分鐘左右車就到了。」我信以為真，我們把東西搬出去又等了半個小時，仍未見司機的蹤影，我又打電話，司機的手機關機了。七時已過，還未見的士來到，隨行的記者劉某問我說：「高教授你給司機說，咱去愛滋病疫區嗎？是否你還說當地官員不歡迎我們……」

我說：「司機是我以往治癒病人的弟弟，當然我會把外出目的如實地告訴他……」

八時十分我們在大街隨便截了一輛的士，講好全天五百元，到新蔡縣去。於是，我們帶上衣物、食品直奔疫區。司機只顧開車，什麼也不知道。十一時許抵達目的地古呂鎮，先到了墳地，因原定的士司機「耍×」，我們未能看到當地祭亡人的儀式，此時，村民們從墳地祭祀

後已返回村裏。我們開始發東西，他們排成大隊領東西，司機目不轉睛地瞪着大眼看着我們，東西很快發完了。

時過中午，一時多了，我們一行四人去吃飯，司機往鄭州家裏打電話說：「我拉了一群『神經病』去外地了，吃飯別等我。」他接着又說：「媽你想，誰不是掙錢往自己腰包裝，東西往自己家裏拿。今天拉的這幾個『神經病』，我親眼看着他們拿着錢、衣物、食品送給那些從來不認識而又有病的窮人……」

午飯後，我們又到了幾戶最窮困的人家，一戶父母雙亡，留下兩個孤兒沒有飯吃，上月我給他寄去的錢也沒有收到，我們又開車去郵局，因沒有帶匯款依據，沒法檢查，就無所獲而歸，只好給孤兒二百元，讓他暫時買食物充飢……

同時，我們再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我們走進村頭一對八十多歲的老夫妻家裏，他的四個兒子全死了，她一直在哭，並沒完沒了地說，「因窮賣血，賣血染病，更窮更窮」，老人一生就是在窮困淚水中度過的……

他面對的就是墳墓，從他的窗戶往外看，一望無際的墳塚，我走出來折了一個松枝，插在了老人兒子的新墳上，並留有一首詩：

心懷悲傷赴墳塋，滿地泥濘真難行。

筆者手中無禮物，插個松枝表心情。

夜幕降臨了大地，我們在老婦泣涕聲中離開了這個悲傷的人家。深夜十時半才回到鄭州，當我給司機付車費時，他堅決收四百五十元，他說：「今天我見到你們的所作所爲，是我活三十多年見過的第一次，中國人像你們這樣的太少了，留下五十元錢作爲我們中午的飯費。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的『慈善行爲』，我更不會忘記愛滋病病人的悲慘景象……」司機扔下五十元（一張鈔票）開着車風風火火走了。這兩位司機的行爲相比，不知讀者得知之後有何感想！



二 愛滋病病人的求生欲望

（一）柘城愛滋病遠近聞名

90年代中期，興起了「血漿經濟」，柘城縣雙廟村，有半數村民曾經賣血，這裏整齊的青磚瓦房，就是那時候用賣血的錢建起來的，你看有這種瓦房的住戶，就是賣過血的家庭，那裏就有愛滋病病人。當年這些賣血人，全是青壯年，現在多數人患有愛滋病，有的人已經死了；有的人還不敢去檢查，為什麼呢？怕檢查出來愛滋病被他人歧視……

有一個面容憔悴的中年漢子告訴我說：「當年爲了致富，爲了蓋房，每天去賣一次血，有機會時，我一天會賣兩至三次血，賣了多少次血，我自己也記不清楚，有時抽得我下不了牀，有幾次他們從牀上把我抬了下來……」他又說：「若把我賣的血，撒在大路上，五里地的土路，會全變成紅色的……當時都說：『賣血對健康有好處，不得高血壓』，現在染上了愛滋病，比高血壓嚴重得多！什麼活兒也幹不成，只有等死！」他說着痛苦地用衣袖拭去臉上的眼淚。他指着青磚瓦房痛恨的說：「我死了，孩子也不能吃它，真遭罪……」從柘城回來，天氣晚了，我坐在長途汽車上睡着了，凍醒後我作了一首詩：

誰之罪

寒風呼呼的吹，瑞雪紛紛的飛。

飢寒交迫的人兒啊！蜷曲在青磚房內，

他依靠着誰？誰知道？誰曉得？

誰之罪？

2003年12月4日，我隨記者又一次來到雙廟村，一進村口大門發現了兩個小女孩，大的八歲，小的六歲，在零下二度的天氣，她站在牆角裏發抖，我開始注意她，發現她穿了件成人棉襖，下身穿得件單褲，小

腿、小腳凍得青紫……

走進前我問她：「下着小雪，天這麼冷，爲啥不回家？你媽呢？」

兩個小女孩，一句話不說，四隻眼睛流淚！旁邊的一位婦女說：「這是姊妹倆，在前年，她們爸爸媽媽害愛滋病全死了。」幸虧我去時帶有大家捐贈的衣物，便請那位婦女把她倆帶回屋內，打開包裹，找出兩件毛褲給小女孩穿上，大女孩那件還可以，小女孩那件有些大，挽起雙褲腿，再縫上幾針，穿上總比凍着好吧！

走進了村小學校，正逢學生放學，許多小孩高高興興走了，在門外牆角裏又遇見兩姊妹在撓頭髮，我翻開她的頭髮一看，黑色的虱子亂爬，頭髮下面全是白色的虱卵，不計其數……

我和她搭訕了幾句，知道她倆一個四歲半，一個近七歲，她們倆跟我走了我問她：「你倆需要什麼？」

小女孩問：「你家有饅嗎？」

我說：「有，很多饅……」

大女孩說：「啥饅？」小女孩插話問：「有包子嗎？」

我說：「你想吃什麼有什麼。」

我帶她倆走進了飯店吃飯、包子和燴麵。在吃飯時，我們在談話中才知道，女孩的父母因愛滋病死去一年多了，她倆隨八十二歲的祖母生活。

這次柘城縣行，未敢多逗留，第二天中午回鄭州了，但此次的見聞，在我腦海裏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象——孩子們真的太可憐了！

2002年底，愛滋病病毒攜帶者朱進忠，在家鄉辦了個「關愛之家」（孤兒院），收養了愛滋單孤（父母死亡一人）、雙孤（父母全死亡）五十多個孩子，從山東請來了位吳老師，志願爲孩子教課，吳老師對學生很好。在此同時，救助愛滋孤兒的志願者李丹等在商丘市也成立了「東珍孤兒學校」。這兩個民間組織，收養的多是柘城地區的愛滋孤兒，當時，去的記者很多，新聞媒體播出後，不少人爲他們捐款、捐



物，中央電視台一次為朱進忠的「關愛之家」捐款一百萬元人民幣，為此惹了禍，這兩個民間愛滋孤兒機構遭到了「封殺」。

2003年10月20日，中央電視台十台，「公益行動欄目」記者武卿去雙廟村採訪，遭到了當地警方的阻止，將武卿等二人用繩捆綁七個半小時，押送回北京。武卿女士勇敢而又不辱使命，三天後她又回到了柘城縣，經過兩天的拍攝，題為「愛滋孤兒跟我回家」的一幕故事完成了，在2003年愛滋病病日之際向全國播出。

再說，朱進忠、李丹這兩個救助愛滋孤兒的民間組織，雖然有許多人支持和鼓勵，但遭受了很多阻力和壓力，最後仍未能免去它停辦的命運。

朱進忠的「關愛之家」停辦了，眾說紛紜……有褒有貶。我始終沒有見過朱進忠本人，只是從電話上和他說過話，電視上看見過他的形象。他三十七歲，看上去只像一個三十歲的小伙子，很有一股幹勁！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和杜聰先生、高燕寧教授前往看望他，一進村便有人認出了我，我知道在多處縣鄉有懸賞：「誰發現高耀潔來了，快報告。抓住她獎你五百元。」我們剛坐在朱進忠家的凳子上，朱不在家，杜先生想等一下，我看氣氛不對頭，便說：「我們快走！」車剛行至村口，鄉里來抓我們的人已經到了。不過即使被抓住了他們也不打我，只是趕走我，這次我走了，沒有被他們抓住，報告者未能獲獎！

2005年元月11日，我聽說：「朱進忠愛滋病發作且病情很嚴重，經搶救無效，於2005年元月13日下午七時許去世。」我這一生永遠不會看到朱進忠了，他的妻子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今後兩個孩子怎麼辦呢？另外他還收養了八個孩子……一切一切，均在人們的掛念中。朱進忠你永久的安息吧！

最後送給朱進忠一首詩：

你太累

風瀟瀟的吹，雨陣陣的飛。

你走過的人生道路，

坎坷，短暫而又很累！很累！

夜茫茫！

你在人生孤途無暇睡，

天蒼蒼，

你在疾病的折磨中難寐，

你，你啊！

為了愛滋孤兒，你身心憔悴，

為了救助他人，你操勞無悔，

你寫下歷史篇章，讓人如痴如醉！

你太累，安息吧，你太累！

（二）事發鄆陵縣

2000年7月的一天，老賈來到了我家。他長得憨厚、壯實，是農村小學教員，有一定的文化。一進門他就很緊張地說：「我妻子因子宮肌瘤出血，於1996年8月8日在縣中醫院行子宮切除術，術中輸血四百毫升，感染了愛滋病，現在病情很重。我來問問，她是否還有救。」我讓他坐下，他不坐，只是站在中廳裏，從衣兜裏取出他本人的HIV抗體化驗單，結果呈「陰性」，證明他未感染愛滋病。

我送他一些資料，並告訴他要注意的事項，要他注意醫騙子，慎防上當。老賈很快離去了，臨走時留下了家庭地址和電話號碼。

2000年9月12日，我專程去了老賈的家。老賈的妻子玉貞躺在牀上，她五十多歲，面色黑青，極度憔悴，說話少氣無力。玉貞告訴我說：「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發燒，吃退燒藥根本無效。每天腹瀉五至十多次，吃什麼拉什麼，經常噁心，進食量很少。」她只說了這幾句話就已



氣喘吁吁！我給她診斷之後，送給她一些對症治療的藥物，有退燒片、黃連素、藿香正氣丸等藥品。

她再三問我：「大夫我這病會死吧？孩子還小，沒有我了，他們怎麼辦呢？」

走出院門的時候，老賈送我，當我告訴他玉貞害的是傳染病，要注意隔離，分開睡覺時，老賈說：「我們結婚二十多年了，一直這樣睡覺。現在她有病了，我不能離開她。」接着當我告訴他怎樣正確使用避孕套時，老賈不相信地說：「那玩藝不管用……」看來老賈聽不進去。與他握手告別時，我再三叮囑他有事情給我打電話。

二十多天後，玉貞撒手西去，老賈告訴我，手術所在醫院賠償他兩萬元。一年後我又見到老賈，他很健康，他和三個孩子又化驗了三次HIV抗體，結果均為「陰性」。這說明他們未感染愛滋病。

2002年春節前夕，一個姓張的醫學碩士從南京過來，回鄆陵老家過春節，我請他代我去看一下老賈。我們很久不見了，不知道這麼長時間以來，他和孩子們的生活是怎樣度過的？

春節過後，張碩士告訴我，老賈全家人的身體都很好！

2004年2月10日，我請人僱車拉衣物赴疫區，車快進入愛滋病疫區時，在大路上遇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大娘，她領着六個小孩，四男二女，七口人的衣服也很單薄，其中有個女孩穿着塑料涼鞋。老人說：「我今年已經六十九歲。老伴、四個兒子、三個媳婦在四年的時間內先後患愛滋病死去，老二媳婦帶着愛滋病和兩個孩子改嫁他鄉。這六個孩子，老大家十二歲的女孩，老三家三個十一歲、九歲、七歲的男孩，老四家八歲的男孩和有愛滋病的五歲小女孩，跟我在一起生活。我們在村子裏實在活不下去了，只好出來要飯。」送衣物的女士給每一個小孩一件棉衣，一條毛褲或絨褲，給老大娘一件大棉襖。老大娘抱着衣服失聲大哭：「俺是出來討飯的，別人知道俺家有人害愛滋病死了，有東西也不給俺。他們說：『好人不害愛滋病。』剛才有人說，政府應當把愛滋

病病人關起來或者全部殺死……」老大娘嗚咽着再也說不下去了。

十幾年來我們不能正視愛滋領域的真實情況。十幾年後的今天，許多病人死去，感染者也開始發病，大量的愛滋遺屬出現了。如果我們還要持續掩耳盜鈴的遊戲，愛滋病將引發什麼樣的問題，那是無法想像的。

有詩慨歎：

悲傷的愛滋病疫情

數不清的新墳舊塚，顯示出另一世界的悲情！

仰視高山，俯視深淵，誰知多少愛滋冤骨在此長眠！

繁星般的「鬼火」，四處閃閃爍爍的蕩漾！

不，不是，這是磷火，是人體最後的光！

當太陽將要升起的時候，鳥兒在悲鳴，烏鴉在哭叫！

它會驚醒長眠的沉冤，或會揭出其他「鮮為人知」的悲傷！



第二十節 目睹愛滋病禍患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說：「愛滋病才是真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沒錯，這個大規模殺傷性的武器看不到硝煙，它很隱蔽，有不少人還沒有意識到它。也就是說，它是一種鮮為人知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帶來的危害比二戰還嚴重。有的愛滋病病人因無助而走向自殺。

一 無奈患者自殺知多少

（一）無奈走向自殺

2002年2月15日我接到余福（化名）來信，要求我為他聯繫「免費」藥。2月25日我打電話，找余福時，他已離開人世一周了。在電話筒的那一側傳來了家人的哭聲，我非常非常難過，余家的生活太困難了。我想把余家兩個孩子讓人領養了，余妻不肯，為此讓人流淚。

2001年10月2日，我去了一個愛滋村，該村在當年搞血漿經濟致富，現在患愛滋病遠近聞名，我訪問了十多個愛滋病病人的家庭。該村十二歲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學，女孩子輟學後從事家務勞動，服侍着患有愛滋病的親人，男孩子多數外出打工，十五六歲的孩子在外地幹成人的苦力活，甚至下煤窖做苦工。我到了一個姓余的家中，他十四歲的男孩在某縣建築工場掂泥兜，每天累死累活只掙十元錢，拿回五元給他患愛滋病的爸爸買藥吃，孩子每天只有五元錢，在超負荷的勞動中，不知他怎樣生活……

2001年中秋節那天我見到了余福。我帶了一些藥品和食物去某某村裏看望愛滋病病人，當我走進一個破敗不堪的小院裏，一進屋見到余福時，他已經病入膏肓了。陪伴着他的是一隻小花貓蜷縮在門口，可憐地喵、喵、喵地叫着，因那裏的光線太暗，我險些踩到牠，我把牠抱起來放到灶火台上。我很懷疑這個家裏還有什麼食物可以餵養牠，但牠跟主

人還是很親密。

余福躺在一張木板搭成的牀上，牀的四條腿都綁着四根樹枝，掛着一頂不灰不白，滿是塵土的蚊帳，蚊帳上有窟窿，還有補丁，綁在牀腿上的樹枝又多了一個用途，就是用來掛輸液的瓶子。余福的臉上、身上起滿了紅疹，有些部位大片皮膚潰爛、化膿，那是已被感染的疱疹，也是愛滋病人晚期的表現，他已活不了多久了。

其實，生活對於余福來說，剩下的只有痛苦了。爲了他的病，本來靠賣血漸漸富裕起來的生活，又變得家徒四壁了，現在家裏最多的東西是堆在牆邊的空葡萄糖水瓶。兩個孩子因無錢交學費早已輟學，那個年僅十四歲的孩子到外邊給人家背沙子，掙幾塊錢給父親買藥。

孩子的母親看起來還好，她說自己也賣過血，可不敢去檢查，反正是沒救的，過一天算一天吧！能等到孩子長大些就好了，不然也沒有什麼親戚，就怕自己也死了，孩子可怎辦？話沒說完，她就說不下去了，用骯髒的衣袖抹眼淚。她說這個家連買鹽的錢都沒有了。

余福在高燒、疼痛中過着他已爲數不多的日子，家裏已沒有錢給他看病了，其實也不是治癒愛滋病的藥，只是針對症狀給予緩解的藥物。我們給他留下了退燒藥、治拉肚子的藥，還有其他緩解他痛苦的藥。並一遍遍地告訴他妻子各種藥物的用法。可憐的妻子一邊哭一邊抹淚，念叨着說：「一定還有人來看我們，有人肯定會到我們家！」和我所見到的病人或家屬不一樣的是，儘管如此貧困，余福和他的妻子堅持不肯收我給他的錢，他妻子哭着推讓着，說：「肯來看看我們就行，錢是不能要的。」

在我從其他人家出來準備回鄭州時，我又見到了余福的妻子和他的大男孩兒，這孩子剛從工地回來，他瘦弱得像他家裏的那隻小花貓。他們真誠地挽留我在他家吃飯，爲了趕路，我們說不去了，他們依依不捨地跟在我身後很遠、很遠。在灰濛濛的天空下，他們無助的身影讓我流下了眼淚。



回到鄭州以後，給她寄去四百元錢，他九歲的小兒子復學了，這時得知余福的頸部、背部已大面積潰爛，已經不能起牀。這時，余妻化驗愛滋病病毒抗體也是「陽性」，她是一個愛滋病病毒的攜帶者。

一年以後，我又一次去看望余家，余家的鄰居告訴我說他們夫婦因病重，無奈服農藥自殺了。

我留下一首詩：

問蒼天

傷傷青壯年，賣血惹災難。

處處聞鬼哭，陰風惡雨寒。

高堂無人養，幼兒真可憐。

哀哉人為患，誰來問蒼天？



愛滋病病人須長期依靠吃藥治療，經濟負擔、群眾壓力都使他們的境況淒涼

（二）歧視愛滋的惡果

李保國夫婦面對徒空四壁、睜着大眼，看着眼前失去父母、兩個幼小的孫子和孫女，哭乾了眼淚。因為兒子李志星殺了八個人，他自己也投井自殺了，李保國背負了殺人犯家屬的惡名。李志星為什麼殺這麼多人呢？其原因是：他因賣血全家都感染上了愛滋病病毒，妻子因愛滋病死去，兩個孩子都在生病，全村人都歧視、敵視、冷落他們，逼得他做出這種過激的行爲，禍及無辜！

李志星家境貧窮，爲了娶媳婦，拼湊「彩禮」，開始賣血。好不容易娶了個媳婦，媳婦不久又走了。爲了再娶媳婦，他繼續去賣血，在血站認識了一個姑娘，花了不少錢，和這位姑娘結了婚，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但仍然靠賣血來維持生計。他和鄰里從未發生過糾紛，與大家和睦相處，日子一度過得還不錯。

2001年秋，李妻開始生病，四處求醫，久治不癒，花了不少錢，家中積蓄也花完了。2002年4月她在縣醫院檢查確診爲愛滋病，住院治療幾個月無效，出院在家用偏方單方，半年後她死了。李妻在生病期間，人們都不敢接近她，說她害的是醜病、髒病，連娘家人誰也不敢來看她，直至她死亡也沒有一個人在李家露過面……

同時，李志星和他兩個孩子也被確診爲愛滋病，這個消息傳出之後，李家的左鄰右舍怕極了，他們怕「空氣」和「風」傳來愛滋病病毒，使自己染上愛滋病，周圍四家鄰居搬走了三家。他房屋周圍種的菜誰也不敢收回家吃，甚至走路也避開李家的大門；他門口的一口井再也沒人敢去挑水了。村裏的小孩見了李家的孩子，要麼跑開，要麼圍着打他，還會大喊大叫「愛滋病快滾開！」農村鄰居間互相借用東西是很平常的事，特別是日用品、農具之類的物件，自從知道李志星得了愛滋病後，無論他借什麼東西，鄰居們也不肯借給他用。有一次，他用手摸了一下鄰居用柳條編的筐，鄰居就把他摸的柳筐燒掉了。

李保國夫婦也因此和兒子媳婦分開另過。李母說：「自從知道兒



子、兒媳害了愛滋病之後，就和他們分開了家，並且再也沒有踏入志星家門一步，也不再讓孫子和孫女來自己家玩耍。要為兒子家準備一些飯菜時，還是在自己家中做好，再從自己家飯盆倒進兒子家的飯盆，送菜送飯時，也不進兒子家的屋門。」

李的兒子該上學了，為入學的事情李志星跑了很久，開學了，他把兒子送去，兒子看見小朋友很高興，不到半天老師說：「你回去吧，孩子有愛滋病，不能接收……」李志星不服氣，兒子活蹦亂跳，能吃能喝，不上學不行……他找到了縣裏的律師，律師又給他找了教育局，校長說：「其他學生知道李孩有愛滋病，他們紛紛提出如果讓李孩進來讀書，他們就要轉學！」李孩哭着離開學校回家了。

李志星一氣之下把兩個孩子送到縣裏愛滋病檢查中心，之後該中心把孩子送到市政府，市政府又將孩子送到縣民政局，民政局又把孩子送到鄉政府，鄉政府又輾轉把孩子送回李志星的家，折騰了兩天多，李志星看見孩子回來以後，抱着兩個孩子哭了一天一夜……

因為怕愛滋病，村裏人不斷向村委會、鄉政府反映，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把李志星的家隔離起來，李志星忍無可忍，幾次站在村子中央破口大罵，罵「血頭」、「血站」害人……！這樣鬧了一年多，也沒有引起當地政府幹部任何人的注意和重視，更談不上制止李的行為或對李家給予照顧。這樣以來，本性平和、勤快的李志星地裏什麼活也不幹，兩個孩子也不管，脾氣變得很不正常，愈來愈暴躁，張口罵人，抬手打人，有時他深夜站在亡妻墳墓前大哭大罵。在這種情緒的激化下，2003年4月21日早晨，「血案」發生了，李首先殺了他鄰居的妻子和兒子，他走着殺着，殺傷九人，死亡八人。當村民們出來圍堵追趕他時，大夥兒問他為什麼要殺這麼多人，連孩子也不放過，李大喊大叫的說：「誰讓你們欺負我家，瞧不起俺，你的孩子打我的孩子！」李拿着刀，橫眉怒目的喊着說：「誰敢靠近我，我就殺了誰！」大夥兒愈聚愈多，李志星愈發瘋狂，又砍傷幾人，最後一頭栽入了深水井裏，自盡了。

不少人說，李志星不是天生的殺人狂，是給歧視愛滋病病人逼出來的，是政府這種無所作爲導致李志星的心理變態，最終報復社會，殃及鄰里的無辜者。

以上事件的發生和經過，是歧視、敵視愛滋病病人造成的惡果，現在多年過去了，李家的老人與幼兒如何生活呢？可用「貧病交集」四個字來形容，大家會問此類事件是第一例嗎？是最後一例嗎？

（三）可憐的孩子不知道媽媽上吊自殺

我走過無數個愛滋病村，耳聞目睹的人間慘劇實在太多了。但其中有兩件事，讓我永不會忘記。每次有記者來問我「在愛滋病村遇到的印象最深的事情」，我就會回想起這兩件事，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要流下淚來。

2001年9月30日，我到周口地區的農村做調查，返回鄭州的途中，有人告訴我某村的愛滋病病人特別多。我們就臨時去了該村。

剛進村，我就聽到一個小孩子用奶聲奶氣的聲音在叫：「下來！下來！」聲音已經有點嘶啞了。我和陪着我下鄉做調查的兩個記者衝着這個聲音走過去，找到一個破爛不堪的小院。

當我們推開了小院半掩的大門，就聽到北屋裏有聲音，敲門喊：「有人嗎？」出來一條骨瘦如柴的大黑狗，「汪汪汪」地叫了幾聲，轉回身就往屋裏跑。我們跟着黑狗走進屋裏，驚訝地看到房樑上拴了根草繩，一個年輕婦女懸樑自盡了！人死了以後挺在那裏了，醫學上稱之為「屍僵」，即人死後約一至三小時後，肌肉出現強硬收縮，全身包括四肢等僵硬無法彎曲，約經一到兩天會逐漸消失。

一個兩歲多的男孩子滿臉都是鼻涕眼淚，餓得沒東西吃，正一邊哭喊，一邊在啃他媽媽的腳後跟。到現在我想起這件事都想哭。當天中午我們幾個人都沒吃飯，因為這個景象實在太淒慘了！簡直不敢相信我們的眼睛！

後來我們才知道死者與丈夫一起賣血，那時他倆才十六歲，後來都



染上了愛滋病。孩子出生後，因生病在醫院抽血化驗，發現也感染了愛滋病。半年前男人死了，女人貧病交集，親戚鄰居都不敢和她來往，連她的親弟弟也不敢上門，她再也活不下去了，就走上了自盡的道路。那個兩歲多的男孩誰也不敢收留，聽說一個月後也死了。

愛滋病感染者不堪忍受貧病交加的痛苦，自殺者大有人在，如李治安割腕自殺、黃清芝服毒自殺、張珍妮上吊自殺，他們都是無法忍受愛滋病的折磨才走上了這條路。某村一個月內有五個愛滋病病人自殺身亡，而自殺失敗被救活的有二十多人。

二 愛滋家屬的無助

被愛滋病奪去生命的一些青壯年，他們留下的不僅有子女、配偶，還有年邁的父母。這些家屬未感染愛滋病病毒。他們沒有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還會受到社會的歧視，真是雪上加霜，度日如年。

（一）老年喪子的苦與憂

2000年10月31日，我們一行三人赴程老村，該村是愛滋病重災區，那裏的趙醫生，走村串戶，多年來為愛滋病病人送藥、打針、輸液，每天置身於愛滋病病人身邊，為他們盡心盡力地服務。這天上午我們找到趙醫生詢問愛滋病病人的情況時，他一連說出幾十人的姓名，其中已死去的有十幾人，他還指着對面的小理髮屋說：「理髮店的老闆才三十二歲，前天才死，門口流淚的老太太是他媽。」

趙醫生熱情地騎着摩托車，帶我去村裏看看。翻過幾道溝和水坑，半小時後，我們到了一戶老夫妻家。兩位老人均已八十多歲了，身體還好，老太太正在院內掃地。老漢熱情地把我們迎進院裏，指着三間瓦房說：「這房是娃們（兒子們）賣血掙錢蓋的，他倆走了（死了），我倆守着這座房和他們的兩個孩子過日子，俺倆年紀太大了，不能下地幹活，全憑親戚們救濟糧食吃。」老漢還指着趙醫生告訴我：「娃有病時吃藥欠診所的錢，一年多了也沒有還上。」那裏的愛滋病病人太多了，

鄉親們一直欠帳，診所也支撐不住要關門了，這個情況趙醫生曾向我談起過。看着兩位老人淚眼婆娑，趙醫生向我解釋：「這兩位老人怕咱們是來要帳的……」

說話間，蹦蹦跳跳地進來了兩個蓬頭垢面的小孩，有八九歲的樣子。他們一進門就嚷着要吃饅。老太太流着淚說：「今天沒有饅，鍋裏只有黃糊糊了（玉米粥）。」兩個孩子也不說什麼，掂起碗來爭着盛碗粥，蹲在牆跟，大口大口地吃，沒有菜，更別說肉了。我們看了非常難過，準備告辭。我拿出兩張五十元的人民幣遞給孩子。老太太說：「天冷了，孩子還沒有棉襖，這下可好了……」這時我才注意到，兩個孩子還光着小腳……

老漢送我們出院門時說：「俺倆年齡太大了，能活幾天呢？孩子的姑姑、叔叔都因愛滋病死去了。他們有個姨，家裏孩子多，生活也不好，她也害有那個病（愛滋病）。」走了很遠，我內心還很難平靜，他們太難過了。

趙醫生說這兩位老人和孩子都去市裏防疫站化驗過 HIV 抗體，都是「陰性」，他們未感染愛滋病。

吃過午飯後，我們又去了張坡樓，見到了張庭豪和他的奶奶。小庭豪才四歲，父親因愛滋病已死一年多了，母親改嫁不知去向。小庭豪六十八歲的奶奶帶着他生活，奶奶一對小腳，不能下田間勞動，只能靠他姑姑送些糧食生活。周圍的人們誰見誰躲，怕他帶有 HIV 病毒，有些人甚至連話也不敢對他說！我問庭豪的情況，村醫告訴我說他們檢查過了，他們的 HIV 抗體都呈「陰性」，他們沒有感染愛滋病。

午後我們又走進另一村莊時，路上遇到兩個小孩。相距十幾米小孩就和我們招手，我問，這孩子為什麼這樣好客，一個愛滋病病毒攜帶者說：「他們父母都因愛滋病死了。男孩十歲，女孩六歲，現在跟着他們六十五歲的奶奶生活，因為他們知道外來人會援助他們，所以他們特別歡迎外來的陌生人。」



這些老人們已近垂暮之年，讓他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在他們離世之後，孫子、孫女們的生活由誰來照顧，教育問題又由誰來解決？

張老太今年七十七歲，有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老伴因病早逝，目前帶着七歲的孫女古真、六歲的孫子古揚。張老太的四個女兒都賣過血，其中二女兒、三女兒已經因染愛滋病身亡，大女兒和小女兒現在病中。兒子古方和兒媳會明從十六歲就賣血，兒子染上愛滋病，害了一年多把積蓄也花光了，他於2001年冬天病死，兒媳也感染了愛滋病病毒，她難熬苦日子，丈夫死後不到一百天，她拋下一雙兒女改嫁走了。

張老太多病纏身，走起路來顫顫的，村裏分的田已經拋荒兩年，住的還是土坯房，張老太說，當年兒女賣血錢都買糧食吃了、買衣服穿了，還有就是為兒子娶了個媳婦，根本蓋不起房子。

兩個孩子在本村小學讀書，學校學費減免政策取消後，他們就失學在家，每天跟着奶奶一起撿垃圾。「南京愛德基金農村助養計劃」每季資助張家一百一十二元五角。2003年春節前夕，村裏可憐祖孫三人，給古家扯上電線，免費使用電燈。

在張老太家中看到，沒有什麼值錢的家當，全部家當加起來也賣不了五百塊錢，燒飯用的是玉米秆，鍋內是玉米粥，連一點油也見不到，更談不上吃肉了。這是春節剛過十天的情景。

張老太哭着說：「孫女小真模樣長得周正，人也聰明，上學期語文考了九十五分，數學得了滿分；給她化驗過HIV抗體『陰性』，說明她沒有染上愛滋病，我就盼着好心人領養她！」

另一位張老太今年六十八歲，她的老伴因災害餓死了，貧困的日子一直伴隨着她的家，因貧窮他們夢想致富，她的五個兒子和四個媳婦都賣過血，老五因家貧沒有娶上老婆。她跟着老五一塊過日子，現在老五也有病不能勞動，娘倆的生活過得很拮据。

2001年8月，老四侯文在山西煤礦打工時一條腿被砸斷了，路都走不成，生活非常困難；老四媳婦在山西煤礦因愛滋病發作，無錢醫治，

她想回到老家方便些，未料，乘火車回來時，她死在回家的火車上。他們有一女一兒，女兒侯娟十歲，在本村小學上三年級，兒子侯濤五歲在學前班讀書，因繳不起學費，今年都輟學了；前幾天領他倆檢查HIV抗體，結果侯濤是「陽性」，說明侯濤已感染了愛滋病病毒，這幾天他又發燒了！

老三夫婦兩個均因患愛滋病，於2001年底和2002年初先後病死。他們有兩個女兒，分別為十二歲、十歲。他們死後，房子也快塌了，不敢住人，兩個女孩被她姥姥收養了，因姥姥家境貧窮繳不起學費，都輟學在家。

二兒患有愛滋病，媳婦因愛滋病已死兩年了，他有三個兒子分別為十五歲、十四歲、十二歲，都失學，為了生計，孩子們在河灘裏挖沙賣錢。

大兒子、大媳婦都患有愛滋病，天天求醫吃藥，錢也花光了，他們有四個孩子，三個女兒分別為十六歲、十四歲、十一歲，全輟學在家，小兒子四歲也患有愛滋病。

在2003年春節前我來到了張家，他家冷冰冰的，沒有存糧，也沒有取暖的煤，只有幾塊巴掌大的紅薯，鍋台上、飯碗裏找不到一滴油，更不說肉沫了。張老太幾近哭泣地反復的說：「誰能給上級說說，能不能照顧一下我們家的這幾個孩子上學讀書？將來沒有文化怎麼辦？他們沒文化這一生永遠受窮啊！」

逝者已逝，留下的老人們如何度過他們的晚年，孩子們又如何面對他們未來的人生，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面對現狀，他們都很無奈，只會痛哭。有人問現今有多少這樣的老人，我只能實話實說：太多了，不計其數。他們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弱勢群體，人們啊！關心他們，伸出援助之手吧！

有詩為證：



深夜的孤老

風瀟瀟兮夜無聲，孤老茅屋度深更。

愛滋入侵誰人知，相對泣涕等天明。

（二）她失去了丈夫

河南愛滋病的傳播集中在貧困鄉村，農民不知道如何預防愛滋病，患病後又無力醫治，直到死亡臨近，還不知自己究竟患的是什麼病。

在我踏進某些小村之前，只知道這裏是愛滋病肆虐的村莊，並不清楚其受害的程度。進村之後，目睹一個個病人和受害的家庭，才知道疫情比我估計的要嚴重得多。每遇到一個村民，我都會自然地問：你賣過血嗎？我很想聽他回答說沒有，令人失望的是，從二十多歲到六十多歲，無論男女，幾乎都會回答：「賣過。」令我尤為震驚的是，賣血次數少則幾十次，多則千次以上，完全超乎我的想像。有的人上世紀80年代初就走上了賣血路，賣血史達十多年之久。

河南愛滋病高發區的患者，年齡集中於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他們均已成家，並普遍有二至四個孩子，有的患上愛滋病之後仍未停止生育。這些人中以男性為多，1995年以來，隨着他們的相繼病逝，愛滋寡婦、愛滋孤兒問題開始浮出水面。

丈夫因愛滋病死亡，自身沒有感染愛滋病病毒的婦女，稱為「愛滋寡婦」。這些寡婦有年輕的、年老的，有多年寡居、新近寡居，還有將要寡居的，不管她們屬於哪種情況，處境都非常淒涼！

2001年正月，杞縣一名賣血農民徐保玉，「血頭」以找工作為名，把他騙到開封市一個養雞房裏，強迫他賣血，八天抽了一萬七千毫升血，體內幾乎沒了蛋白，渾身浮腫、發燒。還沒檢查是什麼病，三天後就死了。許保玉的兒子叫黑蛋，剛剛兩歲。2002年3月20日，我和兩名記者去杞縣看望黑蛋母子，他大娘緊張地站在房頂上監視——怕我們是來給黑蛋娘「說媒」的人。

黑蛋大娘對陌生人來訪如此緊張，事出有因。在愛滋病高發區，丈夫患愛滋病死亡後，妻子往往迅速改嫁，速度最快的僅有三天。對於這些未亡人來說，家裏死了男人，不改嫁就難以維持生計，即使有的本身亦為愛滋病患者或病毒攜帶者，也會隱瞞病情。然而，由於女人改嫁後，往往把子女扔給爺爺、奶奶或叔叔、大伯，給後者新增格外沉重的負擔。

2000年10月的一天，我在項城見到了金某。她才三十二歲，長得很健壯，不善說話，正在忙活家務。她有三個孩子，兩男一女，長子十一歲，小女兒才三歲，是丈夫田某感染愛滋病後才出生的。她的丈夫1996年中秋節在市集上賣蔬菜時被一輛大卡車壓斷左腿，在項城縣醫院手術截肢，因出血過多，輸了三個人的血。2000年春開始發病，全身乏力、發燒、厭食，當時以為是患了感冒，就在當地治療，愈治病情愈重。直至2001年8月在鄭州河醫大一附院檢查HIV抗體呈「陽性」時，才知道是愛滋病。這對田家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他們萬念俱灰。醫生又讓金某和老人、孩子等八人檢查HIV抗體，都呈「陰性」，說明他們未感染愛滋病。

從此金某陪着丈夫，每日不離左右，她把孩子交給了娘家的兩位老人，她的父母說：「孩子在俺這讀書，不受欺負。在他們村上學，其他小孩罵他是愛滋病……」我問金某他們夫妻過性生活時有否用避孕套防護，她說：「我們一直不知道他害得啥病，農村人誰懂得防護呢？自從確認是那個病以後，醫生教我用避孕套。他病得這麼嚴重，已沒有性生活能力，我也不想活了，我很想和小田一起死……」她停了一下又說：「兩家都有六十多歲的老人，還有三個孩子，俺倆一塊走了對不起他們，這樣我才支撐着活下去。」一個月後，我聽說小田死了。金某全家又化驗了兩次HIV抗體，都是「陰性」。金某沒有改嫁，有位知情人告訴我：「這些愛滋寡婦，不是她不想嫁人，是害怕改嫁之後，受別人的歧視和虐待。」



金某過得怎麼樣呢？請看她給我的來信：

……我認為田某的愛滋病就是在項城醫院輸血所致。我是農村婦女，文化不高又不懂法。再加上我家無錢打官司，請求上級領導、新聞媒體伸出援助之手，幫幫我討回公道，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現在我的兩個兒子在初中上學，大兒子今年考高中。我的孩子成績優良，成績在班前幾名，但我愁腸百結，我哪裏有能力供孩子上學。小女兒又到了上學年齡，更使我愁上加愁。請您幫我，給我一點生活的希望吧！

金某

2004年4月10日

另有華某，兒子十歲，丈夫因賣血建房染上愛滋病，1998年12月死亡。1999年春節後她帶着孩子又嫁人了。過門不久，男方知道她前夫死於愛滋病，便對她百般虐待，把她關在屋裏不讓她外出，說她丟人現眼，稍有不順，便拳打腳踢，甚至用煙頭燒她……

一年半之後，華某生了個女孩。這時她後夫開始出現發燒、腹瀉、咳嗽等症狀，他說是華某傳染的，其實他在1995年左右也曾多次賣血。2000年秋，他被診斷為愛滋病，不久他死了。華某生活很困難，她帶着兩個孩子去防疫站檢查HIV抗體，三口人均為「陰性」，說明母子三人均未染上愛滋病。

以上案例僅僅為代表，「愛滋寡婦」何止幾人？是什麼造成了她們現在的境遇？華某的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當我想給她解釋一下並問她有否用避孕套防護時，華某十分氣憤，她連珠炮發地說：「誰見過那玩藝（避孕套）？給病人發那玩藝時，發給誰，人家不但不要還罵人，那玩藝能救愛滋病病人的命嗎？都是你們宣傳『幹壞事』才得愛滋病，弄得好人抬不起頭來。我們的病是『血禍』、『人禍』害的，害得我們好

苦、好苦啊！」

賣血並沒有使農民走出貧困，令人望而生畏的醫療費用，使其更加困頓。愛滋寡婦失去丈夫，孤苦無依，更使她們痛心的是，她們飽受歧視，生活冷落，處境淒涼。

我為她們寫了一首詞：

滿江紅·血禍

悲憤填膺，隨歲月，何時能歇。

回憶泣，蒼天難問，心情激烈。

三十左右已入土，源與愛魔來肆虐。

遺老遺少痛苦難說，空悲切！

「血禍」仇，災難雪，滿腹恨，何時解？

村莊凋零墳塋遍野，賣血陰風暗中呼，染愛更多是輸血，

到如今，為何難杜絕，望天嗟！

（三）他失去了妻子

因妻子死於愛滋病而本人並未感染愛滋病病毒的男子，飽嘗失去妻子的痛苦，常在冷落、孤獨和無助中生活着，境況也很淒涼，有「愛滋鰥夫」之稱。

2001年5月5日，我趕往某愛滋病疫區，一上午見到四位愛滋鰥夫，他們各帶領着二至四個孤兒，缺衣少食，過着極其困難的生活。如駱獅子，骨瘦如柴，衣衫襤褸，領着三個孩子，大女兒十三歲，輟學在家，帶着三歲的患有愛滋病的弟弟，距離他們十幾米遠，就可以聞到他們的腥臭味。另有三戶和駱家相差無幾。更令人心寒的是閭窪村一個失去母親、隨父親生活的九歲小學生，整個冬天他一直沒棉襖穿，直至2月8日我送他一件女孩子的花襖，他才穿上棉衣。相同的是，周圍的人都躲得遠遠的，甚至不敢從他們門前經過……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一個家庭，因愛滋病魔的侵襲，四個缺少了一個

為什麼這麼多婦女死於愛滋病呢？村裏人告訴我：「農村人認為女人月月淌血（指月經），她們的血賤。當年颳賣血風時，很多家庭都讓女人去賣血。」現在女人因愛滋病死了，男人又當爹、又當娘。不少人搖着頭說：「沒有女人的家，就不像個家，沒有娘的孩子連草都不如。真是太可怕了！」請看一個女孩的來信：

尊敬的高大夫：

我是駐馬店地區上蔡縣蘆崗鄉某某村人，我父親叫夏某某。在1988至1993年中，這裏湧現出賣血熱潮。俗話說：「興啥啥不醜。」我媽是個勤勞能幹的人，處在貧窮、落後的農村，為供我和弟弟上學，無法掙錢，她走上了賣血這條路。這兩年，我們這裏好多、好多感染了愛滋病的人，他們都相繼死去。我媽媽從去年8月份化驗也是愛滋病。到哪去治療呢？高大夫，我只想對您說：我需要我媽媽！我可憐我媽媽！只要能治好她的病，讓我做什麼都可以！高大夫，茫茫人海能讓我看到您那隻溫暖、寬厚的手撫慰中南

地區一個女孩冰涼的心嗎？請給我回信吧！

夏 冰

2001 年元月 9 日

我追詢了不少沒有感染愛滋病的鰥夫，問他們是否正確使用了避孕套，或用其他防護措施。他們答覆：「我們不懂這種『怪病』怎樣傳染，有啥防護可說呢？」他們從來就沒有做過任何隔離預防措施。那為什麼男方未被感染呢？可能是男性外生殖器皮膚及黏膜不易破損，因此愛滋病病毒感染的機率小。

再追問他們的生活情況時，鰥夫們說，他們最大的痛苦是周圍人的冷漠和歧視。這是因為大眾對愛滋病所知甚少，懼怕「愛滋」這種「怪病」引發的。請看 2004 年 9 月 23 日收到的一高中生來信：

高大媽您好！

在陝西電視台看到您一心為拯救愛滋病患者（奔波）。而且您那麼大年紀，卻一直信心百倍，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感染（愛滋）病毒的危險，我打從心底非常佩服。

愛滋病這個可怕的概念，讓人一想起就會毛骨發寒（悚然）。我雖是一高中生，但對這方面的知識太缺乏以致於到旅館睡覺不敢脫衣服、用旅館的杯子，甚至到飯店吃飯都非常擔心，懷疑這個碗是一個愛滋病患者剛吃過的。

不光是我，在我的周圍都是一些比較正統的年輕人，一提起與性有關係的字眼都覺得不好意思，所以對這方面的知識所知甚少。在電視台上看到您贈書，想一覽您的心血（所凝之作）。

謝謝 祝您晚年幸福

全家歡樂

陝西省永壽縣店頭鎮某村 某某



1999年末到2000年初，我到愛滋病高發區去，群眾對愛滋病十分恐慌，他們走路說話都怕被傳染，有的甚至全家「逃亡」。五年過去了，在某些鮮為人知的高發區，因為病人或家屬的愛滋病知識的缺乏，對愛滋病的態度仍然是恐慌。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的現象。這說明我們宣傳愛滋病的力度還不夠，需要加強有關的宣傳，讓民衆知道愛滋病為何物，消除對愛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冷漠與歧視。如此，才是預防愛滋病的最佳「疫苗」。



到農村向婦女派發預防愛滋病宣傳單張

第五章

「血禍」及後遺症
(2001 年 4 月-2007 年 3 月)

第五章

「血禍」及後遺症
(2001 年 4 月-2007 年 3 月)



第二十一節 愛滋病受害兒童的慘況

在愛滋病氾濫的今天，患愛滋病死亡者遺留下來，不滿十八歲未成年的孩子，他們受愛滋病危害最深，故稱之謂「愛滋孤兒」。愛滋孤兒這個名詞，在全國大辭典上都找不到的，只能顧名思義。愛滋孤兒與愛滋病孤兒不同，前者未被愛滋病病毒感染，而是健康無恙的正常兒童，後者是已被愛滋病病毒感染，或已發病了的愛滋病患兒。愛滋孤兒和愛滋病孤兒，又因具體條件的不同，可分為：

1. 雙孤兒：即父母因患愛滋病雙亡者。
2. 單孤兒：即父母因患愛滋病一方死亡者。

3. 準孤兒：即父母一方或雙方染有愛滋病，現下正在病中，一年內便會去世。

有人說他們是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是從外文 OVC（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翻譯過來名詞。那麼按中文意思，「影響」是指一件事物對其他事物發生作用。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和獨立的文化，因害愛滋病致死遺留下的兒童，他們是受害者、受災難者。我認為，「愛滋孤兒」之稱謂更確切的合乎中華文字的解釋，對嗎？又有人說：「稱愛滋孤兒對他們來說是種『歧視』。」那麼，誰把愛滋病推向歧視的深淵，為什麼害高血壓、糖尿病不受歧視呢？愛滋病也是病，「歧視」是人為的推入了「髒病」的範疇，勸那些「高明」的女士們、先生們，勿再為愛滋病製造莫名其妙的歧視了。

一 愛滋孤兒現存三大問題

我都知道愛滋孤兒現存的三大問題：1. 生存問題，生活無着。經濟拮据和無人照管。2. 教育問題，讀書無門。不單經費缺少還有厭學情緒。3. 心理問題，有的孩子出現了心理變態。每當你見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的目光是無法讓人迴避的！

有不少人問，目前中國有多少愛滋孤兒，他們的生活情況怎麼樣？我無法回答，只能這樣說，中國愛滋病是因為賣血或輸血感染的，多是青壯年人，每死去一對夫妻，就會留下一至三



繳不起學費的愛滋孤兒

個孩子，甚至更多一些。中國感染愛滋病的病例數，尚無準確數字，而孤兒人數如何能確定，這也可能成爲一個永遠的未知數。

（一）孤兒生存在羊腸小道上

關於愛滋孤兒的生存情況，可以說除了政府照顧的極少數孩子之外，還有些防愛基金會救助一些孤兒，但絕大多數孤兒過着淒涼無助的生活，他們同在愛滋陰影的籠罩下，遭受了「白眼」、「歧視」、「敵視」，許多不平等的待遇，如某幹部說：「這些孩子的父母害愛滋病死了，孩子現在沒有愛滋病，萬一他將來有了怎麼辦呢？」另有宣傳的誤導：「愛滋病主要是吸毒、性亂傳播的。」也就是說，好人不害愛滋病，孩子父母不是好人。真的嗎？孩子父母因貧窮賣血得的愛滋病，你們爲什麼不去抨擊「血頭」、「血霸」的罪惡？而偏偏歪曲事實真相，給孤兒們增加歧視和苦難呢？2002年，我曾領了三個愛滋孤兒來家過春節。一下汽車，我就讓她們到河南省防疫站抽血做HIV抗體檢查，結果都是「陰性」，這證實她們都沒有感染愛滋病病毒，都是健康的孩子。結果我兒子第一次看見孤兒就黑着臉，瞪着眼說：「快把孩子送回去，萬一她有愛滋病怎麼辦呢？」我批評他不學習、無知，他一走七天不敢回來。我兒子是河南大學第七十八屆文科畢業生，現任職某大學副教授，也竟嚇得不敢回家與父母共吃「年飯」。如此表現在我家裏並非兒



子一人。

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救助的一個姓王的學生，現在是個退休的主治大夫。她兒子有出息，開了大酒店，每逢節日她常領着她的小孫女給我送東西吃，坐在我家說個沒完沒了。除夕她送來一箱蔬菜，說：「高老師今年過節還缺啥東西，你說一聲我去辦……」她看見兩個愛滋孤兒後，她問這幾個農村孩子從哪兒來，我說是死去的愛滋病人遺留下的孩子，來我家過年的。嚇得她表情緊張，坐也不敢坐，站在我家門裏不到兩分鐘，就一溜煙地走了。

另一個大學同學（醫學教授）來了，看見愛滋孤兒，氣沖沖地說：「老高，你真是個精神病，管這些孩子幹嘛！她們能活幾天呢？」我說：「孩子已檢查過了，她們無病。」她說：「愛滋病這玩藝，傳染病嘛，寧可信有，不可信無，管這些人太沒意思了。」

我只不過是領了三個健康的孩子來家裏過春節，竟然受到如此待遇：兒子不敢回，朋友不敢來，我也成了個人見人怕的「精神病」。這些孤兒的生活之艱難就可想而知了。

在那片貧瘠的土地上，有不少青壯年因賣血染上愛滋病死亡，留下的孤兒住在他們賣血蓋起來的磚瓦房裏痛苦地生活着。他們的父母因愛滋病雙亡，而時下人們對愛滋病知識了解甚少，他們不敢接近這些無病的孩子們，怕染上愛滋病。

自2002年以來，有些愛滋孤兒的遭遇更令人痛心，他們現在已不是單純的缺吃少穿、生活無着，而是出現了更為悲慘的境遇。

（二）輟學的愛滋孤兒知多少

愛滋病已是致貧的風暴，不知多少戶人家因愛滋病致貧或死亡，因此使孩子們失學了。

2000年，家住河南農村的十四歲的張紫龍（化名），父親愛滋病病發。為了給父親買藥治病，才上初一的他到新鄉打工，以未完全發育的身體每天扛幾十噸水泥，一個月掙千多元人民幣。2001年父親去世了，

感染了愛滋病病毒的母親也即將發病。爲了還好幾萬塊錢的債，爲了給母親治病，張紫龍繼續去扛水泥。2002年，他的身體垮了。天天扛那麼重的東西，把他兩個脊椎骨之間的隔膜給壓碎了。醫生給他拍完片子說：「你這兩個骨頭直接壓迫神經，你要不治，不動手術，以後兩條腿神經會殘廢，你就會癱瘓。」可他還有錢治嗎？

2001年4月30日，我在某愛滋病高發區的一個小學調查，百多名學生中有二十九個愛滋孤兒。當時有個姓董的九歲女孩，眼淚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說：「高奶奶，您救救我媽媽吧！我不能沒有媽媽，我爸去年害那個病死了，我不能再失去媽媽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聲讓在場的人無不流淚。2002年元月，那學校的彭校長來信說，該校的愛滋孤兒去年畢業時已經走了七個，現在又已增加到三十三個，數目一直在增長。那些可憐的孩子們，誰能救助他們呀！

2001年10月2日，我去了另一愛滋病村，訪問了十多個愛滋病家庭。該村十二歲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學，女孩子輟學後從事家務勞動，服侍着患有愛滋病的親人。她們有的十四五歲就被那些三四十歲的老光棍們盯上了，被弄去做小媳婦。更可惡的是，還有人以招工爲名，騙她們到外地去「賣淫」。一位自稱在蘇州開有紡織廠的「金老闆」，到某愛滋村招了六名十六至十九歲的女孩，當這六個女孩到達蘇州時，那裏根本沒有紡織廠，只有個大型髮廊，金老闆讓她們在髮廊裏當招待員，實際上是接客，她們發現情況不妙，深夜逃出虎口……男孩子多數外出打工了。那些十五六歲的孩子在外地幹成人才幹的苦力活，甚至下煤窖做苦工。

2002年3月30日，一位愛滋病患者程某帶着一個八歲的小女孩來到我家。他說：「我和孩子媽媽1995年一起賣血，她媽已經走了二十多天了，現在我求求你給我的孩子找個家吧，只要孩子有口飯吃，俺們死也放心了……」小女孩站在那兒一直流淚。孩子很瘦小，一點兒也不像八歲的孩子。程某從口袋裏取出一張孩子的化驗單給我，上面寫着「血



HIV 抗體『陰性』」——說明孩子無病。當時我的一個姓蘇的中學同學在我家坐着，她的女兒四十多歲，還沒有生育，她願意收養這個孩子。同時給她洗了澡，換了衣服。程某非常高興。次日一大早，他要求帶着孩子回家給她媽媽墳前燒點紙，同時把她的戶口遷到鄭州。程某經過途中顛簸，回家後病情嚴重，半個月後撒手西去。此後程家三個孩子全輟學了，特別是小女孩多在深夜哭泣。你若問她爲啥哭，她說「想我媽！」我爲此寫了一首詩：

夜 泣

愛滋蔓延太猖狂，廣大生靈遭禍殃。
青壯年人遇浩劫，親人陰陽各一方。
病亡人數難統計，暴風夜雨月無光。
遺屬夢幻亡靈際，孤兒夜泣等天亮。

（三）孤兒出現了心理異常

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下，孤兒的心理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

2001年的一天，我走進某村發現一個已輟學的十二歲男孩，他跪在一個大的新墳前，對着一對中年夫婦的照片嚎啕大哭。他叫小夏，在墳墓裏躺着他因愛滋病死去的父母，他妹妹也染上了愛滋病病毒，他十四歲的姐姐也輟學了。好心的記者爲他交了學費，但不久他因貧困又輟學去磚廠打工去了，爲了每天掙十元錢來養家餬口，小夏心事重重，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每天跪在他父母墳前哭……



小夏在患愛滋病死去的父母墳前

經調查，愛滋孤兒們的要求不高，他們只想有飯吃，有衣穿，有學上，是每個正常孩子的基本願望。實現這些願望對於有錢人的孩子來說是再容易不過了。可對於愛滋孤兒來說，即使付出沉重的代價，乃至於生命，也是那麼遙不可及。每每想到這些，我不由問自己：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難道我們祖國的未來就這樣被蹂躪就這樣枯萎嗎？

1999年的下半年至2002年的上半年，我多次將自己的講課費、稿酬、給人看病所得的報酬寄給孤兒，並呼籲好心人幫助他們，前後給孤兒匯款在八萬元以上。最後調查了解證實，這些錢連三分之一都沒有用在孩子身上，大多流入那些發「愛滋財」的人的腰包。有人以救助愛滋孤兒為名，行發財之實。這種事情太多了，不但河南有，其他地方也有。但是愛滋孤兒們一無所知，他們只知想念死去的父母。例如：2002年2月10日晚，我在廚房做飯，在我家住的十四歲女孤兒一邊剝蔥一邊和我聊天。她說：「我爸爸媽媽死得太早了。我經常夢見他們，有時候不做夢也會看見他倆。一天我沒有吃飯，餓着肚子回家了，我家東西因他們有病都賣光了，我站在空空蕩蕩的屋子當中，睜眼看見我爸我媽回來了，他倆又說又笑，一前一後走進家門，媽媽手裏拿着一包饅，我迎上去，他們沒給我說話，轉眼間看不見他們了，這真的不是在做夢，真的不是在做夢。」她流着淚說：「高奶奶，人死了會不會有靈魂……」我說：「人死了沒有靈魂，那是你心裏想的。你好好讀書吧，將來考上大學，才是唯一的出路。」趕快把話題轉開了。（這個女孩在杜聰先生的幫助下已經於2007年考入了大專）

這使我意識到單純經濟上的援助是解決不了愛滋孤兒的問題的。後來我曾建議學習1960年在自然災害期間周恩來總理解決三千孤兒進內蒙分散撫養的經驗。

2002年夏季，曾經有六個愛滋孤兒先後以領養的方式進入山東曹縣幾戶農民家。「今非昔比」，我可以說大多數孩子在新的家庭是好的，如陳祥鵠、顏秉政、劉提安等。但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也發生了。有人



互相爭奪孤兒，不是爲了孩子，而是爲了給支助者要錢。如一個姓謝的，他只有一個兒子，兒子在濟南上大學出車禍死去，領養了一個愛滋孤兒，就有一個愛說瞎話的女人多次打電話，說姓謝的有六個女兒，又領養了一個孤兒，我和杜聰先生怕謝家養七個孩子無法撫養，專程僱車去謝家了解，而謝家連一個女兒也沒有，這個愛說瞎話的女人瞎話太多了，道德畸變，一切向錢看，目的只有一個，以領養孤兒爲名索取財物，其事例太多，無法一一列舉。

而孤兒在領養地區，學校的生活也不盡如人意。陳祥鵠等曾給我來信反映他在曹縣第三中學的一些問題：

老姑奶奶：（他按領養家庭鄉村的稱呼）

您好，近來身體好嗎？由於這段時間學習非常緊張，給您去信的機會也不多，請您諒解。

在這裏，我們倆祝元旦快樂，事事順心。老姑奶奶，我們有些事情，需要向您反映。這件事也不知道怎樣向您說，但也不得不說。

我們在這裏實在是呆夠了，想和您商量一下，能不能回家上學。這是我倆經過多次思想鬥爭，才做出的決定。

在我們的班，混子特別多，班裏的紀律愈來愈差，弄得我們無法靜心學習，這一點不說也算了，但是還經常有人，找我們的事，有幾次甚至動起手來。我們在這裏只是好好學習，但不知道會招來這樣的事，我們也不能和找事的人對抗，只能忍受冤屈。我們無能為力，只能逃避。

不僅找事，就是在他們面前說話，或上課回答問題，也會招來排斥。不在這兒上學的原因還有一條，同學們可能知道我們的身分了（愛滋遺孤）。

總而言之，事情比我們寫的嚴重得多。三中我們是無法呆下去

了，請體諒我們的苦衷，我們只是想在家上學，上高中時再到曹縣來。請您好好想想，本來我們是不想再讓您操心了，但是我們也別無他法。

祝佳節快樂

顏秉政 陳祥鵠

2004年12月28日

這件事情我已通過縣領導解決了。但孤兒分散撫養也是喜憂參半。按道理來說孤兒有了父母，生活有了着落，教育有保障，也免受社會歧視；孤兒和正常兒童在一起玩耍、讀書和生活，日子久了，能慢慢消除他們的心理陰影，有利於孩子的成長，為政府為社會節約了開支。對愛滋孤兒的歧視問題，不知何時才能休止。2004年暑假有兩個愛滋孤兒在我家閒住，這兩個女孩分別是高中一年級和小學五年級學生。她們失去父母已三年多了，在心靈上已走出了陰影，但社會上對她們的歧視仍難以消失，請看她的日記：

2004年7月30日 星期五 多雲轉陰天 風

上午奶奶領我們玩的很開心，下午奶奶接了一個電話，我聽到她說：兩個孩子沒有愛滋病，愛滋病也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可怕，這個病一般接觸不會傳染，即使這兩個孩子是個愛滋感染者，你們吃了她提過的東西也不會染上愛滋病，何況她拎的是禮品盒，食物在包裝盒內裝哩，不用怕……他倆或其他愛滋孤兒經常在假期來我家住……

電話落了之後，我倆纏着奶奶問，誰來的電話，他問俺倆幹啥呢？奶奶說：「昨天上午咱三人去醫院，看望我三十年前的老朋友，你倆幫我拎着兩個禮品盒，癱在病牀上的老太太，看見你倆之後，她害怕你倆有愛滋病，她們不敢接禮品盒，讓你倆把禮品盒放



在病房離她牀很遠的牆角裏，也不敢讓你倆個坐下來，她怕感染上愛滋病。今天這個電話是老太太女兒（某大學的教師）打來的，詢問禮品盒中的食物是否可以吃？

……啊！這真是一幕令人啼笑皆非愛盲無知的鬧劇，蒼天，蒼天，我真怪您瀆職。

從以上日記中不難看出，「談愛色變」，特別是「富人」更怕愛滋病，他們認為害愛滋病者是道德缺失，愛滋病離他們很遠、很遠，換句話說，「他們永遠不會得愛滋病」。其實不然，中國愛滋病主要是血源性傳播，故每個人都有染上愛滋病的可能，如某市公安局副局長（處級）因輸血害愛滋病死了。

（四）愛滋孤兒的內心世界難猜測

每年愛滋日前後，許多人赴愛滋病疫區探視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門庭若市好不熱鬧。但這是否這個群體所需要的呢？特別是那些「志願者」對愛滋孤兒群體訪問、上課、交流，組織各式文藝活動，無疑給孩子帶來一時的快樂和憧憬，但像火焰一樣的轉瞬即逝。誰知道這些孩子在成長的道路上是如何走的呢？

本人接觸他們十多年了，這些孩子表面上看來很純樸、善良；但特殊的環境，給他們帶來不可磨滅的傷害。這些孩子的內心世界是我們永遠無法想像的！

一次我接觸一個小女孩，表面上看來她非常活潑，其實她內心非常自卑，且適應社會很困難，她不會和全班五十多位同學說話，她會背着他人流淚，她會自認為別人看不起她，別人都對她不好。

另有一個女孩，人們看着她長得年輕漂亮，但她自認為自己長得醜，別人是在嘲笑她，於是整天悶悶不樂，以至影響了她的日常生活與學習成績。

再有一個女孩在她父母因賣血感染愛滋病死亡之後，她自認為是一

個「恥辱」。她夢想自己是「幹部子弟」，於是她對周圍同學及老師說：「我爸爸媽媽在某某縣裏工作。」

由於有些孩子失去父母的呵護，游手好閒、說謊話、小偷小摸、厭學，已成了習慣，村民們也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很令救助他們的愛心人士發愁！

還有一個女孩內向、膽小、多愁善感，在她爸爸媽媽死後，她的遭遇令人難以想像，不過她有個最大的優點，還願意學習。下面我摘錄她2005年9月25日來信：

親愛的奶奶：

我知道您很忙，您很累。總想對您說休息一下，注意身體。但我深深的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有好多人正等着您，等着您的關愛與救助，等着您為他們揭露事實、解決問題。為此，您不願他們失望整天忙碌着。奶奶您從未想過照顧一下自己的身體。

.....

不是我不懂得感恩，我怕我做的不好，令您們傷心。也許在旁人看來我的心冰如石板，連愛心與親情也撞不出火花。曾幾次自問：難道我真的如此嗎？記得五年來，在這漫長的歲月裏，您為我付出了許多許多。從生活到學習，從外表到內心，您總是樣樣想到。為了讓我更好地生活，您不斷的找人為我物色學校，讓我讀書，為了讓我走出內心的陰影，感受心靈的溫暖，您曾多次接我與您同住，曾幾次拒絕記者對我的採訪。為了讓我走出自卑，您曾多次勸我思想上不要有壓力。奶奶還記得我們相識的情景嗎？還記得6月6號您給我寄來的信嗎？字裏行間都滲透着您的堅強與剛毅、成功的不易。當時我哭了，不為別的而是悲憤自己不爭氣。有人說生活就像一行列車，每站都有起點與終點，不前進就後退。如今我給您寫信，不為別的，只為您為我的付出，為您的愛心和關懷。現



在，我已長大。我應該學着自立、學着感激。因為我已不是昔日的孩童，也許我有時會犯錯、有時很糊塗、有時會令奶奶您擔心憂愁。……

一個愛滋孤兒

2005年9月25日

2006年春節，爲了讓大家了解隱蔽的愛滋病病人，我讓志願者在鄭州郊縣接來兩個單孤雙胞胎十歲半的女孩，來我家過春節。她們父親因賣血感染愛滋病，死亡之後，生活很苦。2004年5月，我去他家見到的情況是食不充飢，衣不蔽體，她們的媽媽整日以淚洗面。她們還有一個姐姐輟學，當她們家的慘況曝光以後，不少好心人在經濟和物質上援助她們，她們的姐姐也復學讀初中，據說學習成績也不好。這次我見她們時，孩子變了，春節那天，端上餃子，要吃米飯，做了米飯，要吃炒米，做了炒米，那個小的女孩又要吃饅頭。天天看着電視跳着繩，從早上七時看到晚上沒有節目，從不看書，她們是四年級的學生，聽說成績在六七十分。沒有一點生活的緊迫感……

本人接觸愛滋孤兒多年了，這是第一次發現單孤的新情況，春節期間的來客，他們異口同聲說：「單孤的家庭教育缺失。」

二 這三個四歲孩子的遭遇比孤兒還慘

上世紀90年代因有償賣血使許多人感染愛滋病，已是公開的「秘密」。這些被污染的血流往何處？到目前爲止，我所接觸的愛滋病病人有80%是輸血感染的。這僅僅是悲劇開端的序幕，這些含有愛滋病病毒的血漿貽害多少人，迄今還是一個未知數，更是某些人不願提及的問題。

我發現不少人因輸血或血漿感染了愛滋病，特別是兒童。他們不可能吸毒，不會有性活動，父母或其他人HIV抗體「陰性」，可排除患有

愛滋病。他們不但有輸血史，而且供血者是愛滋病病人或後來死於愛滋病的人。他們感染愛滋病，完全是無辜的。請看這三個四歲的幼童是怎樣成為冤魂的！

（一）太康的四歲帥帥

帥帥 1997 年元月 4 日出生。1998 年 10 月 20 日中午，他媽媽在做飯，把剛燒開的一鍋水放在地上，他從牀上下來，伴隨着一聲慘叫掉了進去，待把他從開水鍋裏撈出來後，從脖子以下到兩腿彎以上以及兩臀部的皮膚全部燙脫。家人立即把帥帥送到鄉衛生院，醫生說：「傷情太重，快轉縣醫院……」於是僱車轉往縣某醫院，住進該院燒傷科治療，醫生說：「傷情太重，需要輸血。」10 月 24 日上午十時許醫院叫來一個賣血的中年男子邵某，化驗血型吻合，配血之後，抽他二百毫升血，並付給邵二百元錢。血拿回病房之後，順利地給帥帥輸進體內。護士再三叮囑把化驗單、抽血單收藏好，千萬不敢扔了，萬一出了事還有用。

帥帥住院一個多月，傷情很快好轉，皮膚傷口慢慢癒合，但從腰背到大腿滿留下了難看的疤痕，一條右腿伸不直，幾乎不能奔跑，走起路來，彎曲的腿將沉重的身子拉向右側，他父母想為他醫治，切除疤痕植皮。

1999 年 8 月 2 日，帥帥住進解放軍某醫院做植皮手術。當時孩子又白又胖，表情大咧咧的，與同齡孩子沒有多大差異，8 月 6 日他的血化驗結果出來了，HIV 抗體「陽性」，醫生問他父母：「你們外出打過工嗎？賣過血嗎？孩子輸過血嗎？」其父回答孩子只在燙傷時輸過血。醫生對帥帥的父母、祖父母、舅舅、姨姨、姑姑、叔叔等十幾位親屬進行了 HIV 抗體檢查，結果均為「陰性」，醫生便要他們找出帥帥當年輸血時的配血單，找到了供血人邵某，此時邵某愛滋病已發作，發燒、腹瀉，對邵某進行抽血化驗 HIV 抗體，結果是「陽性」。醫生說帥帥是輸血傳染的愛滋病，並表示愛滋病感染者不能做這種手術，讓他馬上出院回家。



帥帥父母聽到了兒子害愛滋病的消息，他們不相信，這孩子能吃、能喝、能說、能玩，會有病嗎？是不是醫院化驗出了錯誤？商量來，討論去，8月10日來到了河南省防疫站的性病、愛滋病防治中心，再次給帥帥進行抽血化驗。第二天化驗結果出來了，HIV抗體仍為「陽性」，醫生說：「根據你們在當地的檢查化驗結果，孩子就是一個愛滋病病毒的攜帶者，回去吧，這種病現在沒法治！」

但他父母仍不能相信現實，於8月12日夜帶着帥帥赴北京，次日下火車就進了右安門醫院，再次化驗。他一家三口，只有帥帥的血HIV抗體「陽性」，父母均為「陰性」。醫生說：「世界上目前還沒有研究出治療愛滋病的良藥，只能依靠現有對症治療的藥物用來延長病人的生存時間。但花費巨大，每年醫療費需要十至二十萬元錢，哪個家庭能夠負擔得起呢？而又不能治癒，結果還是人財兩空！」

帥帥父母很無奈，帶着孩子來到醫院太平間旁邊的一個「關愛之家」。據說這是一個幫助治療愛滋病人，宣傳防愛知識，防止愛滋病蔓延的非政府組織。「關愛之家」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生說：「我們這裏收住院的愛滋病人已有四百多人次，河南人佔了半數，前一段時間，又有一群人來到了北京，這裏實在容納不下去了，你們回去吧！」

回家半年後，帥帥出現了今天腿痛、明天背癢的情況，不是發燒，就是咳嗽腹瀉。帥帥父母到處打聽治療愛滋病的「神醫」，誰說哪裏能治療愛滋病，他就帶兒子去醫治，花錢不在乎。帥帥家本來開個飯店，生意很好，是一個數得着的富裕戶。爲了給孩子治病，飯店的活動資金花光了，打官司的訴訟費都拿不出來，只好關門停業，借錢貸款爲兒子治病。冤枉錢花了不少，兒子病情卻日漸加重，骨瘦如柴，行動困難，進食後就嘔吐，且每日腹瀉十多次，很快帥帥就被「愛魔」奪去了生命。

（二）永城的四歲伢伢

2003年6月15日，我們租專車專程去永城看望伢伢。第一次見到伢

伉時，聽到他唯一的話是，「媽，你總哭啥？」懂事的小伉在睡覺時總說：「媽媽，我不和你一張牀睡了，免得感染你……」這位我們所見過的年紀最小的愛滋病患者，他的症狀已相當顯著了。

伉很聽話，讓他退下了衣服和褲子，便露出了從脖子到小腿密佈的膿疱瘡。當時，他全身發癢，不停地抓撓，每天靠吃藥才能在睡覺時少醒幾次。從每盒八元錢的百服寧到六元錢一片的依利康，四歲孩子每天吃藥比吃飯還要準時，儘管六七種藥品都無法真正阻止他的病情惡化。

他媽媽說：2000年8月18日，伉突然發燒，某某村診所醫生診斷，伉得了「急性壞死性腸炎」。醫生某某作出了輸血決定。因為伉的爸媽與兒子血型不同，伉的爸爸提出到血站買血的要求。該醫生對伉爸講，血庫的血遠遠不如身上抽的鮮血好，庫血存放的時間太長，質量差。隨即，該醫生打電話尋找血源。不久，某某鄉某某村村民血頭某某用三輪車拉來了一個血型相同的人。

就這樣，一百五十毫升血從綽號為「壽」的賣血者身上輸給了當時不滿兩歲的小伉，兩天後，又輸了一百五十毫升。這兩次輸血，花的錢比從血庫買血便宜得多，三百毫升只用了二百元錢。

因為伉出院不到十天便開始發燒，伉爸又在村裏的診所和鄉裏的醫院為他治療，兩家醫院的診斷分別為肺炎和類風濕，直到去永城市人民醫院也沒能確診，當時的病歷上留下的記錄為「連續感冒，無名熱」。

2003年正月後，小伉再度連續發熱、咳嗽、皮膚瘙癢，在出現一次抽風症狀



生命垂危的邱伉



後，伉伉爸決定帶兒子到大醫院查查病根。4月7日，夫婦二人帶着伉伉住進安徽醫學院附屬醫院。

4月9日，查出伉伉HIV抗體「陽性」。

記錄的診斷結果為：HIV感染，肺部感染，鵝紅瘡。

4月15日，他們又帶着兒子來到河南省衛生防疫站做HIV抗體檢查，檢查的結果是兒子為「陽性」，夫婦為「陰性」。

全家震驚！因為兩家治療機構的醫生都問了相同的問題，「孩子輸過血嗎？」伉伉爸開始懷疑一年多前的輸血是他家的「禍首」。

回家兩個月了，伉伉的治療只能「頭熱醫熱，身癢治癢」，但每個夜晚，年輕的父母都會因孩子的啼哭和抽搐驚醒。

因在村裏備受歧視，爸爸媽媽帶着小伉伉去了新疆，伉伉受盡了愛滋病的折磨，直到2003年10月8日他走了，長眠在天山腳下。

蒼天有知，邱家在2007年又生了一個小男孩，起名叫博博。2009年2月我見過博博的照片，他長得很像他的哥哥。

（三）驛城的四歲寶寶

井寶寶，他才四歲，對人生的「悲歡離合」還全不知曉，便被「愛魔」奪走了生命。

1994年12月16日，寶寶在河南省駐馬店市人民醫院出生了，是個胖小子，哭聲宏亮，濃眉大眼，能吃能睡。12月17日全家人歡天喜地回家了。

回家第三天，寶寶開始發燒，哭鬧不安，拒絕吃奶。寶寶的姑姑把他抱到駐馬店人民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為臍帶發炎。於是，寶寶住進了駐馬店人民醫院新生兒科接受治療。

12月21日，醫生診斷寶寶因臍帶發炎引起敗血症需要輸血，當時駐馬店有兩家醫療單位出售血液或血液製品，寶寶的爸爸慌忙到出售血液的解放軍159醫院買回了一袋一百毫升血漿，讓醫生給孩子輸。23日，醫生又叫寶寶爸去駐馬店地區中心血站買了第二袋五十毫升的鮮血



愛滋病患兒井寶寶

漿，回來後給寶寶輸了。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治療，寶寶病情好轉，順利出院。寶寶的爸媽說，還是血漿好用。以後寶寶活潑健康，會說會笑，會蹦會跳，誰見誰愛，他們一家三口過着歡歌笑語的生活。

四年美好的時光很快過去了。1999年6月的一天，寶寶和其他的小孩子打架後，他的媽媽發現他身上有一片片的紫斑，沒有在意，只是告訴兒子以後不要再打架了。7月22日晚上，寶寶突然鼻子出血不止，弄得衣服、被褥上處處血漬斑斑。第二天，一大早被家人送到159醫院，醫生診斷為「原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斑」，住院一周出院。以後，他爸媽到處打聽治血液病的醫生，誰說哪裏有專家治血液病就帶兒子去哪裏看，花錢他們不在乎，家裏沒有就四處去借，只盼早日把寶寶的血液病治好，吃中藥、吃西藥，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但兒子的病情不見好轉反而日漸加重。

2000年1月3日，寶寶出現發燒、氣喘、咳嗽、噁心、厭食，1月7日住進駐馬店市人民醫院，診斷為「肺炎」。吃藥、打針各種方法都用盡了，病情仍不見好轉。1月8日，醫生得知寶寶五年前輸過血漿後，開了一張化驗單。1月10日下午，血液化驗結果愛滋病病毒抗體「陽性」，診斷為「愛滋病」。

接到化驗通知，寶寶全家如五雷轟頂，希望是化驗出了錯誤。次日凌晨，寶寶的舅舅拿着二百元錢帶着寶寶的血樣連夜踏雪趕往鄭州，請求河南省衛生防疫站愛滋病監測中心複查，結果很快出來了，愛滋病病毒抗體仍是陽性，和駐馬店人民醫院的結果一模一樣，寶寶的舅舅驚呆了。這張宣布死亡的化驗單，讓全家徹底失望了。1月11日下午二時，



醫生護士趕兒子出院，這時兒子摟住母親脖子叫喊：「媽媽，我很難受！你保護我吧！」一會又衝着護士和醫生說：「阿姨啊、叔叔啊，救救我吧！我不走，我要治病哩！」寶寶的爸媽無奈地抱着兒子回到家，眼睜睜地看着寶寶在2000年元月12日下午六時半離開了人世，痛不欲生……

在兒子死後的第五天，寶寶的父母在駐馬店地區防疫站抽血做了相關的檢查，檢查結果愛滋病毒抗體夫婦均為「陰性」。為了保證結果無誤，二人又到河南省衛生防疫站愛滋病監測中心做了複查，結果愛滋病毒抗體仍為「陰性」，未被愛滋病感染，那麼寶寶的愛滋病是從何傳染的呢？既不是母嬰傳播，又不可能是性傳播，只能與血液有關。

四歲的井寶寶去了，他走得這麼匆忙，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永遠也不會知道，是帶有愛滋病病毒的血漿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

2006年12月寶寶的媽媽又生了一個女孩，全家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但是他們不會忘記「血禍」給他們帶來的災難。

我把這些情況告訴了河北省遷安市工會的朋友劉先生，他很驚訝，他來信說：「孩子們如此冤死，他要告知更多的人們，愛滋病的巨大危害。」並寫了兩首詩：

（其一）

慘劇悲情痛我心，燈前扶思久沉吟。
金剛鐵漢當垂淚，憐憫蒼生苦難深。

（其二）

緣何知情淚頻傾？訴者慘狀著者情。
我願公眾施利劍，愛（艾）魔斬盡救蒼生。

第二十二節 愛滋孤兒的遭遇

愛滋孤兒這個新生的弱勢群體，備受各式各樣並帶着各種目的人們的關注。這些孩子生活在愛滋病的陰影下，還受着貧困、歧視與敵視，過着窮苦、恥辱的生活。有人怕他們會傳染愛滋病，有人說他們父母造孽了該他們受罪……更可怕的有些孩子不思進取，給他交學費，他也不讀書，甚至打架偷東西等等，很難預料他們將來會走向何方！

這些愛滋孤兒的祖父母有的已經過世，有的不管或沒有能力管這些孩子。當地有一些封建思想，父母一死就認為孩子「妨人」（即所謂的剋星）。2001年冬季，某地有一個十一歲的男孩父母因愛滋病死亡之後，爺爺也死了，奶奶又有病。跟着叔叔孀孀生活。後來孀孀害愛滋病死了，叔叔也患了愛滋病卧牀不起，他沒有飯吃，到姑姑家去要饅，姑姑隔着門給了他一個饅（饅頭）說：「你趕快走吧，你妨人……」後來他被人收養了，臨走時他給奶奶打招呼說：「奶奶我走了。」奶奶說「你走吧！你想去哪裏去哪裏，你到哪裏妨到哪裏！」那些愛滋孤兒在貧困與歧視下，生活無着，缺衣少食。

2003年12月4日我去某愛滋村，在零下二度的天氣有個愛滋孤兒還穿着單褲，幸虧有好心人給他一件大棉襖，不然就有凍病凍壞的危險。這並不是僅有的情況，許多孩子都是過着類似的生活。他們大多數沒有讀書的機會。在少數地方愛滋病人和家庭享有「四免一關懷」，但那些單孤（即喪失一位親人者）不享受上述政策，特別是那些準孤兒在父母患病的日子裏更難過……

我有幾次進某愛滋病高發村，那裏十二歲以上的兒童全部失學，原因是沒有錢繳學費。2004年2月26日下午，我在某愛滋村與十二歲的女愛滋孤兒談話，她第一句話就說：「奶奶，我想上學……」

愛滋病疫區的慘狀，愛滋孤兒為數之多，觸目驚心！請看一個愛滋



病感染者妻子的來信：

親愛的大娘、大爺，你們好！

近來，高大娘辛苦了，天氣寒冷，兩位老人家多保重身體，我非常感謝高大娘、大爺在百忙中，時刻牽掛着合洲（愛滋病感染者）……

高大娘，我們村在2003年10月22日朱三妮四十一歲愛滋病發作，肝腹水死亡；27日孔某燕，男，三十六歲，患愛滋病，渾身起像銅錢一樣癬死亡，妻子馮某紅三十六歲，患愛滋病，兩個兒子孔某貝十五歲、孔某盼十二歲；30日張英，女，四十一歲，愛滋病發作肺結核死亡。

高大娘，您說（要）的孤兒照片，我已給寄去了，名子寫在照片上，崔某麗、崔某麗雙胞胎失學，黃某貝、崔某明、徐某飛、崔某、任某、崔某紅、黃某、徐某、汪某等都在小學輟學……

祝高大娘、大爺身體健康！

某霞

2003年11月6日

從來信不難看出，愛滋孤兒還在增加，但這類的信很多，無法一一錄用。

此外，不少愛滋孤兒慢慢地發生心理變態，仇視社會。有個十幾歲的愛滋孤兒喊着要「殺人」。問他殺誰，他說殺抽我爸爸血的那個人；另有一個小孩在手臂上刺上字：「仇！殺！」還有的孤兒結拜兄弟……2001至2002年，我給馮家四個愛滋孤兒繳了三個學期的學費，但他們不去讀書，老大、老二到南方去了，老三在村裏流浪，只有九歲的女孩老四在村小學讀書，我實在無奈。爲了他個人前途，更爲了社會的安全，這是件好事，但做起來非常困難。2004年我聽說有的愛滋孤兒在官

辦「陽光家園」裏打架打人，後因打保安被開除出陽光家園……

2005年8月北京地質大學的大學生赴愛滋病疫區做社會調查。8月25日他們告訴我說：「信陽地區有幾個『陽光家園』建起花二百多萬元，只收十幾個孩子，而這些孩子厭學情況較重，只想出來打工。他們才十多歲，為何不想讀書呢？」

（一）愛滋孤兒的新動向

2005年8月16日，我去鄭州火車站送別兩位老朋友，在他們老夫妻走了之後，我在火車站廣場找的士準備返家，突然發現地上跪着兩個行乞的小男孩，看來他們的年齡在十歲左右，人長得又瘦又小，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且不蔽體，……當我急忙走過時，兩個小孩突然站了起來，他瞪着乞求的目光大喊：「高奶奶您咋在這裏？您去過俺村、俺家，你還記得俺嗎？」

我楞了！仔細一看小孩有些面熟，未等我回過神來，小孩就說：「俺跟鄰居老張出來打工的，來到鄭州他叫俺倆要飯……」

我問：「你們每天會要飽肚子吧？老張呢？」

小孩說：「老張叫俺倆要錢，不讓要饅和飯，他在遠處花池邊站着哩……」

我問：「你倆每天能討要來多少錢？爲啥不要食物？」

小孩說：「老張給俺們規定每天要來一百元錢，若討要不夠錢數，他就打俺兩個，還搜查俺的衣服兜兒，又不管俺吃飯，俺要來的饅和點心一般都可以吃飽，要不夠吃的時候，就餓着，那有啥辦法呢？」小孩一臉無奈！

我問：「你們來鄭州多長時間了，住在哪兒？」

小孩說：「俺來這裏一個多月了！住在城邊農村的賃房裏。那裏還有不少小孩和我們一樣在街上乞討，都是跟『大人』來的。」

我問：「你們那裏來的有女孩嗎？她們怎麼樣呢？」

小孩說：「有女孩，她們和俺們一樣出來在街上要錢，前幾天有一



個女孩丟了，昨天又有一個女孩病了，這事情不讓往外說……」

我問：「你們幾時回家？老張給你們報酬嗎？」

小孩說：「臨來時老張說了，在鄭州待三個月，回家後，他給每人三百元錢……」

我說：「我老了，不記事啦，你叫啥名字，你家住在哪裏？我啥時候去的？」

小孩說：「高奶奶您忘了，您到了俺家時，俺爸已經死了，俺媽的病很重，您給了俺媽一百元錢。現在她也死了快一年了！俺叔、俺姑都害愛滋病死了……」正在說話，兩個孩子突然變得神色緊張起來，拿起乞討盒急忙就走，孩子走着低聲說着……我因耳聾未能聽清他說的什麼。

我急忙大聲喊：「你倆往哪兒跑？」

小孩說：「瞧！瞧！老張來了……」兩個孩子頃刻間，消失在人海中……

回到家後，我想這是個問題，馬上又打的士去找他倆，未能找到。我後悔沒有問清楚！時過多日，我愈想愈難過，便多次打的去火車站。全市六個汽車站尋找這兩個孩子，花了幾百元的士費，也沒有找到這兩個愛滋孤兒的蹤影，想報警也無從說起，我恨我自己，沒辦事能力，為什麼不首先問清楚他倆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呢？現在缺少解決問題的第一手資料，怎麼辦呢？我想起杜聰先生電信、口頭多次告訴我說，有人僱用愛滋孤兒賺錢。今年「五一」節在深圳街頭有孩子「自殘賣藝」，孩子胸前、脖子上、上肢等處用鐵絲纏的一條一條的皮膚損傷與出血痕迹……。杜先生對這一事件追蹤了很久，最後還是不了了之。兩個事件的性質相同，這又是一個愛滋孤兒走向學壞的途徑，這些僱愛滋孤兒出來掙錢的「冷血們」，你唯恐天下不亂嗎？

行乞本身不違法，更不犯罪。而未成年的孩子被他人騙出家門，來大都市行乞，並控制孩子的行動，虐待他們的生活，為自己賺錢，應視

爲違法犯罪。

2004年，廣州市警方發現安徽省太和縣人宮清平拐騙殘疾兒童赴廣州行乞，予以逮捕，經審理之後，宮被判八年徒刑。

據《大河報》2005年10月25至26日連續報道，河南省滑縣於2003年2月，又被安徽省太和縣人高金平以「招工」爲名在那兒拐騙走了至少八名孩子，帶往上海市沿街行乞賺錢。2005年3月這些孩子回家了，唯獨滑縣八里鄉的蕭姓男孩下落不明。蕭家找高金平詢問，高說蕭姓男孩在上海市走失了。有人說：「蕭孩在乞討中遇車禍身亡，車主賠高金平六萬元……」

蕭父說：「孩子走時還不到十四歲，他沒有文化，走後一直沒有給家來過信……」於是蕭家向警方報了案，高金平等人已被逮捕。經追查，和廣州宮清平案同出於一個地方——安徽省太和縣。

據《齊魯周刊》2004年第229期報道，「我怎樣能止住悲傷如同止住眼淚，我的小翠？」——愛滋孤兒賣淫殺人事件。這種現象並非僅有這一起，誘騙愛滋女遺孤賣淫事件，各地不同程度都有發現，爲了保護少女的名譽，在此不再多贅述了。

以上事例說明了什麼？使我聯想到這些不法分子的魔掌，爲啥會伸向愛滋孤兒？因爲這些孩子失去了父母，無依無靠。有的孩子還有心理扭曲現象，比殘疾兒更容易受騙上當，更無人過問，無人追查。天呀，誰又能知道多少孩子會有同樣遭遇呢？

（二）被領養的愛滋孤兒生活怎樣

鑑於以上情況，解決愛滋孤兒的撫養問題已經成爲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我建議分散撫養，最好用以下兩種方式：

1. 領養。有些有經濟能力的無子女家庭、普通的好心人願意收養孩子，其中也不乏騙子企圖進行不法活動，特別是在孩子身上敲詐錢財還給孩子氣受……爲此有關部門必須慎重。法律保障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依法行事。讓有條件的家庭領養孤兒，經過有關部門辦理正式領



養手續，建立正式的養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按《中華人民共和國領養法》，領養孤兒不受計劃生育限制，養父母必須履行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有贍養養父母的義務。對那些聲譽不佳、別有用心者，應予以監督……必要時解除領養關係……

2. 助養。代理父母經民政部

門辦理正式的助養手續後，負責孤兒生活和教育一切費用，減輕社會的負擔，而孤兒的姓名等不變，十八歲成人後，孤兒可以獨立生活，代理父母任務完成。

2002年夏季以來，曾經有七個愛滋孤兒先後進入山東曹縣，這七個孩子分散在五個村莊七個農民家庭，最大的十四歲最小的四歲。近兩年來，他們多數已經融入了這些家庭，和養父母的關係融洽，只有個別孩子例外而轉走。其他孩子精神狀態很好，活潑可愛，在各自的學校讀書成績優異，和同學們相處愉快，有兩個孩子現在當上了班長。十六歲的女孩，現在讀高中一年級，期中考試成績六百多分，最小的在幼兒園。

在中央和地方電視台報道過數十次。孩子們長胖了，也都長高了。誰也看不出來他們曾經有過一段辛酸的愛滋孤兒歷史。其中，最大的女孩立志要讀大學；最大的男孩現在十四歲，他把現在的家庭生活看得「像天堂一樣」，騎車都唱着歌兒；再一個男孩是一個最能維持班級秩序的班長，他的老師說「只要他在班裏秩序就不亂」；還有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寫信說：「我長大把天下書讀完，有了工作就把妹妹從老家救出來。」（因為現在他們老家不讓愛滋孤兒離開當地被領養）；最小的女孩誰要說把她送回老家她就哭。有一次有個新聞頻道作節目，主持人逗這個女孩說：「把你送回老家吧？」她哭了，一說不送馬上又笑了。最



與愛滋孤兒合照

小的男孩誰要說不是他媽媽（養母）生的他就要吵架、打架。有一次他姑姑家的孩子來了，說「你能得不輕（方言：你別這麼霸道），你不是我姪子（舅母）生的！」他哭着向媽媽告狀：「媽媽，他說我不是你生的！」他媽媽對外甥說：「滾！」他高興了，不哭啦。這些孩子已經認同自己是新家庭的成員了。

由此看來，我所提倡的分散撫養方法對孤兒對社會都很有好處：孤兒有了父母，有人愛護，生活有着落，教育有保障，也免受社會歧視；孤兒和正常兒童在一起玩耍、讀書和生活，日子久了，能慢慢消除他們的心理陰影，有利於孩子的成長；為政府為社會節約了開支，比辦孤兒院集體撫養效果好得多。同時更會得到社會多方面的關注，請看下面貴州一個中學生的來信：

高奶奶：您好！

……我是出生於貴州桐梓縣的一家普通家裏，我叫劉某，今年上初三。

高奶奶，那天我看了面對面的節目，也了解了您，認識了您，我認為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您把一切都給了那愛滋孤兒，您撫育了他們，把無私的愛給了他們，給了他們一個溫暖的家。我想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像您那樣的話，中國的富與窮就沒那麼大的差距了……

當記者問到您為什麼要幫助那愛滋孤兒，他們又與您沒有血緣關係，您不怕得不到什麼回報，又不怕其他人對您的偏見，更不怕傳染……

您說得對，「愛滋病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無知。」真的，愛滋病並不可怕，我們要了解愛滋病，要知道怎樣預防它……

高奶奶……

再見！



祝身體健康，全家幸福

劉某

2004年9月25日

關鍵的問題是地方政府不讓這些愛滋孤兒走出當地，爲的就是怕孩子「亂說情況」、「丟面子」。那些想收養孩子的家庭以及那些希望獲得收養的孩子，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關於地方政府提供支持幫助方面，我也不知道。各方都有不同的說法，誰也不知道真正的情況怎麼樣。不過有的孤兒在新家確實受罪，某些人以他爲進財之道，謊話之多，令人難以忍受。

（三）辦孤兒院集體撫養有以下不良後果：

1. 愛滋孤兒心理創傷大同小異，他們相互影響。比如，我發現他們結拜兄弟姐妹，容易增長他們的反社會情緒。日子久了，毀壞了他們個人的前途，又會成爲不利於社會安定的因素。

2. 孤兒院的封閉環境容易被社會歧視。他們避免不了愛滋病的陰影，心靈上的創傷難以消失，心理變態仍可繼續。這批十幾歲的孩子就叫嚷着「殺人」，十年二十年以後，他們想幹什麼能幹什麼難以預料，是否會造成社會動亂令人擔憂。

3. 辦孤兒院集體撫養增加了政府、社會的負擔，萬一孤兒發生了意外傷害或疾病，孤兒院負擔將不堪設想。另一個問題還可能引發經辦人貪污犯罪。官方已承認民間有人利用辦愛滋孤兒機構之名、行發財成名之實。而其他人士再辦孤兒院能否杜絕這一可怕的行爲呢？

這裏摘入一段武漢大學法學院 2005 年赴河南作暑假社會實踐在某陽光家園的見聞：

陽光家園是個讓人失望的地方。那個地方甚至讓我覺得像傳銷組織，所有的孩子都是下線，然後老師、院長、鄉領導是等級森嚴

的上線們，一級一級的進行着嚴密的精神控制，所有人對於所有問題的回答都是那麼的義正辭嚴、滴水不漏。他們的條件真好，無論哪個方面，我一度以為他們生活得很幸福，以為他們很幸運，以為他們會健康幸福地成長，但是一個小女孩的話改變了我的看法。我問她：「老師平時批評你們嗎？」她說：「不批評只教育。」我驚異於一個十二歲孩子的成熟，這個答案我都想不出來，忽然隱約中有了一種感覺——大概文革就是這樣的吧，我們又回到了人治社會，或許在這裏從來就沒有過法治。心裏有一種悲哀，我們的研究對象生活在這樣一種人治的環境下，還談什麼人權保障呢？我們的研究除了紙上談兵之外還有什麼意義呢？

商丘的經歷是一次從未有過的歷險，現在回想起來仍然心有餘悸。就像港片一樣，我們從進入著名的雙廟村之前就被盯梢了，然後我們自己渾然不覺的在村口那家訪問了一個多小時出來後，被幾個彪形大漢攔下，然而我們一言不發的徑直往前走，此後就一直被跟蹤。期間，大家到處發短信給所有八竿子能打着的人，要他們一個小時內收不到消息就報警，直到他們的車突然橫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在承認錯誤和自我批評態度極好的情況下，被押上了車，然後開始與押我們的政府人員不着邊際的瞎扯，並對他們進行噁心肉麻的吹捧，直到我們到達縣城順利下車。商丘愛滋村的情況比較糟糕，政府對很多情況都藏着掖着，一級一級的向上瞞報假報，而且國家每年的救濟款並沒有發到病人手中，雙廟村的病人一個月只能拿到一百五十元的救濟款，這其中還包括他們的醫藥費。回來之後，覺得很沉重，如果說陽光家園讓我感到了人治社會的影子，那麼崗王鄉就是標準的專制統治，村裏有人巡邏，不許任何外人進入，政府財政不透明，鄉幹部都是白白胖胖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古諺用到他們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愛滋孤兒是愛滋病傳播造成的後遺症，他們心理會出現變異，有的



兒童仇視社會，長大之後會擾亂社會治安嗎？不可輕視。爲了將來社會的安定，不能再捂蓋子了。更要制止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發愛滋孤兒財！

請看這封被人領養愛滋孤兒的來信。她是社會助學的，但還會遭到騙她出錢買「廢品」的事情。其信如下：

敬愛的奶奶：

您好，我現在學習很忙，很少給您寫信，請原諒。

我現在這裏很好，因為快要期中考試了，現在老師說：「讓我們（買）易佳憶說是記助器，幫助學生，增強記憶，提高效率，爸爸說是騙人的，哪有那麼好的事，一台用二十九元，爸爸說如果真是這樣，一百元、五百元也買。奶奶您說我應買嗎？」

我知道，作為一名學生，只要自己不好好學習，再好的東西也沒有用，只要自己努力，很快就會敢（趕）上去。語文老師說：「不要認真（為）自己就比別人笨，只要努力，一定會趕上去的。」數學老師說：「學習差只時暫時的，並不代表你的以後和未來。只要努力學，這時還不晚。」現在，我的數學老師很關心我，奶奶放心，這裏我很好，奶奶您帶（代）我向爺爺問好。

祝身體健康

楊某

2004年11月16日

（四）夢中重逢凍傷孤兒

鵝毛大片的雪花，隨狂風降臨到大地，身居暖氣室，還感到寒冷，饑寒交迫的窮人們，特別是愛滋病的受害者，他們怎樣生活呢？

一日夜幕初降，同情這個群體的老人們，大家在閒聊愛滋慘況，有位退休老師說：「你們知道嗎？愛滋病疫區有個順口溜。」

她說：

走一鄉又一鄉，哪鄉沒有賣血狂，
走一村又一村，哪村沒有愛滋病病人，
走一家又一家，哪家沒有愛滋病娃娃，
走一林又一林，哪林沒有新添的亡墳。

大家聽完之後，就說出了許多有關愛滋病疫情的動人故事，不知不覺，掛鐘的時間已指向十二時，夜深了，朋友們各自回家休息，獨我一人，在回憶中進入夢鄉，重見 2000 年初的情景，一幕又一幕的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和愛滋病病人、愛滋孤兒在一起活動，看到了許多孤兒的身影，他們面部、手足，多處凍傷，特別是昔日的真人真事，又在我腦海中映現出來。

1・單孤比雙孤幸福

祖英（化名）愁眉苦臉的站在我的面前，她兩隻小手纏着紗布，我問她：「你的手有啥毛病？」

祖英說：「我的手凍爛了，我爸領我在衛生所包紮的，現在好些。」

今年她才八歲，她媽媽生她時產後大出血，在醫院輸了兩袋血（不知血量），染上了愛滋病。她兩歲時，她媽媽病倒了，到處求醫，愈治病愈重，家中的積蓄也花完啦。她臨死前三天赴縣醫院求治，抽血化驗 HIV 抗體，結果是「陽性」，確診為愛滋病，她不情願的走了。從她媽媽埋葬之後，小祖英經常跑到墳墓前，自言自語的和媽媽說話。

祖英媽媽的墳墓，周圍用青磚建了三個圓圈，她經常爬在墳墓邊上，用小手指摳磚縫之間的土，她把每個磚縫摳的很深，有人問她：「祖英你摳墳子周圍的磚縫幹什麼？」

祖英說：「我看媽媽在裏面幹啥哩？我很想念她，喊她，她也不回答。」

她到了上學的年齡，因母嬰傳播，她也是個愛滋病病毒的感染者，村小學拒絕入取，她失去了讀書的機會。



她爸爸宋某多次抽血化驗 HIV 抗體，均為陰性，說明他沒有感染愛滋病，他需要下地幹農活，留下祖英一人在家。她不甘寂寞，多次去媽媽墳前呼喊，哭累啦，喊累啦，自己躺在地上，枕着墳上的青磚睡着了，多次被她爸爸找回家。有一次她又去墳地找媽媽，天突然下起暴雨，祖英急得抱着樹幹喊爸爸，幸虧遇上同村下地幹活的老大娘，把祖英背回家了。

那時河北天氣特別冷，祖英吃的不好，穿的不暖，她又經常往媽媽墳地跑，手凍爛了，前天她爸爸又領祖英去村衛生所治療，看來她比其他愛滋雙孤兒幸福。西風先生為祖英題詩一首：

人生百年本是夢，
悲喜相伴各不同。
最是死別生離恨，
親娘墳前淚泉湧。

2. 「血漿經濟」的受害者

曜曜（化名）他出生在賣血高潮的前夕，是沈家的一棵獨苗，他的爺爺有四個兒子，他是沈有大的兒子。因家境貧寒，四個兒子娶妻蓋房，是一件大事，因此，全家五口人賣血，他們一心想致富，絲毫不知賣血的危害，反而聽信政府的宣傳，「賣血有利於健康，不得高血壓」。兄弟四人從這個血站賣到那個血站，從本省賣到外省，不但天天去賣，而且一天會在不同的血站賣兩三次血，在採血牀上昏過去，給抬下來，但是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賣血是條不歸路。

他們賣血掙錢，本意是想娶妻蓋房過幸福生活，豈知禍從天降。1999年初，沈老二開始生病，吃藥無效，他很快病倒了，沈老四也病了，沈老夫妻二人在一個月內先後發病，兩個月後沈老四也病了。全家共八口人，五口中年人都在害病，他們都是發燒、厭食、腹瀉，他們

四處求醫，卻愈治病情愈重。2000年元月沈老二先去世，三個月後，沈老大和妻子在一個月內都死了，沈老三和老四在中秋節前後死亡，沈家一年內死了五口人，當時誰也不知道他們害的是啥病，有人說是「怪病」，有人說是「瘟疫」，有人說是「熱病」，大家疑神疑鬼，請巫婆驅邪，巫婆說：「沈家宅基地遭惹了大仙。」一時鬧得沸沸揚揚，兩位悲痛交集的老人，年已八十高齡，哪能經得起這樣的折騰，春節前兩位老人在十天內相繼去世了，曜曜成了孤苦伶仃度日如年的孤兒。

直至2002年大家才知道，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賣血引發愛滋病的惡果，但一切都晚了，政府又把愛滋病列入「保密」的範疇，不准外人來瞭解情況，年幼的曜曜就生活在這個悲慘痛苦的環境中。

2005年的一天，我去曜曜家，看見他獨自一人捲曲在四處透風的草屋裏，白天他蜷曲在小火爐旁取暖，夜間他在草鋪上，蓋上一牀又舊又爛的棉被，他的衣服襤褸而單薄，他饑一頓飽一頓，多是好心人送來的飯，他沒有去學校讀書，因為他家人有「瘟病」，學校怕傳染拒絕收他入校。曜曜以往的學習成績很好，又是三好學生，得了許多獎狀，見照片。

曜曜以前活蹦亂跳，現在走起路來一瘸一拐，我問他：「你爲啥走



愛滋孤兒曜曜



不好路呢？」他說：「我的腳凍爛了。」

我掀開他的褲子看，發現他只穿兩條單褲，幸虧他還穿着一件大棉襖，上身可以保暖，他的兩隻小腳凍得青紫，腳後跟和兩側外踝全凍爛了，凍傷表面呈黑色，邊沿向外流水，我問他：「你凍瘡上敷的啥藥？」曜曜說：「我哪有錢買藥，我用鍋底灰貼在凍瘡表面，傷面啥時流水，我啥時候往上撒鍋底灰。」

我看完聽完之後，心如刀刺，天啊！這無辜的孩子，遭這麼大的罪，蒼天啊，您太無知！天又陰了，快下雪啦，曜曜怎麼辦呢？

我臨離開這個村莊時，我再三叮囑村醫，領曜曜去縣防疫站化驗一下HIV抗體。春節快來了，我叫小杜給他捎去棉褲、棉襖、棉鞋、棉被等物品。小杜回來說：「曜曜檢查了，他沒有愛滋病。」遺憾的是，那個地區封閉很嚴，我再也無法與曜曜聯繫。西風先生爲他題詩一首：

賣血妖風正席捲，
妖風所至百花殘。
哀憐幼女臨此境，
不知何處度饑寒。

結束語

人們都說，做夢是心中想的，在夢中見到這些孤兒，可能是我太想他們了，夢中見的孩子們，以往我都很熟悉，他們在艱難中活着，有些孩子已被饑寒奪走了生命，因爲我沒親眼目睹，故沒有在我腦海中留下印象。

當「血禍」遍及全國時，政府公布的感染人數、死亡人數，全是避重就輕，河南省政府公開承認有三十八個村出現愛滋病疫情，其實呢？我親眼所見，在每個重點村周圍至少有十幾個村有愛滋病疫情，有的村

的愛滋病疫情已超過了那些重點村的疫情嚴重程度。如世界聞名的文樓村，與其兩里路之隔的後陽村，有一天就埋葬了六位死於愛滋病的人。因「血禍」受害的區域分佈呈片狀，局灶型，面積大，人數多，有以下特點：

1・在村周圍田野裏，可見許多新墳，且逐漸增多，有時還可以看到哭墳的老人和兒童。

2・村民門上貼着，白紙、綠紙、蘭紙，紙上沒有寫字，這是當地風俗，家中死了人，第一年貼白紙，第二年貼綠紙，第三年貼蘭紙，三年後才貼正常的紅色對聯，在重疫村，十有八九的家庭門上貼着白綠蘭色的紙，表示這些家庭近三年死過人。

3・許多家庭只有老人和孩子，中年人呢？因賣血被愛滋病奪走了，在村裏還有空無一人的院子，全家病死了。

上述是十多年來，我在鄉村所見的慘況，令人感歎，西風先生題詩一首：

暗淡了刀光劍影，
遠去了馬蹄槍聲，
塵封了戰爭歲月，
卻吹來血雨腥風。

2005年12月12日晨醒來寫



第二十三節 真正關注愛滋孤兒者來了

杜聰在愛滋浩劫救孤工作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他費盡心機，到2009年上半年共救助一萬多人，由於每學期有輟學、畢業，到2009年底他所救助的愛滋孤兒在校學習的有八千多人，其中不乏大學生。他說：「急救愛滋如救火」。高燕寧教授在防愛工作和救助愛滋孤兒方面，多次與我們共同下鄉尋找愛滋孤兒，他還查閱發表了不少有關愛滋病疫情的歷史資料，盡心盡力，令人欽佩。

一 杜聰來了

十二年來通過我來參加「防愛」的志願者，不少於百人以上，絕大多數人畏難而退，或想在愛滋領域中發筆橫財。杜聰進入愛滋領域已七至八年了，且由小到大，現在我介紹一下他的神奇來歷，真是愛滋孤兒的福星。

2001年冬季，我多次接到香港一位男士杜聰的電話，他說：「我想去河南見你，幫助你救助愛滋孤兒。」

我說：「你不要來，我們這裏警員會抓你，或趕你走。」

杜說：「不會吧，我是智行基金會的總幹事，我們這個基金會在香港正式註冊，是合法的。」

我說：「北京彭記者、上海鄉友人記者都在我的門外被抓過，不過沒有打他們，只餓他們兩頓飯趕他們走了。」

杜說：「真的嗎？我想警員不會抓我，我不是記者，我來做善事的……」

我說：「那不一定，本人意見，杜先生還是不來為好！免出意外！」

2002年元月23日早七時左右，杜聰來了，他就在我住的小區門

前，賣油條小攤的人群中給我打電話說：「我叫杜聰，我來到了……」

我接到電話大吃一驚，杜聰真的來了，不管他來河南抱的是哪種目的，我不得不接見，我下樓走在小區門外，看見一個胖胖矮矮約三十歲左右，身後背着一個大旅行包的男士，從氣質上看他完全不是本地人，於是我主動向前打招呼，杜說了一口廣東的普通話，我有時聽不懂，他對我說的話也聽不清。

我沒有敢讓他進家，我帶上禮品，領着杜聰僱了一輛的士到我中學的一位同學家去了，起步時電話通知她出來接我們，她真的出來了，但不巧走錯了路，我們找不到她的家，怎麼辦呢？我們乘坐的的士司機伸出了援助之手，把我們領到他的家，先沖茶，後做飯，我和杜聰在他家吃了頓中午飯，我把我給同學帶的禮物全送他了。

在他家和杜聰談了四個多小時，大致分為兩部分：

1. 據我調查了解的愛滋病疫情，不僅限於河南，在周邊的幾個省如河北、山東、山西、陝西、安徽等省的愛滋病疫情，與河南大同小異，愛滋病的傳播途徑，主要是「血禍」賣血與輸血，我去過駐馬店、周口、開封、商丘等地區十幾個縣市，病人發病很集中，呈片狀，一片就是幾個村。

杜聰問我，因「血禍」感染愛滋病有多少人？現在死亡多少人？遺留有多少孤兒？

我回答說：「自 80 年代已開始出現這種病，大家都不知道『愛滋病』這個病名，那時已開始因這種病死人了，死的多是中青年人，遺留的孤兒絕大多數是未成年人。你問的這三個問題，依我之見解，永遠是歷史之謎，所能見到的是田野裏增加了許多墳墓。」

2. 杜聰又問，在愛滋村的孤兒由誰來管？怎樣管的？

我說：「據我所知愛滋孤兒沒有具體管理部門，任其四處流浪。」我給他舉了一個例子，如高闖姐弟二人，父母死後，生活無依無靠，我給他倆寄去的錢，他們自己說沒有收到，有的愛滋孤兒對社會已產生反



感，現在孤兒問題，已成了未來的社會問題，我曾多次呼籲，但未能引起政府的重視。

杜聰要求深入農村調查了解，救援愛滋孤兒，我表示歡迎，但我內心還是將信將疑，因為這幾年我遇見的騙子太多了，見陌生人就害怕，杜聰是個美籍華人，我對他懷疑加緊張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我表面上還是非常熱情。我們談到下午四時，我送他上火車走了。

2002年5月的一天，上海復旦大學高燕寧教授來了，他的來意基本與杜聰相似，我介紹他們認識了，杜聰開始在上蔡王營村建了孤兒的救助基地，高與杜多次去那裏。同時我們三個也調查了其他愛滋村，給愛滋病病人和孤兒們送去衣物、食品、書籍等，很受他們的歡迎，但還經常遇到以下問題：

1. 乘火車、長途汽車，因時間沒有保證，給愛滋孤兒帶東西搬運很困難，特別是往農村運書，更難辦。僱車比較方便，但司機若知道是去愛滋病村，車開在半路上，司機以車壞了之名，多給錢也不去。到了農村吃飯也是問題，老鄉們多留我們吃飯，但看到他們貧窮的那個樣，實在不忍心，村裏很少有飯店，忍飢捱餓更常事。

2. 愛滋病病人怕歧視不敢暴露身體，他們死亡之後孩子們任其流浪，多數孩子厭學，他們熱衷外出打工，這些十多歲的孩子一無文化，二無技術，他們能勝任什麼工作呢？女孩流落成暗娼者大有人在，如《齊魯周刊》229期報道《我怎能止住悲傷如同止住眼淚，我的小學——〈賣淫愛滋孤兒殺人事件〉》；男孩呢？有人被騙到黑窩廠、黑磚廠做苦力，捱打捱餓，受盡了折磨，有的喪了生命，多年來這種事件屢見不鮮！

3. 地方官員怕影響他們的政績，捂愛滋病疫情蓋子，不讓愛滋病病人說實話，愛滋病病人陳勤曾悄悄告訴我說：「俺村這種病人多哩，支書（黨支部書記）不讓說。」地方官員很聰明，爲了封閉愛滋病消息，在村口設有哨所，見到陌生人來訪，急忙把來人趕走，若遇到不想走

者，立即動用民兵。

2003年5月13日，我和杜聰、高燕寧三人赴山東曹縣（我的原籍）看望寄養的愛滋孤兒，在出租車上有說有笑，高高興興，因為我們見到每個孤兒生活得都很快樂……杜聰突然說：「高老師你以後再叫我杜先生我就不答話了，你和我外婆是同齡人，我是你們的第三代人，以後你叫我『阿聰』就行了。」

次日從山東返回，下午途經河南省柘城縣王崗鄉雙廟村，那兒有位叫朱進忠（賣血感染愛滋病的農民）辦的孤兒院，內有五十多個孤兒，我們順便給他們送上一些衣物、食品等。我們三人剛進入朱家，朱進忠不在家，孤兒和志願者團團的把我們圍住，大家談了約五至六分鐘，我發現有幾個人向屋內探頭探腦，眼神極不正常的窺視我們，我給杜和高說：「氣候不對，咱走吧。」我忙着告辭，志願者朱老師明白，他起身來為我們送別，高燕寧忙着走出屋門上車，我在後邊走着……

杜聰一本正經的說：「剛來到，咱聊聊吧，天不會下雨……」他一動也不動。我和高燕寧急忙催：「杜聰快走！阿聰快走！」杜聰慢悠悠的上了車。汽車剛開出村莊，當地一群民兵警員跟上來了。杜聰拍着司機的肩膀說：「快開，快開……」

我說：「汽車開快了會出事的……」

杜聰說：「我害怕他們來打我……」

這一場高高興興的善舉，剎那間變成了一場驚慌，一場鬧劇，真令人啼笑皆非！杜聰遇到這樣的情況並非一次，但他還是一直堅持了下來，現在救助了六千多名愛滋病受害者的孩子。有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給杜聰寫了一首讚美詩：

因為（寫給杜聰先生）

您的救孤助學義舉，

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毋須讚譽，
為，毋須讚譽！
歷史已有定評！
可是我還是要獻上真誠的詩句。
您已為國內外有良知者銘記！
因為，您令我深深的感動，
您為了救助孤兒讀書，
是在為難自己和您的同志……
您不怕攻擊，
您有膽有識，不怕小人攻擊！
因為，您這樣做的決不是為了自己和小集團的利益。

您擁有真理和正義，
您做的是救孤於水火！
不但是當代的銘記，
而是千秋民族的福利！
不怕攻擊；光焰萬丈，
可還是有小人煞費心機，
妄想對您的形象進行毀譽，
因為，您聖潔無比！
您所作所為妨礙了他們的利益，
您對……
他們醜惡的靈魂，
萬民永不忘記。
他們的行騙，做假的伎倆，
歷史永不會遺失。
向來就是如此。

「文革」留下的殘渣餘孽，
如此齷齪，如此卑鄙！
無數的愛滋受害者和孤兒們。
還有真正善良的人們，
他們都會由衷的敬仰着您！
讚譽，不將你抬高，
估計永不會把你貶低。
您的救孤助學事業，
世人永存感激。

二 杜聰說：急救愛滋如救火（本小節是杜聰的回憶）

自90年代初，華中地區不少人爲了賺取一些額外收入而「有償獻血」。不衛生的採血方法導致很多人因此而感染了愛滋病。自2000年開始，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病人，經過近十年的潛伏期，很多地方均出現大規模的發病情況。

幾年前，當我聽聞這場因賣血而導致的愛滋病災難時，初期感到有點難以置信。後來跟很多從事衛生工作的人員談及此事時，才開始漸漸對事情有所了解。經過長時間透過多方面的聯繫，終於在2002年，我主動赴愛滋病疫區找高耀潔醫生，然後到該地區了解情況。就是這樣，我便與當地因愛滋病而成爲孤兒的孩子們結下了不解緣分。

（一）目睹愛滋慘況

記得第一次到華中地區，只屬考察性質，並沒有具體計劃要如何救助當地的人。經過連日來的家庭訪問，讓我深深的體會到愛滋病在當地所造成的巨大災難。同時也叫我體諒和同情當地政府的處境。一個小小的地方縣政府便要在極度缺乏資源的環境下，照顧成千上萬的愛滋病病人及其他因愛滋病而造成的種種問題，真是十分艱難。



工作旅程中曾訪問了一戶被愛滋病弄得家破人亡的家庭，本來老中青三代同堂，中間的一代，有六兄弟姊妹，早年爲了改善生活和孝順年老的父母而去賣血，結果六名子女全部染上愛滋病，當時大哥二哥已經因病去世了，剩下的四個弟妹亦開始發病，時日無多，可憐老父不單不能享兒女福，還要天天搬運磚頭來賺取微薄的收入，白頭人送黑頭人，眼睜睜看見自己的六個孩子一個一個的死去，剩下一群孫子要老人家來照顧。這是我親眼目睹這個大好家庭日漸衰落，叫人不勝唏噓。兩年後再一次訪問這個家庭時，六兄弟姐妹已死了五人，最後一個也奄奄一息。

這樣的斷代家庭，即中年的一代完全被毀滅的，我探訪過不少，除了帶來了孤兒問題，還有老人家缺乏照顧的問題。由於感染愛滋病的是中年的勞動人口爲主，所以生產力也受到極大影響，毀了三代人。

愛滋病除了直接奪去農民的生命外，還間接造成傷亡。不少人因爲承受不了因愛滋病帶來的苦難，不忍心看見親人一個個的離逝，寧願選擇自殺的道路。我曾經訪問過一個村莊，一個月之內便有五人自殺身亡，而自殺失敗被救回的更不計其數。對於一個只有二千多人口的農村來說，自殺率實在相當高。

還記得第一次走訪農村的那天，在短短一天之內，一口氣跑了幾個村莊，其中一條村內的一個大隊，幾十戶人家，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愛滋病病人，在陰暗的、密不透風的屋子裏，躺着一個個病危的年輕病人，他們本應是人生風華正茂的年紀，但現在他們沒能力照顧年幼子女和風燭殘年的老人，卻過着天天與死神搏鬥的日子。當時還未有抗病毒藥物的提供，連一些針對機會性感染的藥物也十分缺乏，病人與愛滋病病毒鬥爭之同時，亦普遍有發燒、腹瀉、疱疹、瘡瘍類症狀等現象，使他們痛苦不堪，情況叫人慘不忍睹。死亡固然可怕，但死得沒有尊嚴更加可怕。雖是炎炎夏日，卻叫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這樣的慢死折磨所造成的人間地獄，比一剎那的地震或水災，對病人及其家人來說，要來得

百倍殘忍。

到了下午四時，連陪同我做家訪的當地人也不忍心看下去了，我們一行五個男子漢，默默看着村外的玉米田，無不觸動得哭泣流涕。其中一人悄悄的自言自語說：「這真是一場國難。」據一些當地人說，一些村落的愛滋病感染率，竟達成年人口的40%至60%。

（二）幫助愛滋孤兒上學

我所接觸過的小孩子，每個人都在默默承受着一切的苦難。他們的堅強和刻苦，實在叫我敬佩萬分。

他們不單要提早擔起一家之主的責任，處理家務之餘還要照顧父母弟妹，還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無助地親眼目睹父母親飽受愛滋病煎熬下痛苦的離逝。這樣殘酷的打擊，不要說十幾歲的小孩子，對五六十歲的成年人來說，當要面臨送別父母的人生最後一程時，還是有不少人承受不了。

我曾經探訪過一些所謂的家庭，其實是由幾個孩子所組成的。當家長雙雙離逝之後，如果長女或長子已有十四五歲，很有可能她（他）便成了一家之主，並要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幸好在農村的環境，一個村



智行基金會幹事杜聰先生與內地愛滋孤兒在一起



莊可能是由幾個大的同姓氏宗族組成，小孩雖然是獨自居住，但仍可以得到村內的親戚定期的照顧和接濟。

就在離開農村前的那個晚上，我徹夜難眠，不斷回想起幾天以來在當地所見所聞的人間地獄，久久不能入睡。仲夏夜，繁星閃耀，我倚在窗旁，凝望着天上的星空，立志要為那裏的人做點事。就是這樣，我開始全身投入華中地區的愛滋救助工作。

我認為如果能讓這些愛滋遺孤完成起碼的初中課程，他們長大後便可以更有競爭力，更有機會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擺脫貧困。另外，助學還可以改變孤兒的生活環境，掃除孤兒心靈上的陰影。

經過這幾年的奔波努力，智行基金會在中國大陸地區正為五千多名學生，通過替他們交付書簿雜費、生活費和一些關愛工作，提供教育機會和其他救助。他們的父母都是已因愛滋病而去世，或愛滋病病毒呈「陽性」反應的人。

經過五個學期的運作和經驗累積，助學的工作已漸上軌道。三年前為了盡快解決龐大孤兒人口的生存問題，我們以量為主，精力主要放在擴大受助孤兒人數之上。隨着工作的繼續鋪開及國家對愛滋病問題的重視，例如「四免一關懷」中包括的孤兒免費普及九年教育，孤兒的基本生存問題將漸漸得到解決，我們的方向亦演變為加快思考和實踐孤兒的發展問題，以配合國家的救助工作。

於是在助學方面，我們開始擴大力度資助愈來愈多的高中生和大學生，雖然每資助一人可能要用數千元，但他們能有本事以平價生考上高中以上的學校，證明他們是愛滋遺孤中最優秀的一群，更加值得栽培。至於小學及初中，由於是屬於普及九年教育之內，「四免一關懷」的政策雖然剛開始而仍未全面到位，但開始有些地方的孩子已獲得部分減免，未來的方向應該是跟當地的衛生教育及民政系統配合，不重複政府該做的或承諾做的事，而是配合協調政府的工作，拾遺補缺，目的是讓孩子接受全免的教育及更全面的發展和關懷，甚至能得到一些生活的補助。

除了助學以外，有些十八歲以上的愛滋遺孤，已經錯過了讀書的時光，另有缺乏讀書天分而厭學者。對此我們展開了職業培訓，介紹他們到外面工作，讓他們能有一技之長，也能賺取一點收入幫補家庭。有一個在職業培訓的遺孤，弟妹因為我們的助學而讀書，父母雖有愛滋病，但亦能受惠於我們每月發雞蛋及督導員的工作，而他更可賺錢寄回家，全家都能幫上了。

孤兒的發展問題中，最嚴重及最難處理的可算是孤兒的精神心理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如處理得不好，將來他們長大後，可能會有憂鬱症、狂躁症、自閉症等，甚至有自殺傾向，將會影響他們及他們的夫妻子女一輩子的生活。

愛滋遺孤的精神心理問題，思考不應只放在治療他們的傷痛身上，而要從更全面的角度出發。例如怎樣才能使這些孩子不會變得冷酷無情，要懂得關心別人，要有感謝報恩之心和回饋社會的責任感。甚至不要被人過分寵壞，養成過分依賴的心態，把自己的愛滋孤兒身分變成博取別人可憐同情的賣點，甚至搖錢樹。

每個人的心理狀況都不一樣，所以這個問題比助學要複雜得多。而且並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未來的日子，可能需要不斷的思考、摸索和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的幫助。

在助學的過程中，我也注意到傳媒對華中地區窮追猛打的採訪報道所引起的誤導。當我在全國各地展開愛滋病預防教育時，不少人會這樣對我說：「噢，愛滋病，聽說在華中地區有，我們這個省（或地區）沒有。」賣血地區以外的人民有不少以為愛滋病與他們無關，也可能因而導致疏於防範，過於自滿，掉以輕心。媒體有責任教育公眾，愛滋病是全國，甚至全球的問題，不僅是一個賣血地區的問題。

假如愛滋病是一場大火，這場大火已經開始在全國各地燃燒，目前最急切的任務是在火場中救人，即減少愛滋病病人所受的痛苦，讓病人的遺孤得到關愛和接受教育的機會。至於起火原因是意外還是蓄意縱



火，是誰人放火等問題，相對來說顯得次要。

與其隔岸觀火，高調炒作，追究責任，不如親臨火海，低調實幹，救火救人。

三 高燕寧來了

高燕寧是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婦幼衛生研究室的教授，他對愛滋病的流行非常關注。他來到河南愛滋病疫區，很快地與杜聰合作了，高教授對愛滋孤兒盡心盡力，深入愛滋病疫區調查真實情況。

（一）高燕寧教授工作不怕困難

2001年冬季的一天，我接到高老師的電話，他詢問我當地愛滋病情況，我告訴他：「那裏疫情很慘重，但為了安全起見，你不要來了。」2002年春季的一天，他還是來到了我家（我記得是在2002年元月23日我見杜聰之後）。從此，我們三人不斷地深入愛滋村，他能和愛滋病人、感染者打成一片，為了能夠深入了解愛滋村的情況，高教授裝扮成農民模樣。2004年夏季的一天，他赤腳穿着涼鞋，挽着褲腿從疫區回來，一進我家的門，我老伴就說：「高燕寧！誰能看出他是復旦大學的教授？」說明高教授在工作中敢於付出，不怕困難。

（二）他在科研項目調查工作中敢於碰硬

高老師帶着科研任務深入愛滋病疫區調查情況、搜集資料，他很注意記錄一時一事，特別是婦女、兒童的感染途徑和痛苦慘狀。他拍了不少有價值的照片，在我那本《中國愛滋病調查》一書中，彩圖第4頁「垂死的愛滋患兒」就是他拍的。他還很關注這個弱勢群體的救助工作，經常與杜聰一起走村串戶，還因此引發了基層幹部的不滿，並給他懸獎：誰發現並舉報高燕寧，獎勵五十元錢（比舉報我獎勵五百元少十分九）！2004年春季的一天，我和高、杜三人進入雙廟村，被幹部發現了，高老師很機警，看着事情不對頭，他就說：「走！」，我們三個馬上跑掉了，沒有被抓住。可是，高老師並不在乎，仍在愛滋病疫區堅持

暗訪，搜集資料。他堅持工作的精神令人欽佩！

（三）他在調查愛滋病疫情的同時，翻閱了大量資料

我經常向他人解釋：「本人不是『防愛第一人』，第一人是王淑平醫生，她1995年5月發現血庫存血中含有愛滋病病毒，並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但卻遭到打擊，於1995年11月就被迫停止工作、停發工資。而我堅持吶喊了十多年，所以大家誤認為我是第一人。」經高教授翻閱文獻得知：早在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醫師孫永德（已過世）已發現血庫存血中含有愛滋病病毒，他曾向中央衛生部、國務院打過報告，但石沉大海。假若那時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淨化血液系統管理，中國愛滋病就不會發展到今天的慘狀。高教授為這位鮮為人知的「第一人」孫永德主任醫師留名史冊，說明了高燕寧教授有着嚴謹的治學態度。高教授在防愛救孤工作中付出了很大努力，在愛滋病疫情發生發展中，他聽取了多位專家的意見，並記錄成文字資料，寫成論文如《血殤——中國單採血漿危機不完全報告》。

中國是肝炎大國。能使我們成為肝炎大國的東西，也能使我們成為愛滋大國。將此等專著留給後人，讓他們對這段愛滋病疫情的蔓延、流行史有個真實的了解。

他注重有關愛滋病預防、傳播途徑的宣傳工作，在復旦大學舉辦了多次演講，請過國內外專家學者，並能聽從各種意見。他請我赴上海復旦大學演講過三次，其中兩講的內容被選入《復旦大講堂》一書中。第一次選錄我的演講題目是《中國愛滋病傳播狀況與憂思》，於2004年5月1日出版。第二次是《愛滋病的「社會免疫」》，此書於2005年11月出版，選錄我的題目是《關注愛滋病村與「愛滋孤兒」》。



第二十四節 發現愛滋新情況

2004年10月下旬，我正在山東省濟南山東大學講演，突然接到電話，老伴病了，他本來就有高血壓、心臟病，八十歲的人了。這不知又出了啥毛病。我25日返回鄭州，他已經住院一天了，我只得吃住在醫院陪他住院。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老伴的病情自覺有所緩解。我又外出到山東去調查黑血站。因連日奔波，我也病倒了，血壓高達220mmHg多，我也住院了，嚇得醫生不讓我下牀，經過三個月的治療，血壓得到了控制。



為患病的老伴穿鞋子
(攝於2006年3月30日)

老伴入院後，一直按高血壓、心臟病治療，曾檢查多次，漏診了右側舌跟高分化淋狀上皮癌，因為老伴有老年性癡呆，主訴不清楚，失去了早期治療的機會，直到2005年10月7日我發現他口臭，氣味不對，要求醫生再次檢查，8日確診為癌症，發現癌灶超過額中線，肺部有轉移，雖做了一個多月的放射治療，但未能挽救他的生命。

這時期也得悉不少有關愛滋病的病案，總共有三十九例之多，現選出六例。

(一) 美妞之死

美妞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經過不但受盡了痛苦，更受盡了歧視，她的遭遇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她還代表着許多同病相憐的人。

1998年秋，一位二十八歲的婦女美妞（乳名），因剖腹產輸血感染了愛滋病；2002年秋，因發燒腹瀉，病重時孩子也患這種病死了，她被地區醫院確診為愛滋病，把愛滋病說成劇烈傳染病，村莊鄰居嚇得要死，怕傳染愛滋病不讓她在家中住。她丈夫無奈把她送到田野瓜棚裏躺着等死。每天給她送幾個饅頭和一壺水。她的病情日漸加重，不能進食了，送來的食物，放在那兒任其蒼蠅叮、老鼠咬，她躺在那兒動彈不得。她娘家沒有父母，兄弟姊妹誰也不敢來看望她……天漸漸冷了，寒風吹透了瓜棚，她丈夫送來了一牀舊棉被，但他怕傳染愛滋病所以也不敢進瓜棚給她蓋上，被子扔在她躺的草鋪上，始終沒能伸展開給她蓋在身上。幾個月後她死了，在她離開人世之際，誰也不在現場，只有舊被子還在那兒堆着，誰也不知道她離開人世的準確時間。幾天後，還是她丈夫趁夜晚悄悄的把她埋了。可幸的是她丈夫及其他家屬都沒有感染上愛滋病，時光匆匆，人們漸漸把她忘了。

2005年6月1日，有一位不願意暴露身分的先生去美妞家採訪，一進家門便看見她丈夫和新娶的妻子，懷裏抱着幾個月大小的男孩，活潑可愛，來者剛說出來意，她丈夫便把新妻子支出家門，讓她外出買煙，來者再問情況時，她丈夫搖着手說：「不敢說、不敢說，俺媳婦是外地人，在深圳打工認識的。她只知道我有過老婆，病死了，有過孩子，生下來就死了。千萬！千萬！不敢讓她知道，前妻和孩子是害愛滋病死的。不然現在的媳婦會給我鬧離婚……」說不下去，問不出來。來人辭別了，出家門時，男主人還再三叮囑，千萬千萬不要再提愛滋病這回事了。

（二）高燕走了

這個漂亮的女子，因婚前做過十五次人工流產，造成懷孕生產時胎盤黏連，剖腹取胎盤時，造成大出血。輸血感染了愛滋病，這樣的結局怪罪誰？是「無知」還是「放縱」？

1991年冬的一天，高燕（化名）找我看婦科病症，我問她：「結婚



幾年了？有沒有做過人工流產？」她沒說話。她丈夫說：「我們結婚三年了，未曾懷過孕……」我檢查時發現高燕子宮頸有三處損傷，而宮頸口較鬆弛。我問她：「你做過幾次人工流產？」高燕流淚了，她低聲說：「我做過十五次人流，在1987年一年做人流三次，我老公不知道。不敢往外說……」

我診斷她害的是「盆腔炎」，經過一年多的治療，她終於懷孕了，妊娠足月，在當地醫院住院待產，自然娩出一男性嬰兒。胎盤不下，醫生用手從陰道取不出來，只得剖腹取胎盤。術中輸血八百毫升，住院十二天母子健康出院。

從2002年起高燕開始生病，時輕時重，由縣醫院轉到市醫院。中藥、西藥一直服用，仍不見輕。2005年「五一」節之後，高燕赴北京大醫院求治，醫生抽血檢查HIV抗體「陽性」，確診為愛滋病。她丈夫與兒子抽血檢查HIV抗體，結果均為「陰性」，說明他們二人未染上愛滋病。高燕回家後完全失望了，她尋死覓活，不吃、不喝、不睡，二十多天後她死了。家屬怕歧視不讓說！

我認為她死於多次人工流產，子宮壁損傷，造成胎盤黏連，手術大出血，輸血感染了愛滋病致死。她留給後人的教訓是「潔身自好」。倘若她是因為性傳染，其丈夫與兒子很難倖免。可惜他們沒有勇氣站出來，暴露真正的面目。

（三）寂靜中的無奈

2001年春節的除夕，三十七歲的齊成和三十九歲的妻子陳葉，夫妻二人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他倆都因賣血感染了愛滋病。現在夫妻二人均已發病：極度消瘦、精神不振、倦怠乏力，還有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燒、不停的發嘔、吐黃水，每日多次腹瀉；端坐呼吸，陣發性咳嗽（醫生多按「肺炎」治療）；口腔糜爛，從口唇至咽腔，大面積的潰爛，上敷有白色、淡黃色、黃綠色痂膜，拭之出血，因疼痛，他們進食困難；齊成的上下肢、背部、胸部長滿了瘡癤或膿胞，潰爛滲出膿液，發出臭

氣，有的與衣服黏在一起，從衣服表面往外滲水伴有臭氣，衣服無法脫去，只能往上撒藥……

齊成有三女一子，老大十四歲，老二十二歲，老三十歲，老四是兒子。一心巴望要個兒子，但四歲的兒子一直身體不好，這病、那病，今天發燒咳嗽，明天嘔吐拉肚子，後天爛嘴長瘡……因為化驗一次要七十元錢，夫妻倆自顧不暇，一直沒有給兒子化驗，前幾天縣防疫站來了，給他兒子化驗了 HIV 抗體，「陽性」，說明四歲的兒子已感染了愛滋病。

齊成說，他從十六歲開始賣血，整整賣了十五年，先後到開封、商丘、駐馬店、義馬、確山、鄭州、新鄉、焦作、許昌等地「血站」賣血，賣了不下一千次，有時一天賣三次，每次賣七八百毫升，直被抽得從獻血牀上抬下來，賣了多少錢，也算不清楚，反正單漿採血是四十五元一次，全採是七十五元一次。靠賣血的錢蓋了三間房子，繳了一萬多元計劃生育罰款，但家裏至今還欠村委會三千九百元公糧款和計劃生育罰款，才逼得齊成繼續賣血。

眼見自己和妻子沒幾天活頭了，2003 年春節吃年夜飯時，齊成對七十一歲的母親說：「娘，俺倆走後，四個孩子就託給您照顧了。」老母親說：「我也是快入土的人，託給我不等於沒有託？」一家人相對無言，相對流涕直至五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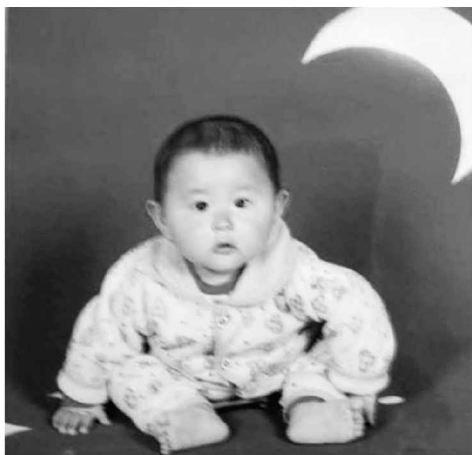
上面是我收集的 90 年代傳播的愛滋病病例。

下面是我收集的 2000 年以後感染的愛滋病病例：

（四）小宇（小名），男，1996 年 2 月出生，先天性齶裂，餵養困難，長大後說話發音不清，爲了孩子將來的發展，2002 年 8 月 26 日，他父母帶他到北京大學口腔醫院進行齶裂修補手術，術前檢查 HIV 抗體，「陰性」，2002 年 8 月 27 日輸血小板二百五十毫升，然後手術。2003 年 10 月發病，2003 年 11 月 9 日被確診爲愛滋病，其父母經省市疾控中心多次檢查 HIV 抗體，「陰性」。



（五）周楓林（周家要求用真名）於2004年10月22日出生，2005年8月20日，小楓林在室內沙發上玩耍，頭朝地摔下來，頭頂上摔了個青棗般大腫包，四十八小時後小楓林開始陣發性抽搐，雙目直視，雙手握拳，意識消失，一會又恢復正常。於是8月22日就診於駐馬店市第一人民醫院，醫生於8月23日、9月1



周楓林

日給他輸了兩次血小板。住院一周後，小楓林出院，此後一直生病。經各種檢查，2006年5月22日確診為愛滋病，6月9日死亡。他在人間生活了十九個多月，見照片。

（六）趙承月，男，七十四歲，農民，新密縣人，因胃出血於2006年2月17日住進河南省人民醫院消化科治療，住院時經過多方面檢查和化驗，特別是HIV抗體為「陰性」，後診斷為黏膜慢性淺表性炎伴出血。在住院期間醫生讓輸血治療。當時為了使疾病盡快康復，家屬同意輸血，結果輸了兩袋血，具體血量不詳。但家屬並沒有被告知輸血會引起其他疾病。趙承月住院九天後出院，出院後身體一直不好。2006年6月7日，又因排尿困難，再次到河南省人民醫院泌尿科住院，被確診為前列腺增生，在準備做前列腺切除手術時，又做了各項化驗和檢查，特別是對HIV抗體又作了檢查，這時的檢查發現HIV抗體為「陽性」。隨後，醫院拒絕為他進行手術，並驅趕病人出院。

愛滋病感染的真實情況，民衆的知曉率又有多高呢？以下摘錄兩封大學生的來信：

來信（一）：

敬愛的高奶奶：

您好！您辛苦了！

我是一名即將畢業的公共衛生管理專業的學生，以前上課時就有接觸有關愛滋病方面的情況介紹，老師還給我們放映了相應的警世片、宣傳片，感觸頗深。前一段時間有幸在圖書館拜讀了您的著作《中國愛滋病調查》，給我帶來了深深的震撼！以前只是聽說過您的名字，卻不知道有這樣的血染的風采；以前只是知道有關愛滋病的官方資料已經驚人，但必有偏差，卻不知道這個差距並非鴻溝；以前只知道愛滋病已經開始倍受關注，而不知道祖國遼闊的疆土上處處都是漏洞。

……

高奶奶，感謝您！真誠地感謝您！您的勇氣，您的信念是我一生的財富！相信您的付出一定會有回報！請您一定要多保重身體！

此致

敬禮

胡某

2007年9月27日

來信（二）：

高教授：

您好！

我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大一的學生……

您讓我知道愛滋病病人需要的是社會的關愛，而非拋棄，需要的是我們的援助，而不是歧視。我更加明白了我們必須面對愛滋病的事實，而不是刻意的逃避甚至掩蓋真相；您讓我知道人權不是口號，而是真真切切地關愛和尊重每一個生存的權利。



.....

最後，真切地祝您身體健康！

馮某

2007年10月5日

誰之過

西風

上世紀80年代，國門洞開。

迎來了世界文明，也泊來了愛滋病災！

愛滋病並非中國土產，為什麼？

能在中國迅速蔓延，

勢如席捲。

為什麼？能割根河南，打了個中心開花戰。

這裏有它生存，發展的環境，有它深深的社會根源。

血！

一樁樁驚心動魄的「血案」，

不是賣血傳播，定是輸血感染。

「血漿經濟」橫掃中原！

豫東、豫南許多縣，幾乎沒有空白點。

賣血者排成長串，十年間，賣血千次，一日三獻。

曾記否？賣了多少錢！

三間新房，四個孩子，尚欠計劃生育罰款。

賣血救窮，太普遍。

貪！

沒有貪腐的靠山，

黑血站怎能橫行鄉里間？
愛滋病怎能如此大規模傳染？
罪惡的貪官，掙來了鮮血浸透的錢。
貧苦的賣血者，走向了死亡的深淵。
時至今天。
並沒有揭開罪惡的根源。
排山倒海而來，又悄然走遠。
緊緊地捂住蓋子，不許多談，
諱避愛滋病的真凶，血液傳染，
卻大談同性戀！

愚！
被愚弄，是弱勢群體的特點，
無論有多少女兒，也要生男。
孩子要吃飯，計生要罰款。
生出了貧困，長成了苦難。
無知的路，還有多遠？
把愛滋病的傳播原因，歸結為性亂。
統稱髒病，接觸傳染。
親人，也不敢近前！
缺少防愛知識的宣傳。

慘！
慘絕人寰，全家死完！
兩歲的幼兒，緊拉懸樑自盡親娘的腳腕，
下來呀！我餓，想吃飯！
那橫陳田野瓜庵內的女屍，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身邊還堆着自己無力蓋上的被毯，

除夕之夜，萬家歡！

這一家即將離開人世的兒子，

把子女託給白髮老娘，相對無言。

他們去了，並未走遠！

他們身上抽取的鮮血，還能夠發生新的感染。

誰之過？應由誰來償還？

是貧窮？是愚昧，還是另有根源？

僅是冰山一角，作者所見。

防愛撫孤事業，

方興未艾，路漫漫，路漫漫！

第二十五節 特殊的噩耗

一 2005年「三八節」她來了

我叫李喜閣（真名），今年三十六歲，在寧陵縣郵政局工作。我曾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丈夫的十年前，我在生我大女兒孫迎晨時，做剖腹產手術住進了寧陵縣婦幼保健院，輸了這家醫院所採集的血液，從此感染上了愛滋病病毒。從那一刻起，死神就向我們招手了！

我是一個標準的愛滋病受害者。大女兒被愛滋病奪去了幼小的生命已經三年了，六歲的小女兒也患上了愛滋病。

1995年6月23日，我因生女兒住進了寧陵縣婦幼保健院。我當時提出要做剖腹產手術。我至今都很清楚地記得，我是當夜凌晨零時被推進手術室，零時四十五下手術台的。

主刀大夫說我身體虛弱，需要補充血液，就給我化驗血型，輸了五百毫升血液。

女兒長到八十天時，因拉肚子住進了一家著名的大醫院，經專家會診是秋季腹瀉，懷疑是營養不良造成的。在這家醫院住了八天院後，女兒的病情稍微輕了一些。從那以後，女兒每兩個月就會腹瀉一次，一遇涼風就感冒，而且發低燒，扁桃體經常發炎。直到三歲時，身體狀況才有所好轉。

女兒到了四歲時，身上出現了許多紅斑。我和丈夫把女兒帶到某市著名的一家大醫院皮膚科進行檢查，醫生說孩子患的是濕疹，吃一些消炎藥就好了。紅斑下去後一個月時間，女兒身上又出現了薄皮瘡（小膿皰），我和丈夫就找到當地著名的專家韓醫生，韓醫生看後說沒事，拿些中藥給孩子吃就行。



女兒到了五歲時，開始感冒發燒，扁桃體發炎更勤，腸道不好，經常鬧着肚子痛，身體逐漸消瘦；女兒六歲時出現厭食，吃一些涼東西後臉上出現疥癩，在醫院打了一個星期的點滴才有所好轉；女兒七歲時，一到夏季就腹瀉得厲害，全身發冷，體質明顯較弱。醫生說孩子是「胎帶」的毛病，長大了就會好些；女兒長到八歲時，明顯比同齡人矮了半頭，身體狀況愈來愈差，胸前胸後長滿了薄皮瘡（小膿皰）。

到了2004年5月，我和女兒同時都明顯消瘦。我從五十二公斤降到了三十六公斤，孩子從二十四公斤降到了十九公斤。女兒出現了中耳炎，免疫能力急劇下降。

7月16日，我和丈夫領着女兒又來到了某市找家著名的大醫院，請兒科專家為孩子會診。專家們說，小孩子消瘦是正常現象，別讓她吃那麼多的涼東西，不會有什麼事的。回到家以後，女兒咳嗽得厲害，我就領她到小門診打了八天的吊針。

8月初，我又領孩子到縣另外一家大醫院看病，一位專家說孩子是貧血造成的，肺部可能有炎症。在給孩子拍了片子後，拿到縣防疫站，縣防疫站的專家懷疑孩子是肺結核病。

8月12日，當打了四天的吊針後，我和丈夫看孩子的病情愈來愈嚴重，就把孩子轉到了某市這家著名的大醫院。

直到8月17日上午，醫院才想起來抽我們全家人的血來檢查、化驗，結果我們全家四口人，除了丈夫還暫時不能確診外，我和孩子全部都是愛滋病患者！

在孩子入院後的第六天，通過到某市防疫站抽血化驗鑑定，我和兩個孩子身上都感染有愛滋病病毒，原因是我因輸血感染上了病毒，兩個女兒屬於母嬰傳播。大女兒已是愛滋病晚期，已經徹底沒救了。

2004年8月19日零時十五分，我那剛過完生日兩個月的可愛女

兒，心臟終於停止了跳動。那天夜裏，我發現孩子的一雙眼睛一直在發鼓，她是對這個世間戀戀不捨，畢竟她才九歲啊！

我女兒長得漂亮，從小又懂事聽話，在班裏面學習成績都是前三名。這麼多年我和丈夫一直在為她治病，她都是咬着牙，從沒哭鬧過。現在，女兒已不在了，可我的心裏總是放不下她，我一直在為她叫屈！

在為孩子治病的過程中，我發現有不少醫院的醫生一說給孩子看病，家長說孩子怎麼了，醫生就說怎麼了，很少給孩子作仔細的檢查，動不動就給孩子掛吊針，用最好的藥，從中吃取回扣和提成，根本沒有把病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特別是最近幾年，愛滋病發病率這麼高，又有多少城裏的、鄉下的醫生懂得愛滋病知識？每個醫療診所的牆上都掛有愛滋病的防治圖，但有幾個醫生認真讀過，並按實際辦法操作過？

這麼多年，我給孩子請了這麼多的名醫和專家，假如說有一個醫生提出來給孩子化驗一下血液，我也算燒了高香！如果是那樣，孩子的病情能夠及早發現，也不至於誤診，起碼來說能夠延長孩子的生命！

說一千道一萬，都是我給全家人惹的大禍！我生大女兒時才二十六歲，身體狀況很好，為什麼那個主刀的醫生非要給我輸二百元錢的血液？她是真心為我的身體着想，還是她想從中牟取私利？我在生第二個女兒時，同樣是在這家醫院做剖腹產手術的，為什麼這一次又不給我輸血了？後來我諮詢了有關專家，做這種手術根本不需要輸血。

也就在2004年的5月，我和孩子的身體同時開始消瘦。因為給孩子治病，我就一直在挺着，說等給孩子治好病以後，再給自己檢查。那一段時間，我因操勞過度，昏死過去幾次，誰知道自己竟害上了這提起來就讓人臉色大變的愛滋病！現在想想，我消瘦的原因



不是因為勞累造成的，我輸血快十年了，這正好是愛滋病病毒發作的期限。

為了得到一個更加準確的結果，2004年9月，我們一家人又先後到北京市協和醫院和北京市防疫站，要求對過去的結果重新作出鑑定。結果出來以後，和過去的是一模一樣。我們徹底絕望了！

回到家裏後，我和丈夫就想到了打官司，要替全家人和死去的孩子討公道。一告給我輸血的大夫；二告幾家醫院的不作為；三告當地的衛生主管部門瀆職。

2004年5月，全國上下普遍開展了愛滋病防治宣傳周，對所有獻血、買血和輸過血的人員進行一次徹底的普查。而我縣衛生局竟然當成了耳旁風，沒有一個人到我家進行宣傳。如果那時我們能夠及早發現，孩子的性命也許現在還能保住。

當我們夫妻倆把起訴狀遞交到當地法院時，法官們說，省裏面有文件，凡因血液方面引起的糾紛，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可是他們怎麼也不給我們看這個文件。2004年11月11日，我們把電話打到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諮詢。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解釋說，當地法院必須受理這種案件，人都死了，為什麼當地對此事不聞不問？

11月17日，我的狀紙被退了回來。實在沒有辦法，我就到縣信訪局告狀，信訪局也是沒有辦法。

2008年清明節，李喜閣為紀念亡女孫迎晨寫了三首詩：

念亡女孫迎晨

（其一）

暴雪連連滿天飛，
萬里烏雲滾滾來。
我失愛女永悲傷，
懷念深處見夢鄉。

問女如今何處去？
醒來淚水濕衣裳，
可憐慈母日夜想。

清明

（其二）

清明天氣陰沉沉，
亡女墓前哭斷魂。
欲問迎晨何處去？
傷心痛苦忘歸村。



李喜閣母女同患愛滋病

清明

（其三）

迎晨離去多冤枉，
清明祭女多悲傷。
紙灰隨風似蝶飛，
傷心悲痛誰敢想？

我是一個工作起來不要命的女人。我和丈夫結婚十多年來，通過我們的共同奮鬥，家庭狀況還算可以。雖然說給孩子治病花了不少錢，但也沒有影響到我們的正常生活。

我患上愛滋病的事及時向縣郵政局領導作了匯報，我認為這沒有掩飾的必要。局領導得知我們全家人的遭遇後，非常同情我，多次鼓勵我戰勝病魔。

我的婆婆也沒有因為我是愛滋病患者而嫌棄過我，她說我是無辜者，我們全家人也都是受害者。我自己也這樣認為，我也不是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染上了這病，沒有必要害怕見人。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那三歲半的小女兒，她還這麼小，就染上了這種病。幸虧她的身體狀況還好，抵抗能力強。小女兒現在已經懂事，她知道她的姐姐是怎樣離開人世的。我和丈夫不敢在她面前說愛滋病這幾個字，無意之中提及，她都要嚇得放聲大哭。

我現在已經感到無所謂了，因為我知道我已經到了愛滋病病毒的發作期。我現在靠着國家給我們這些愛滋病患者所發放的免費用藥，來延長自己的生命。現在，我的身體恢復的還算可以，體重從三十六公斤上升到了四十八公斤，精神狀態也恢復得和往常一樣。

自從發現我患有這種病以後，我們全家人的名字就能夠在中國愛滋病患者網上查到。我非常感謝高耀潔老人，是她老人家不顧年邁體衰，為我們這些愛滋病患者奔走，才引起了國家高層領導的重視，才使我們這些愛滋病患者享受到用藥方面的待遇。

在電視上看到高耀潔老人已經走不動路了，我就產生一個想法，仗着自己年輕，又有文化，我就想接老人的班，做中國的第二個高耀潔，完成她老人家沒有完成的任務！如果醫學上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話，我的小女兒不久的將來也可能和她的姐姐一樣。所以，我很想再領養一個健康的孩子，用自己的母愛和現有的實力，培養他（她）好好學習，長大後專門從事愛滋病的研究。我是愛滋病患者，我的這一想法不知能否實現。在中國，愈是最貧窮的地方，這種病的發病率也愈高。可以說豫東地區的愛滋病絕大部分是以前農村的老百姓因買賣血漿、血液交叉感染所造成的。當地政府應該正視這個問題，絕對不能為了保自己的烏紗帽，捂着蓋着，那樣會使更多的受害者蒙受不白之冤。現在好多醫生因為病沒有傳染到他們身上，他們不知道這種病的痛苦，也根本不知道如何防治。一遇發燒感冒或拉肚子的病人，就給人家抓些藥敷衍了事，很少讓人做血液化驗，誰想過這裏面有沒有愛滋病患者？

通過我親歷的害病經過，我已經把愛滋病防治方面的知識掌握



李喜閣和她的女兒（2008年10月攝）

得非常熟悉。現在正好趕上了十年後的發病高潮，我已經做好了準備，找當地的領導和衛生部門協調，自己要做一名義務宣傳員，現身說法，給全縣乃至全市所有的醫療工作者輪流講上一課。

我現在正在學習網絡知識，準備自己建一個個人網站，把自己的抗愛經過讓更多人知道和了解。考慮到許多農村人沒有條件上網，我還準備公布自己家的電話，和廣大的愛滋病患者進行交流，探討如何增強自己的免疫能力。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我還有個願望，就是把自己的遺體捐獻給國家醫療機構，讓人們從事愛滋病工作的研究，讓這種危害人類健康的疾病早日從地球上消失。

（李喜閣供稿）

2008年10月，李喜閣在警員的監視下，帶孩子來鄭州看病，到我家吃了一頓飯，不僅病魔對她折磨，還有人為的痛苦，使她已經非常憔悴，見照片。

二 輸血感染愛滋病者何其多

2006年我收集了輸血感染愛滋病的病例百多例，已經在我的博客上發表了。2007年僅10月份我又收集了三十四例，其中農民有二十九例，夫妻間傳播九例。事實上，並非所有的輸血感染愛滋病病例都發生



在90年代，我在2006年10月至11月間收集到的三例病例，說明2000年後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病例大有人在，只是由於愛滋病發病的「潛伏期」長，這些病例往往不能及時發現。現發表如下：

（一）王秋雲，女，三十九歲，民辦教師，河南鶴壁市鶴山區人。1995年因胃部腫瘤做手術，輸血二千三百毫升，身體恢復很快。1997年生孩子時又輸血三百毫升，術後身體很好，孩子現在已經十歲了，身體很好，去年化驗HIV抗體，「陰性」，說明她沒有感染愛滋病病毒。

1998年，王秋雲發現月經過多，醫生診斷為子宮肌瘤。1999年因子宮肌瘤做子宮切除手術時，再次輸血八百毫升。三次輸血全部在鶴壁市第一人民醫院。

第三次手術後，身體常年虛弱多病，一直認為是多次手術的原因，在此期間，在鶴壁市第一人民醫院多次抽血檢查，不知什麼原因並沒有告知感染愛滋病。2005年元月，她開始持續發高燒，多方治療無效。直到5月份在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檢查HIV抗體，「陽性」，被確診得了愛滋病，前後治病共花費近八萬多元，身心倍受摧殘，現在身體極度虛弱，生活十分困難。

（二）王小紅，女，三十九歲，農民，鶴壁市鶴山區人。1996年，在鶴壁市職工第二醫院住院做人工流產，因出血過多，輸血兩袋（數量不詳）。此後因經常感冒發燒、腹瀉，吃藥無效，一直到2005年在市疾病控制中心抽血檢查HIV抗體，「陽性」，因很長時間內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其丈夫也被感染了。現在兩個人都已經發病了，身體極其虛弱。她說：「所幸兩個孩子未被感染，但我十分擔心兩個孩子，一旦我們夫妻二人病死了，兩個孩子以後怎樣生活……」

（三）劉麗紅，女，三十六歲，農民，河南省鞏義市人。1996年因產後大出血在鞏義市人民醫院住院輸血兩袋，不知多少毫升。2004年8月開始高燒不退、腹瀉、爛嘴，在當地防疫站檢查HIV抗體，「陽性」，同年9月死亡。其丈夫和孩子四人抽血化驗，沒有感染愛滋病。

（四）瑤瑤，女，1995年出生，十二歲，鶴壁市淇縣人。其母親1993年因引產大出血，輸血八百毫升，感染愛滋病，2001年9月死亡。瑤瑤發育遲緩，身材矮小，還經常害病，隨即檢查瑤瑤，發現她也感染愛滋病。現在瑤瑤已經開始吃藥，身體情況很差，無法上學。

（五）馬金英，女，三十七歲，農民，鶴壁市人。1996年懷女胎，中期引產後出血過多，在鶴壁市職工第二醫院輸血四百毫升，此後常年多病，查不出原因，於2003年3月懷疑是肺結核，住院，查出感染了愛滋病，2003年5月又到省疾控中心確診愛滋病合併肺結核。現在身體虛弱，她丈夫已死亡，孤身一人重病纏身，在精神和經濟上都承受常人無法忍受的折磨和壓力。

（六）李玉琴，女，四十四歲，工人，鶴壁市職工。1996年在鶴壁市人民醫院因產後大出血，輸血四百毫升。2004年12月因感冒檢查出她感染了愛滋病。現在身體狀況非常不好，吃抗病毒藥物又有副作用。心情很糟，她還有一點安慰，全家其他六口成員均未被愛滋病病毒感染。

（七）陳立萍，女，三十三歲，農民，鶴壁市淇縣人。1996年因流產大出血，由當地醫院轉往安陽縣第一人民醫院搶救，輸獻血八百毫升。出院後感覺身體一直不好，這病那病的，久治不見好轉，又檢查不出原因，四處求醫，但身體反而愈來愈弱，直到2007年因高燒不退，在衛輝市醫學院治療期間，檢查HIV抗體，初篩「陽性」，並患有丙型肝炎。經鶴壁市疾控中心確診為愛滋病，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傳染給了丈夫單保波和女兒單福幸，現在全家三口都是愛滋病患者，精神和經濟上都受到巨大壓力。

（八）李雪芹（化名），女，三十七歲，農民，林州市人。因不想要女孩，懷孕五個多月引產大出血，於1996年5月在林州市人民醫院輸血兩袋，不知具體的數量，以後經常生病。於2004年8月份在新鄉醫學院確診為愛滋病，2006年4月死亡。其愛人路包華也被感染了愛滋病，



現已發病，正在服抗病毒，生活十分困難。

（九）高國強，男，四十六歲，農民，許昌市禹州人。1995年因車禍在縣醫院手術輸血兩袋，不知具體血量。此後經常生病，腹瀉、感冒、生瘡，久治不癒。於2005年4月在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被確診為愛滋病，其妻子也被感染了。

（十）鄒東傑，男，四十二歲，農民，魯山縣人。1995年夏季的一天，他進城辦事遭遇車禍，被抬往魯山縣新科醫院治療，因病情嚴重，又轉往平頂山第一人民醫院手術，先後輸多少袋血也記不清了，只記得花了四千多元的輸血費，命保住了。

2005年，鄒東傑發現爛嘴，繼而發燒，治療無效。2006年2月在平頂山市醫院檢查，確診為愛滋病。2007年5月7日，病重，治療無效死亡。隨後全家人檢查HIV抗體，他妻子和大嫂、二嫂均是「陽性」，說明已感染愛滋病，兩個孩子及父母兩老，四人都是「陰性」。

追尋原因，鄒東傑和兩個嫂子家不在同一地居住，如何感染愛滋病？經回憶只有在2006年春節時，鄒東傑和兩個嫂子共同殺豬時，曾經被豬咬破了手，當時鮮血直流，由於血液接觸了彼此的傷口，造成兩個嫂子也感染了愛滋病，現在他兩個嫂子還沒有發病。

此次車禍，先後造成四人感染愛滋病。

（十一）唐建華，男，四十四歲，農民，信陽市羅山人。1996年因車禍在羅山縣醫院手術輸血，此後一直生病，到處求醫，於2004年在鞏義市醫院查出感染愛滋病和丙肝。全家其他人沒有感染愛滋病的。

（十二）李素珍，女，三十三歲，農民，鞏義市人。1995年在登封市醫院因外傷手術後輸血，2004年查出感染愛滋病。2006年冬季在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住院治療，因沒錢支付住院治療費用，醫院停藥後只得出院，2007年4月7日死亡。

（十三）李愛榮，女，三十二歲，農民，鞏義市人。1995年因燒傷在河南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住院治療，輸血三袋，不知多少數量。

2004年在鞏義市人民醫院查出愛滋病和丙肝。

（十四）喬紅衛，男，三十四歲，農民，鞏義市回郭鎮人。1995年因車禍在市人民醫院手術，輸血九百毫升，2001年10月在本市醫院查出愛滋病，並傳給了妻子。2002年8月死亡。

（十五）王小強，男，十四歲，學生，安陽市人。1996年他三歲時被車拖傷，在安陽市礦務局醫院住院手術，輸血四百毫升，後來身體一直不好，經常生病，並且發育遲緩，於2005年3月在省疾控中心確診為愛滋病，現已發病，正在服抗病毒藥物。他全家沒有其他人感染。

（十六）李志永，男，三十三歲，農民，鶴壁市淇縣人。1996年10月17日，因車禍導致左額顳部硬膜外血腫，左側血氣胸，在淇縣人民醫院手術治療，住院期間輸血一千五百毫升。1998年以來，身體始終乏力、厭食、腹瀉，自以為是生活緊張造成的，沒有在意。2004年冬季其妻子徐某在義務獻血時發現感染了愛滋病，夫妻雙雙被確診為愛滋病。2005年春季開始進行抗病毒治療，2006年至今多次發病，先後在淇縣人民醫院和鶴壁市傳染病醫院住院治療，已不能參加農業勞動了。

（十七）何昌秀，女，三十九歲，農民，鶴壁市人。1996年因甲狀腺亢進，在省建七公司（安陽）醫院做手術切除甲狀腺，手術中輸血四百毫升。手術後身體一直不好，不知什麼原因，到處求醫治療。2005年因持續高燒，多方求醫疑為結核，在新鄉結核病醫院抽血檢查，結果確診為愛滋病，她現在已發病，正在服藥。其丈夫和兩個孩子均健康無病。

（十八）王勇，男，三十五歲，工人，鶴壁市人。1996年因工傷在鶴壁第二職工醫院做截肢手術，手術中輸血一千二百毫升。2005年確診為愛滋病，其妻雖然身體尚無症狀，經檢查也感染了愛滋病。現在夫妻二人都在服藥，身體狀況仍然很差。

（十九）李小平（化名），女，三十六歲，村幹部，鞏義市人。因擔心體型肥胖，影響形象，於1998年在鞏義市中醫院實行腹部脂肪抽出



手術，因出血過多，輸血六百毫升。六個月後因為肚瀉不止，確診為愛滋病，九個月後死亡。

（二十）張建賓，男，三十五歲，小商販，鞏義市人。1995年因眼角膜發炎在當地醫院治療時輸血一袋。2006年5月2日因高燒不退，在鞏義市中醫院抽血確診為愛滋病合併丙肝。其妻子現在無自覺症狀，仍能工作，經檢查HIV抗體，「陽性」，說明她已被感染。時下，夫妻二人經常為三個健康的孩子流淚，以後他們怎麼辦呢？

（二十一）張朝俊，男，四十三歲，農民，鶴壁市人。1997年9月1日，因手臂骨折在當地醫院手術治療，手術中輸血六百毫升。以後身體衰弱乏力、消瘦，經常發燒、腹瀉，疑為結核病，經過各種化驗檢查，最後確診為愛滋病。其妻和兩個孩子多次抽血檢查HIV抗體均為「陰性」，說明他們沒有感染愛滋病。

據統計：

因輸血感染愛滋病者二十一家，又發生家庭傳播愛滋病者十三人，共計三十四人，男十三人，女二十一人，已死亡八人。

輸血原由：

1. 因產科疾病、生育失血而接受輸血者八人，輸血量為五千一百毫升（另有四袋血記不清量）。
2. 因婦科疾病輸血者一人，輸血量為八百毫升。
3. 因外傷（多為車禍）輸血者十七人，輸血量為五千五百毫升。
4. 其他疾病輸血者八人。

發病時間：

最早輸血感染愛滋病的時間為1993年，最晚的時間為2005年，發現時間最早的為2001年，最晚的為2007年，均因發病後，多處求醫得到確診。這說明了愛滋病潛伏期過長，在此期間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具有與病人同樣的傳染機率，希望讀者提高警惕。

分佈地區：

在三十四位愛滋病感染者，來自鶴壁地區十六人，鄭州郊縣八人，平頂山市魯山縣四人，安陽地區三人，許昌地區二人，信陽地區一人。

三 直至近日「醫騙子」還如此猖狂

迄今為止，醫藥騙子們仍在我處打主意，每月我會收到三至五次電話，說：「我有秘方，驗方會治好愛滋病，請你給我找幾個愛滋病患者。」

2008年3月5日，在我的信箱裏發現一封陌生人的信件，這封信沒有封口，也沒貼郵票：

尊敬的高耀潔教授：

你好！

我從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上看了你的光輝事蹟，我倍受感動，我一定會向你好好學習。我現在向你作一下自我介紹，我叫鄧正華，老家是四川的。1984年來到鄭州，一直在鄭州開煙酒店。1998年我在南關街第五中學對面買了一套一百二十八平方米的住房，2006年在航海東路買了一套一百六十平方米的門面房。我本人是在1966年初中畢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認識了一位地主老中醫，他看我對他態度好，教了我一些知識，和他本（人）親筆寫的書。當時我父親也是當地公社衛生院的中醫。我本（人）從1968年到1970年在衛院學了三年，再跟我父親學一部分。當時在衛生院月工資八元，我不夠用就回家自己幹，我跟別人上山（採）了兩年中草藥。去年8月，經人介紹一名愛滋病患者叫我治療，見了患者的臨牀症狀後，經過分析，給處（出）了一方劑吃了三十多天的藥，患者身體病症全部治癒康復，到現在沒有復發。此患者又帶來一名男患者，男患者把我帶到了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對面一家住戶，裏面好多人全部都是愛滋病患者，裏面其中一人給了我三本書，叫我好好



看看，我回家看全部是你寫的，裏面有些問題理解不透徹，想向你請教。

另外我想在你的指導下，共同治療十名愛滋病患者，中藥費全部由我承擔，具體辦法見面商談。

此致：敬禮

鄧正華 2008年3月3號

在這封信裏，還有一個他聲稱治癒了的愛滋病患者的《HIV 抗體確認檢測報告單》。3月9日上午，我拿着這封信去找有關人員詢問情

HIV 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					
REPORT OF HIV ANTIBODY CONFIRMATORY TESTING					
秘密 SECRET			编号: NO2006042606		
送检单位 FROM	禹州市卫生防疫站		送检日期 DATE	2006年04月10日 YEAR MONTH DAY	
送检标本 SPECIMEN	血清		送检人群 POPULATION	自愿检测	
姓名 NAME	吴海芬	性别 SEX	女	年龄 AGE	30岁
婚姻状况 MARRIAGE WEDLOCK	已婚	文化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农民		
国籍或民族 NATIONALITY	中国 汉族	地址 ADDRESS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鸿桥乡白桥村5组		
检测方法 METHOD	日期 DATE	检测结果 RESULTS			
快速检测 酶标法	2006-04-10	HIV-1+2 型阳性			
酶联免疫 ELISA	2006-04-12	HIV-1+2 型阳性			
蛋白印迹 带型 BANDS	2006-04-26	GP160, GP120, p66, p55, P51, gp41, P31, P24, P17			
结论 CONCLUSION	HIV-1 感染阳性				
检测者 OPERATOR	魏秋霞	签发者 HEAD	报告日期 DATE	2006年04月26日 YEAR MONTH DAY	
确认单位或实验室(公章) INSTITUTION OR LABORATORY	备注 试剂厂家: 杭州康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效期: 2006年04月 批号: 20051001				

PRIN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ISEASE CONTROL, CHINESE MINISTRY OF HEALTH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订

鄧正華來信中的化驗單

況，一個感染者說，這個姓鄧的人連 CD4（T 輔助細胞）都不懂，根本就不是醫生，竟然敢到六院住院的愛滋病病人中發傳單，賣他的自製中藥。

不料，當時在這名愛滋病患者對面坐着的一名白臉中年男子開口就說：「這個家伙無能，我配的治療愛滋病的藥比他的強得多，我要是遇到他就揍他。」當時，我就告訴他：沒有行醫證，自己配藥讓病人吃，是非法的，到醫院賣藥是不允許的。那個男子聽了後非常不高興，站起來走開了。

3月10日上午，某組織有關人員來我家拜訪，我把這個「醫騙子」對病人的危害告訴了他們，並嚴厲地說：「爲了你們今後的工作，以後不能允許這樣的人利用你們的組織搞相關活動，否則，你們會招惹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當時，他們就表示我說的對。

2008年3月16日上午十一時半，我接到一個四川口音的男子的電話，因我聽不懂他的方言，我很客氣地問他是誰，他連說了三遍，我才聽出他在罵我，醫騙子竟然如此猖狂，對病人和社會的危害難以想像。

愛滋病病人，痛苦不堪，住進公立醫院治療，仍不能避免假醫假藥的危害，這怪罪誰！據我所了解，因騙子的藏身處、根據地、信息窩點，有那些所謂關愛之家等單位，因那些機構是救助愛滋病病人和愛滋孤兒的組織，他們從那些地方出沒，可減免人們對他們詐騙行爲的質疑！還可以在那裏混頓飯吃、拉攏更多不知情的人們。

爲什麼那些地方對醫騙子不敢過問，不敢制止他們的活動，並且聽之任之？他們怕醫騙子的後台，更怕他們那些神通的錢。另一個問題，是他們水平問題，他們會說：「我們不會吃他們自製的藥，那些藥不會治療愛滋病的。」再一個問題，醫騙子多是地痞、無賴，什麼壞事都會做出來，關愛之家的人不敢惹他們。



第二十六節 愛滋領域內的官司

一 愛滋病病人訴訟無門

最近一周，各地愛滋病群體的電話紛紛打來，述說的是很多當地政府在愛滋病問題上的瀆職和腐敗。在京上訪的輸血愛滋病感染者們，貧病交加中依然堅持向中央政府、國際社會反映當地的真實情況。

2007年12月1日是愛滋病感染者、病人和相關群體發出聲音的日子。關於藥物、賠償、政法部門的侵害……太多「富有中國特色」的愛滋病問題值得揭露和解決。在愛滋病領域「沉默意味着等待死亡」。

2007年11月19日早晨六時，我被電話鈴聲吵醒，傳來了一個男子的聲音，他說：「我是個愛滋病病人，我沒有見過你老人家，昨天俺被公安局抓了，今天夜裏跳牆逃出了拘留所。」

我問他：「爲啥抓你……」

他說：「再過十天，12月1日國際愛滋病日就要來臨。每年的這個時候，海內外媒體都會關注一年以來中國愛滋病情況的變化，中國政府會在此時述說進展，民間愛滋病群體和NGO（非政府組織）成員也會針對真實問題發出聲音。」

停一下，他又說：「昨天，我們十六七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病人，往寧陵縣婦幼保健院，要求查找複印十二年前的病歷，那裏面記載着我們的輸血過程。19日從上午到傍晚長達十個小時，我們待在婦幼保健院的會議室。我們代表整個縣一百一十六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病人。該縣縣長等負責官員到過現場，但都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步驟，聲稱除非中央下達命令給予輸血感染者立案、賠償，否則不可能給受害者複印病歷。」

當天傍晚七時左右，縣公安局局長和副局長指揮了對愛滋病病毒感

染者的驅趕行動，他們用喇叭對留在婦幼保健院大廳中的愛滋病感染者們喊話，要求他們十五分鐘內離開婦幼保健院，否則就使用催淚彈強行驅散。十幾名戴有鋼盔和手套，穿着防護服的防暴警員接連把一些愛滋病婦女從現場抬出來。其中因警方的暴力曾造成一名叫張春霞的愛滋病婦女昏厥，被送往中醫醫院搶救。在過去的五年中，逼害至死了不知多少人，屢屢壓制、軟禁愛滋病感染者李喜閣，也曾拘留過柘城縣朱龍偉。今天中午，王冬玲、崔玉玲、呂秀芝、翟獻芝等四名女性愛滋病病人都被警方帶往縣拘留所，王冬玲下午獲釋，另外三位仍在關押中。呂秀芝是從縣中醫醫院的感染科病房被直接帶走的。今天下午公安局長還聲稱要正式逮捕這四位女感染者。愛滋病病人每天必須定時服用抗病毒藥物，幾名被抓捕者有斷藥的風險，這從根本上威脅到她們的健康和生命。

最近五年來感染者紛紛發病，縣婦幼保健院非法採供血液的真相被曝光，但其一直拒絕提供病歷，理由先是管理病歷的人員已經離職，後來說是要商丘市批准。十二年前的責任醫生孫文玲現在不僅升了職，而且還當選了縣政協委員。河南省最高法院甚至還下達了荒唐又違法的「口頭文件」，凡涉及愛滋病的政府責任案件，法院不給予立案。這是非法剝奪了愛滋病感染者討還公道的權益。大量的愛滋病感染者在前往各地市政府上訪，或者到河南省省會鄭州找省委、省政府、省信訪局、省高級法院等處，當地始終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大家只好來到北京。而北京真能解決問題嗎？

二 極力打擊愛滋病患者的上訪

愛滋病病人在不斷地碰壁，希望、失望、絕望。衛生部的信訪接待辦公室門口幾乎從未見過截訪者，這反而說明了主管公衆生命健康的衛生部行政地位其實很低，連各級政府的截訪人員都對衛生問題不予理會。上訪者的歸宿無非是被騙乃至被進一步逼害。信訪無用下，2006年



夏季，李喜閣和其他八九位縣愛滋病婦女在國家衛生部門口要求與高強部長直接對話，但被衛生部通報河南政府，河南政法部門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的罪名，對感染者李喜閣等刑事拘留。這未必是衛生部想要看到的結果，但確是地方政府對愛滋病問題的基本處置方法。

愛滋病不是國家機密，愛滋病患者有權複製自己的病歷。衛生部有明確的法規保障這項權利。而河南地方當局不僅僅用權力非法干擾這種合法訴求，還出動國家機器鎮壓病弱的愛滋病感染者。這其實無非是在用公權來保全一些對愛滋病問題負有直接責任的貪官污吏。

因此中國的愛滋病問題不是衛生部門一家之事，更不是北京的國家衛生部能解決的。政法部門和地方的貪官酷吏是愛滋病問題屢屢惡化的癥結。

這種情況並非僅限於河南，請看河北省一個愛滋病感染者的來信（摘要）：

我叫張露（化名），河北省武安市邑城鎮人。

1995年，我十三歲，還記得那鮮紅的血輸入我體內時依然留有賣血人的體溫，當鮮紅的液體一滴一滴輸入我體內，我也莫名的發起高燒，三十九度，四十度，四十一度……醫生給我用上當時最好的抗生素，可還是壓不住高燒，整個人虛脫了，迷迷糊糊的渾身發抖，只記得母親不停輕聲喚我的名字，不停地換下頭上那塊被高溫暖熱了的毛巾，又昏睡過去，是場噩夢，驚醒後看到母親紅腫的眼睛，我告訴母親不要擔心。我因右手受傷住進河北省邢台市顯德汪煤礦醫院治療，手術後主治醫生說我太瘦又失血過多需要輸血，醫生便從外面賣血隊找了一個血型相符的人，沒有做任何檢測便直接輸血給我。輸血後的過敏反應讓我本來瘦弱的身體更加虛弱，經過十多天的藥物治療，我總算從鬼門關上撿回一條命，雖然手上有疤，但不妨礙我做事情，父母對主治醫生也感恩戴德的塞了幾次紅包，但不管怎樣，我平安出院了。

回家了，我照常人一樣的上學，畢業後參加工作。

2005年，我二十三歲，最燦爛的生命季節，我努力工作，熱愛生活，可是一張HIV抗體陽性報告把我所有的夢想斷送，我明白前因後果，可是不想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我辭掉工作，眼裏的一切沒有顏色且無聲，我把以前所有的美好都毀掉，一個人關在家裏，發脾氣，不說話，不吃飯以虐待自己的身體來緩解心裏的壓力。我輕生，可醒來看到頭髮花白蒼老的父母，漸漸的告訴自己要堅強，就算為父母也要活下去，要為自己無辜受害討回一個說法。同時我和父母都沒有放棄尋找證據，以求通過法律程序來給自己一個清白。當年血禍的結果讓我學會了很多，堅強、忍耐、用心、感恩和自我緩解壓力，尋找主治醫生和當年同病房的病友，這個過程是艱難的，醫生站在醫院的立場不給開住院證明，而當年同病房病友更是不知在哪裏，而經過十多年，當年的住院證明，輸血單已經沒有，所以這個證人一定要找到並出庭做證，我才能有一線希望還我公道，找醫院、礦務局，到哪裏都碰釘子，吃閉門羹，遭人白眼，兩年風裏雨裏從未間斷，終於當年的主治醫生開出了住院證明，並找到同病房的病人做證，證明我當年住院並輸入未經檢測過的血液，為此父母付出超出一生的精力和耐力，只要能立案，能把這不法的行為告上法庭，為我討回公道，他們無怨無悔。

2007年3月，我終於立案了，把河北省邢台市顯德汪煤礦醫院和河北省邢台市礦務局（邢台礦務局是邢台市重點企業，顯德汪煤礦醫院是其附屬企業）告上法庭，在邢台市橋西人民法院一審，開庭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證人、證詞開庭一切都很順利，我信心滿滿地等法官從醫院調出病歷，還我們一家清白並作出應有的賠償，可一審判決竟以對方律師說病歷因房屋漏水毀壞無法對質而以敗訴告終，以這個荒唐的理由用在司法程序中，讓我對司法的公平和公正產生懷疑，但還是向邢台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再次開庭時我一



再要求調出病歷，可兩個月過去了，法院沒有任何說法，且主審法官更是避而不見，電話手機更是不接，法院沒有批條也是進不去。一審的判決已經讓我對司法失去了信心，現在更是心灰意冷，如何才能討回一個說法？

2007年11月22日星期四一早，來自當地的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病毒者集體來到國家信訪局接待辦公室。他們衝破信訪局外面的截訪者阻礙，孫愛玲等三名代表進入了信訪局的接待大廳。他們如實說明了自己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身分，國家信訪局313接談室中的工作人員負責接待三名愛滋病感染者。但是，該名工作人員對每一位代表的接待都是三言兩語的敷衍了事。然後國家信訪局接訪人員直接調來當地截訪人員，把來自鞏義縣的孫愛玲和另外來自商丘市、平頂山地區魯山縣的共三位代表交給河南方面帶走。這顯然是違背法律和法規的。國家信訪局人員涉嫌瀆職，而且與非法截訪者勾結。此類狀況並非此工作人員的個人行為，而是已經演變成國家信訪局和公安部信訪等重要信訪接待部門的基本工作手段。一丘之貉串通一氣。那些來京信訪、尋求最後希望的老百姓頃刻就被送入虎口，他們面臨着當地政府的恐嚇、毆打、非法拘禁、拘留、勞教、判刑、送進精神病院等。

今天山東省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也來了八個。國家信訪局313室的工作人員以更不負責的態度打發他們，並且讓山東當局把他們帶走。今天313室就專門用來接待愛滋病感染者。看來愛滋病日來臨之前，不僅僅是當地的輸血感染者，其他省的愛滋病感染者也不約而同地想要發出訴求。大家都認為每年的12月1日是他們唯一的機會。中國的信訪制度本身是一個莫大的騙局，根本就是對法治社會的嘲弄。而且它採用程序受理而非事實受理，實質上等於根本不會受理，只是給老百姓一個泡沫般的希望。最終結果往往是把舉報者送交給被舉報者處置。而今從中央到地方大部分信訪部門本身已經成為製造罪惡的基地，圍繞着信訪和截

訪，充斥着各級政府的殘酷鎮壓，每一個案例幾乎都是對法律和公民權益的踐踏。而這類案例一年何止上千萬件。愛滋病感染者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受害者分支。

上午十時三十分，我致電被當地警方控制在國家信訪局大廳的鄭州鞏義市的愛滋病感染者孫愛玲女士，我們的對話還未結束，就被當地截訪人員打散。一時二十分之後，孫愛玲趁截訪者不備脫離了對方的控制，到外面與其他十幾名愛滋病感染者匯合。不少感染者看到這些情況非常絕望，表示要前往天安門請願。但天安門、新華門這些地方，對上訪者而言本身就是最凶險的地域，那裏的警員不管你是不是老幼婦孺，不管你是殘疾人還是患有疾病，警員會把你當作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的恐怖分子對待，他們一點不會手軟。而且最終的結果還是會把大家交給各省市的截訪者們。



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患者在衛生部信訪接待室門外



這次信訪國家信訪局和當地地方當局都沒有給予任何實質答覆。我們懇請國家衛生部疾控司的工作人員能聯繫、接待、傾聽這些輸血愛滋病感染者，儘管可能短期解決不了任何實質問題，但起碼讓這些病弱的愛滋病人知道中國政府的衛生部門還在關心他們，知道這個12月1日仍然是屬於他們的。

告狀無門，請看以下愛滋病感染者家屬的來信：

我是河南省鄭州市的一位普通市民，因孩子在北京看病輸血感染HIV病毒而發展成愛滋病的事，請社會各界予以關注。

我們的孩子於2002年8月28日，在北京大學口腔醫院作腭裂修復手術，術前檢查一切正常，包括HIV抗體檢查為「陰性」，然後輸血、手術。這些都有該院的相關病歷證明。

2003年10月間，孩子因咳嗽、呼吸急促、心跳快而在鄭州入院治療，最終於2003年11月9日被河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診為愛滋病。我們追溯孩子的就醫經歷，確認孩子除在北京大學口腔醫院輸過血、做過手術外，沒有輸過血或使用過任何血液製品。我們做父母的經河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查，均身體健康。根據愛滋病的傳播和發病機理，孩子在術前HIV抗體檢查「陰性」，一年多後發展成愛滋病晚期，只能是這次輸血和手術造成的。

2003年12月，我們以孩子的名義將北京大學口腔醫院和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起訴到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2005年4月19日，法院駁回了我們的訴訟請求，判我們敗訴；我們又上訴到北京第一中級法院，2005年12月20日二審結果維持原判。

但，我們對兩級法院的審理過程有諸多困惑：1. 兩級法院均置我們孩子生病這一基本事實於不顧，對我們提供的證據也是不置一詞。2. 我們的孩子患病這一事實發生在國家對血液管理非常嚴格的2002年，是一件極其嚴重的社會公共衛生安全事件，而兩級法院和

有關部門不但不設法調查事件的真相，卻反而以保護獻血者隱私為由拒絕進行「所謂獻血者」的身分認定，拒絕提供「所謂證據」的原件以供當庭質證。3. 兩級法院對被告方提出的主張在沒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也予以認定和採納；甚至於對被告出示的存在嚴重時間前後順序矛盾，存在「時間悖論」的證據都予以認定。

面對這樣的判決，我們真是欲哭無淚。

但，我們不會就此停止我們的法律維權行動，我們還要到人民檢察院申請抗訴，我們還要到人大委員會去尋求法律的公正。

我們不信中國現行的司法體制都無法給我們孩子一個公道！！！！

事實上像我們孩子這樣輸血感染HIV病毒的普通百姓又何止千、萬。希望每一個有良心關心國家、民族命運和人民健康的中國人都能關注這類事件。

求助人：孫亞

2007年6月22日

第六章

深感防愛工作的艱難
(2007 年至今)

第六章

深感防愛工作的艱難
(2007 年至今)



第二十七節 黑雲壓城半個月（上）

自從我和愛滋病結下了「不解之緣」後，當局就把我當成了「異類」。這些年來，電話監聽、跟蹤盯梢、網絡控制、新聞封鎖對我已家常便飯，早已見怪不怪了。開始時我曾有點緊張，但時間長了，也就成了一種「正常生活狀態」，我已經安之若素，毫不在乎了。

記得2001年冬天，天下着小雪，室外滴水成冰，我看到一個便衣警員在我家門外站着，冷得吡吡哈哈的，心生憐憫，就開門請他進屋，喝點熱湯熱水，暖暖身子。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沒辦法呀，我是吃這碗飯的，被派來執行任務的……」對此，我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他說，他的任務主要是防止我接觸愛滋病病人和記者。

一 「生命之音」成了災難之始

但是，到了2007年春節前，風雲突變，當局對我的監控突然升級，我竟然遭受到長達半個月的鐵桶般的非法軟禁。這是我自從文化大革命被關進「牛棚」和勞教場以來，再一次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日子，也是我一生中所有苦難記憶的最新一頁。

這次風波緣起「生命之音獎」。

2006年12月下旬，我先後兩次收到美國一個叫作「生命之音」的組織發來的信函，通知我獲得了「生命之音獎」（Vital Global Partnership），並邀請我到美國去參加領獎儀式。我不知道這個組織是什麼性質的，就打聽了一下，才知道這是個慈善機構，以在全世界範圍關注生命，抗擊疾病為宗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夫人希拉里（現任美國國務卿）是「生命之音全球夥伴」的名譽主席，在美國和世界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對於出國去領獎，我沒抱什麼希望，因為我曾經獲得過2001年的

聯合國「健康與人權獎」，和2003年的亞洲「麥格賽賽獎」，但由於當局的阻攔，我去參加領獎儀式的願望都未能實現。甚至2000年國家教育部頒發的「優秀教師獎」，河南當局都不讓我去北京參加頒獎儀式。這次，我想他們還是照樣不會讓我去。但是，我仍然表示了願意前往的意願，至於能否成行，那只有天知道了。

但朋友們對此卻抱有希望和信心。北京的李丹說：「現在我們國家更開放了，胡總書記正在提倡『和諧社會』。你這個人是從不問政治的，只是關注愛滋病，救助受難者，在民間影響很大，在國際上也聲望很高，他們沒有理由不讓你去。」他把我的護照要走，直接到北京的美國大使館辦簽證去了。

過了沒有多久，李丹興奮地打來電話，說護照的簽證沒問題，讓我做好準備，過了春節就可以到美國去領獎了。

莫非「氣候」真的開始變了？莫非對我的長期監控和封殺真的鬆動了？我將信將疑地開始準備行裝和關於愛滋病的照片、光碟以及文字資料。如能成行，這可是個讓全世界了解中國愛滋病現狀和問題的大好機會呀。

一些愛滋病患者、防愛志願者和各方面的朋友聞訊都為我高興，還為我準備了出席頒獎儀式的「禮服」。有人送來漂亮的大紅色衣服，但我拒絕了，因為這件衣服太喜慶了。最終我選擇了一件由下了崗的一針一線縫製的中式外套，普通布料，黑底白花——我是代表中國愛滋病患者去的，我要為那千千萬萬死難者服喪。

但是，大家都高興得太早了……

二 不祥的先兆

2007年元月下旬，我突然發現家中的電話出現了奇怪的「故障」：我打不出去，別人也打不進來。不管我撥誰的號碼，回答都是「你撥打的號碼是空號」，後來乾脆就沒有一點聲音了。同時，我的網絡也出現



了「故障」，博客被封，信箱打不開，我和外界的聯絡基本中斷了。我感覺到，一個無形的黑暗大網正向我罩下來……

元月30日晚七時許，河南省婦女聯合會主席楊雲帶着辦公室主任劉小平來到我家。她帶來了很多禮品，說：「快過春節了，我們來看看你老人家，並向你了解一下愛滋病病人和愛滋孤兒的情況。」

中國和各國不同，很少有真正的民間組織。婦聯名義上是「群團組織」，實際上是官辦的。省婦聯主任享受着「正廳級」待遇，都歸組織部管。按理說，維護婦女和兒童的權益是婦聯這個組織的職責，現在她們主動來了解情況，我當然是求之不得，於是我就滔滔不絕地「匯報」起來：

——鞏義市有個叫孫愛玲的婦女，因「計劃外懷孕」被強制引產，手術中大出血，輸血時被感染了愛滋病。後來她丈夫經常毒打她，現在她四處流浪，度日艱難……

——開封有個叫楊琄的人，收養了十幾個愛滋孤兒，並供養他們上學。但這些孤兒們受到歧視，入學困難……

——鄭州紡織機械廠的孫某，他七歲的兒子到北京口腔醫院作腭裂修補手術，因輸血而感染了愛滋病，現在已開始發病，生命垂危。孩子的媽媽爲了看護孩子，已經離職，全家生活十分困難……

我一樁樁地認真講着，卻發現這位婦聯主任聽得三心二意，心思似乎不在這些婦女兒童的命運上。

她聽得實在不耐煩了，就打斷了我的話，直接提出了她此行的主題：「聽說你在美國又得獎了，想去領獎？咱可別去，你老了身體受不了，再說外國人對咱也沒安什麼好心……」

這我才如夢方醒，知道她是幹什麼來的了。我冷着臉回答：「如果你們不讓我去，我當然不能去了。但是我自己不能說不去。」

楊雲巧舌如簧，一會兒勸，一會兒嚇，一直說到深夜十二時，還是沒有達到要我自願說出「我不去」的目的。

看到實在無法和我達成「協議」，完不成她的任務了，她才悻悻地告別了。

楊雲在這以後的半個月中（我已被軟禁），還先後來過四次，目的還是一個：讓我主動發表聲明，宣布拒絕到美國去領獎。而且每次都向我宣傳政府和婦聯為愛滋病人做了多少多少好事，河南的抗愛滋病工作取得了多麼輝煌的成就，愛滋病人又對黨和政府多麼感激涕零……她說的這些我都知道，在愛滋病疫情實在捂不住了以後，河南省為了挽回面子而專門搞了個「愛滋形象工程」，「把喪事當成喜事辦」是多年來的老傳統，上蔡縣的文樓村已經被佈置成了對外宣傳的展覽櫥窗。可誰都知道，愛滋病繼續氾濫的形勢依然嚴峻。

號稱是「婦女之家」的婦聯，原來是幹這個的。古人說「先禮而後兵」，她只是即將開幕的「武戲」的報幕員。

其實更早的時候已經有了反常的現象，只是當時我沒有察覺。

例如，在2006年底，網絡上已經有了些新名堂。在我的博客上出現了三個新的訪客，他們的網名是「天涯一方」、「白痴不是一般白痴」和「雙眼皮老鼠」，這三個人的共同特點是對我大肆攻擊，說我在博客上公布的愛滋病病例是偽造的，甚至造謠說我「因家庭貧窮，幼年賣到青樓，是妓女出身」等等。就此一項他們發的貼子數目之多，在網上的時間之長，都讓人懷疑是專業的槍手，大有背景。後來我才明白，這場網上炮擊只是下面這場大戲的前哨戰。

三 圖窮匕首現

2月1日，我隔着窗戶看到樓下的保安、警員和汽車異常增多。開始時，我還以為是附近發生了什麼大案件，反正與我無關，這一天我連門也沒有出，也沒一個人到我家來。

但很快我就明白了，原來這些都是衝着我這個八十歲的老太太來的。



2月2日早晨，我打掃完衛生，出門去倒垃圾，卻發現在我屋門外和樓道裏立着五六個身穿便衣的彪形大漢。他們攔住我，不讓我走出家門一步，倒垃圾也不行。

我被軟禁了，沒有通過任何法律程序，也沒有任何告知過程——請注意，這種怪事發生在21世紀的中國，「以法治國」的時代。

回到屋裏，隔窗細看，院裏停滿了汽車，穿警服的和穿便衣的大漢從樓門前一直排到院門外，足有四五十人。好傢伙，這陣勢我還是第一次見識。

2月3日，我被軟禁的第三天。晚八時左右，我聽到樓下傳來吵架聲。仔細一聽，是我女兒郭競先和女婿田建國的聲音。原來，臨近春節了，他們要給我送些年貨來，卻被便衣警員攔在樓下。

我聽見田建國激憤地高聲質問警員：「你們把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關在二樓上，她犯了哪一條法律……」

接着傳來郭競先的聲音：「你們拿出法律文件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一個退休老專家，憑什麼無故就被軟禁？你們應該對她的親屬說出一個不讓見她的理由……」

他們的聲音愈來愈高，可是警員的回答卻低沉而簡短，只有四個字：「領導命令。」

女兒和女婿見說也沒有用，就一起向樓門衝來，警員們則手挽手地排成人牆來阻擋，樓下亂成一團。

從晚上八時一直鬧到十時多，女兒女婿還是沒能衝進家門。這時，不知是誰叫來了田建國的上司、河南省人民醫院的院長劉學周（田建國是省人民醫院的外科主任醫師），經他談判和調解，警方終於同意網開一面，允許我的子女上樓來看望我。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參與軟禁的警員共有五十多人，其中還有來自北京的警員（這說明對我的軟禁不僅是河南當局的決定）。滿院的汽車中有三輛是掛着警燈的警車，車內還裝備着電台。從這天起，我女兒每

天上下班，身後總跟着兩輛警車。

2月4日，北京的防愛滋病志願者譚老師來接我去北京。她對鄭州不熟悉，就叫上了「預防乙肝」組織的梁燕燕一同來了。二人乘出租車來到我所住的小區門口，剛一下車就被北京的警員「請」到了鄭州金水區公安分局。到了那裏，警方的第一句話就是：「有人舉報你們有詐騙行為……」

譚某六十多歲，是個中央機關的退休職工，老知識分子，一生本分，為人正直，何來「詐騙」？她只得回答：「你們認錯人了吧。」

而梁燕燕是個剛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的學生，哪見過這陣勢，早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譚老師來接我去北京，原定當天十一時的飛機返回。可到了下午六時，譚老師的丈夫也沒有接到她，電話也打不通。她丈夫急了，就到北京公安機關報了案，說：「我妻子譚某在鄭州失蹤」。譚老師和梁燕燕在鄭州市公安局被關了一天，到了第二天警方才說了句「問題弄清了，你們可以走了。」放她們返京了。

這件事被境外媒體知道了，我被軟禁的消息同時也傳了出去。這成了當時世界關注的新聞。

2月5日中午，兩名澳洲記者趕到鄭州，手舉不久前剛公布的溫家寶總理批准的關於允許外國記者在中國自由採訪的條例，直奔我家，要對我進行採訪。我在屋裏又聽到外面吵成一片，警員們又排成人牆，把記者堵在門外。這兩位記者採訪不成，當即返回北京，根據自己的現場目擊發出了「高耀潔被軟禁消息屬實」的新聞。這一下在全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

第二天，世界各大新聞媒體都在顯眼地方報道了這一新聞，許多組織發出了抗議聲明……我當時被關在家中，與外界的所有聯繫都被切斷了，外界的這場「新聞風暴」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當時正窮於應付那些像走馬燈一樣登門來「勸降」的「高級說



客」們呢！

四 「說客」盈門

在我被軟禁的那些日子，我家的門坎都快被掛着各種炫目頭銜的高官們踏破了。前面說過，那位河南省婦聯主任楊雲來過四次，我退休前所在的河南中醫學院的領導和醫院的領導也來了；我現在是文史館的館員，河南文史館的領導；還有省人民醫院的院長劉學周等都先後來過。他們有的是直接奉命而來，有的是來探望我被警員攔阻，後經交涉和請示才被批准來見我，批准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見了我要替上面「做說服工作」，也就是說，他們都是領了「任務」而來的。

也許是因為這些中級官員的「工作」效果不佳，一些更高級的官員也不得不親自出馬了。原來當過鄭州市政法委書記兼副市長和市公安局長，現任中共鄭州市委組織部長的姚待獻前後來過兩次，副省長王菊梅來過一次，來的最高官是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陳全國，他共來了三次。

這些「高級說客」的水平不一，風格各異，但目標全都是一樣的：勸我主動發表聲明，拒絕美國方面的邀請，自動放棄美國之行。客觀評價，他們有的勸說手法低劣，甚至下流；有的則高明許多，頗有政客手腕。

市委組織部長姚待獻第一次來時態度還算和緩，先扯了些閒話以後，就轉入正題，要我放棄到美國去領獎。我回答：「你們不叫我去，我當然去不成了。前兩次不是都沒去成嗎？」他搖搖頭說：「不能說我們不叫你去，必須說你有病，自己放棄的。」我說：「你這不是讓我說假話嗎？」他不高興地走了。

第二次來時，他就沒上次那樣客氣了。他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要我稱病拒絕赴美。我不軟不硬地回答：「我想去也得能去成啊——門外站着那麼多警員，我連家門都走不出一步，難道能飛去？」

這位當過警員頭子的大官聽了很不高興，瞪着眼說：「我來時怎麼

沒有看到任何人？」我拉開門讓他看時，兩個高個子警員飛快地往三樓跑去，他們剛才坐的板凳還在屋門外放着。姚待獻裝模作樣地看了看，搖頭說：「沒有，沒有……」然後沒趣地走了。

「說客」中來的次數最多的是省人民醫院的院長劉學周（現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在我被軟禁的半個多月裏來了十多次，幾乎每天都來，有時一天來兩趟。此人原任省衛生廳副廳長，對河南省大搞「血漿經濟」，導致愛滋病氾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由於我在前些年曾和他有過工作聯繫，算是我的熟人；再加上我的女婿在他的醫院工作，又增加了一層關係。

他每次來都以老朋友相稱，說話很和氣，我對他也客氣。但客氣歸客氣，說到「主題」上，各自的立場都很鮮明。他軟磨硬泡，反反覆復地勸我，不要到美國去了，這麼大歲數了，找那麻煩幹什麼……

2月12日，他又想出了個絕招：把我唯一的兒子郭鋤非叫來了，讓我兒子和他一起勸我。這一招真狠，他明知道這兒子是我一生的心病，就陳明利害，說我如果執意要去美國，則對兒子的工作、職位和前途怕要有惡劣的影響……他還說，你不為自己想，難道不為兒子想想？說着說着，兒子開始痛哭起來，我想起四十年前兒子因我而陷冤獄的往事，也心如刀絞，不覺也淚流滿面。

在我最軟弱的時候，劉院長又不失時機地拿出紙來，叫我立個字據，聲明「因本人年事過高，身體有病，不能前去領獎」。我不同意這一措詞，只寫了「因故不能赴美領獎」，請他通知我在美國的妹妹代我領獎。看我寫了這幾個字，他一把就把紙條抓在手裏，如獲至寶，飛快地走了。

我估計他是跑去報功了，但他沒發現，我根本就沒有把妹妹在美國的聯繫方法告訴他。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拿這張紙條大作了文章。官方很快向境外媒體發布了消息，說我已經屈服了，決定不去領獎了。



陳全國第三次登門通知對我解禁時，劉學周也來了，他不知為什麼哭了起來，說：「高老師，我和秋月是同班同學，你是我的老前輩，咱們的關係一直不錯，我很了解你作為醫生對病人的心腸……」

人真是奇怪的動物，一個人會有幾張面孔呢？

省委副書記陳全國在「血漿經濟」的高潮時期曾在漯河市當過市長，著名的愛滋病重疫區上蔡縣就在他的管轄下，說他不了解愛滋病的真實情況，對愛滋病的氾濫沒有責任，誰也不會相信。

現在，他已經是河南省位列第三把交椅的高官了，氣派與別的官員的確有點區別。第一次來時，他還領了三個隨從，其中有個姓李的省委副秘書長。進門後，他讓隨員送上了豐厚的禮品，然後噓寒問暖，絕口不提那件雙方都心照不宣的事。

談話間，我引用了一句古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曲折地對我所遭到的暴力表示了譴責。他好像聽懂了，但又裝出沒懂的樣子，沒作出任何反應，而是「王顧左右而言他」。

他第二次來是在2月14日，已經離春節很近了。這次來陣容盛大，陪同的除了副省長王菊梅以外，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官員。令人意外的是，還有一群黨報記者，可謂前呼後擁，熱鬧非常，我那小小的客廳都站不下了，有的只好在樓道裏伸着脖子看。然後，他們就表演了一齣「大拜年」，他說：「快過年了，我們是來看望你老人家的，給你拜個早年！」他的隨員應聲送上禮物，有花籃，有筠竹工藝品等等。這同時，閃光燈不停地閃，攝像機不停地拍……

我的直覺感到，這後面大有文章，就冷冷地問道：「今天來了這麼多人，樓道裏的便衣沒有攔着不讓你們進來？」

陳全國說：「大過年的，大家都高高興興，哪有什麼便衣？我們沒看見。」

這場戲演了大約十分鐘，我開門送客時又看到那兩個便衣抬腿往三樓上竄。

後來我才知道，第二天，《河南日報》在一版顯著地位發了一條河南省委副書記陳全國給我拜年的消息，還配發了一張大照片，河南電視台也發了圖像新聞。新聞中說，省領導感謝我「多年來為河南教育、衛生事業和愛滋病防治事業做出的貢獻」，還說「高耀潔感激地表示她感謝黨、感謝政府的關心和關懷」。

這是幾年來我的名字和有關我的新聞頭一次出現在河南的媒體上。以前誰要敢在報道中提到「高耀潔」三個字，非遭到整肅不可。

而這條新聞的真實背景是我當時正在被軟禁，一肚子火正沒處發呢，怎麼會說出那樣下賤的感恩戴德的話？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解禁後了解了外面的資訊，我才明白過來：我被非法軟禁的消息傳遍了世界，引起了抗議的浪潮，形成了強大的國際壓力和國內的輿論壓力。在權力的中樞，似乎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這場「大拜年」的鬧劇，和那條空前絕後的新聞，是河南省當局的一次「危機公關」大動作。目的顯然是為了平息國內外的抗議聲浪。看來，那些無法無天的「諸侯」們還是有所畏懼的呀！

陳全國的第三次光臨是在2月16日晚八時許。這次他好像是剛喝過酒，一身酒氣。進門後他一屁股就坐下來，說：「省委和省政府支持你赴美領獎，明天派人來幫你辦手續。」

我回答：「簽證早已辦好了，你們讓我走了，我就可以走了。不需要你們幫忙。」

他只坐了幾分鐘就走了。

我注意到，這時，門外和院內的警員們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撤走了，院內又恢復了寧靜……



第二十八節 黑雲壓城半個月（下）

軟禁期間，除了這些「高級說客」輪流前來「勸降」之外，還有一批被「綁架」來的「人質說客」也被迫登場，那就是我的親人和朋友。

一 株連九族

一般說來，這個政府的工作效率是不敢恭維的，辦起正經事來總是拖三拉四，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但整起人來可就不一樣了，會表現出驚人的高效率。我驚訝於他們會在那麼短的時間裏，把我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親友都找出來了，並通過威逼利誘的手段讓他們來向我喊話。

最早被迫來出面「勸降」的是我的弟弟高世潔，他是我家老七，住在開封。開封市龍亭區區委書記奉命拉着他來到鄭州，他住在我的小區隔壁的廣電賓館裏，住宿費全部報銷。這位區委書記還給了我弟弟四張面值百元的購物券，算是補償給他的「誤工費」吧。任務就是一個：讓他住在我家，勸說我放棄赴美的念頭。他每天要去賓館向區委書記匯報情況。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可稱「黑色幽默」的小插曲：世潔有病，患有乙肝病，天天離不開藥。帶的藥吃完了，要回開封去取藥。區委書記怕他一去不返，就親自往開封打電話讓區長替他去取藥。沒想到世潔家養了條鬥犬，十分厲害。這狗見了陌生人就咬，也不認你是不是區長。結果區長的褲子被撕破了，腿也被咬傷了……高世潔得知後被嚇壞了，說：「我的媽呀，狗咬區長，惹下大禍了，我至少要賠償千元以上。」他未料到，隨着我的事件出現轉機，區長捱狗咬最後按「工傷」處理了，世潔分文未賠。

我的妹妹是河南醫科大學的退休副教授，她也奉學校黨委之命來「勸降」。她如實地傳達了上級的意思，我給她寫了張紙條：「本人絕

不說假話。你回單位交差吧。」

我還有個在外地一所重點大學當教授的弟弟，是個博士生導師。人雖沒來，卻奉命打來電話，要求我「照上面的指示說話」。我還是用回答妹妹的那句話回答了他，並質問他為什麼要屈服於壓力。他在電話裏長嘆一聲，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在洛陽工作的二弟是個清華大學的畢業生，他性格剛正，軟硬不吃。上面派人找到他，向他佈置這個「任務」，他嘻笑怒罵，把來人說得面紅耳赤，啞口無言。直到最後，這個弟弟連個電話都沒打。

他們的「工作」做得多麼過細，可從下面這件「小事」看出來：連我妹妹的孩子（我的外甥）也成了工作對象，也有人找他們談話。誰知現在的孩子誰關心這些事啊，三言兩語就把他們打發了。

其實，這種「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並不始於這次。2006年，我老伴病重期間，鄭州幼兒師範學校一個姓朱的女學生主動來到我家，幫我照料病人。老伴去世後，她就住在我家陪我。她出身南陽農村，家境貧寒，現在有工作了還住在我家。一天她突然哭着告訴我，有四個幹部模樣的人到學校找到她，把她帶到一家飯店，請她吃飯，還拿給她四百元錢。說是黨和政府要交給她一項「政治任務」——監視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並經常向他們匯報。還許諾，只要幹得好，就幫助她在鄭州安排工作……她一聽嚇壞了，找個機會逃離了飯店。

另外一個姓何的研究生，是個防愛志願者，常來給我幫忙。後來也是因為被便衣找去談話，領受監視我的「任務」，嚇得她到外面躲了很長時間，連春節都不敢回家……

以上這些都可以當笑話來說，但有一件我卻笑不起來，說起來心就滴血。

還是我那個終生的心病——寶貝兒子郭鋤非。

文化大革命時，為了從精神上擊倒我，他們製造冤獄，把年僅十三歲的鋤非投進了牢房。讓這可憐的孩子受到終生難癒的精神創傷，從此



變得膽小怕事，天天作鐵窗噩夢；這次，他們又把鋤非當成了我的「薄弱環節」，重點擊破。2007年2月18日他們讓鋤非跪到我面前，一連給我磕了三個響頭，求我別去美國了。我手摸着兒子那紅腫的前額，心像被手術刀切碎了一樣……

當兒子淪為強權的人質時，當母親的能怎麼辦？

我流着淚給兒子寫了個紙條：

1. 兒子郭鋤非曾為我受害坐過三年冤獄。
2. 本人行為本人負責，一切概與兒子無關。

我讓兒子保存好這個紙條，將來不管我出了什麼事，他都可以拿出來作為自己免罪的證明……

其實我何嘗不知道，這個紙條是根本沒有用的。我一生的經驗告訴我：當專制的鐵拳砸下時，總是株連九族，巢卵俱碎的。但對我那個心靈脆弱的孩子，這總是個安慰吧。

看到兒子接過紙條，慎重地收藏起來，我長吁一口氣：這些權力者真是高明的冷血心理專家呀！

二 「捉放曹」之謎

先是大兵壓境，黑雲摧城：突然又悄然收兵，風收雲散，短短半個月間圍繞我演了一齣驚心動魄的「捉放曹」，這背後到底有什麼名堂？當時我搞不明白，到現在也沒全搞明白。

2月17日，大年三十，我試着打開電腦。奇蹟出現了：隨着警員的收兵，電腦也恢復正常了。在我的信箱裏，有朋友來信告訴我，在我被軟禁期間，克林頓夫人希拉里先後給胡錦濤、溫家寶和吳儀等國家領導人寫信，才促成了我的解禁。後來，我得到了其中的兩封，全文如下：

其一

尊敬的胡錦濤主席先生：

我高興地了解到中國政府尊重她來美國接受「生命之音」頒獎的決定。我同時也將對吳儀副總理和周文重大使致意，他們也殷勤地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協助。

作為「生命之音」名譽主席之一，我相信高耀潔醫生來訪美國將不僅對「生命之音」這個組織，而對我們的國家有益。高醫生出席頒獎，將能夠分享您的政府致力於愛滋病工作的進展。我期待着能有機會與高醫生見面，並從她那裏學習經驗。最重要的是，這次旅行將讓海外有機會親見高醫生的慈悲。

請相信，我將盡我所能去確保高醫生在美期間是建設性的，並確保她喜歡這次旅行。這是高醫生第一次有機會訪問美國，我知道「生命之音」會努力使她的訪問成為值得回憶的一次。

再次感謝您確保高醫生下月與我們在一起。我真誠地感謝您為解決此問題做的努力。對我們來說有高醫生參加此慶典是巨大的榮耀。

您的忠實的
希拉里克林頓

其二

尊敬的吳儀副總理女士：

我對您協助解決關於高耀潔醫生訪問美國的誤會表示感謝。周文重大使非常殷切地傳達了您的回覆，我很高興地了解到中國政府將尊重高醫生來美國領取「生命之音」頒獎的決定。對我們來說，有高醫生出席頒獎是巨大的榮耀。

高醫生訪問美國將對我們兩國大大有益。她參加「生命之音」頒獎會毫無疑問將提升關於中國已經致力於愛滋病工作的進展意識，並將使海外有機會親見高耀潔醫生的慈悲。我期待着有機會與高醫生見面，並從她那裏學習中國愛滋病預防、治療的經驗。我將



盡我所能去確保她在美期間是建設性的，並喜歡她的旅行。這是高醫生第一次訪問美國，「生命之音」將會努力使她的訪問成為值得回憶的一次。

再次感謝您對解決此問題的努力，並確保高醫生可以在下月與我們在一起。我真誠地感謝您為解決此問題所作的工作。

您的忠實的
希拉里克林頓

這大概就是「捉放曹」發生戲劇性轉折的主要原因了。希拉里、胡錦濤、吳儀等人顯然是主張「放曹」的一方，那麼主張「捉曹」的一方是哪些人呢？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出來對非法軟禁這一嚴重違法事件承擔責任，也沒人站起來向我說一句賠禮道歉的話。

但是誰都明白，能從北京到河南，調動那麼多警員，動員那麼廣泛的力量來對付我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婆的，肯定不是一般角色。河南省的主要領導肯定不能免責。但觀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氣焰之囂張，僅僅河南當局怕是沒膽量來作出這樣的決策的。

現在國內外的說法很多，在沒有確實的證據前我不好亂猜測。但有三點是肯定的：

1. 這些人肯定對當年大搞「血漿經濟」，從而導致愛滋病氾濫，後來又千方百計地掩蓋真相，否認有愛滋病災情，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裏搞新聞封鎖，鎮壓對愛滋病真相的揭露等一連串行為，負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他們實際上是這場世界罕見的「血禍」的罪魁禍首。罪犯爲了掩蓋罪行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2. 這些人肯定手握公安、國安等鎮壓機器和控制新聞、箝制輿論的大權。在胡錦濤總書記號召建設「和諧社會」，提倡「以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敢於幹出如此無法無天，震動世界的倒行逆施，絕非等閒之輩。一般小角色是無法掀起這樣大的風浪的。

3.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人肯定對我這個老太婆早已有刻骨仇恨，必欲除之而後快。多年來，他們對我電話監聽、跟蹤盯梢、派人臥底，網絡控制、新聞封鎖，阻止我參加社會活動，乃至限制出國，各種手段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但依然無法征服我，也無法徹底屏蔽我的聲音和在國內外的影響。這次，打壓手段突然升級，乃是邏輯的必然；沒想到這次他們竟然會敗於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八十老嫗，如何會甘心？今後是否會以更大的仇恨，使出更加狠毒的手段來，我也早有準備。

我心裏很明白，那些對我實施非法軟禁，以及在軟禁期間登門「勸降」的說客，其實都是在前台表演的演員。而真正的決策者，也就是「導演」，卻一直深藏在幕後。

遠的不說，就說近的吧。在河南，有這樣一個女性高官，手握宣傳大權，多年來一直把我當成是眼中釘。在媒體上對愛滋病的真相和有關我的新聞報道進行封殺的禁令就是她下的。2003年中央電視台把我評選為「感動中國」的人物時，她親自出馬，跑到北京去活動，非要把我的名字從候選名單中抹掉，但終於未能得逞。於是她惱羞成怒，下令她管轄下的所有河南媒體一律不得出現我的報道。「感動中國」可感動不了她。

2003年我關於愛滋病的著作《鮮為人知的故事》出版後，她雞蛋裏挑骨頭，從書中找出一張「性病病人體徵」的照片（這是我作為人大代表到監獄視察時拍的，很多專家都評價這張照片很典型，有科研價值），非說這是「黃色書籍」，下令要查處封禁，直嚇得責任編輯劉某聞訊穿反了褲子。正鬧得雞犬不寧的時候，北京傳來消息，這本書榮獲了「第十四屆中國優秀圖書獎」，這是我二十幾部著作中在國內獲獎最高的一個，也是河南農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年來獲得最高獎的第二本書，責任編輯也爭得殊榮，晉升為編審，工資也提升了，於是查處封禁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去年領導派人來找我，說徐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讓你領導



牽頭河南組織了個寫作班子，準備出一本《河南愛滋病的今夕》，是為河南省政府防愛工作歌功頌德的書，以「高耀潔」為主編出版。提出的條件頗有誘惑力——我不用動筆，他們花錢出書，我淨得稿費。我明白他們想利用我的社會威望，來欺騙世人，真不愧為「徐光吹」，真會吹。這個方案被我斷然拒絕了，由此引起的惱怒可想而知。

說句公道話，這個高官這樣做，除了對我的偏見和仇恨之外，還另有原因。就是她的水平實在低得可憐。這位在文革期間靠當「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而起家的「政治標兵」，雖說在「工農兵上大學，工農兵管大學」的時代到開封師範學院政教系當了兩年「工農兵學員」，但實際文化水平也就是高小程度。讓這個離了字典就看不懂文件的人主管意識形態和理論、新聞，也實在為難她了。真不知靠什麼本領爬上這個崗位！

水平不高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她無知，新聞觀念太離譜了。新聞界的朋友告訴我，一次她批評報紙上「負面新聞」太多了，說：「盡發點子，哪個官貪污了，哪個官受賄了，誰誰又被判刑了，這誰願意看？尤其是那個某某女市長開槍殺情人的報道，有什麼意思啊？」當下級問她報紙該怎麼辦的時候，她說：「應該多發點怎麼減肥呀，怎麼美容呀，怎麼選時裝呀……連我都愛看。」這倒是實話實說，據說這位「美女領導」去年還專程到韓國去作了臉部拉皮、雙眼皮手術和豐乳等手術。

這個「美女」獨特的新聞思想在河南得到了強力推行，結果鬧出了不少笑話。例如，中紀委在河南揪出了個大貪官王有傑，此人曾任中共河南省漯河市委書記（注意：那裏是愛滋病重疫區）、鄭州市委書記。被捕時位居河南省常委、省人大常務副主任之職，是河南省迄今被揪出的最高貪官（此人是在上海海關被揪出的）。2007年年初在湖北荆州市中級法院開庭審判，他以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奇怪的是，對當地政治生活中的這件大事，河南只有一家當地黨報

獲准在不顯眼的位置發了條簡短的消息，其他河南媒體都奉命保持了沉默。河南人要想了解這位「父母官」犯罪和判刑的詳情，只有去找外地的報刊來看了。

王有傑被「雙規」後，有人在網上貼出一篇並不太舊的新聞，是2004年4月11日新華社報道的「王有傑書法作品展」的開幕消息。

消息說，一大批河南省的高官都光臨了這個隆重的開幕式，這位女高官在開幕式上作了主題講話，她「強調了這次書法作品展的重要意義，並把它提高到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認真領會十六大精神的政治高度……」

她用肉麻的語言高度評價了王有傑和他的書法，說他「把酷愛書法藝術與追求遠大的人生目標有機結合在一起……蘊含着高尚的人生境界，融書法藝術與人生哲理為一體，充分表達了他對河南人民的熱愛和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反映了新時期河南省黨政領導幹部的嶄新生活觀和人生觀……」

她還讓秘書找來一串最輝煌的讚美詞羅列在一起，說王有傑的作品「筆墨酣暢，雄渾壯麗，器宇軒昂，虛實結合，浩浩蕩蕩。猶如黃河之水自天而下，剛柔相濟，一泄千里，令人仰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上網去搜索這篇奇文。）

人們一對照時間，發現在這個女人發表這篇「貪官頌」後不久，王有傑就被中紀委「雙規」了。此事成了河南人酒桌上的熱門談資。她所說的「剛柔相濟，一泄千里」則成了一時的黃色流行用語。

愛滋病的問題是這些官員最大的心病，直到我的「軟禁風波」過去大半年了，在十七大期間，這位女高官在北京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還念念不忘攻擊一下我的觀點，並為河南政府辯護。她說，「河南的愛滋病並不是血液傳播的，是多人共用針頭傳染的，其實只有幾千人，現在每個人都受到了很好的照顧……」

這話是中央電視台報道的，信不信由你。她就是這種水平，這種立



場，這種態度。我面對的就是這樣一股勢力。

這場精彩的「捉放曹」大戲已經落幕了。但其中的隱情，幕後的博弈，導演和編劇的身分，還遠遠沒有揭開，也許將永遠是「鮮為人知的故事」了。

但我明白，「故事」並沒有結束。北京傳來一個尚未完全證實的消息，說當時河南省曾對我準備了三套方案，「軟禁」只是「中策」，那麼，「上策」是什麼呢？是「蘇三起解」還是「斬寶娥」？

下一齣戲會上演什麼，人們可以拭目以待。

三 尾聲

尾聲一：春節過後，2月20日，我正準備行裝。又有人來敲門了。是河南省紅十字會的兩個人。他們先是給我送上一大堆禮品，然後從包裹裏掏出一份事先打印好了的文件，讓我簽字。他們說，我要去美國了，我在外面名氣很大，領導讓他們來找我，商量利用我的名字成立一個基金會。讓我到美國後，想辦法給河南多搞些捐款……

我一口拒絕了。

我早就多次發表過聲明，並立下遺囑，無論生前死後，不承認任何以我的名義成立的基金會和募捐活動。

我不想成為貪官污吏撈錢和騙子們贏利的工具。

剛剛軟禁過我，又馬上來利用我，虧他們想得到！

尾聲二：2月22日，我離開鄭州去北京。有十幾個人到機場送行，一位省委副秘書長、衛生廳副廳長、中醫學院領導、第一附屬醫院的領導等。我注意到，一個便衣警員跟着我上了飛機，就坐在我身後。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也許是最後一次。坐在飛機上，只覺得累，渾身像散了架——整整折騰了我這個八十歲的老太太半個多月了，誰受得了啊！

尾聲三：飛機在北京降落。走出機場，防愛志願者曾金燕來接我了。我們乘車前往賽特飯店。這時，隨機來的便衣不見了，但隔壁的房



防愛滋病志願者曾金燕到北京機場接我

間裏住進了幾個北京的便衣警員。我一進房間，記者就蜂擁而至。房間裏擠滿了，樓道裏還排着隊。我發現，來的都是境外媒體的記者，沒有一個大陸媒體的記者。我明白了，對我的報道封殺令還沒撤銷。

太累了，記者的提問都盡量簡短地回答——

「河南政府為什麼要軟禁你？」

「不知道。」



「爲什麼又讓你出來了？」

「不知道。」

「以前兩次獲獎爲什麼不讓你去領獎？」

「可能是怕暴露中國愛滋病主要是血液傳播的事實……」

我反問他們：「我到北京的消息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他們說是中國朋友告訴他們的，說着拿出朋友的名片讓我看，有北京的記者，也有河南的記者。我心裏一熱：原來中國的記者們沒有瞎，也沒有聾，只是不能說話，但大家還在關注着我。

尾聲四：2月23日晚，德國大使館一等秘書舒女士請我吃飯。剛走出餐廳，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代表吳儀副總理來看望我，同行的有防疫司司長郝陽。我們談了一個半小時，氣氛融洽。

王隴德副部長承認，中國的愛滋病主要是「血傳播」。主要是因爲窮，賣血；因爲病，輸血造成的。我說，愛滋病不是河南的專利，是全國性的問題。我並不否認有「性傳播」、「吸毒傳播」和「母嬰傳播」，但多數是「血傳播」。我還指出，現在「母嬰傳播」比「性傳播」的機率還要高，在孕期如果不用藥物阻斷，感染機率在三分之一左右。

王副部長指出，防愛宣傳力度不夠。他舉例說，有個醫科大學四年級的學生，懷疑自己得了愛滋病，打電話向衛生部求救。派人領他一檢查，結果是「恐愛症」。連醫學生的愛滋病知識都如此貧乏，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王副部長認爲，現在對愛滋病病人的救助還很不普遍，少數得到了「四免一關懷」，多數因爲害怕受歧視，不敢暴露身分，因此沒有得到救助。我補充道：還有地方當局怕影響政績和形象，不願意承認的原因。

王副部長所說的三點如能解決落實，就是中國的福音，中華民族的福音了。看來，官場還是有明智健康的聲音的。

但是，關於這次談話的消息報道出去以後，美國的病毒學博士、原紐約艾倫戴蒙愛滋病研究中心林曉旭寫文章質疑：「爲什麼王隴德、衛生部、吳儀不對外公開承認王隴德在與高醫生私下會談中承認的問題呢？難道說，泱泱大國的十幾億民衆，只有高醫生需要知道這個真相嗎？」話說得尖銳了些，但道理是對的。愛滋病的問題是無法悄悄地解決的，首先需要的是把真相公開化。

這一合理的願望何時會實現呢？我不知道……



與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左）合照



第二十九節 我為中國最窮的人而來

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奉獻於斯，受難於斯，拚搏於斯。我在這片土地上已經生活了整整八十年，不管是在戰亂年代，和平年代，還是在那被叫做「浩劫」的年代，我都沒有跨出過國門一步。

現在，我這個垂垂老者就要第一次登上越洋旅途，邁動幼年被裹過的小腳，拖着被文革傷殘了的身體，帶着被軟禁半個月的極度疲憊和焦慮，走向大洋彼岸那個陌生的國度。

我為何而去？我去幹什麼？我要去尋找什麼？

如今人們出國，目的五花八門，有去留學的，有去淘金的，有去避難的，有去旅遊的，還有些腰纏億萬不義之財的高官大款則是為了逃避法網和揮霍贓款而去的……

那麼我呢？

去領獎，這只是由頭。我有更重要的使命。

我不是一個人去的，和我同行的有千千萬萬愛滋病受難者的靈魂，我是他們的「使節」——如今「代表」這個詞往往被濫用，誰都可以一廂情願地自稱是別人的代表，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我可沒有這份僭越之心。

我沒有價值千萬的名牌禮服，身上只有一件平布手工縫製的中式外套，黑地白花，價格不值兩美元，但那是領取最低保障金的下崗職工專門為我出國趕製的「禮服」，針針線線都凝結着他們的心意和希望。

我為這些中國最窮、最可憐的人踏上遠途。

我要把他們的苦難和不平告訴世界，要喚起全人類對他們的關注和同情，要為他們帶回與病魔和社會不公抗爭的希望。

「你還會回來嗎？」有些人懷着善意，有些人懷着惡意，不約而同地問了我這個共同的問題。

——我當然要回來了！這是我的家，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是到處留下我足迹和血淚的熱土，是我的事業和我的價值的所在，最重要的是與我已經血肉相連的愛滋病病人和愛滋孤兒們生活的地方。多少人在盼着我的回歸呢！

……這是登上遠航的班機時我心中的聲音。

一 我是偷着跑出去的

我原定於2月25日登機赴美。但負責安排行程的朋友24日下午告訴我，屆時將有大批境外記者聚集在機場，要對我進行採訪。爲了減少麻煩，避免混亂，需要變更出發時間，改爲26日下午五時的航班。

我心生疑慮，是不是又有誰搗鬼了？他們反復解釋，這是唯一的原因，「您老不要再疑神疑鬼了。」我只得同意再推遲一天，但心裏還是打鼓，怕夜長夢多。

26日吃過午飯，我們一行就悄悄離開了賽特飯店。爲了怕人發現，連房間都沒有退。打了輛出租車，在城裏胡亂轉了幾個圈，到四時才來到機場。那舉動可真有點像搞地下工作。

不料，剛進出發大廳，就被美聯社記者堵住了。他是個中國通，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只是有點洋味。他說：「昨天有很多記者在這裏等你，他們想見你，採訪你，特別想跟你留張合影。一直等到深夜，有人說你已經走過了，大家才回去了。」然後他得意地說：「我想不可能。今天又來等你，終於等到了！」然後，他指着前面說，還有兩家電視台的記者也來了。

我坐在輪椅上，服務生推得很快，他就追着輪椅採訪。他問我：「你關心救助愛滋病病人和孤兒，這不屬於政治問題。爲什麼河南官員這樣對待你呢？」電視記者也跑着拍攝像。

我耳朵聾，聽不清其他的問題，也沒法回答。不一會就到了安檢入口。只聽着四個記者開心地大笑着：「咱們終於等到了高醫生，勝利了



……」這些外國記者真敬業，為搶到獨家新聞是不惜力氣的。

順利通過了安全檢查，我和同來的去香港的防愛志願者揮手告別，就登上了美國大陸航空公司的航班。這時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氣：長期緊繃的神經才放鬆了。

頭等艙的座位很寬敞舒適，我又吃了片「安定」，不一會兒就進入了夢鄉——從軟禁以來，我已經好久沒有睡得這樣安穩了。

等空姐來叫醒我吃麵條時，飛機已經飛過了日本的大阪。有人說飛過太平洋時容易有眩暈感，我倒是沒有任何不適。吃完了接着睡，一直睡到了美國。醒來後，有段時間我像是做夢，不知道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是不是真的。想起了莊子夢蝶的典故，自己悄悄地笑了起來。

第一次出國，竟然是這樣「鬼鬼祟祟」地溜出來的，想想有點滑稽。

在紐約時間26日七時許，飛機在紐約國際機場降落了。「生命之音」會務組兩位工作人員在出口接到了我。一位叫于文琦的女士老遠就認出了我，熱情地上來噓寒問暖，讓人覺得很親切。

就在于文琦招手叫車的時候，當地的美聯社記者又出現了。他們扛着照相機堵住了我們的去路，採訪就在路邊開始。

記者問：「高醫生，你是第一次來美國吧？」

我回答：「是的。」

「上次聯合國給你頒獎，你為什麼不來？」

「問題不在我，我不是不想來……」

記者說：「明白。」

記者繼續緊跟着我們，于文琦用英語和他交談着。我們很快就上車了。

這天，紐約正下着漫天大雪，天地一片潔白，空氣特別清新。我的心情也好起來。

經過兩個小時的車程，我們來到了一個大陸來美的華人家住下。他

很熱情地款待了我們，談話也很投緣，因為他也是防愛志願者。但主人家很遺憾地說，他不能多陪我們了，因為他已經訂了機票，馬上就要到中國大陸的防愛滋病培訓班講課去了。

於是我在 29 日搬到紐約曼哈頓的一家飯店去住了。于文琦怕我住在飯店裏寂寞，每天上街去買六七份當地的華文報紙給我看。這時我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那些日子裏的「頭版老太太」。幾乎所有報紙的第一版都有我的報道和大照片，我和記者說的每句話都被報道出來了。除了我到紐約的新聞外，前些天的「非法軟禁事件」仍然是各媒體關注的焦點。

從這些報道中，我才知道了在我被軟禁期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例如，我被軟禁的消息是如何傳出去的，世界上有多少組織和個人發出了抗議聲明，有多少人爲了促使當局解除對我的軟禁在奔走呼號，還有的報道指名道性地說軟禁我的命令是哪幾個人下達的，而我最終被解禁意味着什麼……

我無法判斷這些說法是否完全真實，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決定對我實行非法軟禁的人幹了件大蠢事，當時他們絕對沒想到一個八十歲的中國老人的命運居然能在世界上引起如此爆炸性的反應。

那些關注我，聲援我，支持我的人，我絕大多數不認識，更沒見過面，但我深深地向他們表示感謝。

我還驚歎這個世界的變化之快。到底是信息時代了，全球變成了一個互通聲息的整體，誰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關起門來幹壞事不讓別人知道了。要是在以前，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像我這樣的人就是被關死，被殺掉，外面也不會知道，更不會有抗議、聲援，乃至用輿論促成我命運的轉機……

從報紙上，我看到美聯社的一條來自中國河南的消息，幾天來的好心境一下子被打破了。我好像立刻就回到了河南，又回到剛擺脫了的憤怒之中了。



消息報道：「河南省委宣傳部一位官員稱，河南省一直沒有禁止高耀潔前往美國領獎。其他一切說法都是不負責的。」

我看了怒火攻心：這些人臉皮可真厚，剛剛幹的事就賴帳。我一輩子沒罵過人，但那時真想用一句河南農民的粗話來罵他們：「你們提起褲子就不認帳，是什麼東西！」

你們沒有禁止我來美國，那半個多月在我家門口站的警員是幹什麼的？那麼多官員像走馬燈一樣往我家裏跑是幹什麼的？還有，你們三番五次要我簽字的字據寫的是什麼？

早就知道那夥人無恥，但沒想到他們竟然厚顏寡恥到如此地步。

到這時我突然發現了一個秘密：為什麼在對我實行軟禁時，他們不走任何法律程序，不留任何文字依據——原來是爲了日後可以隨時矢口否認，還讓你拿不出物證來。

我也明白了那些官員來我家時為什麼瞪着大眼說瞎話：「哪有什麼便衣啊，我什麼都沒看見……」

這一招比起他們的文化大革命前輩來，是高明多了。最明顯的差別是，我這本回憶錄中的文革部分可以展示那麼多文獻證據，例如抄家清單、判決書、解除勞教證明、平反通知等等，但到了上一節「黑雲壓城半個月」中，我居然對親歷的軟禁無法拿出一份來自官方的文字證明。

聽說這已經是官方工作的一個新經驗。例如，宣傳部幾乎天天下達「報道禁令」，但早就不用成文的形式了，而是電話指示，口耳相傳，不准記錄——當然還必須執行。

這樣做的好處是隨時可以不認帳。章詒和狀告出版署時就遇到了這個難處。我要是想就遭到非法軟禁，人身自由受到侵害一事提出訴訟，也會遇到這個舉證難題——沒人承認曾經軟禁過你。

最高明的小偷是偷了東西不留任何痕迹和物證，被人指控了可以紅口白牙地否認一切。看來，這些官員的「執政能力」確實有了明顯的提高。

問題是使用這種「下三濫」的地痞流氓手段來「執政」，幹了事不認帳，這還像個「負責任」的政府嗎？怎麼有點像黑社會了……

看來，我在萬里之外，也還要繼續受到他們的精神折磨！而我回國以後，說不定還會有什麼新的「奇遇」呢！

二 在美國的演講與參觀

生氣歸生氣，就是罵兩句他們也聽不見。重要的是該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

休息了幾天之後，在等待「生命之音」頒獎儀式的日子裏，我開始了在美國的奔忙。

我從2月26日入境，到4月1日離境，共在美國訪問了三十八天。除了參加頒獎儀式之外，我還參觀、演講與各方面的來訪者會晤，日程相當緊張。

根據我的專業和興趣，主人爲我安排了到一個愛滋病救助組織 Housing Works 去訪問。那是一次難忘的經歷。

這個救助組織是個慈善機構，工作人員都是義工（即志願者），其中有許多本人就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他們自願幫助那些已經進入發病期的人。這個特殊的社區規模很大，環境也很優美。他們有自己的麵包房、書店、雜誌社，有三處店鋪和住宅樓，光工作人員就有四百多人，他們免費收容那些無家可歸的愛滋病患者，經費靠社會慈善捐助和他們自己經營項目的營利。

我在那裏作了一次演講，聽衆大



我與美國愛滋病病人合影



多是愛滋病患者，有百多人。演講主要內容是介紹中國的愛滋病疫情，以及受害者與愛滋孤兒的悲慘命運。爲了使內容更容易被他們理解，我主要用圖片來說話，那是從我多年來在愛滋病疫區拍攝的照片中精選出來的。



我告訴他們，中國的
訪問美國一愛滋病機構
愛滋病人面對特殊的困難：缺乏社會的理解和寬容。人們普遍認爲愛滋病是一種「道德病」，是由於患者不道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是「咎由自取」，別人包括政府是沒有什麼責任的。愛滋病人受到社會上很多人的歧視和排斥，因此，非常害怕公開暴露自己的身分和病情，因爲那樣一來就要立刻失去自己的職業、社會地位，甚至家庭……

當我講到這裏時，看到聽衆中很多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淚。

美國的情況好多了。整個社會對愛滋病人相當寬容和開放，大家談起愛滋病沒有什麼歧視的意味，像是在談論一種普通的慢性病，如癌症、糖尿病一樣。

與中國現在的愛滋病傳播模式（血液傳播爲主）不同，美國的傳播主途徑是吸毒傳播和性傳播（包括同性戀）。但愛滋病患者並不因此而受到歧視。我演講後，一位女士走上前來，很坦率地說，她是在上大學時，一天夜裏回校的路上被人強姦後，感染上愛滋病的。現在她在防愛組織的雜誌社當編輯……說起話來，氣定神閒，毫無愧色。

中午，我在他們的餐廳裏和愛滋病患者一起吃了頓飯。飯後，一個愛滋病晚期的患者一定要來見我。他患有食道癌，已不能進食，全靠胃管餵養，骨瘦如柴，行走困難。他好容易走到我眼前，用手撐住桌子，

費力地和我貼了貼臉，說：「我的伴侶也是得這個病，已經走了。我能夠在活着的時候見到您老人家，感到非常高興，非常滿足……（經翻譯）」

在國內，我沒少跟愛滋病患者打交道，河南的愛滋病疫區我幾乎都走遍了，我家裏也經常有愛滋病病人來訪。但在美國和愛滋病病人在一起，總覺得和在國內的感覺不同。這不同是在哪裏呢……回來的路上我一直在沉思。

——在目光上。他們敢於那樣坦誠地直視你，沒有躲閃，沒有游移，沒有自卑。他們還是個尊嚴的人，只是得了一種病而已。

可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愛滋病患者的目光呢？有痛苦的迴避，有絕望的哀憐，有時也爆出瘋狂的憤怒，唯獨缺少像那位雜誌社的女編輯一樣的坦然，和那位瀕死的患者一樣的自尊。

2001年，聯合國授予我的獎項是「健康與人權獎」。看來，這個獎項的設立是大有道理的。

生命的健康，不僅僅是個生物學意義的概念，而且是和人權這個社會學的概念緊密聯繫在一起。當一個人失去了人的尊嚴時，健康還有什麼意義呢？中國愛滋病患者缺少的不僅是健康，還有最基本的人權！

在美國紐約、華盛頓、芝加哥三個城市和附近地區進行了六場演講，有美國國務院、亞洲協會、哥倫比亞大學等部門和學校，我還到哥倫比亞大學作了一次演講。還是以真實生動的圖片為主，盡量少講話。去報道的媒體記者



在美國國務院演講



很多，演講後的提問有些問題很敏感。我堅持了一個原則：只談愛滋病，其他免談。因為我是個醫生，不願在我熟悉的專業和個人經歷以外隨便發言。不像有些人，在一個專業領域有了成就，就對所有領域的問題說三道四，好像自己無所不知，百科皆精。

我誠懇地告訴他們，我是來做客，不久還要回國去繼續我的事業，當然要考慮回去後的工作和生存了。對此，他們表示了尊重和理解。

我講到，中國有不少患者是因為在醫院裏輸血而被傳染上愛滋病的。美國的聽眾問了個在他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問題：「那他們為什麼不到法院打官司去呀？」

美國人的辭典中是沒有「上訪」一詞的。權利受損就打官司，據說美國人是最愛打官司的，他們怎麼能了解「中國特色」這四個字的深刻含義呢？

你去問孫亞吧，他的兒子在北京口腔醫院作腭裂修補手術，因輸血感染上了愛滋病，現在已經病發了。他的這個官司已經打了幾年，估計在他兒子的有生之年難看到結果。

你去問李喜閣吧，她在醫院作剖腹產時也因輸血而母女三人感染了愛滋病。現在一個女兒已經發病死亡，而法院根本就不受理她的訴狀。她本人還因到衛生部上訪而被拘留了二十多天，軟禁在家一年多，現在還被監視居住……

我沒法對他們說明白，他們也沒法聽得懂。我們之間隔着的可不僅僅是「文化差異」。

什麼時候這個巨大的差異消失，兩國人之間才能真正互相溝通？

三 頒獎台下的風波

訪問的高潮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我是3月11日從紐約乘火車來到華盛頓的。文琦陪我參觀了白宮，我還先後兩次到國會演講。國會的歡迎詞中給了我個特殊的評價，說我

是「唯一一個在美國沒有反對聲音的中國大陸人」。

後來，我還到國務院作了一次演講。在那裏遇到聯合國喬曼森納人權獎組織的成員劉先生（華裔）。他對於文琦說：「我們請不來高醫生，你們能幹，你們有辦法……」

他還直接對我說：「2001年我們頒獎時請不來你，現在你來了，我們能看到你真感到榮幸……」

我回答：「對不起，當時沒能來，問題不在於我。現在我給你帶來個小小的禮物——我最近出版的四本書。」

在去國會大廈的路上還鬧了個小插曲：正走路時，突然被兩個黑人攔住，嚇了我一跳。後經翻譯才知道，他是說：「您是姓高嗎？我認識您——在報紙上看過您的照片。」我承認自己就是那個高耀潔，他非要拉着我的手和我照合影。要求得到滿足後，樂得一蹦一跳地走了。

這次來訪的主要節目「生命之音」的頒獎儀式定於3月14日晚舉行。獲獎者共八人：印度、孟加拉、蘇丹、危地馬拉各一人，中國四人。另外三名中國人分別為大學教授、雜誌總編和律師。他們三位出國順利，未受阻攔。

三個中國人湊在一起就是一台戲。本來挺喜慶的事被鬧得讓人像吃了蒼蠅一樣難受。誰在儀式上代表四個人發表感謝詞成了難題。那位雜誌總編來到我的房間，說要推薦我代表大家發言，並說她已經給我寫好了發言稿。

我冷冷地拒絕了：「我的口音不行，讓王教授發言吧。」

王教授很願意上大會發言，可那位總編不同意，於是兩人多次發生爭執，以致於發生了肢體衝突……

爭得最後讓那位律師發言了。

我冷眼看着這一幕，心中感到悲涼。中國人吶，你何時才能爭點氣？

說實話，發言稿寫得很臭，充滿了國內流行的官腔。典禮後進餐



時，不少來參加儀式的華人用「假、大、空」三個字來評價了這次發言。

在當天上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出現了令人尷尬的場面。

那三位獲獎者爭先恐後地往台中心擠，總編坐在正中央，我乾脆躲到台邊上，靜靜地坐下來。沒想到各國記者一擁而上，把所有的照相機、攝像機都對準了我，閃光燈亮成一片。全場的重心偏到了我這一邊。

提問開始了，幾乎所有記者的提問都指向了我。提的最多的是中國愛滋病傳播的規律和原因。

我據實回答：中國的愛滋病病毒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愛滋病病毒類型不同，傳播途徑也不一樣。在中國，吸毒傳播和性傳播的比例較小，主要是血液傳播。而從 1990 年在很多省份大興「血漿經濟」，造成官民齊上，亂採血漿的狂潮。在採血的過程中，血站和血販提取血漿，用來製藥，把剩下的紅血球加上生理鹽水反輸給賣血者，對這一過程的管理不嚴，造成了愛滋病病毒在短時間內大面積傳播……後來，官方雖然關閉了一批採血站，但由於暴利的誘惑，地下採血和非法血庫依然存在……

我還特別指出，愛滋病並非河南的專利，南方一些省份，例如貴州，「血漿經濟」方興未艾。那裏有二十五個縣市在賣血，廣東也有人已經賣血賣了十幾年。他們的活動愈來愈隱蔽，常在午夜十二時以後到清晨六時之間採血和交易……

這些答案，在第二天又成了各大媒體的醒目新聞。

有趣的是，會後那位雜誌總編找到大會主持人提抗議，說記者招待會冷落了他們。

主持人向她解釋：「我們只負責通知和召集各國各媒體的記者。至於他們來了要採訪誰，對誰感興趣，鏡頭對向誰，我們無權干預，更無權作出安排。記者們的採訪是自由的，這是美國的法律規定的……」

看來，這位總編又犯了一次經驗主義的錯誤，她把美國當成中國了，這也算是一種文化隔閡吧。

四 希拉里的好奇目光

頒獎典禮的當天下午，安排我去會見克林頓夫人希拉里，這是早就安排好的議程。她在致胡錦濤和吳儀的信中就說過：「我期待着能有機會與高醫生見面，並從她那裏學習經驗」。

在紐約時，當地的朋友就多次勸我，要為我多準備幾件禮服，說美國上層社會的習俗是在不同的場合，見不同的貴客，應該穿不同的服裝，佩戴不同的飾物。我善意地拒絕了。

這天中午，華盛頓的朋友又勸我：「你來到美國後，就是穿得這件衣服。下午要見希拉里了，晚上還要參加大典，該換件像樣的禮服了。」

我又一次向他們說明這件衣服不尋常的來歷和其中包含的意義。他們聽了，表情凝重，不再堅持了。

下午，希拉里在她的辦公室單獨接見了我。我剛出電梯，希拉里的女幕僚就迎



希拉里單獨與我會面

上前來。她告訴我，聽到我被軟禁的消息之後，希拉里非常着急，命令她趕緊起草信件，二月初那幾天，她先後起草了十幾封信，送希拉里，直到北京有了肯定的答覆，她們才鬆了一口氣，接着就準備迎接我的到來。



我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謝，並說：「我能夠出來領獎，不也說明了中國在改革開放方面的進步嗎？」她點頭稱是。

她引導我走進希拉里的辦公室，希拉里笑嘻嘻地出來迎接。她把我請到裏間，坐在沙發上，開始拉家常。

她先問我現在的工作情況，又問我來美國生活習慣不習慣。說話間，她一直上下打量着我，目光不時地掃過我的黑底白花衣服，和那雙穿着自製布鞋的小腳，臉上現出好奇的微笑。

我告訴她，這小腳是中國婦女千百年來苦難的縮影，現在已經不多了，我是最後一批了。她很禮貌地把話題轉到愛滋病問題上，我介紹了中國愛滋病的情況，她表示同意我對防愛的主張，還提出要提倡性道德，鼓勵人們潔身自好等等。言談中我發現，她是個中國通，對中國的情況相當了解。

總的印象是，她是個能力很強，又相當家常的女政治家。

在盛會期間，我又先後見了前總統執行長菲奧莉娜、克林頓時期的白宮辦公室主任麥克拉蒂、與布殊總統關係密切的共和黨德克薩斯州的凱巴利、當時可能參加2008年總統競選的共和黨阿拉斯加州參議員哈格爾、CNN的The Situation Room節目主持人沃爾夫布利哲、CNN的伊拉克戰地記者克裏蒂亞尼阿曼普爾，以及NBC的資深記者安德利亞米切爾（格林斯潘的夫人）等知名人士，足見此行受到美國各界的高度重視。

我在美國的親友也受到大會的盛情邀請，我的妹妹高明鳳夫



美國國會議員、我、希拉里三人合影

婦、我的小女兒郭炎光、王淑萍醫生等也來與會。

3月14日晚，我在隆重的頒獎典禮上接過了美國維護婦女權益的組織「『生命之音』環球合作夥伴」頒發的「2007年環球領導獎」。

特約頒獎嘉賓、資深女記者朱莉伍德若芙向全體與會者講述了我十多年來為調查愛滋病疫情，救助愛滋病受難者和愛滋孤兒，和以極大的勇氣揭露愛滋病「血禍」真相所作的艱苦努力和取得的顯著成就。全場來賓深受感動，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獻給了緩緩走上頒獎台的我。

從鄭州到北京，再到華盛頓有多少里程，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計算出來。但是，誰能計算出我為此所冒的風險，以及付出的血汗和淚水有多少？誰能知道當我帶着這個榮譽回到河南以後，等待我的命運又會是什麼？

時下，我已遭到監視和消息封鎖，那一刻，我淚水充滿了眼眶。

聚光燈下的一切，轉瞬即逝，我的心思亂如麻，一切不知所措，我難以一一記清。但有一件小事令我終生難忘：

大會後的酒宴上，有人領着一位年紀與我相仿的老女士走到我面前。翻譯向我介紹說，這位女士自費買機票，乘了四個小時的飛機，來到華盛頓，又花了三百美元買了張門票，目的只有一個：親眼看一看我，並和我照張合影。我當然要滿足她的願望了。照完合影後，她還用英語急速地說着，翻譯告訴我，她說的是：「你是個善良的人，你救了很多，你的工作很不容易，你比德蘭修女的工作條件還要困難，你是個英雄……」

另一位老太太說，她希望我能留下來，把八十歲以後的日子交給她，由她來照顧我的晚年。她保證要給我一個安靜的、幸福的晚年……

拳拳真情，感人肺腑。但是，我要走了，我的家在中國，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病人和孤兒在中國，我的人生價值在中國……

再見了，善良的人們！



五 我是英雄嗎？（代結束語）

在回程的飛機上，那兩位老女士的話一直在我耳邊迴響。

我果真是個英雄嗎？

有不少人說，這是個利益至上的時代，是個庸人的時代，是個不需要英雄，也沒有英雄的時代。

我從來就沒有想當個什麼英雄。

如果，二十年前我退休後，什麼也不再作，什麼「閒事」也不管，那我就會像無數的退休老人一樣，生活的平靜、安逸，無聲無息。但是，是誰把那第一個愛滋病患者送到了我的面前，使我從那一天起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這大概就是命運吧。

誰讓我是個醫生，誰讓醫生的天職是治病救人，誰讓我從小就在聖賢的教育下長大，誰讓我見了受苦難折磨的人就難以冷漠，誰讓我見了黑暗和罪惡就怒髮衝冠……

先賢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我今年已經整八十了，怎麼聽到百姓的哭聲，還不能做到「耳順」，還要心有淒淒然？

這一切都是命定的吧！

我不是英雄，只是個平常的人。與多數人稍有不同的是，在別人轉臉走開的時候，我沒有放棄；在多數人彎腰避禍的時候，我挺起腰杆；在多數人自覺不自覺地說假話的時候，我像個小孩子一樣選擇了說真話。

如果把這就叫作英雄的話，那英雄的尺度也未免太低了。

我的選擇是在一個健康的社會裏，每個正常的人都能作出的選擇。



在亞洲協會演講

不是個英雄，只是個正常的人——本來意義上的人。
除此之外，豈有他哉！

最後附上一首北京大學碩士生寫的詩：

感 動

——獻給慈善的高耀潔奶奶

那張佈滿皺紋的臉
那顆七十六歲的心臟
那個蒼老多病的身軀

映入愛滋病遺孤的眼
依舊跳動着青春的火光
步伐一如既往地堅強

像春天的花園
傳遞着博愛的接力棒
沒有怯弱的慌張

沁香着孩子們的心田
自私者臨陣脫逃
直面愛滋給孩子的創傷

正如黑亮的煤炭
慈悲者挺身而出
傳說中菩薩的心腸
燃燒掉冬日的嚴寒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只願貧弱者健康成長
那比這般善良
孕育着溫暖的港灣
在愛的波光中蕩漾
感動着世人冷漠的心房

作者：來曉雷 北大體育大學碩士研究生 2003年12月2日

第三十節 難忘的菲律賓之行

爲什麼菲律賓邀請我，並且熱情招待？是因爲杜聰獲獎，我隨他一同去的。2003年我曾獲得過拉蒙·麥格賽賽獎（Ramon Awardee Magsaysay），因故沒能前往，此次與杜聰先生同行受到了極大歡迎，我從家出走得非常神秘，未遇到任何阻力！

一 我為何不聲不響去了菲律賓？

2007年4月，從美國回來之後，表面上看來很平靜，我門口沒有國保與警員，實際上當局對我的監控並不放鬆，在我住室周圍安裝了四個攝像監控器，爲的是監視我的活動，怕記者來訪，怕愛滋病人或家屬來訴苦、來託孤……

在此同時還遇到兩起令人心煩的事情：

1. 陪我到美國去的那個二十歲的女孩子，是李丹東珍的員工，她要認我當「乾奶奶」，我特不喜歡拉這種關係，另一方面我對她有看法，此人不誠實，自稱英國大學畢業，其實她高中也沒有讀過，她家用幾十萬元讓她去英國讀過語言班，中文水平也很低，在美國她不能勝任我的翻譯工作，許多場面的翻譯事宜都是于文琦女士承擔的，更可怕的是她封鎖了我的對外消息，有不少事情都不讓我知道……近來她與李丹的關係拉得非常近。爲了不惹是非，我聲明與李丹斷絕來往，我支持了七年的「防愛」友誼毀於一旦！

2. 政客們表面很客氣，實際上「怪招百出」。我發現警員執行任務時感染愛滋病的機率高，決定自費往全國縣以上公安局寄的書和防愛宣傳品，從2007年6月2日起至8月27日上，先後發出二千七百一十九包，而接收方沒有收到，全部石沉大海，使我書籍、資料和郵費共損失了二萬多元。真不知是何原因！難道有人不願、不敢讓警員知道愛滋病



真相嗎？

2007年8月初，通知我赴菲律賓的信息不是通過郵件也不是通過電話傳來的，而是來人取護照為我辦理手續，並約定好接我的時間。

2007年8月25日，接我的人來了，約定下午四時的火車。二時許我兩手空空，離開了家，按時乘上了火車。次日上午八時許順利抵達廣州，當即轉到廣州東站乘上了出境的火車，十一時許到達香港，次日晚一行四人乘十時的飛機，十二時到了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市國際機場，大會接我們的四名工作人員已等候多時，杜聰是獲獎者，我是貴賓，另兩位一個翻譯者，一個隨從者，均為青年女子，我們剛一出關便被他們認出，基金會負責人馬上往杜聰脖子上掛花環，那樣的歡迎場面，在大陸杜聰是不可以想像的！

次日我們參觀了基金會大樓，接着就是座談會（因為語言不通，我坐在那裏像傻子），杜聰可以用外語講話，我們參觀了華人博物館，三層樓，很氣派，有電梯，不太費力，講解員是個中國後裔，他的說話我能聽懂，很多古物都是中國的，最早一件是秦代兵馬俑的站俑，再就是幾件來自唐代的，宋代文物不多，以明清兩朝的東西較多。



2007年8月攝於菲律賓已故總統拉蒙麥格賽賽墓前並敬獻花籃

8月30日，我們全體去了已故總統麥格賽賽（Magsaysay）的故居，他的夫人於2005年才去世，他的女兒和兒子出來接待，我們還在那兒會餐，合影留念。已故總統的兒子說：「我母親臨終之前遺言，頒獎大會時中國大陸的高醫生未能來領獎，今後若她能來馬尼拉，一定請她在我的墓前拍張照片。她是馬尼拉的榮譽市民，她是個善人，你把照片燒了以慰我在天之靈。」我真的按照已故第一夫人遺囑拍了照片。



在菲律賓大學演講



演講後合影



當時我有另一種感覺，我們大會的車所到之處，警車開道，兩側也有武裝警員保護，大會接待人員告訴我們說：「你們不要一個人去『唐人街』，那兒比較亂。」大街上也可以看到武裝警員，當時我想菲律賓的治安不如美國，所以除集體活動之外，我們沒有外出過一次。

今年獲獎者六人全來自亞洲，其中有兩位中國人（不，杜聰是美國籍），只有北京那一位，還有一位老先生是40年代遷居國外的華人，他會說中國話。大會比較隆重，可能坐有一千多人，在會場上又出現了武裝警員，看到他們令人感到不太舒服，和3月份美國那次會議完全不一樣。

大會之後，酒會上還有一些人要求與我合影留念。來訪記者沒有在美國授獎時那麼多，因語言不通很快結束了，這次我不太累。

8月31日我去菲律賓大學演講，聽眾多來自外單位，約有百多人，為保證真實性，我仍然用幻燈片，因幻燈片中的每一張照片都是活生生的現實，也可以說，每張照片都可以說明愛滋病病人的慘痛遭遇，政客們造謠再多，也不能推翻「血的災難」，會後不少人發問，看來不少人知道中國愛滋病傳播的真實情況！我堅持中國愛滋病傳播途徑是血，而且是全國性的，並非只限於河南一個省……

二 作家的一次另類採訪

我剛到菲律賓就發現一位年約五十歲左右的白人作家，在等我採訪，我們見面之後，作家與以往採訪者都不相同，除一般寒暄之後，他開口就問：「高老師你父親在前清朝做啥官……」

我說：「在我祖父的青年時期，清朝已廢除了科舉，我父親文化不高，沒有做過官，但他很聰明，他知道要教育子女讀書……」

作家又問：「你是河南人嗎？在過去生活怎樣？家住在哪裏……」

我說：「我是山東曹縣人，因戰亂於1937年離開了山東曹縣的老家高新莊，1939年遷居開封市……」

作家對我原籍及身世很感興趣，像連竹炮似的問個不停：如我讀書的情況、什麼時間當了醫生、做哪科醫生、何時退休、退休後為什麼走上防愛的道路，十幾年來的艱險，你怕嗎……等等。

我對他的發問一一作了回答，介紹了不少細節，因語言不通，頗感費力，花費了一個上午四個小時，翻譯也說不清楚。

當天晚上，我用了一張大紙，畫了一張30年代的高新莊示意圖，並另畫了一張高家先人的示意圖，圖畫的雖然不好，但能夠說明問題，即我出身於名門望族。

過了一天，我們又一次開始談話，作家對這兩幅圖非常感興趣，他指着第一幅圖一點一滴地問，如：

1. 家庭每位成員當年的生活情況，家中生活來源。
2. 我從小讀書情況。
3. 中國「反右派」、「文化大革命」時期我的遭遇。

我告訴他：「反右派」時，我因下農村做醫療隊而倖免，文化大革命我是死裏逃生，一言難盡，每逢提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生活，本人不能入睡……現在中國就有不少掌權者還是文化大革命的殘渣餘孽，這些人文化水平很低，小學文化，在「文革」中表現「積極」，上了工農兵大學，是一些全靠拉幫派，搞陰謀詭計來掌權的小人，他們本性難移，欺上瞞下，造假成風。有首民謠把他們的形象描述得非常生動：

村騙鄉，鄉騙縣，一騙騙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層一層往下念，念完文件進飯店，文件就是不兌現。

我最後告訴他說，我當了二十一年的婦產科醫生，十六年婦瘤科醫生，我是有名「走白專道路，從不問政治」的人。

作家問：「你為什麼從一位婦產科醫生，轉變成了愛滋病的救世者，你在人們心目中威望很高，我收集過你各種文字的報刊資料很



多。」他說着便開櫃子讓我
看。

我說：「本人關注愛滋
病，是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
的那個愛滋病病人是輸血感染
的，這種感染發生在庫存血
內，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當時我絕沒有想到愛滋病流行
的背景及後來發生的這一串問
題，打壓的一切，全認倒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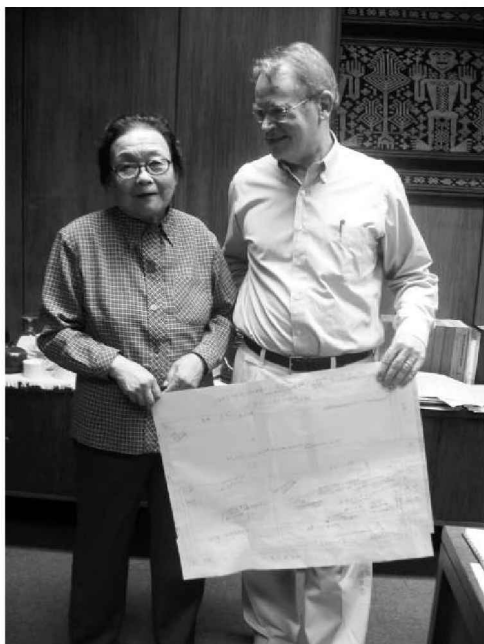
作家又問：「今後你打算
怎麼辦？」

我說：「愛滋病已成為中
國的災難，你們只知道『六
四』等事件死人，這些死的人
與愛滋病死人相比，我敢說那是九牛一毛，2003年的一天，我到一個愛
滋病疫區的村莊，一天之內就埋葬了六個死亡的愛滋病病人。現在還不
算完，還會繼續發病，繼續死人。在這樣悲慘的情況下，還有一些發愛
滋財的『醫騙子』，他們無恥地當了幫兇和殺手，更可怕的是這幫壞傢
伙背後有保護傘，有後台：官員們或官太太。他們沆瀣一氣，爲了賺昧
心錢，助紂爲虐，做了壞事中的壞事！一切的一切，我全無能爲力！我
時常認爲自己生不如死，死是一種解脫。」

作家說：「不能！不能！你應當爲多數人而健康地活着……」

我說：「我人年已八旬，對今日的中國來說，又有何用……」

我們先後談了三個半天，他和夫人都很客氣，最後還把我畫的一張
圖紙拍了照片。



與白人作家合影，手中拿的是我畫的
高新莊示意圖

最後我才明白了，因在我出訪美國前夕的那場鬧劇，驚動了西方記者與作家，激起了他們的好奇心，他們認為我的古文水平與當官所說的那樣情況不符合，他們感到奇怪，要對我的出身調查個水落石出，所以這位作家才下了這麼大的工夫，離別時他說：「謝謝，等我寫完後給你寄上一份。」

我從菲律賓回來之後，表面上看來風平浪靜，我屋門外沒有坐着便衣警員，其實暗中監控並沒有放鬆：

1. 自2007年5月，我住室前後裝了四個攝像頭監控我的住室，「愛滋日」在小區外至少有四部警車，和十幾名便衣警員（我就不下樓讓他們在嚴格中為主子效勞吧）。

2. 近半年有四次外省高校活動請我參加均被阻止了。

3. 自2007年6月至8月26日，我先後往全國公安局寄出防愛書籍二千七百一十九包（均是讓學生包的），迄今未有一個受書單位回執，也未有因寫錯封面而退回一包，因我寄出時沒有用掛號郵件，全部石沉大海，無法追究。

為什麼官員們對我這樣態度，其原因是我堅持了中國愛滋病血傳播的主要途徑。我並不否認有性傳播和吸毒傳播。但愛滋病發生在廣泛貧苦的農村是因為貧窮賣血，生病輸血而引起的。

海內外人所共知，中國愛滋病以「血禍」為主要傳播途徑，在2007年「愛滋日」大肆宣傳性傳播和吸毒傳播，對血禍傳播愛滋病問題，如今仍是捂捂蓋蓋不敢正視真相，而疫情一直上升，對敢於暴露輸血感染者，大量被打壓，此時，關進拘留所者為數不少，但官方大肆吹噓防愛成績，我送他們一首打油詩：

吹！吹！吹！

吹的鷄毛飛上天，

吹的蒜皮如天仙。



吹的大的像泰山，
 吹的高的如雲端，
 吹的愛滋播散，
 吹的「典型」把人騙。
 吹的「政績」泡沫現，
 吹的「公德」如霧煙，
 吹的本能全靠錢，
 嗚吁！哀哉！何時吹完！

如此下去，這和五十年前對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論一樣的惡果。若干年後，愛滋病疫情在中國的傷害，我認為要比人口過盛問題嚴重得多，不信走着瞧！

2008年8月，我又一次去菲律賓馬尼拉市，是參加蒙麥格賽賽獎基金會成立五十周年慶祝大會，又是和杜聰一起去的。這次會議，近五十年來在世的獲獎人士都來了。各國來賓約有百多人，當地的電台記者、報紙記者、菲律賓各級官員都參加了。大會非常隆重。

那位好奇作家也來了，正好；這次我去菲律賓帶了二十冊《高潔的靈魂》一書（這本書2008年版剛剛出來），先送給他一本，他又從我手中取走一本，很高興的離開了，以後再也沒找我了。如此看來，《高潔的靈魂》一書是對惡毒中傷我的壞人一個有力的回擊。

第三十一節 八十三歲踏上流亡路

這是多年來一些人不斷好意或惡意推測的我的歸宿。

這是多年來我一直反復拒絕的選擇——流亡。

放逐和流亡，與被殺和監禁一樣，是古今中外所有生活在黑暗暴政年代的聖賢君子、仁人志士無可逃避的命運。從兩千多年前三閭大夫屈原在汨羅江邊的泣血悲歌開始，去國離鄉、萬死投荒的悲慘故事一再續寫，永無終篇；「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的椎心哀鳴一直不絕如縷，穿越蠻荒，浸透史書，縈繞在世世代代中國人的心頭。到了近現代，儘管流亡地大都不再是蠻荒之野了，有的甚至是遠國異邦的繁華街市，但對眷戀故土的中國人來說，流亡的慘痛一點也不因此而減輕。說老實話，這是我一直拒絕選擇流亡的第一個原因：離開這片我生活了八十多年的熱土，流落到異國他鄉去當一隻離群孤雁，對我來說是無法想像的畏途。

多年來我拒絕流亡的第二個原因是：我是一個醫生，我的病人在中國，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責任在中國。近十幾年來，我以一個退休醫生的身分投入了愛滋病疫情的調查和愛滋病病人及其子女的救助。在這個過程中，愛滋病病人和愛滋孤兒們認識了我，並以真誠的愛來回報了我；民間社會熱情地接納了我，並把「感動中國」的崇高稱號授给了我；全世界愈來愈多的人也知道了我的名字和我的事業，把一個個桂冠加在我頭上，這一切讓我感動萬分。我本應在這個救死扶傷的高尚崗位上工作下去，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息。只要我在自己的國家裏還有條件從事防治愛滋病的工作，我是絕不會放棄自己的崗位的，就像戰士絕不會放棄自己的陣地一樣。

但是，去年，我卻不得不逃離自己的家，踏上了漫長的流亡之路。儘管我只是個醫生，從來不熱衷於政治，甚至極端厭惡那多年來籠罩中



國的醜惡政治，但最終卻不得不因為政治的原因而成了一名流亡者。

這些年來，有成千上萬的人由於政治原因被迫逃亡國外，其中有青年人，有中年人，也有六七十歲的老年人，但是像我這樣在八十三歲的風燭殘年，拖着傷病羸弱之軀，泣血灑淚走上流亡路的怕是不多。我大概是這些年來中國最高齡的逃亡者吧——天鑒我心：這項健力士式的紀錄可不是我情願得到的啊！

這到底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作出了違背初衷的選擇？

是什麼魔鬼把我推上了這條荊棘之路？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當我開始關注愛滋病疫情以來，專制機器就把我當成了重點監控的對象。一個巨大的黑色羅網在我周圍佈開，攝像頭、竊聽器、電話監聽、網絡監控、警員、便衣、警車……成了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點綴。而2007年春節前半個月的非法軟禁，則是這場殘酷荒唐鬧劇的高峰。

後來，當我終於奇蹟般的獲準到美國領獎時，河南當局開始散佈謠言說：「高耀潔去美國不會回來了。」可我卻偏偏回來了。當年4月8日我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走下飛機。我二弟到上海來接我，住在一個朋友家。有關當局的耳目真是靈敏，很快就把電話打到那位主人家處問：「高耀潔是否住在你那裏？」4月中旬我先回到開封，住我小弟的家，4月下旬返回鄭州家中，每走一步都有人在密切地監控着我的行蹤。

這一切都預示着我的回來將不會平靜。回家的路上，我不斷地設想着這次美國之行可能招致的各種後果，並做了最壞的準備。

一 笑臉後的「招安」陰謀

但是一回到鄭州，撲面而來的一張張笑臉，讓我多少有點意外。

大大小小的官員走馬燈似的來登門拜訪，我所屬的醫院、學院的當權官員先後光臨，噓寒問暖，熱情得讓人生疑。醫院的內科主任來了，

非要給我檢查身體不可，似乎十分關注我的健康。老幹部科的工作人員更是進進出出，忙個不迭，先後送來了落地檯燈、血壓計、電動按摩器、紫外線燈、手機等十多種電器，還一次再



2007年4月我從美國領獎歸來，在回國的飛機上

次地往我家送各種食品，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只好婉拒：「我們醫院幾千位退體人員，你們對我的照顧不是太特殊化了嗎？你們不怕別人有意見？」

他回答：「這是領導的安排，別人都不會知道。」

多年來和魔鬼打交道的經驗告訴我：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異乎尋常的笑臉後面定有文章。果然，沒過多久，答案就出來了。

一位省政府的高官翩然降臨，他一張口就打出了「王牌」，帶着神秘的表情隆重宣布：「徐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要求出版一本書《河南愛滋病的今昔》，以文樓村為典型，全面反映河南省防治愛滋病的偉大成績……」接着他說出了這次來訪的主要目的：「由於現在你在國內外有廣泛的影響，這本書想以你的名義出版……」

我剛說了半句：「我老了……」他就打斷接着說：「我們知道你年紀大了，不用你親自寫。我們組織一個寫作班子來完成，你只要到現在的上蔡縣文樓村去看看，簽個頭，署個名，做點指導就行——稿費可是全歸您啊！」

無恥，沒見過如此的無恥！

一股怒火從心頭騰起！

這確實是個一箭三鵰的鬼主意：以我的名義出書給他們歌功頌德，



一可把我當成遮醜布，使他們脫掉造成愛滋病惡性氾濫的歷史責任，由千古罪人搖身一變為抗愛英雄；二可把我當成封口膠，封堵國內外輿論的嘴，把剛剛開始被揭露的中國愛滋病真相重新掩蓋起來；三可把我釘上恥辱樁，向世人宣示我高耀潔已經乖乖屈服，跪地接受「招安」，從而永久性地敗壞我的聲譽。

出這個陰險惡毒主意的人是統治河南的封疆大吏徐光春。此人從當攝影記者起家，因善於吹牛拍馬、弄虛作假和攀龍附鳳，結交權勢，二十多年來官運亨通，曾當過主管全國新聞的中宣部副部長，來河南當省委書記前是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局長。控制輿論工具和製造虛假新聞是他的專長，而逢場作秀和沽名釣譽則是他的愛好。所以河南老百姓送了他個外號，叫「徐光吹」。他在河南主政期間把「重塑河南形象」當成了首要的目標，而掩蓋河南當局大搞「血漿經濟」造成驚天「血禍」的真相，則成了「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務。因此，這位封疆大吏親自策劃用我的名字出版這本書的鬼主意，確實是個夠黑夠毒的「高招」。

其實，這一招並非徐某的專利發明。把喪事辦成喜事，把罪責說成功勞，逼受害人出來唱頌歌，讓罪凶裝扮成救世主，本是極權專制主義「宣傳工作」的基本訣竅。其發明專利應屬於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其核心原理是：「真相不說就不存在」和「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毛澤東時代的唐山大地震報道，就是這種宣傳的經典樣本，而最近發生的一連串重大災難報道（如四川大地震、山西大礦難、雲南大旱災等等），就是這種理論的繼續發揚光大。只不過戈培爾的徒子徒孫們把這一套玩得更加爐火純青出神入化了。這位「徐光吹」則是玩這套把戲的高手。這些年河南出了那麼多震驚全國和世界的惡性事故和可怕災難（如愛滋病大面積氾濫），都被他一手遮天掩蓋下來，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淡化處理。而2007年8月陝縣的一次礦難破天荒地救助成功時，他卻不失時機地出現在現場，脖子上搭條白毛巾，站在礦井口迎接上井的礦工，又是電視直播，又是連續報道，還組織人寫電視劇，

創作巨幅大畫，大張旗鼓地足足折騰了半個多月，上演了一出令人齒冷的「救人秀」。

我活了八十多歲，在這個充滿了暴力和謊言的強權苛政下也已經生活了六十年了。多年的親身經歷已使我不難看透這套陰險的把戲。我怎能让自己在多年的艱苦抗爭之後，就如此輕易地被虛偽的笑臉所欺騙，被廉價的錢財所收買？

我身後還站着千千萬萬已經死去和正在受苦的愛滋病受害者，他們正用殷切的目光看着我，等待我向世界說明真相，為他們申訴冤屈，爭取公道，我怎能辜負他們的信任，可恥地背叛他們？

全中國和全世界有那麼多雙眼睛在看着我，他們的理解、支持和鼓勵是我在黑暗中孤軍奮鬥的力量泉源。我怎麼能在這滿天星斗般的灼灼目光下公然叛賣良心和操節，與魔鬼同流合污？

我是從小讀着聖賢書長大的，做一個「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仁人君子，是我終生的信念。幾十年來，清貧的生活，暴力的摧殘，謊言的欺騙和利益的誘惑都沒有使我屈服，我怎能在八十多歲臨近生命終點時低頭屈膝，喪失晚節，讓靈魂恥辱地跌入永劫不復的地獄？

於是，我拒絕了：「你們那個文樓村，是個裝點門面的虛假樣板，是為欺騙中外輿論而精心製造的騙局。河南每一個愛滋病病人都能享受到文樓村那樣的待遇嗎？這樣的樣板，我不去看；這個大騙局，我不入夥！」

三天後他又打電話來，我還是斷然拒絕。

其實，這不是他們最後一次想利用我，也不是我最後一次拒絕。2008年秋的一天，當局通知我，聯合國主管愛滋病的副秘書長來鄭州了，要見我。這讓我左右為難：秘書長一定要問愛滋病疫情，說真話吧，河南官方不會答應；說假話吧，又對不起愛滋病死者、病人和孤兒。我當時只好離家出走，逃到愛滋病病人家中避了兩天，待他們走了我才回家。



我明白，這一次次的拒絕給我帶來的會是什麼。

但我心已如鐵：「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離騷》）

二 網在收緊魚在跳

從此之後，「笑臉攻勢」戛然而止了，再也沒有人走馬燈式地上門來「送溫暖」了，我過了一段難得的「清靜」日子。

但這「清靜」之中卻並不平靜，我像一隻網中之魚，眼看着大網正在一天天收緊。

在無聲的壓力下，我在鄭州的子女登門日稀，志願者們來看我也愈來愈困難了。我常常孤身一人在家，寂寞度日。一次患了感冒，去廁所、上廚房時都要扶住牆慢慢行走。後來我想去開封小弟家住幾天，但當局找到我兒子，讓他找到開封把我接回了鄭州。

2007年4月20日，國際天文聯合會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將38980號小行星命名為「高耀潔」。一貫好大喜功的中國官方新聞媒體竟然一反常態，對這個消息嚴密封鎖，我也無從得知。直至過了一年半，2008年9月，北京一家非政治雜誌《科學導報》發表之後，到了12月我才知道。

那天，一個山東朋友打來電話，說：「祝賀你！你是我們山東的第三位小行星啊。」我大惑不解，他驚奇地說：「你怎麼還不知道呢？」然後才告訴了我這個喜訊，還說，孔子、孟子是另外兩個被國際天文組織用來命名小行星的山東人。這天我還收到河北一位劉先生的賀詞，其中有「光耀長空，聖潔明瑩。青史幾人，獲此殊榮」等句。

說實話，名利等身外之物早已不能使我縈懷，而追名逐利之徒歷來為我所鄙視，但這個並不附一分錢獎金的小小榮譽，卻真正地讓我感動了。

我已年逾八十，在世上來日無多。想想在浩瀚的夜空中，在燦爛的群星裏，有一顆並不明亮的小星星，上面留着我的名字。我不知道這顆

小行星有多大，亮度是幾級，肉眼是否能看得見……也許她只是圍繞着太陽旋轉的一塊大石頭吧。但是，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結束了，我的軀體化成塵灰以後，這顆小星星還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視着地球，注視着中國，注視着愛滋病這場世紀災難的結局，注視着造成這場「血禍」的罪人們走上歷史的審判台……這一切我是看不見了，但祂能看得見！

這對我確是莫大的安慰。它印證了，我一生所受的千災萬難，幾十年嘔心瀝血的奮鬥，包括現在所受到的一切橫逆和摧殘，並非是毫無價值的虛空與枉然。

只要有這樣一個報償，我就該滿足了……

可笑的是這樣一則不涉政治的科學新聞，卻被敏感的當權者視為眼中釘，他們裝聾作啞，百般封鎖，官方媒體至今未透露半字。可見這些權貴的內心是何等陰暗、狹隘和虛弱。有顆名叫高耀潔的小星星懸在頭頂，他們大概寢食難安了吧，哈哈。

38980 Gaoyaojie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Jump to: [navigation](#), [search](#)

Gaoyaojie

Discovery and designation	
Discovered by	W. S. Y. Yang
Discovery site	Dahe Observatory
Discovery date	October 23, 1997

Designations	
MPC designation	38980
Alternate name(s)	2000 UJ2

Orbital characteristics	
<i>Epoch</i> J2000.0	
<i>Semi-major axis</i>	3.0215444
<i>Eccentricity</i>	1.7142138
<i>Orbital period</i>	0.2760552
<i>Mean anomaly</i>	1330.8763384
<i>Inclination</i>	6.52371
<i>Longitude of ascending node</i>	60.32612
<i>Argument of perihelion</i>	287.21775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i>Absolute magnitude (H)</i>	14.7

38980 Gaoyaojie (2000 UJ2) is a trans-Neptunian object discovered on October 23, 2000 by W. S. Y. Yang at the Dahe Observatory.

Retrieved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38980_Gaoyaojie&redirected=gaoyaojie"

刊登國際天文聯合會命名「高耀潔星」消息的刊物封面



2008年5月份，奧運會要在北京舉行了，舉國上下，氣氛空前恐怖。不少人被驅逐出北京，或被要求呆在家中不准出門。朋友們也擔心我的安全，讓我找個地方避一避。從電話得知美國一個民間組織寄來一筆為數不小的錢，讓防愛積極工作者在奧運期間躲避，赴美國住三個月，名單上有我。我回答說：「我從不涉足政治問題，躲什麼呢？」但想到奧運會期間，外籍記者來華者眾多，我必定是他們關注的對象。要談愛滋病問題，我會坦然相對，據實而言；但要對奧運會和相關的問題發言，我既沒有資格，也沒有興趣。為了減少麻煩和不被當局抓住把柄，我乾脆離家七十二天，找了個清靜地方躲奧運。後來聽說有人以我的名義把美國民間組織的錢領走了。我鄭重聲明，這筆錢我沒領，也沒見到。奧運期間本人並沒去美國。對有人冒我之名領取這筆錢的行為，我除了鄙視他的貪婪之外，還懷疑其動機——這些年所謂「線人」可是無孔不入，栽贓陷害是他們常用的伎倆。

說起「線人」，並非我多疑和臆測，而是有切身的體驗。十幾年來，在我身邊一直不斷有可疑的人物來往。我的一個小保姆曾在良心發現後，她將事情的經過告訴了一個叫小關的女孩，請小關向我轉達她的抱歉並請求我原諒她；一個曾經積極協助我的志願者突然告辭，臨別時告訴我，她是因為受到威脅利誘的沉重壓力，而又不願昧着良心當「線人」，只好忍痛離開我。

甚至我所救助領養的愛滋孤兒，也不斷有人請他們吃飯、送錢，動員他們按時向當局匯報我的言行和交往情況……一個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權力集團，卻用如此下作的骯髒手段來對付一個年逾古稀的公民，這對他們自己真是莫大的諷刺——不過，他們是不會臉紅的，因為他們的字典中並沒有「羞恥」二字。

人而無恥，不死胡為？

2009年2月2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訪華，她通過外交部要求見我，中國政府同意了。2月19日我抵達北京，20日河南官方派我所

在的醫學院已退休的黨委副書記趙芬莉攔截我，而且通知北京警方說：「高耀潔有政治問題，不能見希拉里。」趙乘飛機到北京後，以為我還會像以前一樣，住在抗愛志願者胡佳家中（胡佳這位心地純良的年輕人和我一起從事防愛工作多年，是我的忘年交），她讓國保人員堵住胡佳妻子曾金燕等，不讓出房門，想把我也堵在那裏。正巧我這次沒有住在胡家（胡佳已經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了三年半，在獄中服刑。曾金燕處在嚴密監管之下，行動都受限制）。我從另一住處出走，給美國駐華大使館打電話，使館工作人員安排我住到使館旁的酒店，故而他們沒有找到我。這樣，希拉里終於成功地會見了我（如圖）。我回鄭州後，原單位的幾個老同事告訴我：「前幾天趙芬莉去北京截你，沒有找到你。趙回來大發雷霆說『我沒有把高耀潔截回來，怎麼向領導交代呢？』」

我只知道，從此以後，當局對我的監控更緊了。

十幾年來，我的工作主要是兩方面：一是調查愛滋病疫情，二是普及防治愛滋病的知識。最近幾年，由於當局對我的監控管制日益加緊，



2009年2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女士在北京美國駐華使館接見我



再加上我的身體更衰弱了，深入基層，走村串戶式的田野調查困難愈來愈大。於是，我把工作的重點逐漸轉移到普及宣傳防治愛滋病知識上來。

自 90 年代末，我經常往愛滋病疫區、貧困災區和學校、圖書館等處，郵寄贈送自己出版和印刷的愛滋病知識讀物，以及衣物、書籍、雜誌等，總共價值超過一百萬元。後來聽一個省衛生廳的官員（上大學時是我的學生）說有些警員在和愛滋病人接觸中，也有受到愛滋病侵襲的情況，我又在 2007 年 6 月 2 日至 8 月 27 日，先後往全國縣級公安局和一些監獄寄了防治愛滋病知識的讀物和我的著作《鮮為人知的故事》（2004 年曾獲全國優秀圖書獎），共二千七百一十九包。

在疫區調查時，我了解到，愛滋難民們不僅需要醫藥、生活救助，也迫切需要精神食糧——他們大多都識字，有閱讀能力，喜歡讀書看報，用閱讀來安慰自己苦難的心靈。我就利用網絡向全國發出呼籲，為愛滋病疫區收集書刊雜誌。近代史學者章立凡先生聞訊在網絡上發出號召，請大家支持我的義舉。此舉很快得到熱烈響應，從全國各地先後寄來《讀者》、《南風窗》、《人物週刊》、《中國青年》、《新聞週刊》、《生活週刊》、《大眾醫學》、《家庭醫學》等十多種雜誌，共十幾萬冊，《南方都市報》一次就寄來百餘公斤的各種雜誌。我把這些雜誌分類打包，每包裝三本雜誌和一份防愛資料，寄往偏遠地區的鄉級中學。每次發出三百至五百包，請志願者開車拉往郵局。

大量的郵寄品要耗費巨額的郵資。一開始我是自掏腰包付郵費，後來，很多人知道了就給我送來大批郵票（我從來不接受現金饋送），這才保證郵件能一批批地寄出。

開始時，這些郵件寄出後的反響還是令人鼓舞的。回信雪片般地飛來，圖書館和學校寄來收到贈書的證明，陌生的讀者寫來熱情洋溢的感謝信。個別由於收件地址不準確而無法投遞的郵件還會被退回。但是，過了不久，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郵件寄出後，反饋愈來愈少，最後是全無聲息了。例如，第一批、第二批雜誌寄出後反響如潮，說明郵件已經到達目的地。但第三批、第四批和第五批寄出後，均如泥牛入海，毫無消息，寄往各公安局和監獄的書也沒有音訊。到2009年4月，已經打好包的第六批雜誌，我只得放在家中不敢再寄了，先要查查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拿着寄出郵件的存根到郵局去查，十幾年來經常接收我郵件的老熟人沉默了。反復追問，他才嘆了口氣說：「您就別問了……」後來，一個在郵局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我的郵件都被扣押封存了。他說，這不是基層郵局的決定，命令最起碼來自省郵政總局；至於郵政總局又是奉誰之命，那就可想而知了。

我一連幾天吃不下飯，心裏堵得難受。誰都知道，通信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力之一，是人權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時代，任意拆檢和扣押公民的私人郵件不受任何限制。可現在不是說已經進入「法制時代」了嗎？不是說要「以法治國」了嗎？憑什麼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扣押了我的大批合法的郵寄品呢？如果是在一個真正有法制的國家，我完全有理由訴諸法律，維護自己的公民權利，追究違法侵害者的責任。但在當今中國，哪個法院能接受我的訴訟呢？哪一級的



第六批未發出的雜誌和衣服（2009年5月4日攝）

信訪局會傾聽我的聲音呢？我要是真的去告狀的話，說不定也要像成千上萬「非法告狀」的上訪者一樣，「被和諧」了，「被精神病」了，甚至「被自殺」了！

個人的權利被侵害了，這對我來說還算小



事。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我就沒法工作了：去搞愛滋病疫情調查吧，警員前截後堵，不讓我接近愛滋病病人；要說出「血禍」的真相吧，所有媒體一律禁聲，連網絡也對我遮罩；要普及防治愛滋病的知識吧，我的郵件又被扣押和沒收……我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一個想為防治愛滋病做點工作的老醫生，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真被逼得走投無路了！

古語道：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其我之謂乎？

不，我非魚肉，絕不甘心任人宰割。我寧願：人爲刀俎，我爲「魚刺」。

你可以吞噬我，但我這根「魚刺」要紮在你的喉嚨上，讓你不舒服幾天！

三 躍出羅網——為的是說出真相

真正使我擔憂的是，在官方嚴厲的控制下，中國民間的愛滋病防治工作已經處於難以爲繼的絕境。2005年，上海復旦大學的高燕寧教授寫了一篇十萬餘言的《血殤》綜述，概括了中國愛滋病調查和愛滋病研究的基本現狀：

- 關於愛滋病疫情和防治愛滋病研究的文章總數顯著減少；
- 關鍵疫情發生的情況被迴避不報、或報不出，或不及時；
- 「指鹿爲馬」：疫情避而不談，卻歌功頌德，歌舞昇平；
- 「顧左右而言他」：避開疫情的主因血液傳播不說，卻積極報告性（娼）傳播；
- 敏感地區早期或重要現場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都不是本省人；
- 各地防疫站（CDC）對本省疫情的報告口徑不一，數據相差懸殊；
- 國家水準上的疫情報告基本闕如，偶爾提到的則遮遮掩掩，欲說還休；
- 真正有科學價值的論文（像程華和邱佩芳的幾篇）屈指可數，

昭示中國公共衛生界對那麼大的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幾乎「視而不見」。

在《血殤》這篇文章中，高教授參閱了二百一十七名有志之士對「血禍」的呼籲，參加呼籲的人數高達六百一十三人次。其結果是非但不被重視，反而遭到打壓，於是這種聲音逐漸銷歇，而活躍分子逐漸匿跡……我大概是少數幾個堅持發出聲音的人之一。設想有一天，如果我也因為各種原因（病重？監禁？死亡或失蹤？）而銷聲匿跡了，中國還有誰會為此發出聲音？那樣一來，權貴們的耳邊倒是清靜了，但是愛滋病受害者們豈不就要在無聲無息中忍受痛苦和等待死亡？

有如此重任在身，我不能停步歇息，不能緘口沉默，甚至無權死去！

發出聲音，說出真相，對我來說是天定的使命，生存下去的唯一目的。

既然在這裏我已經沒有繼續工作的條件和可能了，那麼我就有充分的理由作出新的選擇，哪怕那是我最不情願的選擇。一個念頭在我心中暗暗滋生……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法國駐華大使館打來電話說：「法國將向你頒發一年一度的婦女人權獎。」我沒有詳細詢問，便說：「4月中旬，我赴上海領《南方週末》等新聞單位的獎項，屆時我們再詳談吧。」對方回答：「好……」不巧上海會議推遲，我未能如期赴滬，也沒能和法國大使館聯繫。

5月6日，我發現氣氛不對了：電話又出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進來；電腦也上不到網了。往外一看，三輛警車已經停在我所住的小區大門口……這和2007年我赴美國領獎前的架勢一樣，甚至來勢更加凶險。看來，我要去法國領獎的消息他們已經竊聽到了，並要採取行動來阻止我。面對隨時會失去自由的威脅，我當機立斷，中午飯未來得及吃，假牙也未來得及戴，只帶上存儲着多年來愛滋病調查寶貴資料的電腦硬



盤，就匆匆離開了家。臨行時我甚至沒有時間到設有我老伴遺照的靈堂去看一眼……

我這個八十多歲的小腳老人，就這樣一步一滴淚，邁着蹣跚的腳步，離開了我那生活多年的老巢，隻身踏上流浪路。當時我不知道這流浪的終點在哪裏，也不知道此生是否還有機會回來，為我那終身伴侶老郭的靈前補上一柱香。

從河南，到北京，又到四川、廣東，到……在每一個地方我都不敢多停留。孔夫子當年流亡到如今的河南，曾被鄭人說是「累累若喪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我在流亡路上，也經常用這句話來自嘲。讓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忠於職守的老醫生變成「喪家之犬」，身無分文地流落四方，這不是我的恥辱，而是這個國度和時代的恥辱。

在那居無定所的日子裏，唯一使我欣慰的是各地志願者對我的熱情。我躲在廣州郊區的農村時，有不少志願者和大學生跑來照顧我的生活，幫助我的工作。每天都有兩三個人協助我的書稿打字。我也盡可能抽出時間給他們上課，講授愛滋病的知識和各地愛滋病的疫情。我盼望這些年輕人中，有人能繼續我的事業。

去年6月中旬，一個似乎與我無關的消息給了我強烈的刺激：在四川地震災區調查死亡學生名單的譚作人先生，竟然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如今又被判有期徒刑五年！），這使我非常震驚。我做的事與譚先生相類似，都是要查清事實的真相，為弱勢群體討回公道。如果譚先生有罪，那麼我該當何罪呢？我做的愛滋病疫情調查，在行動的時間、範圍，以及涉及的人數和產生的影響上，均大大超過了譚作人先生。我若回家，河南當局對我的打壓，肯定要比對譚先生的更嚴厲，更無情，結果可能更慘。其實，最壞的結果無非一死，對此我早就有準備了。但是，我若無聲無息地死去，多年來調查所得的關於愛滋病的寶貴資料——當權者滔天罪行的鐵證，不是也要隨之湮滅了，永無見

天日的希望了嗎？

在想起譚作人先生的遭遇時，我又想起了我的小朋友胡佳。這個天真純潔得像個孩子一樣的年輕人，和他的妻子曾金燕，曾經全身心地投入防治愛滋病的事業，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巨大的支持。2007年我被軟禁在家的消息，就是通過他傳播出去，才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和抗議，最終促成了我的解禁和出國。這些年來，我還沒見到幾個像他們那樣善良純真、富於同情心和道德勇氣的青年，我一直視他們為自己的兒女。可現在，胡佳正以重病之身在鐵窗下掙扎，我非常擔心他能不能堅持到出獄之日；而金燕則在警員的嚴密監視下，帶着孩子艱難度日。

這些年裏凡是和我一起進行過防愛工作的人，現在幾乎沒有一個不處在險境和困境中。深入河南愛滋病重災區拍攝了震撼人心的紀錄片《中原紀事》的艾曉明教授，除了經常被便衣警員騷擾外，還被剝奪過出境的權利和在國內一些大學講課的權利。更多的人只因為和我有來往，就上了黑名單，成了監視和控制的對象。

僅僅因為要說幾句實話，就要付出生命作代價。在林昭、張志新的時代是如此，現在究竟比那時代好了多少？極權專制的鐵窗雖然生了銹，但其堅硬和冷酷的程度似乎並沒有改變，「防民之口勝於防川」依然是專制者信奉的箴言，為封住老百姓的口而採取的措施比以前更加花樣百出，有過之而無不及。別再說他們只是些腐朽、顛頂、無能的官僚了，在箝制人口、牢籠人心方面他們確實表現出非凡的「創新能力」。

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見《論語·公冶長》）連他老人家在窮途末路時都作如是想，如今我的「道」在當今中國已經絕無實行的可能，我在這裏連最起碼的工作條件都沒有了，我何不「乘桴浮於海」，找個自由的天地把自己的聲音發放出去呢？

我終於下定了決心：離開這個充斥邪惡暴力和無恥謊言的國度。

於是，2009年8月7日，我離開了中國，經過三次轉機，8日抵達目的地。



我自幼熟讀四書五經，到現在八十多歲了，還能一口氣背誦出幾十首《詩經》。坐在飛離中國的飛機上，抱着比我的生命還要重要的愛滋病資料硬盤，望着白雲下面逐漸離我遠去的中國大地，我反復默誦着《詩經》的名篇〈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念了一遍又一遍，直念得我老淚縱橫，唏噓不已。

我已經以最大的決心離開了這片碩鼠橫行的土地，但不知道我所去的地方是不是「樂土」、「樂國」和「樂郊」。然而我知道，在那裏我起碼有思想的自由、說話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

這就夠了，這就是我之所求。

在那裏，我將把十幾年來含辛茹苦、履艱克險得來的愛滋病疫情真相訴諸文字，出版成書，公諸於世。讓愛滋病病人們的垂死哀鳴、愛滋孤兒的泣血悲歌和社會底層的憤怒吼聲傳遍世界，讓這中國歷史上空前慘烈的一場「血禍」被百般掩蓋的真相載入史冊，成為總有一天要開庭的正義審判中的證詞。

八十三歲了，我的生命將以日、以時、以分、以秒而計。

我僅餘的殘年將全部屬於這個任務，只要能完成這一使命，即使終老異國，拋屍海外，我也心甘情願，在所不惜。

若問耄耋老嫗有何求？答曰：唯求天理、公道和正義！

第三十二節 生命的最後衝刺

我第二次來到了美國。2007年第一次來領獎，鬧了場震動海內外的「捉放曹」，這次來又演了一齣「過昭關」。傳說伍子胥從楚國出逃路過昭關時，一夜間鬚髮皆白。我雖然沒有如此戲劇性的變化，但內心所受的煎熬一點也不少。

關於我這次出走，海外媒體用了個語焉不詳的詞「秘密出走」，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測，其中有人說是香港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先生送我出來的。我承認，這次出走確實得到了內地、香港和美國一些善良的朋友以及民間組織的大力幫助，將來有機會我是要公開向他們表示真誠的感謝的。但爲了他們的安全，我現在不會說出他們的名字。需要說明的是，杜聰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在救助愛滋孤兒的事業中一貫給了我巨大的支持，這是我終生要感謝的。但是，這次我的出走，與他沒有關係，他根本就不知道此事，也不應爲此承擔任何責任。

如果有任何人因我的出走而遭到麻煩或受到牽連的話，那是最讓我內心不安的了。說到這裏，我不能不說起我的「心病」。

一 「孟夫子之謎」：魚與熊掌的選擇

其實，最讓我焦心的並不是自己可能遇到的風險，而是此舉可能給我的子女們帶來的影響。天下沒有一個母親不願自己的兒女平安幸福，沒有一個母親不願張開兩臂翼護自己的子女。我承認，從常人的角度來看，自己似乎並不是個稱職的母親：年輕的時候，我整天忙於工作，和病人在一起的時間比留給孩子們的要多；在孩子們成長中最需要母愛的時刻，我卻在蹲「牛棚」、挨批鬥和住勞教場……到了耄耋之年，我本可以像一般退休老人一樣在家含飴弄孫，安享天倫之樂，但我又一連十多年捲入了愛滋病這個風急浪高的大漩渦，不僅自己履危歷險，還讓孩



子們跟着擔驚受怕，甚至承受壓力，屢遭牽連……應該說，這一場接一場的災難，並非我所料，更非我所求，也非我所能逃避的。如果所有的災難只是我個人的劫數，我倒是可以認命——用中國的老話來說，是「命該如此」，或者「自作自受」吧。但讓我難以接受的是，我的孩子們也因我而飽受株連，成了災難的共同承受者，這可真是天大的不公平！

然而，當文革中我服藥自殺，被三個繞牀哭喊的孩子喚醒時，當我眼看著唯一的兒子在十三四歲就因我無罪而鋃鐺入獄時，當被沉重政治壓力壓彎了背的兒子在我面前下跪，哭求我不要再管別人的「閒事」時，我這個母親的心一次又一次地被撕碎。

一個殘酷的選擇反復擺在我面前：

向黑暗和強權低下頭，扮出幾分奴顏說幾句違心的假話，就可換取自己和孩子們的苟安，甚至還會得到一些誘人的賞賜；

而堅持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挺直腰杆做個有尊嚴的人，就要準備迎接瘋狂的報復，失去自己的一切，包括孩子們的幸福和平安……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這個古老的「孟夫子之謎」就擺在我面前。

我並不是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從來就沒敢希望孩子們重走我的路，繼承我的苦難和事業。我甚至幻想，就算我是「自作自受」吧，這杯自釀的苦酒只應由我自己來喝，這些噩夢只應屬於我們這一代，會隨着這一代人的逝去而煙消雲散，而孩子們能夠不受牽連地選擇他們自己的生活道路。

但我還是太天真了。

現實比我設想的最壞的情況還要惡劣和殘酷百倍：不是我的選擇要影響和株連孩子們了，而是被一隻巨大的黑掌操縱了的一個孩子要來懲罰我了。

此次我逃亡到美國後，收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各種反應，同情的，支持的，安慰和鼓勵的居多，少數反對之聲也在預料之中，不值一提。但

是有一封來信，像一柄利劍一樣直刺我的心窩，使我病倒多日：

「你在走讓國人謾罵的路。你繼續這樣折騰下去吧。等你死的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在你身邊。你將在孤獨和寂寞中死去。」

寫這封信的不是別人，正是我的小女兒。十幾年前，因為我打擊假醫假藥的行動，曾使她受到株連，害得她失去了工作，因此她對我頗為怨恨。2000年她和她的丈夫、女兒，全家移民加拿大（技術移民）。小女婿是個好人，書呆子。就在她辦理出國的同時，她被一個打着所謂「博士學位，大學教授」招牌的流氓迷惑，家庭和睦遭到破壞。我其實曾有恩於這傢伙，他生在「大躍進」後的大飢荒年代，出生十五天生母就去世了，我一直用自己的乳汁餵養了他二十二個月……這個流氓報答我養育之恩的方式，就是破壞我女兒的家庭，並控制我女兒的思想，多年來唆使她對我離心離德，反對我進行抗擊愛滋病的工作。這個傢伙不僅在生活上無德，對他父親也很不好，他父親晚年體弱多病，住老人院，他從不過問父親的生活，有人問這位老人：「你的大兒子呢？」老人說：「別提他，別提他……」

在政治上他也是個頗有「背景」的黨棍。我小女兒的生活和思想一直被控制着。

這封寫於2009年10月20日清晨的來信不應看作只是她個人意見的表達，顯然有控制和影響着她思想的那個傢伙的聲音。而這一切的背後則是我所熟悉的那個橫暴專制、冷血殘忍的魔鬼的陰影。

他們居然能夠教會一個女兒用如此惡毒的語言來詛咒自己的親生母親，生活在基督教文明背景下的西方人，以及中國大陸上熟悉儒家文化傳統的老人們，對這種悖倫理、反人性的逆行一定會大吃一驚。這其實是「老戲翻新」，是六十多年來在中國大陸撕裂無數家庭的「劃清階級界限」和「反戈一擊」、「大義滅親」等老戲的最新翻版，凡是在那裏生活過的人對此毫不陌生。我不惜亮出自己的「家醜」給世人看，是希望人們可以由此領教風行中國大陸多年的「洗腦術」是多麼邪惡和歹



毒，也知道現在那個社會裏的精神生態已經惡化到了何種地步。

說到這件事時，我對女兒沒有絲毫的怨恨，只是感到徹骨的悲涼和無奈。

我只是一名醫生，對愛滋病這種免疫功能缺失症尚且無力治癒，對比愛滋病更可怕的，氾濫於祖國大地上的道德缺失症更是無能為力。十幾年來，穿行在貧窮的愛滋病疫區，最讓人冷徹心脾的不是愛滋病造成的傷病和死亡，而是權力的冷血、世態的澆薄和人心的麻木。

如此惡毒詛咒我的是我的女兒，她雖然是我身上分離出去的骨肉，但和那個時代飽受「階級鬥爭」教育的孩子一樣，她不是吃我的奶長大的——她自幼吃的就是「狼奶」，這狼奶已經滲入了她的靈魂，改造了她的人性，使她長出了一口狼的獠牙。有罪的不是她，而是餵她狼奶，使她喪失了人性的那匹惡狼……可憐的孩子，誰能拯救她於罪惡的深淵呢？

「你在走讓國人謾罵的路……」孩子，是誰走在這條被億萬人咒罵的道路上，你難道耳聾眼花嗎？你雖然在中國國內生活過幾十年，但到你真正的底層去過嗎？你看過「國人」的絕大多數是怎麼生活的嗎？你聽過他們是如何悲泣、哀鳴和怒罵嗎？而那些在不停地謾罵我的又是什麼樣的「國人」呢？他們雖然口口聲聲代表這個，代表那個，但他們能代表幾個人呢？假如你不信，你可把寫給我的那封信發到網上，看看支持你的到底佔網民的百分之幾？我敢說，除了幾個「五毛黨」，你怕找不到知音了。

「你繼續這樣折騰下去吧……」看來，你雖然到加拿大十多年了，但還一直沒放鬆「政治學習」，對「不折騰」這個新的最高指示還運用得很熟練。但是，究竟是誰在不停地折騰？遠的如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等等不說了，只說愛滋病氾濫這個較近的例子：是誰折騰出個「血漿經濟」，造成了一場世界罕見的「血禍」？是誰現在還在想方設法，遮罩真相，封鎖聲音，企圖讓上

百萬、上千萬（見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元月號採訪王淑萍，王說，1995年通過血站感染愛滋病者有五百萬人，不含輸血感染……）的生命銷於無形無聲？是誰在掩蓋真相的同時，偽造盛世，大唱讚歌，用鑼鼓和頌歌聲來壓下愛滋病垂死者的痛苦呻吟和愛滋孤兒的淒慘哭聲……這些你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你所謂的「不折騰」就是想人們合上眼睛閉上嘴，不看不聽不想不說，當個恭順的「良民」吧？可是，像你這樣的「良民」能防止那些大權在握的權貴們再「折騰」出些新花樣嗎？

至於「等你死的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在你身邊。你將在孤獨和寂寞中死去。」這就拜託你不要多慮了。你應該了解，你媽媽雖然是個八十多歲、體重不足五十公斤的小腳老太婆，但從來就有一顆獅子一樣的雄心，戰死沙場、馬革裹屍是戰士的最高榮譽，我和邪惡與黑暗鬥了這麼多年，應該有資格享受這種榮光。說到「孤獨」和「寂寞」，那是我的老朋友了，從你和我斷絕關係遠行、你哥哥怕我牽連而躲開、你爸爸去世以後，我已經習慣孤獨和寂寞了。自古以來，在孤獨和寂寞中死去的仁人志士何其多也，就此而論，九泉之下這種死法的同類並不少，知音不難尋。

再說，我還有個自信：儘管到我死的那一天，你不會來，但我的身邊絕不會缺少真正的朋友來送行的……謂餘不信，請拭目以待。

孟夫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魚我所欲章》）

對孟子的兩難選擇設問，先聖如是論，我亦如是答，既是對我兒女的，也是對中國和這個世界的。

我將信守這一誓言，直至生命的終結。



二 知其不可而為之

8月初到達美國後，我謝絕訪客，不事聲張，悄悄地投入了緊張的工作：整理我帶去的資料，編輯撰寫書稿，爭取在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以前將出國後的第一本書出版。

這本書的書名是《血災：10000封信》。其實，這本書五年前曾在中國大陸出版過，當時的書名為《一萬封信：我所見聞的愛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現狀》，可是該書在出版過程中，內容受到反復的刪節，很多重要的章節都被砍得七零八落，三十萬字的書成了一個薄薄的小本，慘不忍睹，責任編輯為此曾嚎啕大哭。當時，該書印了一萬五千冊，但又規定不准在書店上架，不准宣傳，結果只發行了三千冊，其餘的都由我免費向社會贈送了。

這次，我恢復了被刪節的內容，又增補了一些重要的新材料，由香港開放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出版社的金鐘先生為此書的出版付出了艱苦的勞動，終於搶在12月1日把嶄新的《血災：10000封信》向讀者推出了。

世界愛滋病日那天的新書發布會，是我此次來美的首次公開露面。在這前一天中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女士在她的辦公室單獨接見了我。這是我們的第四次會面了，應該算老朋友了（上次見面是2009年2月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她對我這次來美國的經過，和在美國的生活情況很關心，對我從事的防治愛滋病的事業再次表示支持，我對她一貫的關心和支持表示了真誠的感謝。

在此期間，我還應參議員Byron Dorgan、美國國會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席、眾議員Sander Levin的邀請，於12月3日到美國國會中國事務委員會參加研討會，就中國的愛滋病問題作了長篇發言。

美國的國會可不是個「橡皮圖章」，它全面地監督着美國政府的內政、外交等各項工作，並為此經常召開各種聽證會，廣泛了解各方面的



與希拉里第四次會面

情況，通過民主和法律的形式指導政府的工作。我在會議上系統地講述了中國愛滋病傳播的歷史和現狀，特別突出地說明了中國愛滋病傳播與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特點和規律——血液傳播是造成中國愛滋病氾濫的主渠道，而政府曾大力提倡的「血漿經濟」則是罪惡的源頭。

我在美國國會的發言，受到廣泛的注意，會後有多位議員還找我進行了深入的交談，他們對中國愛滋病人遭遇的關注令人感動。在這幾天，我還接受了多家媒體的採訪，其中BBC中文網記者威克、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敏、安培和香港電台《頭條新聞》的報道特別詳盡。面對美國國會和衆位記者，我回顧了自己十幾年的抗愛歷程，說明了鬥爭第一階段的焦點是「中國有沒有愛滋病的大面積傳播」，政府否認有大範圍的愛滋病疫情傳播，而我用田野調查得來的大量事例和數據證明，中國不但已經有相當嚴重的愛滋病疫區，而且疫區分佈廣泛，感染者數量巨大，不容繼續掩蓋。這一階段以政府不得不承認已經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愛滋病傳播而告終。

但是，鬥爭又進入了第二階段，焦點是「愛滋病大面積傳播的主渠



道是什麼」。政府宣傳愛滋病的主要傳播渠道是性（包括同性戀）傳染、吸毒傳染，也就是說是因為個人的不檢點、不道德行為造成的，言外之意是罹病者咎由自取，政府無責；而我則用大量的調查數據和病理學分析說明，中國愛滋病傳播的特點和規律，是以「血液傳播」為主渠道，多數人是由於賣血和到醫院輸血而感染的，源頭是政府一度提倡的所謂「血漿經濟」，這場舉世罕見、駭人聽聞的「血禍」，是一場由於政府和政府管轄的血液、醫療單位失職，而造成的公共衛生災難，政府難辭其咎。這場鬥爭至今還未見盡頭。

我知道，儘管愛滋病的大氾濫是個催人淚下、讓人動情的人間慘劇，但要說服人，需要的不是煽情，而是冷靜的科學論證。在發言和回答記者提問時，我用多年來的實地考察統計數據和典型案例證明了「血液傳播」是主渠道的事實，又注重用愛滋病病理學說明了這一結論的理論依據：

愛滋病病毒（HIV）屬於逆轉錄病毒科，慢病毒屬中的人類慢病毒組。根據HIV的基因特徵、生物學特徵和進入細胞所利用的受體特徵可分為基因型、生物型和分子型。

（1）基因型：根據基因差異，HIV分為HIV-1和HIV-2兩型。HIV-1分為M、O、N亞型組。M亞型組包括A1、A2、B、C、D、E、F1、F2、G、H、J、K亞型。

O亞型和N亞型很少見。

HIV-2主要局限於西部非洲和西歐，北美也有少量報告。

HIV-2有A、B、C、D、E、F、G亞型，它的生物學特徵與HIV-1相似，但毒力較弱，感染導致的病程較長，症狀較輕，但仍無治癒的可能。

（2）生物型：根據HIV分離株的生物學特徵分為融合型和非融合型。

（3）分子型：根據HIV對輔助受體利用的特性分為X4型和R5型。

中國中原地區多為B亞型愛滋病病毒感染，其特點是性傳播的機率

很低。而國外很多地區多是愛滋病病毒 C 亞型傳染的，故其性傳播的機率很高。這個提法是一位搞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醫生，對五千多人作調查得出的結論，他不讓發表姓名，他說：「若把這個結論公布於衆，恐怕我們全家都活不成啦！」

我還用自己調查的典型病例來證明：例如，有多對夫妻中一方有愛滋病，但多年來對方未曾感染，孩子也未曾感染。武漢大學醫學院的桂希恩教授也做了一個類似的調查，共涉及五百九十多人，夫婦之中有一方有愛滋病，另一方沒有，他們共同生活五至八年，沒有任何保護。檢驗和統計的結果是：有四十多人被另一方感染，性傳播率不到百分之十。



這位母親抱着雙胞胎嬰兒，右手抱的嬰兒患有愛滋病，左手抱的嬰兒是健康的

我在 2000 年遇到一位感染愛滋病的婦女，丈夫是健康的，她十六歲賣血，得愛滋病，十八歲結婚。他們先後生了四胎五個孩子（第三胎是雙胞胎，其中一個感染了愛滋病，而另一個卻沒有感染，見圖）。她的丈夫檢查

了多次，直至 2004 年的檢查，仍然沒有感染愛滋病。以後的日子我再也沒有聯繫過這個家庭。

總的感染率是五分之一。所以母嬰傳播的幾率也不高。再如官方已公開承認的某愛滋病高發村，全村（即以往的大隊）居民三千多人，在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有一千五百多人有賣血史，到 2003 年初已有八百多人確診為愛滋病感染者，可全村並沒有一個吸毒者。

這些真實例證說明，在 HIV-2 型病毒流行的中國疫區，性傳播和吸毒傳播的機率相當小，母嬰傳播的機率稍高（不到百分之三十），而



血液傳播（賣血和輸血）的機率和比例要高得多。其中輸血傳播（在醫院輸入含有愛滋病毒的污血）要比賣血傳播的機率更高，幾乎是百分之百！我手頭掌握着一批案例，完全是因為他們到醫院求醫時，因輸血而感染了愛滋病，這更是「污血」傳播的鐵證。

時下當局聲稱中國愛滋病病人都得到救助了，愛滋病傳播已被制止，其實呢？自2005年開始用了五種「妙法」：

1. 金錢收買，請吃請喝，送紅包、困難救濟、受災賠償等。
2. 物質誘惑，贈送食品、用物、傢俱、電器甚至樓房、汽車，公款旅遊這一招最多……
3. 榮譽拉攏，獎勵、晉升、提拔、黨票等。
4. 給臉色看，壓制、打擊、恐嚇、監控、軟禁，甚至造謠誹謗等。
5. 最後一招，對以上各種方法不能制服者，編造個莫須有的罪名，勞動教養，刑事拘留，甚至關進監獄等。

這五種方法很靈，不少敢說真話的人在誘惑、恐嚇中倒下來了，有的人再不說話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態，唱起了讚歌，好一個「太平盛世 歌舞昇平」來掩人耳目。

那些人不是總口口聲聲要講「中國特色」嗎，何以對「中國特色的愛滋病傳播規律」卻諱莫如深呢？不承認中國愛滋病傳播的獨特性，從理論上說是反科學的，而從道德上說則是一種諉過卸責，乃至嫁禍於人的卑鄙行徑！

鴛鳥把腦袋扎到砂子裏，除了把醜陋的屁股舉得更高，其他是什麼也改變不了的啊。

記者們都問我這次來到美國的原因和打算，我告訴他們：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在國內已經失去了工作的起碼條件，連安全都沒有保障了；來美國的打算也只有一個，就是找到一個可以自由工作的地方，完成我今生最後的使命：把中國愛滋病疫情的真相告訴世界。

忙了那麼多天，開了那麼多會，說了那麼多話，我真有點撐不住

了。但是，我還有要再出版兩本書的計劃，不知我的身體能不能支撐我完成這個任務？我也不知這些計劃即使完成了，面對官方那個銅牆鐵壁式的頑固堡壘，又會發生多大影響？疲勞虛弱已極時，我經常這樣問自己，然後又自己回答：

孔夫子被人稱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他說過：「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意思是凡事都要盡人力而順天命。未盡其力將留遺憾，盡力而為則不會後悔。如今該做的我盡力做了，該說的我張口說了，甚至明知其不可和無效，我也勉力為之了。至於成敗功效則在所不計了，最起碼可為歷史留下一份文獻，為這個時代留下一紙證言。如此亦足矣！總算不負聖賢之教吧。

我感覺像是在運動場上的選手，正竭力衝向不遠的終點了。這是我八十四歲要來臨時的最後衝刺吧……

三 隔洋回眸望家國 殷殷期望寄後生

轉眼間我來美國已經八九個月了。

這期間，我沒有出去遊山玩水賞風景，也沒有上街逛店看繁華，除了幾次去開會的路上，瞄了兩眼華府和紐約的街道外，基本上是足不出戶。冬天來了，伸出手去接飄雪；春天到了，隔着窗子看新綠。然後接着埋首寫我的文稿，日復一日。最近身體支撐不住了，我就躺在牀上，趴在枕上繼續寫……

（見照片）



臥牀寫作



這就是我在新大陸的新生活。寂寞嗎？有點。忙時不覺，閒下來就想家。

這個家離我真遠，隔山隔海隔大洋，分別在地球的兩端，這裏是正午陽光，那裏可是午夜星辰了。生理的時差不難適應，而精神的時差卻不那麼好轉換。我身雖已到新大陸，可心一直留在萬里之外的故國家園。打開電腦，看的是中文網頁；朋友來訪，說的是中國新聞；吃飯總想作點家鄉口味，連晚上做夢都是在中原大地上遊蕩。八十多年的漫長歲月已經把我鑄造成一個無法改變的中國人。

自由了，是的。開門不必擔心外面站着警員便衣，說話不用害怕有人竊聽錄音，走路無須警惕後面有尾巴跟蹤，每天睜開眼不必猜測今天會不會被關進鐵窗……美中不足的是這個自由的國度不屬於我，而在我的祖國，人們還享受不到免於恐懼的自由。

呼吸着異國的自由空氣，回憶着自己坎坷的一生，我心生無限感慨。自由地生活，勤奮地工作，曾經是我年輕時的夢。上世紀50年代，人們喜歡唱蘇聯歌曲，一曲《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唱得大家興奮不已，似乎這一切轉眼就會實現。但是，時間很快就剝去了那位「老大哥」的偽裝，大清洗、大屠殺、古拉格、克格勃……這就是他們的「自由」。緊接着，同樣的噩夢也降臨到中國大地，其殘酷和血腥的程度一點也不亞於「老大哥」，而且在發動群眾鬥群眾、藉助人民之手殺人民方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可怕的噩夢，至今還沒有消退的意思，甚至還有捲土重來的跡象。自由，還是遠在天邊的一抹浮雲，可望而不可即，而且似乎愈飄愈遠了……

每當遙望遠方的家國，我常常想起的是那些在愛滋病深淵中掙扎的可憐人：上次看望過的那些病人怎麼這麼長時間沒音信了？愛滋病村外的亂葬崗上又添了多少新墳？孫亞的兒子還在堅持活着嗎？她媽媽還是每日淚濕衣衫嗎？李喜閣還在被「監視居住」嗎？她的最後一個女兒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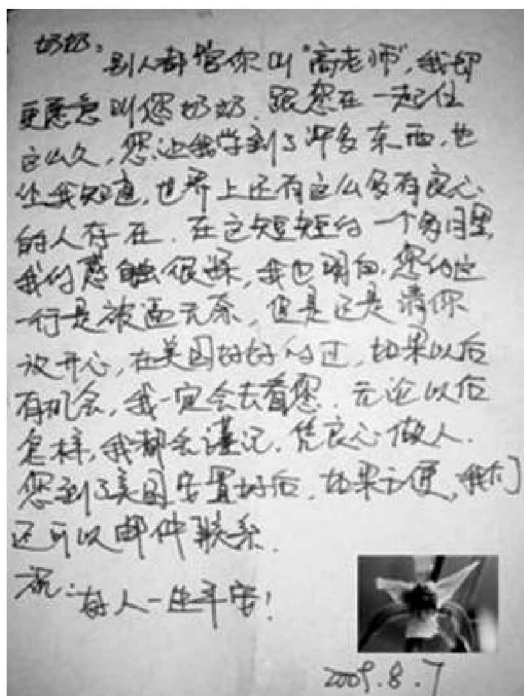
病了嗎？那些愛滋孤兒們在領養父母家過得好嗎？新學期的學費有人幫他們交嗎……我真想告訴他們，奶奶想他們，但現在我離他們太遠了，可能沒機會再幫助他們了，也沒機會再見他們了……對不起，真的對不起啊！

現在我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打開電腦，一封封地品讀來自遠方家國的郵件。生活在網絡時代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它把「天涯若比鄰」這個浪漫主義的幻想變成了現實。有人不是詛咒我將生活在孤獨和寂寞中嗎？可有這些源源不斷的來信，我怎麼會孤獨和寂寞呢？

我手頭最早的一封信不是電子郵件，而是寫在紙上的。那是去年8月7日我登上離國的飛機前，一位曾在農村陪我工作和生活的大學生在機場進口處交給我的。他說：「奶奶您到飛機上再看。」這封信伴隨了我上萬公里的旅途。（全文見照片）

他寫道：

「奶奶：別人叫您高老師，我卻更願意叫您奶奶。和您在一起住這麼久，您讓我學到許多東西，也讓我 know，世界上還有這麼多有良心的人存在……我也明白，您的這一行是被逼無奈。……無論以後怎樣，我都會謹記，憑良心做人。」



一位大學生的信



上海復旦大學的高燕寧教授在聽說我已經到了美國後，來了一封信。首先說，對我的選擇，「有點意外，也不意外。」他告訴我，本來他們還在等着我12月份到復旦去講課，儘管也知道可能被阻止（他們請廣東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9月去講課的計劃被橫加取消了），但他們還想「只要還有1%的可能，就要盡100%的努力去做」。寫到這裏，他說了句讓我感動的話：「對於一個曾在愛滋病村待過的人來說，如果不這樣做，那我還是人嗎？」

在信的結尾，他說：「想到您，我總會記得居里夫人說過的一句話：真正的偉大，是那麼的淳樸和善良。」他最後抄了一首唐詩，算是告慰我這個遠行的流亡者：

「渭城朝雨邑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還有一位上海的大學教授寫來一封長信，其中說：「上周末才看到高耀潔老師去美國的消息，似乎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馮正虎的相關報道我看了也有幾絲愕然，才發現原來我們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國家，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到了夜裏，依然難以入睡。似乎看到了遠在美國的高耀潔老師，老年離鄉，她是何等的忐忑心情？似乎也看到了日本機場的馮正虎，靠椅而憩的他是不是睡得安好，是不是可以溫飽？如果不是被逼到無從選擇，高耀潔老師又怎麼會在高齡如此，選擇遠赴他鄉？馮正虎事件也讓我聯想到了今年的公盟律師許志永被拘事件，雖然許在之後獲釋了，但對於這樣的政府行為真是讓人無言以對！許和高老師、馮正虎一樣，總是花時間花精力不怕麻煩幫助社會弱勢群體，這樣的行為讓人發自內心地尊敬他們。可是，他們又得到了國家、當局和社會什麼樣的回報呢？

作為一個中國的年輕人，我早已經不再是憤青的心態，更多的或許是無奈、甚而憤懣。可是沒有辦法，我們出生在這個國家，無法割捨我們是中國人的情懷！我想正因為如此，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將來陸續

會有更多的像高耀潔老師、馮正虎這樣的勇者站出來，為弱勢群體出力……我們作為個人，應該做什麼？可以做什麼？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這是我問自己的幾個問題，卻還沒有很明晰的答案！不管做什麼，做到什麼樣的程度，面對自己、面對生活，能無愧於心，踏實前行就好！」

多年來跟我從事防愛工作的志願者們聽到我到美國的消息後，也千方百計傳來問候。一位叫小美的女士，半年來了十幾封信。最近的來信（4月22日）說：

「高老師：別這麼客氣，幫您完成有意義的事情，是我們的福氣，我會遵辦的，別擔心錢的問題，關愛之家有很多志工可以幫忙。請老師放心，專心寫稿就是……」

來信更多的是曾經聽過我的課的大學生們。都說八十後、九十後的孩子們是享樂第一、物質至上的一代，可我卻接觸到不少有頭腦、有理想、有高尙追求的好孩子。讀着他們那些真誠、熱情和洋溢着正義感的來信，我總能從陰郁的心情中抬起頭來，看到了我自己年輕時的影子，欣慰但又伴着擔憂：

這些孩子就像我年輕時一樣，做着美好的夢。

有美夢是好事，說明他們的心靈還沒有沉淪，熱血還沒有變冷。

但是，他們還要經過和我們一樣的苦難歷程嗎？他們還要像我一樣親歷和目睹窮困、飢荒、戰亂、瘟疫、政治運動、各種各樣的天災人禍和世間不平嗎？他們還會爲了尋真理、揭真相、說真話而被封口、被監禁，甚至受到割斷喉嚨的酷刑嗎？他們還需要爲了自己夢中的自由和人權，而付出鮮血與生命作代價嗎？他們的夢也會在那極權主義的鐵壁上碰得粉碎嗎？他們也會在夢碎了以後，像許多人那樣，變成冷血的市儈和犬儒嗎？或者，到他們老了的時候，還要像我這樣披着白髮流亡四



方，最終拋屍異國他鄉嗎？

……不知道，八十四歲的我不知道答案。

……看不到，行將就木的我看不到結局。

我只能對故國家園的孩子們說：

但願你們不會重蹈苦難的老路，因為世界正在前進呀。

但願你們能看到我們還沒見到過的曙光，因為太陽總要升起的呀。

但願你們能走上光明的坦途，因為中華民族已經付足了代價，該到收穫的季節啦。

但願你們終生留住美好的夢想，因為沒有夢的星星就會變成地上的一塊黑石頭了。

孩子們，請記住一個老人的祝福吧。即使我走了，那顆名叫「高耀潔」的小星星也會在夜空中看着你們啊。（完）

附件 著作、獎勵與遺囑

一 著作

愛滋病性病書籍	
1.《性傳播疾病的蔓延與防治》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共9,000冊
2.《愛滋病與性病的防治》	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三次修版七次印刷共計371,860冊
3.《鮮為人知的故事——愛滋病、性病防治大眾讀本》	中原農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三次修版七次印刷共計33,600冊 2004年曾獲得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
4.《一萬封信——我所見聞的愛滋病、性病 患者生存現狀》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 共計15,000冊
5.《中國愛滋病調查》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兩次印刷共計26,000冊
6.《中國愛滋病禍》	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年3月
7.《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第一版)	香港明報出版社，2008年8月
8.《血災：10000封信》	香港開放出版社，2009年11月
9.《揭開中國艾滋疫情真面目》	臺灣博大出版社，2010年9月
婦產科專業書	
10.《實用中西醫結合婦產科學》	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4月第一版 兩次印刷共計11,000冊
11.《婦產科誤診誤治病案鑑析》	中原農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共計10,000冊
婦幼保健科普書	
12.《女人之友》——婦女保健與疾病自 查自治	河南海燕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共計 8,800冊
13.《女科疾病防治全書》	中原農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共計 14,000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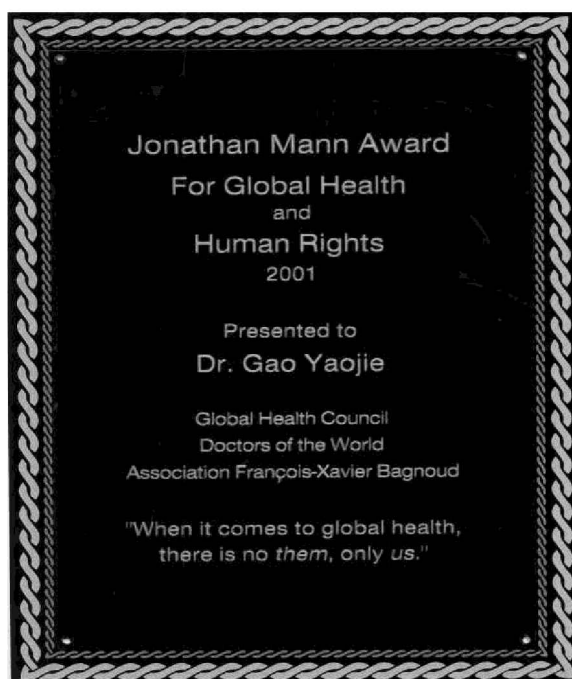


14.《現代保健》（共分五冊） 第1冊 內科疾病防治 第2冊 外科疾病防治 第3冊 婦產科疾病防治 第4冊 中醫藥防病治病 第5冊 性病防治	河南農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共計40,000冊
15.《實用女科全集，女性常見疾病防治》（共分五冊） 第1冊 女性常見疾病防治 第2冊 孕產期保健與幼生 第3冊 嬰幼兒保健與計劃生育 第4冊 婦科病症與性病的防治 第5冊 環境生活與自我保護	河南醫科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共計5,000冊

二 各項殊榮

國外獎項

（一）2001年榮獲聯合國「喬納森·曼恩健康與人權獎」。



(二) 2002 年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亞洲英雄」(獎狀未拿到)。

(三) 2002 年被《商業周刊》評為「亞洲之星」，英國前首相梅傑給予頒獎(獎狀未拿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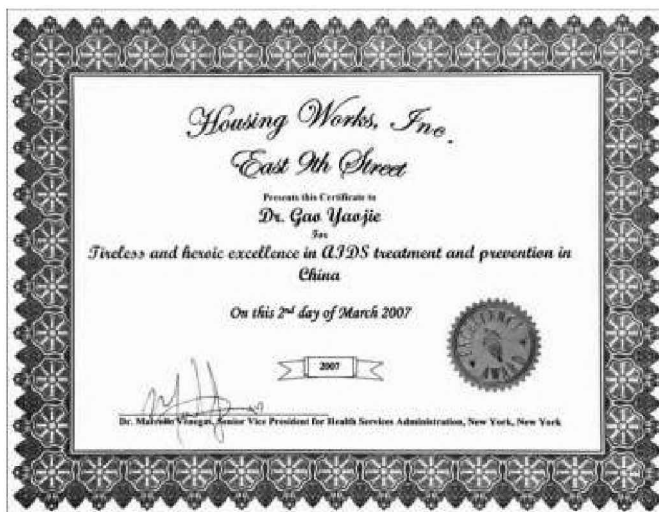
圖為獲獎者介紹，圖中
(自上向下數)第二位

(四) 2003 年榮獲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拉蒙·麥格賽賽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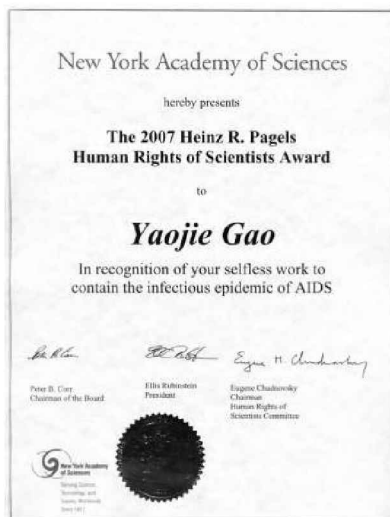
(五) 2007 年榮獲美國紐約衛生署頒發的愛滋病治療和防護傑出英雄獎。



(六) 2007 年榮獲美國「生命之音」頒發的年度「環球女性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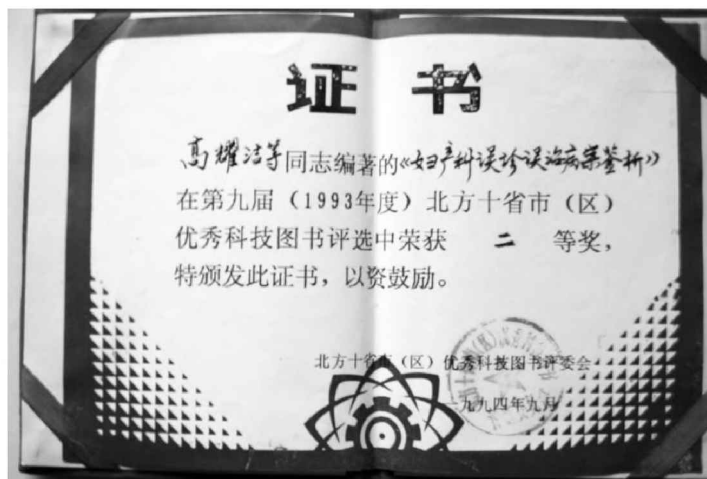
(七) 2007 年 9 月獲得美國紐約科學院年度「科學家人權獎」。



國內獎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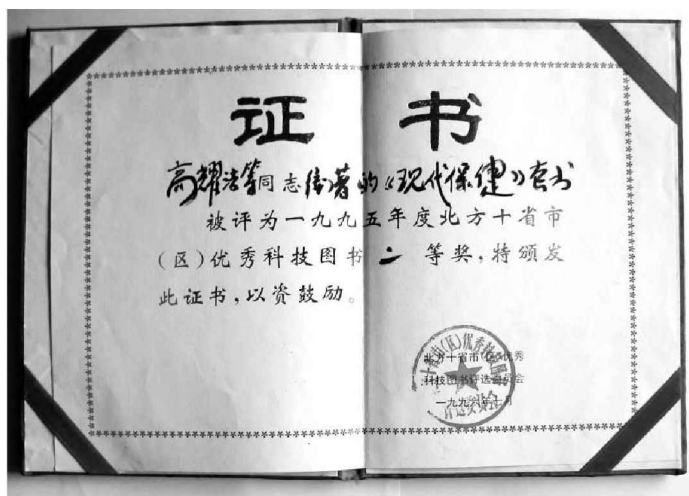
(一) 1988 年授予鄭州市勞動模範稱號。

(二) 《婦產科誤診誤治病案鑑析》一書獲第九屆（1993 年）北方十省市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





(三)《現代保健》套書獲第九屆(1995年)北方十省市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



(四)1999年獲中國教育部全國教育系統關心下一代工作先進個人。



(五) 2003 年被評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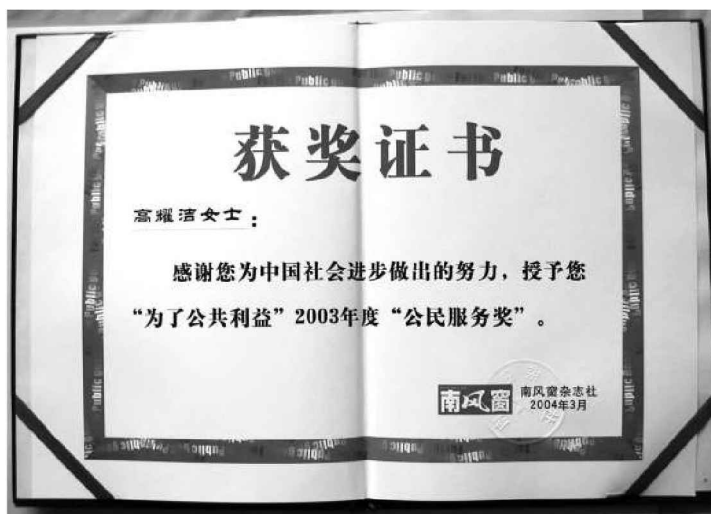


(六) 2003 年度公民服務獎。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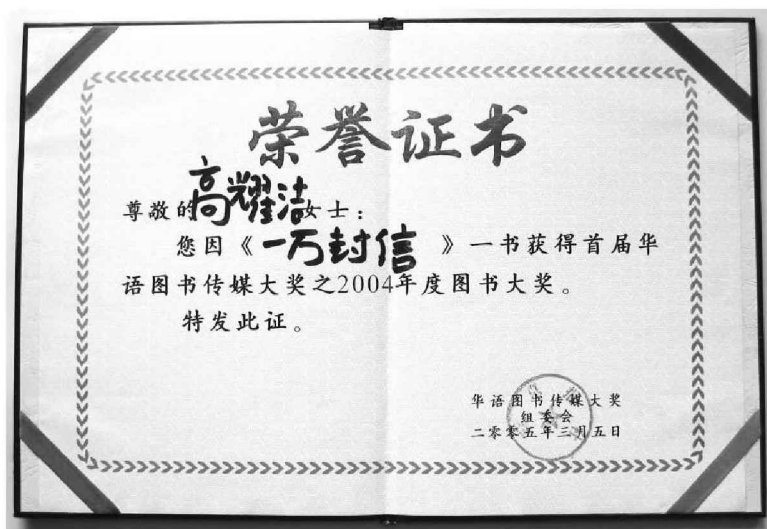
(七) 2004年榮獲中國內藤國際育兒獎葛西健藏獎。



(八)《鮮為人知的故事——愛滋病、性病防治大眾讀本》一書獲第十四屆(2004年)中國圖書獎。



(九) 2004年《一萬封信》一書獲首屆華語圖書傳媒大獎(證書、獎杯)。





三 遺囑

我的遺囑

本人在世八十餘年，適逢「百兇群舞」的時代，我的遭遇令人不堪回首，本人沒有任何違法行為，堅持醫生天職，治病救人，同情弱勢群體，並一直堅持三不原則：

1. 任何時代我不成立任何組織，包括「基金會」、「防愛中心」等，更不會打着公益事業的旗幟以飽私囊。

2. 不接收任何組織，任何個人的捐款，以防止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以我的名譽詐騙募捐肥自己。

3. 不與任何組織，任何個人合作，包括什麼認乾親，拜師等等。

我死之後，「氣如秋風，骨灰如土」本人已無法堅持三不原則，雖在2004年我寫過遺囑，我兒子郭鋤非膽小怕事，不可能堅持執行，故今天再次寫在《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一書中，望海內外有良知者明白一切。

我若正常死亡，不舉行儀式（若被政客殺害，可作他論，我另有安排），不留骨灰，把骨灰運回國，按原計劃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黃河，讓它流入大海，永遠銷聲匿跡。

不能存留墓地，不能給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殘渣餘孽、貪官酷吏、醫騙子、騙子的後台等醜類提供場所，目前我考慮的有四點：

1. 他們會借我的名字成立組織，什麼「防愛滋病協會」、「防愛中心」、「基金會」，用來發不義之財。

2. 以我的名義寫傳記，編造謊言，偽造歷史，愚弄後人。

3. 借助我的名字，賣假藥，坑害病人，危害社會等等。

4. 凡是我編寫的書不准任何人改編或修版，包括書的繼承人。現在我已在網絡上發現我那本《中國愛滋病調查》有修正版本，我不知道，

只好叫有關人員調查處理，因此我留下遺言，特別是這本《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不准任何人修版。

當然還會發生千奇百怪，我預料不到的花招，都會在我身後出現，從本書中，讀者們，你們會想到在2007年元月底至2月初政客令她的小走狗對我進行的人身及家族的侮辱嗎？因此，我委託上海、北京、廣州三大律師事務所，來執行我的遺囑，若有人膽敢冒犯，他們永遠有權力代我起訴，一切賠償歸律師所有，於是2007年4月我已和他們簽了合同，見《法制報》。其目的是為了防止政客們再拿我兒子當人質。

最後，有關我的著作（書籍）、獎牌、獎杯、證書、贈書回執，幾千封民衆來信（有的信很有歷史價值），還有幾百張照片、光盤，如果我的子女逼於政客的壓力，不能保存，或為其他原因無法保存，請通知我小妹妹，轉高家後人保存，那是我一生的心血，也是我留下歷史的聲音！

為此，本人親筆書寫，未作打印，一說明遺囑的真情。

嗚呼！哀哉！蒼天無知，生靈塗炭！

高耀潔寫於2008年元月前夕

2010年5月1日重修



附錄

附錄一：爬坡者的足迹

辛織

一個聳立在萬重冰峰之冠上的禁區——癌症，日趨嚴重地威脅着現代人的生命。攻破癌症關不僅是廣大患者的共同要求，也成了科學工作者夢寐以求的夙願。然而，那片禁區，遙遠、險峻、迷濛，多少人上了，跌倒了，爬起來，再上……這裏，我們向大家介紹兩位攀登在這條通往癌症禁區的小路上的女同志的事蹟。

爬坡者的苦惱

1974年冬，省會鄭州的一個下雪天，寒風凜冽，滴水成冰，行人個個袖手縮頸。一家醫院門前的雪地裏，呆坐着一對披棉被的年輕夫婦。

「怎麼啦？」熱心人七嘴八舌圍上來。

「不讓住院。」

「爲什麼？」一片嗡嗡聲，一陣不平。

「絨癌……癌症。」

如同聽到了死刑宣判，圍觀的人們只是無奈地發出了憐憫的嘆息。人群中前去這個醫院聯繫工作的河南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婦科大夫高耀潔同志沒有嘆息，她緊緊蹙起了雙眉。絨癌是惡性滋養細胞腫瘤的一種，由妊娠引起。過去，這種病不知奪走了多少青壯年婦女的生命。解放後，雖有人對此進行過研究，但因治癒率低，仍被一些醫院視爲不治之症。

飄飄的雪花愈下愈大，披在這對絕望夫婦身上的棉被幾乎成了雪被，難道能因治癒率低就把姐妹們宣判爲死刑嗎？想到這裏，她便彎腰

拉起病人說：「走，她們不收，我收。只要你有一口氣，我就要把你收進醫院搶救！」

風停了，雪住了。雪地上，一串新的腳印，載負着重託和希望，向河南中醫學院婦科病房延伸去。

1974年的醫院，是動亂的醫院。病人入院後，招來一片風言風語。「絨癌惡度高，死亡率高，短期內不易突破。」好心人替她們擔憂。「條件好的大醫院還治不好，就我們這條件，看能搞出啥名堂？」當代智叟等待看笑話。個別怕擔風險的領導，甚至挑剔高耀潔大夫，說她把農民病人引來，影響病房衛生。

無私自然無畏，她心中坦蕩，不怕鬼叫門，硬是用雙手搬開了前進路上的一塊塊絆腳石。沒有化驗設備，護士小謝就提着標本到北京求援；沒有血庫，她們跑遍市內各大醫院去找；手術室設備差，請求兄弟醫院援助……結果，四個月過去後，奇蹟出現了，病人馬根蓮各項化驗指標正常，她治癒了！這時，這群苦累交加的女同志才吃驚地發現：她們也能治癌症！

但是，由於她們採用的還是50年代的傳統療法。在以後的治療中仍有八人因為絨癌肝腦轉移不幸死亡。懷着痛苦和負疚的心，她們向全國九大醫院發信聯繫學習，並於1978年初接到北京首都醫院覆信，同意她們參加在北京舉辦的絨癌進修班。

爬坡者又尋爬坡人

關於絨癌，在國外，1956年就由一位僑居美國的中國學者突破。在國內，首都醫院宋鴻釗教授經多年研究，採用大劑量化學藥物治療，使多數患者得到根治，從而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能到宋教授身邊學習，是多麼難得的機會呀！然而她們怎能想到，等待她們的，竟是一盆冷水。

「你們的正式醫生沒有來。」首都醫院拒絕接收前來學習的高耀



潔、胡玉荃大夫。怎麼？我們不是正式醫生？她倆驚愕得目瞪口呆。醫院的、省衛生廳的介紹信統統拿出來，都不管用。

北京的一月，寒風刺骨，滴水成冰，她倆躑躅在天安門前的廣場上。黨把那麼多姐妹的生命交給了自己，如果不把治癌的經驗學回去，怎能對得起對自己寄予殷切希望的黨啊！想到這裏，她們橫下一條心，不讓參加進修班，決不離開北京。

唯一的辦法是尋找醫學院的老同學作證。縱橫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有多長啊，可是個個巷口都幾乎留下了她們的足迹。大概誠心感動了上蒼，半個多月後，通過一個老同學的關係，她們終於跨進了首都醫院的大門。這時，她倆才知道，她倆未到來之前，已有人從河南通過花生小磨油的渠道告狀到首都醫院，說她們是騙子。看來，一打公章的效果遠不及一個香油瓶子。

門，總算是進來了，然而講台上宋教授的眼光總是冷冷的，來的究竟是兩個什麼人？在他心中還是個問號。直到有一次，一個絨癌病人被痰堵塞了喉嚨，電動吸痰器一時推不來，在場的高耀潔大夫當機立斷，用嘴把病人的痰吸了出來，宋教授嚴峻的嘴角才露出了笑紋。但是，宋教授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兩個為求學而歷盡艱辛的河南學員，以後竟成為這期進修班裏最有出息的學生。

從首都醫院學習回來，她們增長了許多治療絨癌的新知識。同時她們也發現，大劑量的化學藥物會給病人帶來白血球減低、出血等一連串副反應，嚴重的會因此導致病人死亡。能不能減少化學藥物用量，代之以中藥？關於這個問題，她們向有關專家請教。答覆是：低於常規的治療，只能造成治療失敗。

真的會失敗嗎？細心的胡玉荃大夫想起了一個已經出院的絨癌病人，因白血球低遲遲不能用化療，她給她用了扶正抗癌的中藥，八九個月後，病人竟痊癒了。路，是人走出來的，與其跟在別人身後亦步亦趨，不如自己趟出條新路。

爲了趟出這條新路，胡玉荃大夫走訪名老中醫，搜集民間驗方，經過幾百個不眠之夜，按祖國醫學辯證施治的原則，把絨癌分爲三種類型進行探索。高耀潔大夫常吃住在病房，不理家事，被家裏稱爲「住幹店的」。有一次，母親生病住院，電報發來，正逢病人出血不止；愛人癱瘓在會議上，正逢一個垂危患者入院，面對這種情況，身爲婦科主任的高耀潔都能正確對待，沒有影響工作。還有一次，爲了搶救一位四期絨癌患者，她和胡玉荃大夫九天九夜沒下病房樓。最後一天，她昏倒在病房的走廊上，至今腦後還留下了一塊難忘的疤痕。

來自坡頂的笑聲

十個冬春過去了。心血，終於化作朵朵紅梅，朝她們一瓣瓣綻開了。

蘭考縣社員張獻玲，絨癌腦轉移引起半身不遂。從家裏來時，男人給她套上家裏最破的棉襖，襯衣都不給穿，打算到鄭州火化時少燒件衣裳，留給閨女穿。經過半年治療，結果張獻玲的病完全好了。現在張獻玲一人餵着上千隻雞，成了養雞專業戶。上次來鄭州時，嶄新的黑呢大衣，筆挺的藍滌綸褲，婷婷娜娜，穿得像個新媳婦。婦科同志們笑着向她打趣道：「喲，穿這麼漂亮，不怕『火療』啦！」「不怕啦！」她也抵不住嘴笑了。

新婚不久的遼翠得絨癌後，丈夫以爲她不會生孩子了，從不到醫院探望她。由於她們採取了不摘除子宮的保守療法，遼翠出院後生一男孩。喜得丈夫激動地逢人便說：「這回治病算找對門了，病能治，命能救，不開刀，不絕後。」

一條盤曲的小路，終於從荊棘叢生的陡坡上踏出來。大量的臨牀實踐證明：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治療惡性滋養細胞腫瘤，減少了化療藥物劑量，降低了化療反應，縮短了療程，肯定比單純用西醫加手術效果好得多。從1974年到1981年，她們共收治惡性滋養細胞腫瘤患者一百二



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

十五例，總治癒率達 92.13%，經省內外有關專家鑑定，認為「此療法已經達到國內先進水平」。1984 年，她們被授予河南省二級科技成果獎，出席了全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全國絨癌會議和河南省科技界表先暨成果獎勵大會，在會上宣講了論文，並被授予獎章一枚。更值得高興的是，由於她們突出的科研成果，高耀潔大夫作為民主黨派的女代表，到北京出席了「九三」學社第四界全國社員代表大會，受到鄧小平、胡耀邦、許德珩等中央領導同志接見。

原刊於《婦女生活》1984 年第十二期

附錄二：白醫戰士孤膽鬥遊醫

《北京青年報》記者 李彥春

古稀老人高耀潔的義舉爲如今一些「務實」的人們不理解：科普講演、自編防治性病和愛滋病的宣傳材料、鬥遊醫。高耀潔鬥在明裏，遊醫恨在暗處。她也憂心自己因砸人飯碗老命不得善終，但她仍在警惕中行走着鬥的腳步。她認爲醫生救人治病不止在醫院裏，社會毒瘤的剷除也需要她這把手術刀。

9月8日，東方電視台女記者扮成性病患者，在鄭州市某醫院被遊醫承包的性病科室就診，旁立婦科教授高耀潔。記者低頭紅臉：「我得了那個病……」高耀潔問：「治好我女兒的病需要多少錢？多長時間？」「八千塊吧，半年左右。」「能治好嗎？」記者偷瞥醫生。「能。」藏在記者衣袖內的微型攝像機錄下了這一切。然後，這對「母女」迅速撤離，飛車奔了另家醫院，該院內，醫患之間的對話大致相同。7日至10日，高耀潔陪記者暗訪了五家被遊醫承包的醫院，攝像機忠實地記錄着一切。

「痛快」，七十二歲的高耀潔回憶着喬裝的經歷。七十四歲的老伴郭大夫則歎了一口氣：「北京來人，我們既高興又擔心，給騙子曝光，大快人心，但堵了騙子的財路，他們恨你啊，這幫人，防不勝防啊，晚上我不讓她出去……」高耀潔打斷老伴的話：「我不怕死，我活了這把年紀了，孩子都大了，沒什麼可怕的，再說人總要死的。人過五十，不成夭壽。萬一騙子下了毒手，我已告訴記者，我是文史館員，死了要登報紙，報紙上會告訴大家我爲什麼而死，喚起多數人起來跟騙子鬥，我死而無憾。」高耀潔翻開一本名片冊：「我對文史館說了，我死了，要他們通知這十二名採訪過我的記者……他們知道這些年我幹的事，我……」七十二歲老人的臉上淌下淚水。



郭大夫搖頭：「哎，我這個老婆啊，山東人，倔脾氣。」

科普講演，她理想中的主動行醫

1985年，河南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科大夫高耀潔被評為教授。1986年春天，組織派五十八歲的高教授下鄉宣傳計劃生育。高耀潔在宣講中受到抵觸和排斥，她在台上講，台下訓孩子打毛活兒說悄悄話。正題不聽，待高耀潔講完，婦女們湧上前，扯住高耀潔的胳膊諮詢身體上的毛病，怎麼回事，怎麼治療，怎麼預防。高耀潔總結：「別看問題五花八門，其實都是常見的婦科病。」讓高耀潔驚訝的是農村婦女關於婦幼保健知識的了解程度，「零」，她說。農村婦女太需要啓蒙，太需要科普，誰來做這個工作？高耀潔向有關部門呼籲派專人到下面去，「沒有人給她們講保健知識，城裏到處可見的科普書籍，下面一本都沒有」。但事不遂願。這期間，她記起久違的毛澤東的「六·二六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她感慨：「毛主席的話一點不過時。我也不指望別人了，我來做這事。」再下鄉，「婦女病的自我發現和防治」成了她宣講計劃生育之外的內容。據她觀察，會場上走出去一個婦女，回來時帶進四五個，這樣的效果令她興奮，「人愈多，我愈有勁。」每場聽眾平均四五百人，最多一次在濮陽中原油田，聽眾一千八百人。針對婦女關心的問題，高耀潔又加了一項內容——優生優育。根據聽眾身分不同，她講演的內容亦因人而異。如對廠礦工人，她講「女職工保健」；對大學生，她講「女性的自我保護及防止性騷擾」；對衛生局，她講「婦產科疾病診治的誤區」；對防疫站，她講「性病與愛滋病的預防與治療」……

高耀潔有個本子，上書1986年至1999年的講演記錄。每年講演次數，含收費和義務兩種。收費講演的數目與支出；義務講演的由紅筆書寫。十三年，紅筆多多。如1996年講演四十七場，二十七場收費，二十場義務；1997年六十七場，收費二十三場，義務四十四場……高耀潔對

請她講課的人說：「你給錢講，不給錢也講，條件一個，幫我整頓好會場秩序。」90年代後，高耀潔講演前贈書送材料，現已贈書五千餘冊，編寫科普讀物十七種。

高耀潔二十六歲始行醫，三十多歲時，她悟得：醫生治病屬被動行醫。預防疾病比治病更重要，做預防疾病的工作屬主動行醫。她目前做的工作是她理想中的主動行醫，她願意幹拯救大多數人的事。

1990年7月15日她退休那一天，回絕了醫院返聘她的請求。她主意已定：繼續講演、寫書。迄今，她到省內五十多個縣市講演五百多場，直接聽眾十五萬。講演費、稿費，高耀潔專款專用——印製宣傳品、買信封、郵票。「我不會在國難上搞錢花。」她說。高耀潔心中國難的排位是：戰爭、洪水、疾病。

自編防治性病、愛滋病宣傳材料

1996年4月7日，省內一家部隊醫院請她為一疑難女病人會診。高耀潔從患者腹部出現的暗紫色斑點、高燒不退等體徵大膽推測：此人得了愛滋病。後證實高耀潔的推測正確。患者臨終前，懇求高耀潔：「我有病輸了一次血，咋就會死呢？我不想死，不想死，求求您了，救救我，高大夫，我女兒還小，她離不開我……」這個無辜患者的死，使高耀潔認識到愛滋病的可怕和預感到它蔓延的趨勢，她開始收集愛滋病的資料。

1996年冬天，她拿出講演費五百元、省文史館、宋慶齡基金會資助她的一千二百元印製了第一期「防治愛滋病知識」宣傳紙一萬二千張。紙張塞滿了屋子，她抓緊時間打包成捆，然後，七十歲的她背一布包奔去火車站，在人員稠密處，中原寒風中，她見一人給一張。常常是過客接過後，眨眼工夫扔掉了。星星閃爍的夜空下，綽綽人影腳踏白紙片片，這樣的場景讓七十歲的她寒心而無奈。紙張上有意書寫的「注意保存傳閱」的話被人踐踏後伴寒風隨意飛捲。高耀潔待無人可發時，彎腰



拾起傾注滿腔心血的紙，揮揮土，背回家。最讓她傷心的是那撕成碎片的紙……回到家，家人的不理解使高耀潔前進的路更加泥濘。鬱悶中，她冷靜地算帳：「一萬份材料有一半被傳閱，至少五千人得到防愛教育。給每個長途車送上二十份，天黑後，至少落腳到四五個遠郊縣。少一個愛滋病患者，等於少一群被感染者。花小錢辦大事，值！」

馬路上散發效果不好，高耀潔在熟人的幫助下，與醫院、學校、農村、報亭建立聯繫，定點發放，還嘗試過隨信送達。三年摸索，高耀潔認為最有效的傳閱是講演前的發放，它有教材的效果。1997年，高耀潔以婦科教授、人大代表的身分對省內五所女監進行相關科研課題的社會調查。結果，使她憂心忡忡。調查的一千一百八十五人中，92.7%患性病。最讓高耀潔心寒的是犯人的認罪態度。一名十九歲犯人對高耀潔的檢查提問露出得意之色：「俺身上就這點兒肉能賣錢，俺家的房子都蓋起來了。」高耀潔自第二期宣傳材料始，總標題定為「防治性病、愛滋病知識」。1997年是她最忙、最累的一年，講了六十七場。因勞累心肌缺血，住院三個月。三個月的病人生活，讓她卸下一個負擔——老伴改變了反對派的立場：「得得，我以後多為你跑跑，只要你身體好，沒病沒災就成。」但做醫生的子女仍對早出晚歸講演、寫書、散材料的媽不理解：「好好的日子不過，家不像個家，不明白您到底圖個啥？」這一年，不被理解的母親成了遊醫的剋星。日後，母親的行動直接影響了女兒的前程。

阿陳悲劇自揭遊醫真相

1997年6月26日，高耀潔送同學到火車站。見一農民夫婦邊哭邊罵：「害死人了，害死人了，藥騙子，還我兒啊！藥騙子，你早晚得暴病見閻王……」高耀潔蹲下細問來由。原來農民夫婦買了治療四歲兒子癲癇病的「祖傳秘方」郵購藥，結果幼兒因苯巴比妥中毒身亡。高耀潔問：「從哪裏得知祖傳秘方的？」「報紙上。」男人遞給高耀潔某省

報。「遊醫」，高耀潔的第一反應是「騙財害人」。自這天起，她注意起報紙廣告，發現省內治療性病的廣告多而雜，「難道河南省是性病大省？鄭州市是性病大市？」責任感驅使她按廣告地址找到醫院，然後暗中觀察。幾次踩點，她搞清楚：「福建莆田人承包了醫院的某科室，僱在職或退休大夫按照承包者的意願診治。不是性病的說成性病，能短時間內治好的盡量拖延時間，目的，一個，騙錢。」在某醫院，她親眼看見承包者調包藥品，給患者注入生理鹽水；化驗的尿樣偷偷倒掉，直接在化驗單上寫加號。

行醫三十七年的高耀潔震驚、憤怒了！憤怒最初發泄在講台上。「警惕遊醫」成了她講演的新內容。人大代表的責任感驅使她「晚年再多一事，收集遊醫罪狀，給上邊打報告」。

《一個愛滋病病人的懺悔》，高耀潔向人們講述了一個真事。閩南漁民阿陳見表哥外出治花柳病賺大錢回鄉，動了心，於是買了幾本醫書、一些藥品走過東北、河北、河南、安徽、四川、江西等省。阿陳的致富路由租民房、電線杆上貼廣告到與人共同開診所；從搬着書本治病到自己做老闆請專家名醫為己打工；從包治性病到皮膚病、疑難雜症，幾年下來，阿陳家裏蓋了樓，後接出妻女，又生一兒。阿陳承包了一家醫院的科室，租房七間，掛牌「性病防治中心」，承包合同三年。合同書上寫明：甲方（醫院）為乙方（承包方）的管理單位。第一年，乙方需向甲方上交二十二萬元承包管理費，第二年上交二十三萬，第三年上交二十四萬。合同期間，甲方提供醫院的發票，水電費、房租免交，並有責任協助乙方做廣告。乙方單獨做化驗、賣藥、收費等。阿陳的經驗是：不花錢辦不成事，花小錢辦小事，花大錢辦大事。錢，買通了阿陳想買通的一切。性病防治中心明碼標價，治牛皮癬、白癜風一萬六千八百元包治；治尖銳濕疣、淋病五千元至三萬元不等。阿陳給專家名醫開工資三千元至五千元，他們按照老闆阿陳的旨意治病——療程拖長；沒病變有病；小病變大病，動員家屬同來治病。一女大學生患泌尿系感



染，阿陳說得了性病，要交五千元治療費，該女生想不通，險些從學校七樓跳下。一名二十六歲受過高等教育的男子有潔癖，總擔心自己有性病。經阿陳檢查，證實了自己的疑慮。十天花了五千元，未癒，於是買了安眠藥準備自殺。高耀潔得知此事，帶該男子到醫院檢查後，告訴他：「你沒病」。

高耀潔給上邊遞了狀子。阿陳找了醫院院長。院長怒了，拍桌子：「有人竟敢告黑狀，爲了個人利益出風頭，不管別人吃飯不吃飯……不就是誤診了嗎？有什麼大不了的！誰要再敢胡鬧，小心我端了他的飯碗……」爲這事，高耀潔的同學、同事與她生分了，因他們在阿陳手下打工。他們勸高耀潔：「咱們窮了一輩子，老了就爲兒女掙點兒錢，你告狀、告狀，這是何苦呢？誰都沒好處，不愉快。」高耀潔決絕地與舊相識斷了幾十年的交情。

就在阿陳的生意做得火爆時，八歲女兒被撞斷左腿，阿陳爲女兒輸血二百毫升後身體每況愈下。全家都得了一種怪病，後被醫院檢查出四口人都得了愛滋病，病因在阿陳，他接觸的性病患者中有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兒先亡女後死，三十二歲的阿陳在閩南老家說着後悔話咽了氣。1998年11月，阿陳的妻子在扶持丈夫的生意走過風光之後隨親人回去。高耀潔在第六期的宣傳材料上登載了《一個愛滋病病人的懺悔》。現高耀潔手中有一患接觸性皮炎的三十六歲女工寫給丈夫的遺書：「……若老天有眼，這幫遊醫這輩子都不會有好日子過。他們裝腔作勢把婦科病當那個病治，有可能在治療過程中把我感染上了那個病，爲了騙錢，他們是不擇手段的……你要照顧好女兒……」

調查中，高耀潔發現患婦科病症的婦女盲目相信祖傳秘方，結果她們成了遊醫製作的「種子栓」、「清宮丸」的受害者。

1998年，高耀潔花八百多元訂閱十九種報紙，專門收集遊醫廣告，然後按圖索驥，根據事實真相上報中央、下報省市以盡人大代表、有良知醫生的責任。1997年8月31日，高耀潔在《鄭州晚報》上撰文諷刺

《醫壇四大「高手」》。

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

1998年1月24日，在文史館員迎春會上，高耀潔將調查報告面呈省長馬忠臣：「根據本人近半年的親身調查，發現我省各地市仍有大量遊醫、庸醫、假醫、騙子利用他們手中的錢，收買了某些公立醫院的貪官，承包租賃了醫院的科室，搖身一變成了『性病專家』並在各種媒體上大做廣告。由於群眾反映強烈，有的廣告改成治療泌尿科疾病。此風愈演愈烈，不可小視……此函萬望重視……」高耀潔隨信附上幾張掛羊頭賣狗肉的廣告。1月25日，馬忠臣批示：「限期整頓非法醫療活動並將此事作為一件大事常抓不懈。」3月30日，省政府召開全省整頓醫療市場的會議，一場整頓假醫、假藥、假郎中的活動在全省展開。與此同時，高耀潔致信中央，力陳遊醫是我國醫療衛生系統一顆毒瘤，需盡快剷除。9月29日中央二台播發了高耀潔憂國憂民的信函。

1998年1月22日下午，高耀潔接到恐嚇電話：「性病中心是為了治病救人，你不實地亂說，你再多管閒事，小心一點啊！」這年，某報社中層領導不滿高耀潔：「這個老太婆把了一爪子，我們少收幾百萬（廣告費）。」高耀潔的小女兒郭炎光是皮膚科醫生，皮膚科被遊醫承包了。打假運動開始後，遊醫走了，郭炎光受到社會壓力：「有人告黑狀，不管醫院死活。」女兒埋怨母親「六親不認」。高耀潔訓女兒：「我要管你們醫院死活，誰來管老百姓死活？」並數落女兒不像她的脾氣。目前郭炎光的工作沒有着落。說到此，高耀潔摘掉眼鏡，抹淚：「當媽的，誰不心疼孩子？我是沒辦法。她心裏不痛快我也難受，她的工作是我一塊心病。」儘管內外壓力在身，7月25日，高耀潔仍以「一位文史館員的呼籲」給相關部門寫了四十封信「關於整頓非法行醫的建議」。

「1999年入夏以來，遊醫活動反彈，比以往還倡狂。某遊醫說：



『在這兒我們不管啥法經營，大官顧不上管，小官給他點好處他不肯管，只有一個老太婆，拚命反對我們，她已七十多歲了，活不了幾天了，還是在河南幹着合適。』……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就是要為老百姓的痛苦呼籲，其中艱辛一言難盡。有人說我『為了個人利益來管』，其實近兩年來，僅調查路費一項就花了三千多元（因本人七十多歲了，走不動了，多數時間是打的。）。雖然如此，但不灰心，我要一直幹下去，若本人遇有不測或我家人出現意外。只希望變成淨化醫療系統之動力，讓老百姓不再受這樣的痛苦。最後呼籲有關部門解決這一公害。」

高耀潔幾年孤膽鬥遊醫，為民衆疾苦捨身除害的義舉引起媒體關注。1999年7月22日，河南衛視放映了高耀潔的事蹟，8月15日起至記者採訪止，高耀潔接信五百九十九封，90%以上的讀者索要宣傳材料。山東濟甯市建築工程管理局劉慎剛稱高耀潔：「您是中國的脊梁，您是中華民族之魂。」受到鼓舞的高耀潔花五千元印製了第七期宣傳材料。六萬三千張紙堆放屋中，老伴折疊，高耀潔按寄信人的姓名地址逐一登記，發放。9月26日一天，她和老伴在住了四十多年的老屋中寄了二百二十四封信。這座1954年的房子已破舊頹敗，醫院曾分過高耀潔新房，但她的算盤是：「住新房就得花錢買，錢用在買房上了，印材料的錢哪兒找去？湊合住唄。救活個把人比買房子值……」

坐在昏暗堂屋裏，聊國事家事的老人的頭上懸掛一對聯——「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她說：「人老了，有心無力，只希望那些被國家養起來的退休大夫別再為遊醫幹事，要為國家出力，起來跟遊醫鬥。人說我是發揮餘熱，這話我不愛聽，活着幹死了算，這話投我的脾氣。」

當記者與她握手言別，望她注意安全時，瘦小的老人從對聯下站起：「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後 記

當本書完稿之後，令人首先想起愛滋病病毒污染血液傳播流行，開始的時間有文字記載：遠在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教授報道了醫院血庫的存血「被愛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孫永德主任醫師發現血庫存血被愛滋病病毒污染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二十年。河南王淑平醫生，她原來負責血站的管理工作，發現賣血人當中有13%感染愛滋病，她以中國的血站數和每所血站的賣血人數（10%的感染愛滋病）計算出共有五百萬人感染愛滋病（不包括輸血感染的人）。1995年5月也開始向有關部門反映過這個問題，她被打壓下來了。

我在河南接觸的第一例愛滋病病例是在1996年4月，從那時算起，到現在也已經有十四年了。

歷史曾經給了中國人寶貴的機會。如果在那時，孫永德主任醫師和我，以及其他一些專家發出的預警信號時，能得到政府和社會的應有重視，愛滋病病魔已經來臨的警報能夠早日響起，愛滋病通過血液傳播的途徑能夠得到及時的阻斷，那麼我們還有機會在這場「世紀災難」剛剛降臨時，就把它扼殺在萌芽之中，最起碼也可使它不能快速地擴大範圍傳播。

但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這個寶貴的機會被一些愚蠢而又短視的權勢者放棄了。一次又一次的預警報告如泥牛入海，專家的大聲疾呼成了曠野中的孤鳴，強大的權力機器對此的答覆是異樣的沉默——不僅是因愚蠢而麻木不仁，而且是因私利而裝聾作啞，緊接着而來的是令人髮指的倒行逆施：他們把愛滋病傳播的真實情況和原因掩蓋起來，不准媒體報道，不讓公眾知情，甚至對警報的發出者和報道者進行打壓。同時又大搞「面子工程」，製造「鶯歌燕舞」的假像。目的只有一個：盡力捂住蓋子，推卸應負的責任，以保住他們的烏紗。



結果呢？就是當前不得不面對的可怕現實：「血禍」在中國大地上的惡性大爆發，隨着「血禍」增加了愛滋病疫情……

如今，一向對愛滋病疫情輕描淡寫，不承認有大範圍傳播的政府也不得不有限度地承認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2005年左右，官方提供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數位是將近八十萬人，2007年之後又變成七十四萬人了。這個信不信由你的數位肯定是不完全的統計，而且顯然是縮了水的，並不能說明危機的真實面貌。但就這個數位，也已經令人震驚了。不過更讓人痛心的是，如今，血站轉入地下，愛滋病繼續傳播，2010年湖南、湖北、廣東均有病例報道。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詩經·大雅·烝民》）可爲什麼這個蒼天的法則竟然拋棄了廣袤大地上的中國百姓？

二十年來，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愛滋病病毒已經悄悄地感染了多少人？其中有多少人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血漿經濟」的狂潮中因賣血而被傳染的？又有多少人是到醫院求醫時因輸血而被毒血感染的？已經被這種必死的疾病吞噬的生命有多少了？現在正在發病的有多少人？每天進入這個死亡候車室的新感染者還有多少？這場「血禍」最終會導致多少生命和家庭的悲劇？……這些，都已經被裝進了一個巨大的黑箱，成了永久的歷史謎團！

由於本人的經歷，在坎坷不平的八十年的歲月裏，養成了同情弱勢群體的習慣。因此，對我這個醫生來說，很清楚愛滋病所造成的死亡，不是一個簡單的抽象數位，而是一串串真實的姓名和面孔，一個個慘不忍睹的場面，一聲聲淒厲絕望的哭聲，和一片片連綿不斷出現的新墳……

我一直相信，人是會撒謊的，可鏡頭向來不會撒謊；抽象的數位容易忽略，可真實形象的紀錄有更大的感染力；大腦是會遺忘的，書中照片能讓人找回失去的記憶。我是個醫生，不懂這些照片有沒有藝術價值，但我敢保證它們是真實的，其中沒有一張是像「周老虎」那樣的假

貨。

2007年發現有關警員執法感染了愛滋病，有據可查者幾百人，爲了保護警員不受傷害，必須向他們宣傳防愛知識，自2007年6月2日至8月26日，我先後向全國縣以上公安局寄去二千七百一十九包防愛書籍，正是出版物《鮮爲人知的故事》（此書2004年獲得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以本人十多年寄書、贈書的經驗，受書單位一般會回信，同時會因包裝地址會寫出錯誤而退回，可是這二千多包書寄出四個多月後，未出現任何消息，我派人去郵局詢問，同時託熟人到有關公安機關打聽，哪個公安局也沒有看到我的贈書，難道說是有關人員怕警員知道愛滋病傳播的真相嗎？

2008年春發現我和其他同事的幻燈片和光碟也遭到封殺——大概是有礙官員們「面子」和「政績」了。我不禁感到又可氣又可笑：他們竟然像老鼠害怕陽光一樣害怕真實。真是「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詩經·邶風·相鼠》）

爲了剝去這些無恥老鼠的皮，也爲了繼續我的防治愛滋病宣傳，更爲了保存這段不應被忘記的歷史真實，我已八十四歲了，出這本書的目的是供讀者認識愛滋病的傳播真相。2009年被迫遠走國外，也是爲這三本書聞世，作爲歷史的一頁，可能是世界上逃亡者中年齡最大的人。

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是書中提及受愛滋災難者，如今已經輾轉在病榻上苟延生命，或者已經含恨躺在那些連綿的新墳中了……這些貧窮的農民很少有機會照相，或記事情節，這會成爲他們卑微的生命和慘痛的經歷的記錄了！

當我在愛滋病疫區看到社會底層那些無辜的弱勢百姓掙扎在愛滋病的魔爪下時，經常想起《詩經·大雅·瞻卬》中的名句：「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因爲我揭發愛滋病疫情的實況遭到打壓和迫害，這本書是侮辱我的無恥者迫使我寫出來的，當我遭到權勢者的走卒散佈的污穢謠言中傷



時，想起了《詩經》的另一段：「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那些身居重位的權貴們，舞動惡毒的長舌，發出貓頭鷹一樣的叫囂，他們才是這些污穢謠言的大本營！我要用事實回擊他們，讀者當你看完書中的愛滋病病人和家屬的照片之後，你會了解到權勢們多麼骯髒！

因我揭露愛滋病的真相而遭到強權的迫害，並株連了親人，特別是直系親屬，事例太多了，近期出版又兩本書，又是揭發中國愛滋病的真相，可能會有更慘的遭遇，爲民間留下真實歷史，本人死復何恨！我常默默地背誦《詩經·邶風·柏舟》的詩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疊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這些詩句簡直就是我的心聲。這十四年來，我就像在激流中駕着一葉柏木小舟頂風衝浪，隨時都有滅頂之災。常常長夜不安難以入睡，心頭聚集着無窮的憂愁。……我爲愛滋病患者的命運而憂，又爲那些惡毒小人的逼害而怒。在遭遇無數的痛苦和侮辱以後，我靜下心來思前想後，心潮難平。我怨天上的日月，你們幹什麼去了？爲啥不放射光芒照亮人間？我心中的憂愁抹不掉，好像沒洗的髒衣裳。我只恨自己沒有一雙翅膀，帶我飛離這苦難的大地……

有人問我，你這麼大歲數了，該頤養天年了，還整天操那麼多心幹嘛？我總用「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國風·黍離》）來回答。我憂的是「血禍」未止，「愛魔」未滅；我求的是這場「世紀災難」早日結束，苦難的人民早日擺脫苦海！他們生活在最低層，文化水準低，沒有能力喊出疫情的苦難，這個弱勢群體太慘。

我已經年逾八十四，自知來日無多。這場慘烈的「血漿災難」，我怕是看不到盡頭了。上世紀50年代，馬寅初先生發出口警報：「不

控制人口，不實行計劃生育，後果不堪設想。」但沒有被權勢者接受，反而遭到了大批判。結果是讓今天的中國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成了走向現代化的巨大障礙。

時隔半個世紀，這個悲劇又出現異樣形式的重演。我敢斷言：用不了五十年人們就會看到，愛滋病帶來的災難恐怕比人口災難要更加慘烈，後果更加嚴重！到那時，人們再看看我留下的這些資料，回味一下我今天說的話，才會理解我這個八十多歲老人最後的遺言是正確的——可惜到那時一切都晚了……

請記住我這個老人的呼喊吧！

高耀潔 寫於2008年3月1日
2010年5月1日重修

「我家擁有巨大的財產，僅田地就有三十六頃，在那個時代，是不折不扣的名門望族。由於我出身於這樣的家庭，自我五歲起就開始讀私塾，接受儒學教育，奠定了我的人生觀和以後要走的道路：尊重他人，憐憫弱勢群體，堅持實事求是，從不畏權貴勢力。」

八十多歲的高耀潔教授，一直是中國抗擊愛滋病的勇士，贏得國內外的讚譽和敬仰。她以往堅拒撰寫回憶錄，覺得幹實事比立傳更重要。但網上謾罵攻訐的言論使她不得不改變主意，親撰回憶錄公開家世，駁斥謠言，以正視聽。正直不阿的老人細說個人和國家跌宕的命運，使這部回憶錄的意義和價值遠遠大於闢謠。

這書分成兩部分，「上篇：高氏家族和我退休前後的生涯」是高教授的自傳，童年、戰亂、當流亡學生、當上婦科醫生、下鄉、文化大革命、被批鬥、自殺未遂、兒子冤獄、被勞改……透過閱讀她的身世與苦難，我們其實也在閱讀中國近代史。高教授的每段經歷，也是磨難，而且，磨練出她那不屈的人格。

此書第二部分，即「下篇：退休後遭遇的愛滋風雲」，則是中國愛滋病疫情的詳細總論。從打擊性病遊醫，到遇上第一個愛滋病人，繼而揭發中國內地因為人民賣血而引起的災難性愛滋疫情，一直描述至她因此而被打壓、監視、軟禁，有獎領不得，連帶其他跟她有聯繫的人均被監控或教唆出賣的等等情形。

此外，此書在2008年出版的時候，高教授仍身在內地，故原書的內容也是寫到當時為止。現在的增訂版本新增交待了其後的事情——高教授為什麼以八十三歲高齡，最終也得踏上流亡之路，與及到達美國後至今的生活。

最後，請留意高教授把她的遺囑也收錄在這書中去。為什麼她要這樣做？為什麼她要連遺囑也向所有人公開？當中反映的，是不是更值得我們深思？

HK\$ 98

M070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78-962-8993-14-7



9 789628 993147 >